

亲 历 亲 闻 亲 述

SANLIAN
WANG
SHI

马骥 主编

三边
往事

中共定边县委史志办公室

《三边往事》编（审）委员会

主 任：贺子明

副主任：张生平

杨志先

委 员：高景林 张振武 杨卫东

马 骥 任学友 王国伟

惠汉民 刘前进 王道虎

艾 君 冯进堂

主 编：马 骥

副主编：田生贵 苗斌杰

编 辑：高登生 高强娥 李 青

夏 渊

序 一

中共榆林市委秘书长，原中共定边县委书记：尚洪泽

三边，是定边、安边、靖边的合称。位于陕甘宁蒙四省区交界处，“东接榆延，西通甘凉，南邻环庆，北枕沙漠，土广边长”，古长城横贯东西，为军事要冲和塞上商贸物资集散地，素有“三秦要塞”、“旱码头”之称。曾是陕甘宁边区五个分区之一，今天更以石油、天然气开发而驰名，成为人们向往的热土。

三边地区是一块人杰地灵、厚德载物的塞上沃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革命的星火在这里点燃。1926年2月，定边就建立了党的组织——中共定边支部。1927年至1932年间，刘志丹、谢子长以及刘澜涛、张德生、阎揆要、马文瑞等一批陕北革命先驱先后在三边进行革命活动，开展武装斗争。1935年2月，定边县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定边县革命委员会在凤凰寺蔡庄（今属吴起县）成立。10月，中央红军途经定边县的白马崾崴、张崾崴、罗庞塬一带，到达吴起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在此留下光辉的足迹。1936年6月，西征红军解放了定边，成立了中共定边县委和中共三边特委。从此，定边作为三边特区（分区、地区）首府所在地，下辖定边、安边、靖边、吴旗、盐池和三段地等县（区），在陕甘宁边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民领导的中央经济工作团，贾拓夫、毛齐华领导的中央三边工作巡视团，李维汉领导的中央定边工作委员会，高岗领导的中央少数民族委员会，董必武、成仿吾领导的中央党校先后在此成立和开展工作。

三边地区解放前，由于历代反动统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经济困难，文化落后，人民生灵涂炭，长期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三边解放不久，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内战，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残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对顽敌，三边人民不怕流血牺牲，

坚持反内战、反封锁斗争，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保卫了红色政权。抗战时期，三边的优秀儿女又一批批参军参战，驰骋疆场，英勇杀敌；同时，广大人民节衣缩食，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把大量的食盐、皮毛、甘草等物资送往前线支援抗战，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在解放战争的峥嵘岁月里，三边人民浴血奋战，创造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谱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解放全中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世纪新阶段，物华天宝的三边地区，以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原盐等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土地资源，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三边地区前景无限、大有希望，同时也召唤着新一代三边儿女要用先辈那股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向资源开发和文明建设进军，发展特色经济，加快脱贫进程，努力把三边建设的更加繁荣、更加秀美、更加和谐。

《三边往事》这部革命回忆录，是定边县委史志工作者精心筹划，辛勤劳动的又一丰硕成果。它以丰富的内容、翔实的史料，全面展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三边浴血奋斗的光辉历程，客观地记述了革命先辈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真实地再现了老一辈革命家非凡的睿智、卓越的指挥才能、高超的斗争艺术、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廉洁朴素的生活作风，是一部难得的史实资料，也是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好教材。该书付印出版，追怀史实，憧憬未来，我认为，对歌颂先贤、资治当代、启迪后人，变精神财富为物质财富，是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

2006年9月5日

序 二

中共定边县委书记：邵胜凯

三边是革命老区，属于陕甘根据地的一部分，对中国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为了把这段珍贵的历史保留下来，缅怀先烈，追忆过去，教育后人，启迪未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5 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70 周年之际，革命回忆录《三边往事》，经县委史志办公室同志的不懈努力，终于编纂成书。戎马生涯，转成文字；革命历程，凝为史册。我衷心祝贺这本书的出版。

翻开《三边往事》，犹如开启一扇厚重的历史之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三边地区诞生、发展、壮大的奋斗历程，是党领导三边人民为推翻旧制度，缔造新中国，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烂漫画卷。它以动人的笔触，珍贵的史料，从各个不同侧面记述和反映了三边地区当时火热的革命斗争。书中那大量具体生动、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革命事迹，把我们带回到血火拼搏，永难忘怀的峥嵘岁月。这里的山山水水蕴蓄着革命的火种，一旦进步文化思想传来，唤醒人民，立即燃起革命的火把，并成燎原之势。大革命时期，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党组织和创建革命根据地较早的地区之一。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到来和陕甘宁边区抗日大后方的形成，使之成为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三边是陕甘宁边区的五个分区之一，包括定边、安边、靖边、吴旗、盐池和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中共三边地委、三边专署机关设于定边，使之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西北门户和前哨阵地，以食盐、皮毛、甘草为特色的三边丰富物产资源有力地支援了边区政府的财政。这里聚合了一批批有为青年，志士仁人，为人民的翻身，民族的解放建立了功勋。不难看出，发生在三边的党的活动在陕西党史，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革命先辈在三边表现出的崇高品质和光

辉形象，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建设中创造和积累的丰富经验，对我们今天的三个文明建设仍然具有巨大的精神推动作用。因此，把对三边党史的研究、编纂工作搞好，述往事，思来者，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党史工作任重道远。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33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学习中国革命史，发扬光大党的光荣革命传统。《三边往事》作为一部承载历史、发扬坚韧不拔、奋发进取精神的史实资料，能够颂扬英贤、资治当代、启迪后人，焕发精神，具有很好的史料价值和资治作用。我希望全县的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读一读这本书，弘扬革命精神，借鉴历史经验，热爱家乡，建设家乡，为把定边的各项事业建设得更好作出新的贡献。

2006 年 9 月 15 日

目 录

序一·····	尚洪泽 (1)
序二·····	邵胜凯 (3)
我参加革命初期的战斗生活片断·····	牛化东 (1)
我在定边工作的一段回忆	
——建立共青团定边县工作委员会·····	刘澜涛 (9)
定边任团兵变前后·····	孙怀明 (11)
链接 马云藩：高广仁旅投诚后被歼灭的经过·····	(13)
安边张团兵变与田佐勤遇害·····	汪兴民 (15)
陕北红军在定边南部山区的早期活动·····	白彦杰 (17)
苏维埃定边县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王玉海 (19)
红六军团在定边	
——日记选摘·····	王恩茂 (21)
红军来到马庙湾·····	罗正莲 (25)
三边事变·····	刘景范 (27)
六月西征·····	彭德怀 (39)
挥师西征迎战友·····	刘华清 (43)
解放定边、盐池·····	韩先楚 崔田民 (46)
红八十一师在西征甘宁途中·····	李赤然 (51)
西征中在安边“围城打援”·····	李志民 (54)
西征中的安边之战·····	赵立业 (60)
东征西战的红二十八军·····	宋任穷 (62)

在定边三个月·····	李维汉 (66)
链接 罗迈：定、盐城市工作的两个教训·····	(68)
忆拓夫·····	白 茜 (73)
链接 贾拓夫：关于新区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76)
难忘的 1936 年·····	史梓铭 (82)
忆中央三边工作巡视团·····	毛齐华 (85)
链接 刘晓：正在开始活跃的蒙古民族·····	(88)
打土豪 分田地·····	张守杰 (90)
峥嵘岁月·····	左有礼 (92)
往事漫忆·····	贾生财 (94)
到前线去	
——1936 年定边之行·····	丁 玲 (97)
链接 丁玲：广暴纪念在定边·····	(101)
毛主席召见马怀荫·····	金三寿 (103)
三去定边 至今难忘·····	李坚真 (106)
怀念当年事 历程多艰辛	
——在定边工作的片段回忆·····	李志恒 (109)
定环县回忆点滴·····	陈玉山 (118)
三边党政组织建设情况回忆·····	惠庆祺 (120)
初到陕北的中央党校·····	李维汉 (123)
红二十九军纪事·····	刘葆璋 (125)
从井冈走来	
——戍守定边·····	周仁杰 (130)

难忘的教诲·····	肖劲光（153）
步履苍尘	
——三边工作回顾·····	邓国忠（156）
三边到伊盟 齐心支抗战·····	白如冰（172）
往事断想·····	白栋才（175）
我在三边分区的两年工作·····	王世泰（178）
我在三边工作时的一些情况·····	强晓初（184）
一项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事业	
——关于定边产盐、运盐的回忆·····	罗成德（188）
塞上风云	
——戍守三边纪事·····	贺晋年（195）
戎马倥偬忆定边·····	张文舟（206）
关于安边事件与十一旅起义·····	黎 光（209）
关于三边整风运动的回忆·····	孙润华（211）
我所知道的三边保安部队和三边整风·····	牛生祥（213）
三边保安部队始末·····	李存全 李红先（215）
三边盐业生产回顾·····	张永励（218）
记老湖打盐·····	范自慎（221）
陇东运盐·····	杨正喜（225）
三边税务局的成立与发展·····	原子美（227）
塞北毛织工厂忆述·····	朱霁云（229）
忆三边师范与三边公学·····	刘若曾（233）
我在三边师范的学习生活·····	朱 瑜（237）

三边公学简况·····	郭永诚（240）
在三边公学的学习生活片段·····	史继法（242）
延安民族学院迁定三事·····	张 杰（246）
忆诗人李季·····	张子良（249）
链接 李季：想三边 ·····	（251）
在《三边报》工作的日子里·····	刘 山（252）
定边民教馆和“七七”剧团的建立与发展·····	宋绍文（256）
战士的足迹·····	崔 伦（263）
夜袭兴武营·····	白寿康（271）
閤门战斗中的警八团·····	惠世恭（275）
当年鏖战急	
——忆閤门战斗·····	刘玉珠（281）
马鸿逵进犯三边的一段回忆·····	吴志渊（286）
定边突围·····	牛化东（288）
战时生活回忆·····	顾生杰（291）
战斗中发展壮大的定边游击队·····	邬怀礼（295）
回忆二区武工队·····	汤铭鉴（298）
在武工队的日子里·····	朱 瑜（302）
袭击安边战斗经过·····	牛化东（305）
收回教地的一点回忆·····	李维钧（310）
在安边县政府的两年·····	张文辉（312）
三边岁月·····	李子奇（318）
三边分区建团工作的回忆·····	白纪年（326）

解放战争中的安边游击战·····	刘汉鼎（329）
沈口子民兵叛变见闻·····	邹士杰（332）
张廷芝落网记·····	朱秉才（335）
后 记·····	（337）

我参加革命初期的

战斗生活片段

牛化东

牛化东（1906—1995）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曾用名牛杰，牛殿英。陕西定边王来滩村人。1925年入团，1926年转党。1927年被派到西北军从事兵运工作。在西北军历任排长，连长，新编第十一旅参谋，军械官，副团长，团长。1945年10月25日参与领导该旅于陕西安边起义。后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兼三边军分区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宁夏军区参谋长，银川军分区司令员，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宁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一、定边高小入党

我是陕西省定边县王来滩人。1925年8月在定边高等小学念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8月转党。据我所知，当时定边党员有汤仲甫、赵炳日、龙惠民、丁子齐、郭子范、马兰等；安边党员有刘世庵、冯子舟、李锦春、刘子贞、田佐勤、吕振华、沈玉娥（女）等。这些人大多数是在绥德四师、榆林六中念书时入党的。毕业后都陆续回到本地搞地下工作。同时，从外地来的党员有周梦雄、周发源。以上这些人是定边最早的党员，是定边党组织的“创始人”。

那时，地下党员大多数分布在教育界，主要任务是一边教书，一边在学生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我曾记得，这些从事教育事业的地下党员，工作很认真。他们除教授学生学好国文、算术、史地、体育等文化课外，还经常给学生发一些马克思主义小册子和进步刊物，让学生阅读，启发学生的革命觉悟。经过他们的精心教育和培养，青年学生眼界开阔了，思想进步了。我当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接收入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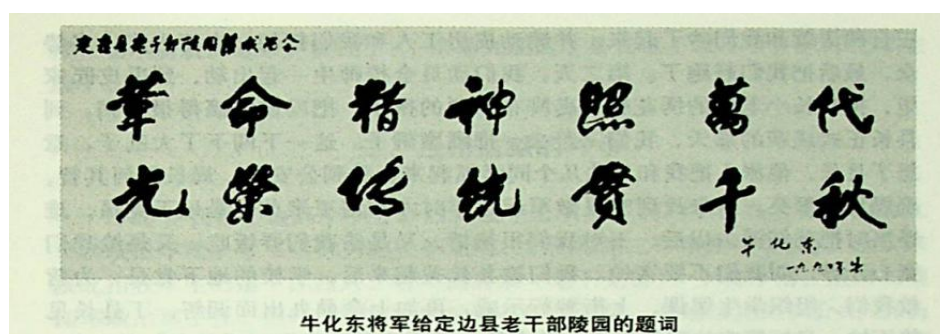
1926年放暑假的一天，汤仲甫、周梦雄、丁子齐找我谈话，介绍我入党。并通知我到城南沙窝宣誓。宣誓地点是在一个四周高、中间凹的沙丘里进行的。为了保密起见，还派一个人在沙梁上放哨。参加我入党宣誓仪式的还有赵炳日、龙惠民、周发源等人。我记得当时介绍人讲了话，我宣了誓，誓词大体内容是：志愿入党、服从组织、严守秘密、牺牲个人、努力革命、永不叛党。宣誓以后，我们分散回到城内。我就是定边学生中第一个入党的人了。此后有张元桢、黄明（又叫黄庚甫），还有一个榆林毛毛匠的儿子叫要希贤的先后也入了党。

二、领导闹学潮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逐渐传播到了中国。1919年在北京爆发的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我们定边的地下党员在“五四”运动革命精神鼓舞下，于1926年前后，组织和领导学生闹学潮，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一）改组“劝学所”，夺回教育权。当时定边的教育权（包括教育经费、房屋、土地等）掌握在当地绅士所控制的“劝学所”一些人手里，有些绅士就是“劝学所”所长。他们向学生灌输旧封建礼教，束缚学生思想的发展，对我们开展活动极为不利。因此，我们就组织和领导青年学生向绅士展开斗争。在斗争策略上，孤立顽固派，争取和团结进步势力，利用矛盾，分化瓦解。

余鼎九是定边有名望的绅士，是定边文武二“圣人”的“武圣人”。他既是“劝学所”所长，又带民团；既掌握着兵权，又有教育权，但他是一个比较开明的绅士。所以，我们就积极做他的工作，争取他的支持，以便达到把“劝学所”改组为教育局，把绅士所管的教产收归教育局，用教育经费办平民职业学校等目的。当时，绅士白炳汉是顽固派，他勾结国民党定边县县长丁鸿藻，不愿意把教产交出来。但余鼎九支持我们，他说：“你们出头，我说话”。当时县长对余鼎九也有些怕，我们就利用这些矛盾，积极进行斗争。在我们的斗争和余鼎九支持的影响下，贾新庄贾仁、郑尔庄张怀明等绅士也支持我们收回教产的斗争。这样一来，使一些贫苦农民的子女得到了免费上学的机会，改变了过去只能在乡下念私塾，没钱进“洋学堂”的状况。我们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教育局也成立了，共产党员汤仲甫当了教育局长，教产也收回来了。



与此同时，学校也更换了一些教员，我曾记得，当时教育局把定边的苗举人和姓李的校长（关中人）等前清秀才都换掉了。聘请郝秀升、段景文、栾本植和一个姓施的（名字记不清了）当了教员。这些人的到来，再加上原有的地下党员教员，使学校的面貌为之一新。

（二）成立“天足会”，惹怒县太爷。那时定边的妇女和全国一样，都时兴缠脚。缠脚对妇女摧残的很厉害，给她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为了解除妇女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以定边高小为主，专门成立了“天足会”。郭子范任会长，我是副会长。由于受习惯势力的影响，“天足会”的工作阻力很大。为了打开局面，我们研究确定先从两个有名气的人身上“开刀”。一个是县长丁鸿藻的小老婆，一个是绅士白炳汉的小老婆。丁县长的小老婆是定边东街冯皮匠的女儿，还没有娶过门，头也上了，就准备马上成亲，

我们“天足会”的学生就到冯皮匠家里动员他女儿放脚。冯皮匠依仗县长的权势，顽固不化，三言两语就和我们吵了起来，并煽动皮房工人和我们打架。由于人家人多势众，最后把我们赶跑了。第二天，我们动员全校师生一起出动，到冯皮匠家里，把县长小老婆的绣花鞋、裹脚布都脱的撸了，把冯皮匠搞得很狼狈。到县长正式成亲的那天，我们又赶去，把酒席砸了。这一下闯下了大乱子，惹怒了县长，他派人把我和其他几个同学抓起来，关到公安局，局长是何其智，副局长王聚英。后来我到宁夏做军运工作时才知道王聚英也是地下党员，难怪当时把我们抓去以后，王对我们很热情，又是给我们弄饭吃，又是给我们宽心开导，叫我们不要害怕。我们被县长关起来后，学校的地下党员，为营救我们，组织学生罢课，上街游行示威，再加上余鼎九出面调解，丁县长见势不妙，只好答应放我们出去，并表示今后再干涉我们“天足会”的工作。

那时，杨虎城部驻定边，有一个齐营长很坏，这家伙与丁鸿藻勾结，狼狈为奸，为非作歹，经常干预学生运动，和学生关系闹得很对立，很紧张，有时竟以武力威胁我们。余鼎九当时支持学生，情况一紧张，他就睡在学校，同时还给学生发了几十支驳壳枪，把学生武装起来。我们有余鼎九的支持，胆子更大了，腰杆子更硬了，就跟齐营长一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斗争结果，齐营长收敛了，从此再也不干涉学生的行动了。

（三）反对天主教，把洋人驱逐出定边城。由于清王朝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允许帝国主义在中国传教，进行文化渗透。所以，外国洋人到处修建教堂。当时，洋人除在定边县白泥井、堆子梁一带修建了教堂外，还想在定边城内和城附近修建教堂，欺骗、毒害人民。我们就和洋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洋人在街南游说，我们就在街北讲演。我们主要揭露洋人的罪恶目的和他们的欺骗宣传，教育群众不要受骗上当。当时闹得很凶，洋人走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唱对台戏，当面痛斥。汤仲甫嫌学生讲得不带劲，就亲自登台讲演。汤的气魄大，讲得好，弄得洋人没有一点办法，最后，终于被我们轰出了城。所以，定边城以及城附近始终没有修起一个教堂。定边“眼光庙”里有个“同善社”，是个迷信组织。有一天，我们几个学生冲进庙里，三锤两棒子就把“同善社”给捣毁了。

我们的这些行动，深受群众欢迎，无不拍手称快。但丁鸿藻却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打击报复。正当学生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丁鸿藻又把几个学生抓了起来，罗织罪名，说我们砸“同善社”是犯上作乱，亵渎神灵。但我们不理睬他那一套，继续进行说理斗争。丁见我们态度强硬，加上余鼎九又出来为我们说话了。他对丁鸿藻说：“学生娃娃嘛！你们不能那样，动不动就抓起来，快放了。”余鼎九说话丁县长也不敢不听，只好把学生放了。

三、兰州监狱的斗争

1926年我在定边高小毕业以后，被党组织推荐到冯玉祥在兰州办的第二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全称为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第二军事政治学校）。这次来陕北招收学生的是个江西人，名叫钱清泉（地下党员），少将军衔，是第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当时，被招收的学生有的是党员，是通过党组织介绍去的；有的是非党群众，是通过私人关系介绍去的，成分比较复杂。我们一起离开定边先到宁夏。到宁夏以后，就把陶新亚、李临民、郭维化等地下党员留下了，以后他们就搞起了个宁夏国民党党部，实际上是由地下党领导的。三边到兰州的还有石英秀介绍的孙志元、党君祥等人。和我们一块到兰州的地下党员只有我和丁广智、吕振华三个人。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对共产党实行血腥镇压。到1928年，国民党还继续搞“清党”运动，三天两头抓人，搞得乌烟瘴气，我们兰州军校也不例外。但由于冯玉祥部队严密封锁消息，社会上发生的情况，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许多共产党员被抓去了，我们还蒙在鼓里不晓得。先是钱清泉不见了，随后，地下党员、学校政治部主任王孝锡（清华大学学生）也不见了。我们还议论说：“孝锡哪儿去了！”接着地下党员马林山、胡清祯、贾宗周等人都不见了。后来，我和一个地下党员马尔逊（清华大学学生）被抓进了监狱，才真相大白了。原来国共两党分裂了，蒋介石搞“清党”运动。我们被抓进监狱，有两条所谓罪状：一是钱清泉

招收的学生，都是共产党员；二是发现王孝锡一个小本子上记了许多人的名字，怀疑都是共产党员。其实，这是王孝锡在课堂上提问学生时记下的名单，哪能都是共产党员。所以，不是地下党员的人，也被抓了起来。连冯玉祥部队里军长、师长的儿子也抓进来了。宋子元不是共产党员也被抓进来了。

我们被抓进监狱，反倒比在外面知道的消息多。敌人也知道谁是共产党的主要人，谁是一般党员。所以，把我和马尔逊都单独关押，也有两个人关在一间房子，那都是普通党员。听说王孝锡在狱中斗争得很坚决，敌人严刑拷打，他什么也不招认。当时是冬天，我们就在炕席下边用火钳子钻了小洞，和隔壁房子的同志取得联系，统一口径，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全靠传递纸条进行联系，坚持斗争。当时，冯玉祥部队军长、师长的儿子也进行反抗，他们的家属闹得更凶。敌人看这样闹下去也不好，没有抓到真正把柄，所以就把抓进去的人编成“三民主义教育班”，由国民党中央派来的雒力学给我们讲课。学习了两个月，还进行了考试。当时地下党员都考得好，最后就把我们分配了。人家军长、师长的儿子仍回学校，地下党员被分到陕西的、甘肃的到处都有，我当时被分到甘肃无线电传习所当管理员，负责上街买材料修房子。有一天，在街上碰见吕振华，互相商量，仍回三边找党组织。但吕还在学校，行动不十分自由，我在“传习所”比较自由，所以商定谁得便，谁就走。后来，我就利用上街买东西的机会，偷偷跑到黄河边雇了一个木筏子，顺水一下子流到宁夏吴忠。1928年四五月间，我又回到了定边，在定边高小任体育课教员。但学校党组织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和过组织生活，无疑是审查考验我。又过了四五个月，学校党的负责人牛英卿才找我谈话，并说明我在外边这一段表现得还不错，正式承认我的组织关系。

四、地下搞兵运

1928年4月，陕北特委正式成立，并决定成立陕北红军游击队。要求共产党员要打进国民党军队（尤其是杂牌军）中，争取兵变起义，夺取枪支弹药，积极支援红军。

1929年冬，刘志丹到定边找到我说：“你搞教育不合适，还是搞军运工作吧！”我说：“组织决定怎干，就怎干”。他又接着说：“你们前一阶段搞得不错，斗争的很坚决，也很艺术。王子元新成立军队，我已经把你和吕振华介绍给王子元，你们就到他的部队去吧。你们的主要任务是搞兵变起义，夺取枪支弹药，支援红军。”我表示同意。他又说：“那好，我就领你去见王子元”。当即，刘志丹就把我和吕振华领到王子元那里，并作了介绍，王子元说：“好嘛！我们懂军事的人不多，正需要你们这样的人，你们是冯玉祥那里来的，到这里好好搞，英雄大有用武之地！”就这样，连春节也没有过，我们跟随王子元部队开到了宁夏平罗姚伏堡一带。后来，我一直在王子元部队里搞兵运。1932年5月，地下党组织领导的靖远兵暴失败后，我从王子元部队到石英秀的新十一旅搞兵运。新十一旅的前身是苏雨生的九旅。1931年春天，邓宝珊把石英秀部队整编为陆军新编第十一旅（石英秀任旅长）。当时，新十一旅的地下党的力量很强大。



1938年春，新十一旅又开赴榆林。当时新十一旅内部斗争很激烈，主要是地下党所掌握的进步势力与顽固派的斗争。

1940年前后，新十一旅调防三边。旅部及一团驻安边、白泥井；二团驻柠条梁、堆子梁。1941年秋，刘保堂被三边武装土匪头子张廷祥、张廷芝设计谋杀后，又围绕着旅长人选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由于三边分委和警三旅的支持，新十一旅地下党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让倾向于我党的陈国宾当上了旅长，为1945年新十一旅起义奠定了基础。

五、消灭张廷祥，夺回安边城

1941年9月3日，刘保堂派我到定边给新十一旅联系食盐。第三天，我正在定边西街理发馆理发，新十一旅一个士兵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说：“牛团副！张廷祥把刘旅长枪杀了，并将连以上的军官全部扣押了。两家打了起来，情况很紧张，你得赶快回去。”我听了士兵的报告后，赶忙把发理完，跑到分委向高峰书记汇报了情况。高峰听了又找来警三旅副团长廖纲绍等一起商量。最后，让我带一个骑兵连很快开赴安边。我说：“不用了，靠新十一旅自己力量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你们再派部队增援。”他们也表示同意。让我带了十几名换成新十一旅服装的战士赶到砖井。到砖井一打听，新十一旅已经撤出了安边，于是，我又赶到白泥井。高宜之、高昆山、朱子春、胡立亭等地下党员都在白泥井。当时我们就一块研究对策，大家一致同意打回安边去。但是，一、二团有矛盾，二团对刘保堂感情很深，为了争取二团的力量，我们打出了为刘旅长报仇的旗号，决定成立讨张指挥部，我任总指挥。并由我到二团做营长米杰山的工作，向他说明利害关系。我说：“咱们连个旅长都保不住，还互相闹什么意见，这样下去，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米营长认为我言之有理，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让我做了动员，大家痛哭流涕，一致表示决心为刘旅长报仇。

这时，曹又参营长也放回来了。于是，我又找他商量，让他当讨张指挥部总指挥，我和米杰山、柴明堂为副指挥。恰巧冯世光也被放回来了，我风趣地说：冯世光就是我们的“参谋长”，大家都同意这样干。在此之前，我秘密派汪兴民给夏品三、杜廷芝送信，让他们在新十一旅攻打安边

时作内应，开东门放我进去。汪兴民回来以后，带回杜廷芝用麻纸写的4个大字“唯命是从”。这时，地下党负责人冯世光要到定边亲自汇报，我也同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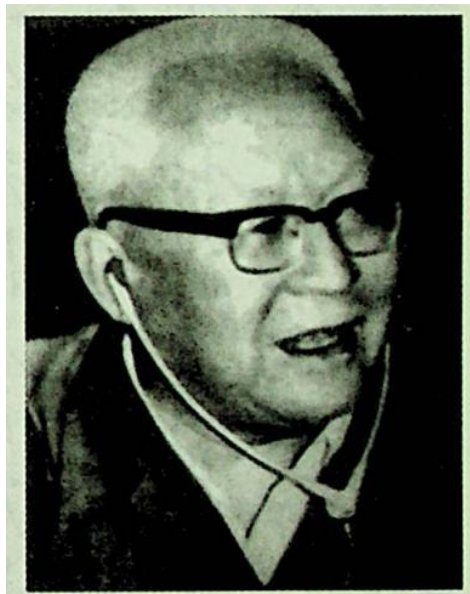
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冒雨在9月14日拂晓前赶到安边城东门。冯世光同警三旅一个营和一个炮兵连隐蔽在安边城西树林，隶属我们指挥，听候命令。我到东门后，让部队隐蔽好，然后悄悄走到城门跟前，让汪兴民跟夏品三答话。夏品三问道：“化东来了吗？”汪兴民说：“来了。”于是，就开了城门。我们很快上到城墙，向夏品三问情况。这时张雨亭（张七）带了两个哑巴警卫员过来了，并阴阳怪气地说：“品三，有什么动静？东门外好像来了些人！”我怕被张雨亭发现，立即抓过夏品三士兵的大衣和帽子穿戴上，跟着夏品三走到张雨亭跟前。夏品三一把抱住张雨亭，我说：“你抱着干什么，还不动手！”夏一枪打死了张雨亭，并解除了两个警卫员的武装。这时，张廷祥带了一群匪徒向东门冲来，我指挥部队顶了回去。张廷祥一看事情不好，即从北城墙跳下，跑到鹑怪子沟他姐姐家躲藏起来，一周以后被抓回来镇压了。经过激烈战斗，除鼓楼和北城文昌阁未拿下外，其他据点都拿下来了。不多时，我调了两挺重机枪把鼓楼也拿下来了，只剩文昌阁了。我正准备叫高昆山通知用迫击炮轰文昌阁，不料，李友竹被副团长高乐亭哄上去扣作人质了。当时，我一边答应高乐亭的条件，放他们走，一边命令赵级三带五六十人到安边城东北埋伏。高乐亭放出李友竹以后，带着一伙人仓惶出城，结果除个别人外，高乐亭等人全被我俘获。到此，新十一旅胜利的夺回安边城。

在我们攻打安边的同时，委派柴明堂前往堆子梁捉拿张兰亭、张廷芝父子。但是，由于柴明堂接受了张廷芝十几箱子贵重财物，便把张廷芝父子有意放走，给三边人民留下了祸根。

我在定边工作的一段回忆 ——建立共青团定边县工作委员会

刘澜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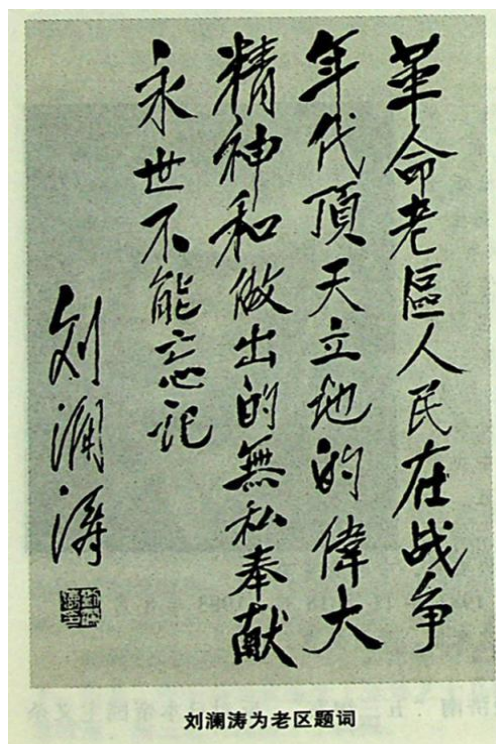
刘澜涛（1910—1997）陕西米脂人。1926年入团，1928转党。1930年9月在绥德被捕。经杜斌丞营救于1931年2月17日与张德生一起出狱。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政委，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建国后任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政协第四、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十一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常委。



本文据刘澜涛同志办公室1981年11月18日、1983年8月29日给定边县委党史办公室的两次来信，李青整理。

1928年5月，在陕北米脂声援济南“五三惨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杀害我国同胞，反对土豪劣绅，曾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这是大革命失败后革命低潮时期一次有很大影响的革命斗争。在这次斗争中，我被反动军阀井岳秀通缉，于是改名为刘鸿飞，被陕北特委派到“三边”（定边、安边、靖边）任特派员。7月我到了定边，寄居在定边县城的一所高小学校里。我的任务主要是开展青年工作和当地驻军工作，建立共青团定边县工作委员会。当时，定边驻了一个连，连长张道川，陕北团组织去了八

九个青年团员，成立一个团支部，我兼管这个支部，做这个连的工作。定边团县委成员除当地一位姓汤的同志外，其他两三位成员是这个连队中的党员，这些党员都是陕北特委打人敌军中工作的好同志。我以三边特派员名义召集靖边、安边和定边的同志开过会，传达特委的指示，主要是恢复和发展党团组织，让他们去敌军和土匪中工作。



另外，定边教育界有几位共产党员，我和他们在教育界以广交朋友的方式进行思想的宣传活动，大力开展农村工作。我还组织了一个“小鸟社”，油印小报，实际上是向青少年开展宣传的刊物，用通俗的语言（也用方言）宣传党的政策和有政治意义的历史地理知识以及爱国人物的介绍等，公开散发。不久，这个活动被定边伪县长（姓白，榆林人）发现，要抓我。我得到消息后于农历八月十五深夜翻越南城墙跑到绥德师范时的一位同学马兰家中藏了两三天，因怕久住会连累家，又于夜间出发跑到安边，在一个织毡的工人家中（地下党员），和陕北特委取得了联系，并护送我到特委工作。当时陕北特委党的负责人是杨国栋，团的负责人是贾拓夫。

定边任团兵变前后

孙怀明

孙怀明（1908—）定边县杨井镇贺崾岭村沙峁子人。1927年在安边高小任教时由窦文章、窦子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国民党民团内进行兵运活动，1931年10月高广仁营起义失败后脱逃回家。本文据孙怀明1984年11月25日回忆整理。

任延瑞，字和亭，定边县贺圈乡任圈村人。辛亥革命前系定边团练领导人，与郑思诚结盟为十八弟兄之一。辛亥革命时，随哥老会西北坐堂贺兰山大爷高志清（又名世秀）举义，推翻满清在定边的统治。后入西安陆军学校学习。1920年任高志清骑兵师团长之职，驻防神（木）府（谷）一带（骑兵师共辖5个团，即段幼安团、张鸿儒团、高景明团、荆虎成团、任和亭团）。任和亭团于1926年移防安边。其时，该团共辖5个连：一连连长丁盘生，二连连长马伯仁，三连连长石子俊，四连连长陈国斌；同年，王子元偕阎揆要来到安边，面见任和亭，故又扩编独立连，王子元任连长，阎揆要任团部教育副官。不久阎离开任团它往。

1927年任团奉令调往府谷（张鸿儒团调回安边），同时，骑兵师改编为混成旅，部队缩编，任团编掉王子元和陈国斌两个连。1929年，任团又调回定边驻防，除原来所带3个连外，在定边又扩充一个连。是时，王子元、陈国斌、石子俊均离开任团去宁夏、甘肃，故任团的建制有所变动：一连驻龙王庙坑（现在的北大操场），连长丁盘生；二连驻现在的影剧院，连长赵堃；三连驻鼓楼东旁，连长高广裕；四连驻鼓楼附近的财神庙旁，连长马伯仁。另有直属手枪排，排长陶玉山，保护团部。

1931年5月13日（农历三月二十六日），任和亭团内部发生兵变。这次兵变是在中共陕北特委积极开展武装兵运工作和高志清、郑思诚等陕北

军阀进行“倒井”运动的大背景下发生的，策动、领导兵变的既有共产党人，如：王伯功、王化南、龙惠民等；也有“倒井”激进军人如：赵堃、武继光、高广仁等。

兵变计划是：一面由二连连长赵堃和该连大排长武继光率兵向任公馆鸣枪进攻；一面由一连丁盘生连长的传令兵苗存雨、四连马伯仁连长的传令兵马宗祥，同时分别干掉丁盘生和马伯仁。

农历三月二十六日鸡叫时辰，马宗祥带领其弟马占海到大营盘，没有找上连长马伯仁，打死四连二排长李宗棠。苗存雨提枪到丁盘生院内，被丁发现。丁遂鸣枪冲出去，跳城墙遁逃。苗入丁公馆大抢其金银财宝，得钱后欢喜若狂，行至二道城涝坝沿时，被攻打任公馆一士兵发觉，见其财物甚重，故暗算获金而去。

任和亭的外甥陶玉山，是任直属手枪排排长，对兵变早有风闻，也曾多次向任提过，但未引起任的重视。而陶却早有戒备。此时，陶听得枪声四起，便立即掩护任和亭从西门而去，到盐池暂避，后赴榆林求救于井岳秀。打开公馆未伤一人，光抢劫财物。公馆内所遗三姨太刚生小孩 18 天（乳名炳炳）。三连连长高广裕是任和亭的女婿。高广仁是高志清的侄子，在高志清部下当副官，举事时在安边张鸿儒团，闻讯带手下十余人，赶到定边，夺得了三连、一连的人马，因而势力雄厚。

兵变成功，群举赵堃为旅长，王伯功为参谋长，高广仁、武继光为一、二团长。王伯功认为赵虽是自己妻哥，却也是任和亭的外甥女婿，恐不可靠。而高广仁是高志清师长的侄子，人精明强干，拥他当旅长影响大，号召力强，有利于部队的稳定与发展，故经过一天的积极策划，赵堃的旅长便由高广仁取代。由于安边张鸿儒团兵变失败，田佐勤等被杀，王伯功、高广仁等觉得在定边城里不好立足，即率领部队出城南下，先在红柳沟、牛家寨子、寺儿沟一带驻扎，继又到庆阳柏树原、柏普子一带。其时，定边正遇年荒投军随行者纷至沓来，末几，即达一千余众。他们原打算投奔甘肃雷中田部王子元军，因被陈珪璋部队所阻无法过去。同年农历八月，又从庆阳川上来，经环县、红井子到谢儿庄一带，后取道盐池西去。盐池县长聂继善（聂三）被迫从军，任参谋长，高军声威大震。欲投苏雨生，

声言攻宁夏。兵至平罗立岗堡时，苏雨生已败走，聂继善被马子祥部下打死，高广仁、王伯功被困，走投无路时被马子祥引诱收编。马子祥借整军查验人数之机，排开机枪扫杀了高部官兵数百人，高广仁、王伯功也被扫杀，没有打死的都跑回家了。

链 接

高广仁旅投诚后被歼灭的经过

马云藩

民国二十年（1931）农历八月中旬，宁夏省主席马鸿宾调任甘肃省主席未到职前，发生了苏雨生攻打宁夏城（现银川市）的战事。这场战事我亲身经历了，知道一些情况。只因年代久远，我已年老，体弱多病，记忆力减退，记得不甚详细，今由杨应林君代笔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参考，望知情者批评指正。

先说宁夏城防，那时省城（今银川市）城防司令马子祥，管辖着两个步兵营，共有千余人。两个营人数相等，均 500 余人。一营营长王文清，二营营长白云祥。我是白云祥的传令兵，时年 20 岁。中秋节那天，从后套来的杂牌军苏雨生部约 5 千人攻打宁夏城。马子祥命一营守城，二营在东门外迎击。苏军长途跋涉、人困马乏、军心涣散，且粮草不济。我军兵力虽不及苏军，但城池坚固，易守难攻，而且粮草弹药都比较充足，以逸待劳取胜心强。双方交火不久，苏军失利向城北 40 里的立岗、清水堡一带撤退，我军紧追不舍。是夜月蚀，城乡群众敲锣打鼓不止，意在解救月亮爷受难之苦，这当然是一种迷信陋习。待月亮复圆时，我营已到达立岗堡，对苏军进行了包围，以待机歼灭。由于我营仅 500 余人，包围不够严实，苏军趁虚从北门突围而去，与清水堡的苏军汇合北上。我营仍紧追不舍，至平罗城南高家庄子时天已大亮，只见庄墙上插着一杆白旗，白营长没有

理会。入城不久，庄主高子超（大地主，解放后镇反时枪毙）气喘嘘嘘地来到营部，要求面见白营长说有要事禀告。我报告营长允准后领见，他们谈话时我在旁边侍候边听着，高子超说苏军旅长高广仁今年 20 来岁，是他定边老家的族侄，路经他庄时，他苦口婆心地进行了劝说，说马主席是有名的好官善人，中央很器重，苏雨生是土匪军队，争城夺地，作恶多端，百姓恨之入骨，他应当机立断，弃暗投明才是出路。高广仁考虑多时才做出投诚马鸿宾的决定，白旗是高广仁插的，他是来向白营长说情疏通的。白营长作不了主，回说改日答复。高子超走后，白营长电话请示了马子祥，马子祥又请示了代主席马福寿，答复说可以，但是必须听从命令，高部 300 余人要在立岗堡集结待命。过了两天我营返回省城。高广仁部在立岗堡等了 3 天。最后一天高广仁在给苏雨生打电话时，不期被马子祥派来谈判接受投诚的一营副营长马老九（收编的土匪）发现并及时作了报告，说高广仁是假投诚。究竟是真与假不得而知。当此事报告马福寿后他极为恼火，当即命令马子祥派二营连夜折返包围了立岗堡。此时，高广仁旅 300 多人正在酣睡无防。二营立即下了他们的枪，把人押回省城。高广仁和其王参谋长押在二营营部，由我看守，其余官兵也押在这里。晚饭过后，高广仁说他烟瘾犯了要抽大烟。经请示营长允准，我借了一副大烟灯和大烟让他吸食。这夜我一眼未眨地看守着他俩，真是困极了。天亮后，马子祥带领通讯一排忽然到来，在给白营长打过招呼后，便把高、王二人五花大绑押至东教场。这时东教场已集合起来我部众多官兵，他作简短讲话后，即命执法人员就把二人枪毙。接着马子祥又匆匆折返二营，把高部 300 余名官兵集合起来排成长队，说让排以上军官站出来。可是他们面面相觑，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马子祥大怒，便亲自相面挑选。高部本来官多兵少，他挑了百多人留下，其余貌似当兵的百多人当场释放，自寻出路。而后把留下的百多名“官”分成四组，每组 30 至 40 人，由两个营指定的 4 个排，每排押一组分别向东西南北四城门走去，说要释放他们回家。那些官们信以为真，大踏步行进，刚出城门后就四散逃跑。于是押送官兵立即开枪，边打边追，逃官十之八九被打死打伤，对逃入民宅、庄稼地和苇子湖里的也不放过，真是惨极了。这次行动我也参加了，出的南门，但只朝天开枪没有打人。

“雷马事变”和平解决后，马鸿宾回到宁夏。闻知此事后大为恼火，严厉批评了马福寿和马子祥惨无人道的行径，并说：“我连一个逃兵也未杀，你们杀了这么多人，于心何忍？”

（《银川文史资料》第1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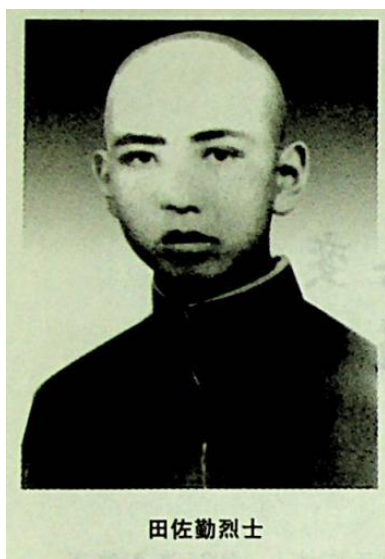
安边张团兵变与田佐勤通害

汪兴民

汪兴民（1904—）定边县安边镇汪坑村人，1925 年入陕西省延安四中学习，1927 年入西安中山学院，加入共青团，毕业后回安边任完小教员，并转为共产党员。1929 年入国民党任和亭民团一连当政治教员，后经刘志丹介绍到宁夏苏雨生部八旅十五团进行兵运工作，历任排、连、营长。国民党新十一旅安边起义前退伍回乡。

1929 年冬，我和牛化东、姜耀、刘实庵等 10 人，经刘志丹介绍，到王子元部搞兵运工作。1931 年春我们在定西一带驻防时，安边来密信说：三边地下党在定边任和亭团和安边张鸿儒团策动兵变。于是张东蛟、石子介派我回三边联系。我到定边时，定边任团已于头日兵变成功，王伯功要我速到安边联系，我即赶赴安边，找到高尚信，高带我与田佐勤接头，但未能见着。我在隆盛店住下，第二天，突闻田佐勤被张鸿儒逮捕，兵变失败。

张鸿儒，字兰亭，吴起金佛坪人。其父当年带过民团，曾在吴起川里称霸。张鸿儒于民国初年到榆林井岳秀部下高志清骑兵师为伍，先当排长，后当连长，一直到团长。



田佐勤烈士

1926 年张任高志清骑兵师二团团长，驻靖边。1928 年又移防安边，下辖 3 个营：谭结候营，孙有福营，张雨亭（张七）营。当时中共陕北特委正在开展兵运工作，中共三边区委书记田佐勤，共青团三边区委副书记高尚信等，以教书为掩蔽，积极进行对张团的兵变活动。高尚信的父亲是哥老会的头目，张鸿儒父子也都是哥老会要员，加之张团内部还有不少哥老会分子，于是田佐勤、高尚信等就利用这个关系，通过拈香拜把、哥老会等多种形式，积极活动，做通了张团许多官兵

的工作，就连张鸿儒的勤务兵李廷甫（靖边人）的工作也给做通，他和田佐勤结拜弟兄后，主动提出要在兵变时亲手干掉张鸿儒。

1931年5月13日（农历三月二十六日），定边发生任团兵变，起义士兵赶走了团长任和亭。作为策应，田佐勤等当即决定3日后行动（农历三月二十九日）。未料，兵变前夕（二十八日晚），李廷甫临阵动摇。一则李跟张多年，感情复杂；二则李婚期已近，怕影响了结婚，思想起了反顾之后，便跪倒在张鸿儒面前自首了。李廷甫一告密，张就立即动手捉人，先后抓捕了田佐勤、高尚信、陈彦仓、马家玉、毕家宝、罗连成、艾顺顺等多人，先将田等带回团部，进行威逼利诱，妄图使田等供出兵运组织名单，遭田厉声斥责，遂将田佐勤、高尚信、马家玉拉至城北巷老爷庙前，吊在一棵木瓜树上，严刑拷打。田佐勤骂不绝口，张即下令把田、高、马3人拉出西门枪决，并令李廷甫亲自开枪射击。李面对田、高又生出顾念，不忍心彻底把田等打死，遂在每人头皮上溜了一枪。田、高未死当即高喊：“再补一枪！”，于是又由张七（张雨亭，人称老营长）的护兵金海峰每人补了一枪，田佐勤、高尚信遂壮烈牺牲。马家玉第一枪溜在头皮上即倒地装死，直到夜间偷跑，后逃到绥德投高桂滋部，当了高的随从副官，一直到高桂滋起义。田佐勤遇害当天下午，我在安边杂税局遇见刘实庵，他给了我两块银元，要我快走。我在太和祥找上马，就离开了安边。到定边我把马还给夏品山，又见王伯功，告诉了安边情况即返兰州汇报。从此之后，张鸿儒加强了警戒，明碉暗堡，处处设防，安边地下党的活动不再听有人说起。

陕北红军在定边南部

山区的早期活动

白彦杰

白彦杰(1926—)定边县白马崾崴乡人。1944年参加警三旅，1945年到延安西北医专学习，毕业后在绥德军分区、第一野战军独一师卫生部工作。建国后，在北京警卫师、东北坦克三师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6年调北京军区装甲部队工作，1976年转业，先后任北京市宣武区中医院院长、北京市回民医院党委书记。



1933年12月29日，陕甘红军游击队骑兵360余人由吴起头道川的李台子进入定边樊学寺儿沟，后到樊学庄，又经过武山、罗儿崾崴、张崾崴、左崾崴、早章台、铁角城等地出定边境，然后深入到华池的乔川、元城子等地进行活动。当时，为了解决红军游击队物质生活的困难，他们采取“拉票子”的办法，筹积资金，打击土豪劣绅。在罗儿崾崴拉了土豪张元升的一匹马，又在左崾崴和早章台拉了左三和贺三的“票子”。左三被拉到南梁堡，经他的家门户族、亲戚朋友筹积交纳资金及布鞋、肉食等物赎了回来。贺三因没有往回赎就被红军游击队镇压了。据说，该游击队是刘约三等率领的。

1935年4月27日，又一支几十人的红军游击队从吴起庙沟斗掌进入定边的白马崾崴。听说这次由王宝珊（外号皮垮子）带领。第二天在白马崾崴的赵崴先召开了群众大会，进行革命宣传，号召群众起来打土豪，分浮财，建立苏维埃政权。当晚分别随后打了豹子掌林占奎和许家湾贺生福两家土豪。随后，红军游击队在白马崾崴、张崾崴、樊学等十多个村庄活动。他们逐村召开群众大会，斗地主，打土豪，分田产，并在白马崾崴建立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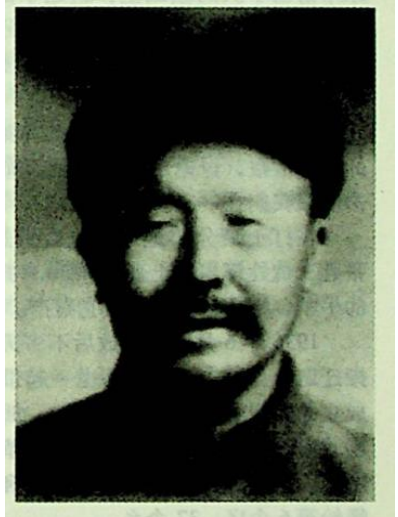
村苏维埃政权。芦大胖子任乡主席，汤得录、张得库、白玉贵、马四等人任村会长。乡、村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又带领群众斗了汤若尧、张文玺等土豪，后来发展到樊学一带打了梁永泰、李生财、侯占川、刘伯清、张成杰和罗峪岭的张元升、李满弟等土豪。打土豪所得的粮食、农具、牲口、衣物等，基本都分给了群众。少部分由红军游击队带走集中到白马峪岭。这里是和保安县总后方通讯联络点，吴起铁边城阳庙台的杨福谦就是当时的通讯员。一天，他从白马峪岭往保安送信，路过史岩涧时，被该村一些坏人杀害。红军所到之处，无不受到贫苦农民的热烈欢迎和爱戴，有些青年还踊跃报名参加游击队。白马峪岭的白久贤、白久功、焦三、郝学保等人先后参加了红军游击队。但被打的土豪劣绅对游击队却无比憎恨。他们偷偷地跑到定边城内向国民党反动当局告密诉苦。因此，定边国民党县政府派出陕北军阀井岳秀驻定边李荣光营，伙同地方民团于农历四月初九从定边出发，取道羊圈山、芦草沟，溜到樊学的马坊埧、张新庄一带寻歼红军游击队。当时敌人很狂妄，又是纠集民团，又是联络吴起张廷芝，甘肃曲子马鸿宾部，企图来个四面包围，一举彻底打垮游击队。但未等其它各路敌人到齐，李荣光营于四月十二日下午与我游击队在牛圈圪坨接火。由于敌众我寡，加之红军游击队员缺药少枪，地形不熟，虽经激战，王宝珊带伤率部突围，我军受到重大损失，死伤游击队员 13 人，丢失白洋、大烟土 13 驮。其中当场被打死我游击队支队长赵兴禄及队员艾克丰等 3 人，俘虏 5 名。被俘 5 人中白马峪岭白彦华和镇川贺家坡“皮客”贺二镇，系一般群众后被释放。我游击队长董新城等 3 人惨遭杀害，其中两人的头被割掉。最残忍的是杀害李来孩。李来孩是当地党沟李如堂抚养的儿子，年仅十四、五岁，参加游击队给王宝珊当勤务。被敌捉住后，只要当地民团头子说一声李是本地孩子，就可免死，但李荣光见无人说话，即命人拉出去枪打了。此次我游击队在牛圈圪坨战斗失利后，敌变本加厉，更为疯狂，反攻倒算，到处杀人放火，在白马峪岭杀害了我游击队侦察员郝学保，在吴起庙沟石涧庄杀害了我游击队掉队伤员（住刘保善家）一人，欠下了人民的血债。

苏维埃定边县革命

委员会的建立

王玉海

1933年3月，我在甘肃华池县南梁堡参加工农红军。我参加革命后，先在保安游击队当战士。当时，这个游击队有八十多人，刘约三、刘景范先后任队长，王英任指导员。我在游击队工作约一年时间，南梁堡举行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大会，我代表保安游击队参加了这个大会。1934年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决定成立赤安县（今志丹）苏维埃政府，边金山任主席，袁万祥任副主席，我是委员，之后我就离开保安游击队转入地方工作。



1935年春，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决定向三边（定边、靖边、安边）方向的宁塞川、颗颗川、乱石头川、铁边城、新安边以及宁夏、内蒙等地开辟根据地。赤安县先派我去搞了一段工作，随后陕甘边政府又派蔡子伟、马仰西来到吴起凤凰寺蔡家庄筹备建立定边县革命委员会。1935年6月15日（农历五月十五日）中午，在蔡家庄召开成立大会，会议由我主持，到会群众八、九百人。大会选举产生了10人组成的定边县革命委员会。主席由我担任，副主席王兆英，赵国雄、白国明、李文俊、李天鹏、王发厚、贺子忠、郭怀斌、朱建堂分别任军事、土地、经济、粮秣、肃反、保管、宣传和农会委员。

定边县革命委员会主要活动在今吴旗县北部和定边、靖边县南部山区，下辖3个区，10个乡。即：凤凰寺区，辖凤凰寺、五谷城、周湾3个乡；颗颗川区，辖毛家砭、党家畔，马家台、帐房湾4个乡；乱石头川区，辖葛沟门、吴仓堡、新边安3个乡。共有群众300多户。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发展革命根据地，边区政府派强加珍带领十几人组成的游击小队，帮

助我们开展工作。我们把革命委员会委员兵分三路：一路在新安边南、乱石川一带，由白国明负责，又派郭怀斌作向导；另一路在颍颥川一带，由李文俊、郑占奎负责；第三路在宁塞川一带，由樊银山、赵国雄等人负责。其主要任务是：一、开辟苏区，建立各级政权（主要是乡、村）；二、打土豪、分田地；三、发展地方武装，建立赤卫军，配合游击队开展工作。经过一个多月时间，在原来游击小队的基础上，组建了定边县革命委员会游击队，王德成任队长，我兼政委。游击队下编一个骑兵分队，郑占奎、许忠旺先后任队长；一个步兵分队，刘大才任队长；一个保安队，白凤清任队长。共有队员 100 余人，战马 80 余匹。

同年 10 月毛主席率中央红军来到达吴起镇，和我们接头后，听取了我们的工作汇报，讨论了工作计划，布置了工作任务。其时，龚逢春带的三边游击营跟我们在一起。

在打土豪分田地中，先后打过李姓、蔡姓、路姓、赵姓、谢姓、温姓、张姓、魏姓等当地土豪劣绅 30 多户。他们本人闻风逃匿，我们只是分了他们的牛羊、粮食、土地和其它财产。

1936 年 6 月定边解放后不多天，我率定边县革命委员会由凤凰寺蔡家庄搬迁定边县城内。游击队也一起带到定边。原所辖 3 个区分别交赤安县和新成立的安边县（驻地在新安边、武峁子流动，因之又有叫新安边县的）苏维埃政府管辖。到定边后，定边县革命委员会改建为定边县苏维埃政府，我任主席。至年底，全县共辖定边市和城区、白寨子、范圈、羊圈山、姬塬、罗峪岭等 6 个区，37 个乡。

1936 年冬，组织调我到中央党校学习，县苏维埃主席由康建熙接任。西安事变后，中央党校迁往延安，我就离开定边到了延安。

红六军团在定边

——日记选摘

王恩茂

王恩茂（1913—2001）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江西永新人。1930年入团，同年转党。历任中共永新县委技术书记、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长、县委书记，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干事，中共湘鄂川黔、川滇黔省委秘书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政务处处长。参加了长征。之后曾任八路军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旅副政委、政委，西北野战军第二军政委，参加了中原突围、保卫延安及解放西北等战役。建国后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新疆军区第一政委，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副政委；是八届、十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王恩茂一生坚持写日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整理出版了《王恩茂日记》，本文集选自该书，反映了红六军团1936年山城堡战役后途经定边南部山区行军宿营、休整训练、开会学习等真实情况，是非常难得的第一手史料。



王恩茂，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2月4日

晴。

胡敌有继续进攻盐池的企图。我们为了随时准备消灭敌人，向黑城岔以南李家大湾转移。下午1时出发，经过洪德城、庙咀子，7时到达李家大湾之崔家院子宿营。行程30余里。

12月5日

晴。

上午 12 时由崔家院出发，经过黑城岔，下午 5 时半到达刘家拐沟以南之康家庄宿营。行程 40 余里。

12 月 6 日

晴。

上午 10 时出发，经过刘家拐沟，下午 5 时半进到谢家土墩以南之庙家咀子宿营。行程 50 余里。

12 月 7 日

晴。

下午 2 时向姜家台移动，经过五六里，3 时到达姜家台之苗家大渠，离谢家墩二三里，离定边城 140 里，离盐池城 120 里。此地系陕北定边县地区。

12 月 12 日

晴。

8 至 12 日均在苗家大渠，待机备战。

12 月 13 日

晴

仍在姜家台之苗家大渠。早晨 7 时得接红中社中央军委电讯：西安事变，爱国将军张学良、杨虎城在全国与西安革命势力推动下，捕捉了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及其走狗陈诚、陈继承、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钱大钧等六人，打死蒋孝先、邵元冲及宪兵团团长，打伤钱大钧，解除了宪兵团及驻西安的中央军、警察等武装，俘虏了随蒋来西安的全部南京中央委员，开展了中国革命新的阶段。这一胜利消息传来，使我从来没有这样兴奋。

12 月 14 日

晴。

由于西安事变，胡宗南部正向西退，使我们担负待机备战消灭胡敌的任务，转入准备新的战略行动，加紧部队整理训练。故总部来电，要我们仍在原地休息整理，准备新的行动的工作。

12月15日

晴。

上午在苗家大渠。下午2时，全军团以上干部去深田子参加全方面军积极分子会议。这一会议，首先由关政委宣布开会，继由朱主任报告西安事变的经过、原因、政治意义、发展前途、我们的任务、中心工作、行动中应注意的事项，再则甘主任发言，散会。散会时已天黑。因为明天要行动，即连夜赶回苗家大渠军部。

12月16日

晴。

早晨下大霜，好象落了雪一样。本来出发，并在6时准备完结，向环县、庆阳、西峰城南移，配合东北抗日友军作战，刚要出发时，接总指挥部来的命令，暂时停止行动，如紧筹足10天以上的粮食，改变行动路线，准备向甘泉前进，经过保安、肤施等地，去配合东北抗日友军，故仍在苗家大渠休息。

12月17日

晴。

早晨同样下大霜。上午6时准备完毕，6时半出发，经过姬家园，集结部队，王政委讲话，说明西安事变的经过及我们的任务。下午4时到达西庄园宿营。

12月18日

晴。

上午6时出发，经过罗儿峪岭，这一路都驻了后方机关。下午5时到达离铁边城30里之黑溪曲儿宿营。

12月19日

晴。

下了一点雪。上午6时半出发，经过铁边城，本来要超过铁边城40里以东地区宿营，但在超过铁边城15里之杨家庙台，得接方总骑兵送来军委命令，二方面军19日即在原地停止休息，改变前进路线，向西峰镇前进。因此，我们即在杨家庙台宿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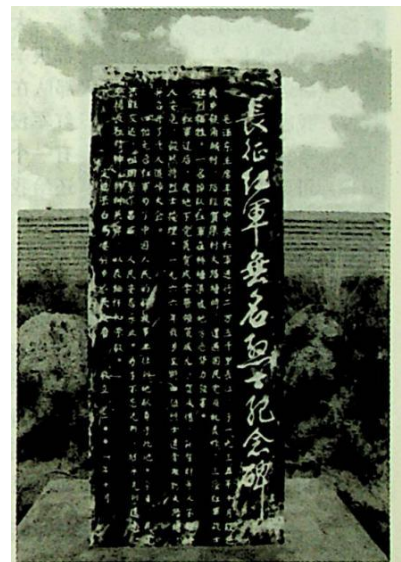
红军来到马庙湾

罗正莲

我是罗庞塬公社马庙湾村一个农村妇女，听说现在搞党史资料征集，把我所知道的过去一点情况讲出来，供编写党史资料的同志们参考，略表我对党的敬爱之心，也是我对过去亲人们的怀念之情。

那是 1936 年 10 月间，我刚 20 出头。一天，我们马庙湾村里来了一支 200 多人的队伍。那个时候，老百姓吃尽了旧军队糟蹋蹂躏的苦头，所以见队伍来了，就害怕的东躲西藏，只有在暗地里窥视和打探消息。可是，我们发现这支队伍与以往所见到的队伍都不一样。他们既不烧杀抢掠，也不打人骂人，真是秋毫无犯，鸡犬不惊。于是，我们躲藏起来的老百姓，踌躇了一回慢慢地又回到了村里。回到村里一打听，才知道这支队伍原来就是我们老百姓日夜盼望的中国工农红军！他们一见到群众就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宣传共产党领导穷人打土豪闹翻身的道理。不多久，军民之间就水乳交融，亲密无间了。这是我当时见到的第一支人民的军队，怎能至今不怀念他们呢？

当时，我们马庙湾村子不大，只有五户人家，驻扎 200 多人的部队，自然困难很大，加之这是一支后勤部队，牲畜物资又多。所以破窑烂庙、家庭院落到处都住满了人。部队里有男的有女的，自己办了 4 个大灶，自己加工粮食，自己打柴担水，从不打扰群众。在我的记忆中，这支红军在我们马庙湾村驻扎时，主要办了 3 件大事：一是加工军服。二、三十名女战士使用三台缝纫机，整天忙碌着赶做军服。这些红军女战士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不缠脚，不上头。她们欢天喜地，说说笑笑，无拘无束，非常热闹。我当时很羡慕她们，经常主动和她们接触，在她们那里学到不少的



白马岭乡贺渠村长征红军无名烈士纪念碑

革命道理。后来，她们加工的棉衣任务大了，就请村里的妇女帮助合棉衣缝子、订纽扣等，我就合过几十套棉衣的缝子，部队按规定付给我工资 30 多块银元。二是修理枪炮。长枪、短枪，还有几个人才能抬得起来的大炮，一大批一大批破坏了的枪炮运来了，经维修后，又一大批一大批的运走了。修理枪炮那是男同志的事。三是筹集粮草。战士们每天都很辛苦，翻山越沟，风雨无阻，到处买粮草，然后运进运出。听说红军大部队在离我们村子不很远的环县山城堡一带打仗。我家里当时储有一窑草，红军没动过一根，我男人为红军带路，到处买粮买草，他们如数发给工资。有一个姓李的班长，还经常给我男人讲革命道理，可亲热哩！红军临走时，还给我家送了一头麻骟驴，从此我家也有了大家畜，逐渐立起了牛对，发展了农事。

这支红军后勤部队在我们马庙湾住了两个多月，和群众处得热火极了，尤其是有一位首长，当时 30 来岁，身边跟着两个勤务员，他整天不是看文件就是写东西，再不然就开会，真是够辛苦的了。可是至今我们还不知道这支部队的番号，也不知道这位首长的姓名，他们之中，可能有不少同志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而英勇殉国，可能有不少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光荣捐躯；但肯定有不少同志还健在，或正忙于四化建设或已离休，欢度晚年。在此，祈望当年在我们马庙湾住过的那支红军后勤部队里工作过的同志，撰写那段史实，告诉我们，你们在哪里？可知我想念你们的心情是多么的迫切啊！

三边事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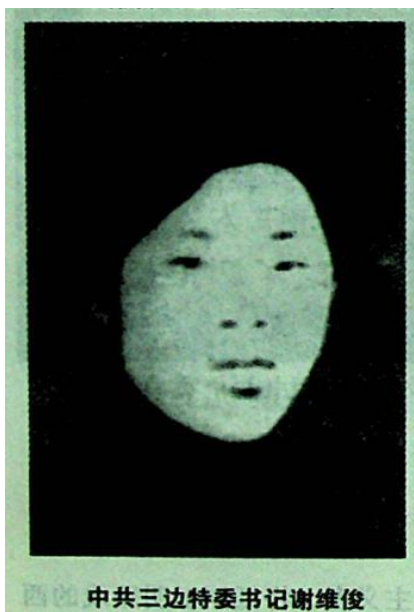
刘景范

刘景范（1910—1990）刘志丹胞弟，陕西保安（今志丹）人。1928年参加革命，1930年入团。1931年入党。1931年任红军游击队班长及副大队长。1934年10月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二团团长。1936年12月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7年4月任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抗战时期，先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厅长，民政厅厅长。解放时期，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兼任西北野战军勤务部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监察部副部长，地质部副部长，民政部副部长，“文革”中受到迫害。粉碎“四人帮”后获平反，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出狱后的任务

1935年9月下旬至10月初，“左”倾机会主义者，将抵制王明路线的西北军委、西北红军指挥部、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区的领导人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杨森等以及二十六军营以上、陕甘边区县以上的干部数百人逮捕，我也是被逮捕的一个，有的无辜被杀害，搞的人心慌慌，人人自危。正在这时候，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陕甘根据地，纠正错误的肃反。到1935年12月底，我们被关在陕北瓦窑堡的人，已陆续获得释放了。但下面还没有完全纠正。



中共三边特委书记谢维俊

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主任周恩来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到三边工作。当时的三边包括靖边、定边、赤安等县。那里已成立了中共三边特委，随中央红军来的谢维俊任特委书记。因为三边原属陕甘边区领导，我在被捕前是陕甘地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又是当地人，所以要我去担任三边特委的军事部长。当时中央对三边的情况还不太清楚，只觉得消息不灵通。

我的工作是军委分配的。中共陕西省委又分配了一个叫慕生桂的去当三边特委副书记，杨琪去三边任独立营营长，杨琪同志原是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的师长。出狱后的分配，显然很不恰当，当时都出于照顾大局，只要有点工作，总比当“反革命”强，所以杨琪什么也没有说。另外，还调来了李玉英、崔总山等几个做地方工作的干部。我们领了十几条枪、几匹马就出发了。

我们从瓦窑堡出发，带着陕西省委的介绍信，到了赤源县，县上给我们派了 1 个警卫班，班长姓刘，我们都叫他刘班长，现在把他的名字也忘了。我们是 1936 年 1 月 17 日，也就是农历腊月二十三到赤源县的，在县委住了一夜，第二天走到靖边县境内一个农村又住了一夜，第三天上午 10 点左右到了三边特委住地李家梁。

叛 乱

李家梁是靖边县城西面一个山坡小村。我们一进村，只见全村乱七八糟，找不见一个人。我们只得又往前走，到处找人，在山上碰见个放羊的，一了解情况，才知道靖边游击队中有 100 多人叛变了。这事就发生在头一天的晚上。一夜之间，他们杀了三边的特委书记谢维俊，西靖边县苏维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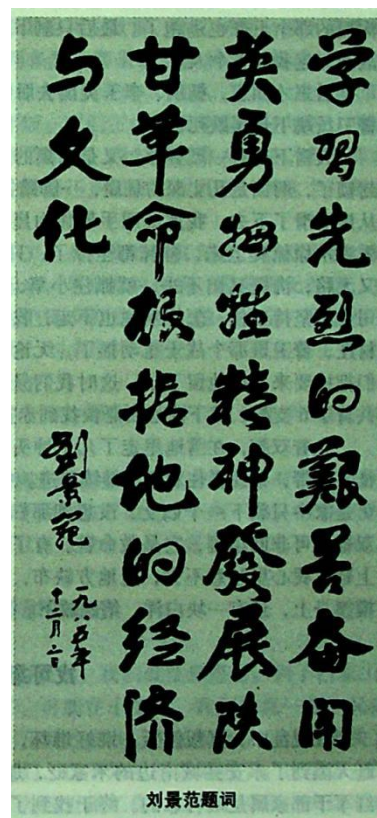
政府主席阴云山，县游击队长黄万银，政委孙德胜。游击队的其他人全被缴械了。这里的群众吓得四处逃散，不敢回家了。当时叫“赤安事变”。

遇上这种情况，使人震惊，也使人挠头。三边特委已被破坏，叛军有100多人，我们只有十几个人，目前情况又摸不清，怎么办？我和慕生桂、杨琪商量后决定：赶快离开这里，去找赤安县委。

我们所在的李家梁，距赤安县还有200多里路，只得边走边了解情况。可是沿路经过的村子，群众也弄不清我们是叛军还是红军？不敢向我们说什么。我们也弄不清这些群众反水了没有，双方都警惕着。

当天到了石厂子沟，这村子我们曾打过土豪，但那时土豪本人跑了，这次我们到了这里，恰好遇上他又回了家，我们顺便就把他抓着押上走。

大雪纷飞，我们冒雪赶路，在雪地里一连走了3天，晚上到了赤安县的李家嘴。这时人困马乏，衣服鞋袜全已湿透，急需休息。要不，人就会全部病倒。这个村，在赤安县东川，原是大地主李林方住的村子，我们开辟这块地区时，在这里打过土豪，地主全跑了，这时也没有回来。这个村没有人，只碰上一个佃户，名叫李折桂。我叫住问他：“这村里人呢？”他说：“全走了！”我叫他给我们弄了些饭食和草料，准备在这里过夜。吃罢饭，喂了牲口，安排岗哨。谁知我们带的警卫班，全是刚参军的农民，还不会放哨，要一个个手把手的现教，弄了半夜，我们才睡下。天快亮时，响起了枪声，我猛翻身从炕上爬起来，叫醒杨琪、慕生桂，没来得及穿鞋，就跑到院子里。原来我们行军中，叛军已跟上了我们，这时，叛军又把我们包围了。这个李家嘴，三面是石岩，上面是当年捻军时代修的旧城堡，大门出不去了。



我们要突围出去，只有爬上窑背上山。我和李玉英赶快找了个梯子搭上，招呼大家，都往窑背上爬去。趁大家往上爬时，我才找上鞋子穿好，最后一个上去的。赶到我上去，我们的人在山坡上已经走散了。因为天还没有亮，黑楚楚的，有的人路也不熟，敌人的枪又打的急，都瞎摸着走了。在石厂子沟抓的那个土豪也逃跑了。最后只剩下崔总山、刘班长、一个司务长、一个战士，连我共 5 个人。

后来才知道，杨琪、李玉英出去后向瓦窑堡方向去了，慕生桂和杨琪的警卫员跳下悬崖跌死了。

大雪下得有一尺多厚，又是漆黑的夜，上山下沟只有一条路，还被敌人封锁了，两面是几丈深的悬崖，一脚踏错就完了。天黑路滑，我一脚没踩稳，从崖上滑了下去，我连忙用手攀住山崖上的灌木，否则就会掉进深谷。待我攀灌木徐徐爬上来，鞋袜都全掉了，只得光着脚踏雪而行。我们要往上走，又无路，沟里又出不去，就抓住小草，再顺着峭崖陡壁往上攀。在险境中，司务长坚持不住，怎样劝说也不走，我们拿了他的枪，攀上山顶。走到一个村庄，警卫班那个战士也动摇了，无论如何不愿再往前走，说他肚子痛。我们把枪要来，把他留下了。这时我们只有 3 个人：我、刘班长和崔总山，一共背了 6 支枪，我下决心要赶快找到赤安县委。

光着双脚，在雪地里走了几个钟头，两脚冻得红肿、疼得钻心，崔总山扯下腰带，帮我裹住双脚，继续前进。中午走到孙岔沟，这里住着一家农民，可是家中只剩下一个妇女，没想到那妇女认得我，连忙送我一双新布鞋。这双鞋，可非同小可，它是救命鞋。有了它，我就能走路了，还要打仗呢！穿上鞋，我心里过意不去，这地方缺布，兵荒马乱的，做一双鞋也不容易，我摸摸身上，还有一块白洋，给她放下。我们又继续上路。

找可靠群众

在混乱中，真叛假叛，谁好谁坏，一时不易分清。我们李家嘴突围后，赶天黑到了赤安县城南边的米家砭，那里有马锡五同志的家。到这个时候，

红军干部家属是最可靠的。终于找到了马锡五的原配夫人马大嫂，她见了我们，也是见了亲人，领到家里，给我们做了荞面，热了米酒，先让我们饱饱吃了一顿，然后就对我们说了许多情况。她说，赤安县城里住着还乡团，南面三台山上也有还乡团。她这个家离还乡团太近，不能久留。然后她又经心地给我们找了个带路人，把我们引到对面山上。这山上有一家农民，家中有个老汉，这老汉非常忠心，他先把狗拴起来，让我们在他家安安稳稳休息一夜。天刚亮，我们就要起身，老人家不放心，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走大路，要走小路，到了李家渠，去找左贵得和郭继业，这两个人没有叛变。我们按照他说的路走，到了李家渠，找到郭继业和左贵得，才了解到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前几天在白家山。这时我的两条腿，膝盖以下全肿了，行动很吃力，得在李家渠停一下，喘口气儿。这个地方离麻子沟5里路。这时，正逢春节，凡是能在家住的人，也要设法吃顿年夜饭。我们正在郭继业家吃过年夜饭，听说麻子沟来了三四十个人的还乡团，派了团丁，到各村召集人开会。有个群众跑到李家渠说，王贞（历史反革命）带着还乡团在后村开会，叫这个村里人到后村参加会去。

我这时有点着急，因为我们只有3个人，我的脚又坏着，行动不便，如果还乡团发现了我们，把我们包围起来，是很难对付的。眼前别无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唱“空城计”了。我着人把那个群众叫来。他一进窑，我猛然问道：“你认得我吗？”他忙说：“认得！刘主席！”我说：“你回去对王贞说，刘景范回来了，叫他们都到这里来开会！”

那人听我理直气壮，也不知我带了多少部队回来了，急忙跑到后村，向王贞一吆喝，还乡团马上就逃跑了。

左贵得派他的弟弟引着我们赶紧离开李家渠，顺着沟渠上了对面的山顶。我们在山顶休息时，还乡团也到了麻子沟的脑畔山上，一南一北，两山相望，已相隔十数里之远了。虽然看到我们只有三四个人，可是他们已来不及追赶。

找县委和县政府

郭继业说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在白家山，我们就往那里赶。到了白家山，一个老汉说，县委、县政府早搬走了，可能在小崖窑。我们休息一夜，又赶到了小崖窑。这一带群众没有反水，行动方便些，可是又扑了空，县机关又搬走了，只剩下几个妇女同志，问她们，也不知他们到哪里了。这里群众给我找了条毛驴，我骑上毛驴到各乡、各区去做工作，宣传中央和中央红军来纠正了陕北的错误肃反，把刘志丹等都放出来分配了工作，稳定群众情绪。

我们到吕家砭、橡皮嘴、老崖窑等村子。我又找支部书记吕文华和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彦彪，谈了反水问题，我和他们一块做群众工作，一面调查县机关的情况，后来才知道，县机关搬到了桃树岭。

在我们工作的过程中，群众对我们非常欢迎，特别喜欢听中央的各种政策，情绪越来越好，什么话也愿对我们说。有个群众悄悄说，有一位受了伤的中央红军，是个连指导员，掉了队，被他藏了起来。我得知后赶忙去看，只见他全身浮肿，身体虚弱，见到我一定要跟上我走。当时我们也很困难，怕带不动他，劝他暂时留下，等我找到县委，再派人来接他。可是他很坚决，一定要和我们一块儿去找县委，我们只得把他带上走。

听说县委在桃树岭，我们便赶到桃树岭。到了那里，县委又不知去向，可是当地老百姓给我们讲了些叛乱情况。

我们找到个姓乔的乡苏维埃主席带路，再去追县领导机关。走到路上，姓乔的一再说：“刘主席，你的腿不好，我帮你背上枪吧！”他一连说了几次，我便把枪锁上，给了他。他背着枪走在前边，我们走在后边。下了山到王家庄，这里有个地主的窖子。一下到沟底，姓乔的就背枪往前跑。我的脚坏了，不能跑，叫崔总山连忙追上去，夺回了枪。姓乔的跑进了地主的窖子，原来他早已通了敌。

我们4个人，还有病的残的，如果遇上强大的地主武装，就难对付，要赶快离开这里，我们一气跑了十来里，到了石畔村。听说这个村里群众

没有叛变。中央红军那位连指导员呻吟起来，他实在走不动了，要求留下。我摸摸他的腿，肿得更严重，不得已，只好把他安顿在石畔村老乡家中休息。我们连夜又往前赶，到了定边集，只听后面喊道：“刘主席，等一等，有情况向你汇报。”那个姓乔的连跑带喊的来了。

我停下来，顺着沟中河水细听，后边还有哗啦哗啦的趟水声。我断定，这是叛军追上来了，想诱骗我们，包围我们。在夜里，只能借着月光察看，我对刘班长说：“注意，有敌情！”

这时，一群人影已向我们走近，刘班长迎上去，打了两枪，敌人一乱，掉头就跑。我们继续往前走。听到背后的石畔村一带狗声乱咬。后来托人打听，原来叛军到石畔村搜查，杀害了中央红军的那位指导员。

这夜，我们赶到甘洛县的刘家老庄，才找到了赤安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我们以为到了家，放心的睡在一个群众家中。

我满以为，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县领导机关，一切事都好办了。我们是夜里到的，在群众的石窑里倒头便睡，刚睡一觉，就有人踢门，一抬头，几支盒子枪对着我的头。大声喊到：“谁是刘景范？”我搭眼一看，是几个娃娃，说的是南方话，穿的黑军衣，我说：“我就是！”几个人把枪对着我说：“你是叛徒，是右派，快交枪！”

看来这几个战士，因为年轻，受了别人的煽动，便问：“你们听谁说我是叛徒？”他们说：“我们听袁主席说的，你是叛徒，右派，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崔总山、刘班长听着这话很生气，怎么也不给交枪。我说：“把枪给他们！”又对那几个红军战士说：“把你们的主席叫来，我有话对他说。”

袁主席就是袁万祥，是赤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这人文化太低，政治上没受过锻炼，那边“肃反”，这边叛乱，把他弄糊涂了，不能分辨是非。袁万祥一来，我就把他骂了一顿。我说：“我是右派，逃跑主义？你们是干什么的？几个反叛革命分子，就把你们吓跑了？把自己的同志丢下不管了？你们为什么不做工作，不抵抗呢？”袁万祥说：“说你的那些话，都是上边来人说的，我们不了解情况。”

我又找来县委书记任秀明谈话。告诉他，是中央派来工作的，瓦窑堡押的人全部放出来了。中央已经向下传达过，是有人向你们封锁了消息。看起来，他表面相信，实际不相信。我说：“你们不相信可以派人到瓦窑堡去问。”我给周恩来同志写了一封信，讲明这个地区的叛乱情况，也讲了县委的问题，讲他们对我信任，任秀明见我给恩来同志写了信，便派土地委员张钧军到瓦窑堡去了。

这个期间，他们限制我的行动自由，等于把我软禁了。我住在一个支部书记家里，这人姓郝，悄悄对我说：“特委来这里召开过党员大会，大会上宣布过，习仲勋、刘景范都是右派，现在已经逮捕，开除了党籍。你还不知道？我们是相信你的，可是他们还说你是叛徒，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现在是让我监视着你，不许你工作，不许你随便行动。”老支书这么一说，我心里非常着急：眼看要耽误大事了。叛军问题，是急于要解决的，这样下去，要等到哪一天？但是不等又有啥办法？

焦急地等了一个多礼拜，周恩来同志的信终于来了。一封是给县委的，一封是我的。给我的信中是说，如果身体支持不住，就回瓦窑堡养伤，如果能支持，就找三边独立营指挥消灭叛军。给县委的信是告诉他们，是中央军委派刘景范来三边担任军事部长的，刘的身体如有病，就请他们派人把刘送回瓦窑堡，刘如果能工作，要他们听刘指挥剿匪。

我马上给周恩来同志回了信，说明我的脚已经好了，目前不能回瓦窑堡，急需集合部队，把叛军镇压下去，恢复这个地区的工作。

由于周恩来同志的来信，我有了自由，可以随意安排工作了。

平 叛

工作关系通了，我就调动部队，把甘洛县和赤安县的保卫部队召集在一起，开会讨论如何开展消除叛乱的战斗。

我们头一仗袭击了石畔村的还乡团，紧接着就打开了王家庄窖子，杀了反动地主和还乡团的头目。发动群众找到了中央红军那个连指导员的尸体，给换了衣服，埋在附近的山上。

下一步，是攻打三台山寨子，这个寨子里，有还乡团，也有反水群众，200 来人。到了寨子下面，我们没有硬打，先派人向山上喊话，说明瓦窑堡狱中押的人全放出来了，分配了工作，不要再听信谣言，中央红军带来了好政策。果然，寨门不打自开，还乡团的头目王贞带了几个人逃跑了。其他的人全部投降。对反水的群众，我们召集起来开了会，动员他们回家生产。

三边的独立营到了赤安县一区鹞子川，营长马福记，政委龚逢春，党委书记张明科。

这个营，是由原陕甘边区第二路游击队改编的，战斗力很强，干部也很好。可是，自从发生“肃反”之后，在“左”倾路线领导下，战斗力受了挫伤，“赤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定边驻军张鸿儒团利用谣言、事变，纠合各地民团攻打独立营。独立营从定边南区，到靖边宁塞川，一直打败仗，士气低落，情绪不振。我们见到独立营后，向他们讲了中央来后的情况，告诉他们现在的任务是做群众工作，消灭叛军和还乡团，平定叛乱，恢复我们的苏区。

独立营的同志亲眼看见我已安全回来，又听到中央的政策，战士们又看到了希望，鼓起了士气。

我们的人马多了，去攻打保安县城。城里面驻有宗文耀、金林的叛军和还乡团。我们下决心狠打。因为我们攻得猛，宗文耀、金林支持不住，逃跑了。还乡团也随之逃散。保安县城得到了光复。这一胜仗，大大振奋了士气，群众也欢天喜地。

这么大的叛乱，不是两仗能解决问题的，还得大力做群众工作。边打仗，边做群众工作。被“赤安事变”冲击逃跑的群众，要叫回来，要安抚他们。被“左”倾路线划错成份的农民，要予以纠正，退还土地、牲畜和农具，叫他们回家安心种地。是真地主的，也给发些能生活的土地。使其

自食其力。对富农，除封建剥削部分外，全部退还。对反水群众，首恶必办，一般不究。

赤安县反水的有4个区，即一、四、七、八区，到1936年4月，就全部恢复了。

曲 折

3月初，党中央要我回瓦窑堡汇报工作。我和龚逢春到了瓦窑堡，未见周恩来同志，向洛甫同志汇报的。陕北省委也有人参加。汇报后，中央和省委认为，三边特委已遭破坏，决定先成立个中心县委，改组赤安县领导机关。暂定中心县委的书记是龚逢春，组织部长惠子俊（原西北工委书记），我任军事部长，任秀明任宣传部长。袁万祥任政府副主席，主席是陕北省委派的姓李的同志，名字忘记了。

使人生气的是，当我回瓦窑堡期间，赤安又发生了问题。县委又决定抓了一些曾经跟着反水的群众，把已经争取回家的群众当成了反革命分子。这个调子一定，是要有很多人被逮捕、杀头的，群众又恐慌起来。其中有个姓陶的，在当地有些影响，县里有人要杀他。我从瓦窑堡回来的路上听见此事，怕乱了套，连忙赶回到县委的所在地小崖窑，就找县委书记任秀明谈话，叫他把姓陶的放了。此事一传开，群众觉得我们的政策能兑现，又回来许多人。但是，任秀明受“左”倾路线影响太深，一时转不过弯来。恰好，县委的其他同志都陆续来的，我们马上开县委会讨论决定，真正是地主、富农的，只要没有血债，不是反革命的，不能杀。只杀罪大恶极的。要尽量少杀。反水的群众，只要回来安心生产，不能杀。今后杀人要，经过县委会讨论，不许随便杀人。

上述决定一贯彻，其他被抓的人释放了。群众马上传开：政策真的变了，不是放一个人，凡是群众都放。人心安定下来。

这时，县委、县政府转移在陈家岭，得到群众的报告：宗文耀、金林、宋文华从北边又来到靖边县巡检区的磨科坪和宋家庄，要向赤安县进攻。我们马上开县委会，布置了战斗任务。我带独立营，到距磨科坪六七十里路的康家沟。派侦察查明，敌人有 200 多人，150 人在磨科坪，另有五六十人在宋家庄，两处相距 5 里路。我一掂量：我们的独立营和保卫队都是受过严重损失的，加起来还不到 200 人，看来磨科坪不好打，便决定先用独立营的一连和二连去消灭宋家庄宋文华那股敌人，用骑兵队和保卫队去牵制磨科坪的宗文耀和金林。

我带着独立营和保卫队后半夜从康家沟出发，跑步 30 里到保安县旧城。天刚麻亮，群众还没起床，部队稍休息后又急行军，前半晌就接近了敌人。独立营埋伏在宋家庄脑畔山上，骑兵和保卫队佯攻磨科坪，切断了两股敌人的联系。宋家庄的叛军听到枪声，便向磨科坪靠拢，被我独立营全部消灭，收了 50 多条枪，当场打死了队长宋文华。宗文耀正准备接应宋家庄，骑兵队正打在他的屁股上，使他首尾不能相顾。把宋文华部消灭后，我们正准备两路合击宗文耀，突然刮起一阵漫天黄风，使人睁不开眼，看不见人，宗文耀和金林带着 100 多人逃跑了。

继续战斗

我们打罢宗文耀和金林，部队在磨科坪集合，吃了一顿饭，睡了两小时觉。侦察员回来说，靖边县蔡家砭的民团回来了。这个民团的团总是蔡丰。这个人从前是中立的，现在也是跟着干起了坏事。我集合部队当夜出发。由群众带路，通知沿路群众把狗拴好，连夜急行军。蔡家砭距磨科坪有七八十里路，天明前必须赶到。走到离蔡家砭十几里路的马连城休息了一下，准备吃罢饭就打。

这时发生了件事：独立营的战士贺四娃，放哨时抓了个俘虏，这个俘虏不是别人，而是蔡丰民团的密探贺三娃。贺四娃和贺三娃是亲兄弟，贺三娃原也是独立营的战士，叛军一闹，他害了怕逃跑了，参加了蔡丰的民

团。我们把贺三娃叫来问话，叫他说说蔡丰民团的情况。没想到，他一句实话也不说，还虚张声势说，凤皇寺有张廷芝的一个大队，蔡丰有一二百人，都等着和我们打仗。看他满嘴胡说，只得暂时押下。贺四娃撑不住劲了，非要亲手杀死他哥贺三娃不可。我又要做贺四娃的工作，我说：“你们都是穷苦人家，弟兄两个参加革命，组织上很信得过你们，贺三娃虽然叛变了，也不能杀他，要教育他，暂时押下，慢慢和他谈话，可能他思想上有许多顾虑。”

我们已布置好了，直奔蔡家砭。民团发现我们来了，都爬上了山。骑兵队紧追不放，在山上展开战斗，抓了些俘虏，收了 20 几条枪，蔡丰丢下骑的骡子钻了水洞。消灭这股敌人后，我们把他们抢劫群众的几百头牛、羊都找了回来，叫群众们来认，是谁的谁领回家去。

我们开到赤安县六区瓦舍村休整，向县委汇报情况。这时，六区游击队长袁耀秀赶到瓦舍村，一见我就大哭一场。他说，游击队在白宝川袁家台，被庆阳县蔺士升、齐正英的民团打散了，抓走了些游击队员，抢走十多条枪，赶走了老百姓的牛羊。蔺士升、齐正英的民团有 100 多人。敌人现时住在三道川的齐家桥。

我分析情况，又估量一下路程：三道川归华池县管，这一带群众也反了水，从瓦舍往齐家桥直走，有 100 多里，要经过金佛坪和蔺家砭，那里原是张廷芝的反动据点，不易保密，只能走白宝川的袁家台，路程是远些，有 200 多里，可那里是老根据地，漏不了消息。决定后便一天一夜急行军，黎明包围了齐家桥。进去一看，民团的人一个也没有了。我想，我们的速度快，还是绕圈子来的，敌人怎么会知道呢？据齐家桥群众反映，民团是头一天走的，也就是我们刚出发的时候他们走的。既是这样，说明他们不会事先知道我们来，也就不会走得太远。

我派游击队长袁耀秀带几十个赤卫队员，赶着敌人抢来的牛、羊往白宝川走，其他人埋伏在齐家桥休息、吃饭、睡觉，目的是引诱民团出来。果不其然，赤卫队赶着牛、羊刚上了山头，就发现了民团。这时民团在距齐家桥不远的金盆湾上下来，追赶赤卫队了。

我们把队伍分成两路，步兵在正面，骑兵在侧面，把敌人围在山头上。这个民团大部是些贯匪，很顽强，战斗打了两个小时。敌人占着有利地形，火力也很强，我们的骑兵绕到敌后才冲了上去。我们的步兵也打得很猛，一连连长戴同孝负了伤，不下火线，坚决冲了上去。把民团压的跳了沟，我们的战士也跳下沟，把他们一个一个抓上来。结果是除了打死的以外，全部被我们俘虏，还活捉了他们头子蔺士升和齐正英。对他们处理的办法是：把两个团总押到后方，交给赤安县政府处理；对一些被强迫参加民团的人，遣散回家。

从审讯蔺士升、齐正英口中知道：定边县的王子元民团和赵坤民团，已联合了宗文耀叛军和蔡丰、蔺士升、齐正英等民团，集合了六七百人，准备向赤安县进攻。他们的计划被他们各个击破了。王子元、赵坤部已从定边县城出发到了吴起镇，听到他们联合的力量有的被我击溃，有的被我消灭的消息，又退回了定边城。我即带独立营去靖边县、新城堡、宁塞堡一带游击。当地群众报告，宗文耀、金林叛军在姑山涧骚扰。我们又追到姑山涧，打了一仗，这时宗文耀、金林只有 100 多人，他们一发现我们来追就向北逃跑。我们骑兵队紧追，把敌人追散了，活捉了 40 多人，收了 40 多条枪。之后，我带着部队又到定边、安边、宁条梁、张家畔一带游击，寻找叛军头目宗文耀、金林。他们已经逃到蒙古草原去了。

当我们驻扎在柳树涧时，这里发生了一件事情，是当地群众告诉我们的。他们说，前天从新疆来了个骆驼队，到处打听刘志丹和红二十六军的消息。一打听刘志丹，敌人就注意上了，被张廷芝的部队包围在八里河南边的草山梁。我们听到这消息，断定是自己人，连夜赶去营救。但是已经晚了，连人带骆驼都被张廷芝俘虏了。很久之后才得知，这个骆驼队的人是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化装成商人，由新疆来到陕甘边界的，他们在安边附近打听刘志丹时，也正是宗文耀他们叛乱的时候，暴露了身份，都遇了难。我及时向中央汇报了这个情况。

从 1936 年 3 月到 5 月，我们用了 3 个月的时间，七战七捷，除几个叛军头目脱逃，把叛军、民团和还乡团全部消灭了，赤安、定边、安边、靖边、华池结合部被占据的苏区收复了，三边独立营也扩大到 300 多人了。

“赤安事变”平定后，1936年6月间红军就西征了，党中央领导机关也离开瓦窑堡搬到了赤安县，这里成了红色中国的首都。赤安县成了中央的直属县，我担任了赤安县苏维埃政府的主席。这是1936年12月以前的事。

六月西征

彭德怀

彭德怀（1898. 10. 24—1974. 11. 29）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原名彭德华，号石穿。湖南湘潭彭家围子人。1916 年入湘军。1922 年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在湘军中任连长、营长、团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8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7 月，与滕代远、黄公略等发动和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军长，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12 月率领红军上井冈山。历任红军师长、军长、红三军团总指挥及军团前委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东方军司令员。1935 年起任陕甘支部司令员，红军前敌指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到陕北后，参与指挥红军东征和西征，任抗日先锋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总指挥，继任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协助朱德总司令指挥对日作战，开辟了华北抗日根据地，曾指挥百团大战，使日本侵略军受到沉重打击。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参与指挥保卫陕甘宁解放区挫败国民党对陕北重点进攻等战役，转战陕、甘、宁，消灭了胡宗南军队，解放了大西北。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1950 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4 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59 年 7 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庐山会议）上，上书毛泽东，陈述 1958 年以来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及其经



验教训，被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受到批判，并被免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职务。1965年赴西南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六、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诬陷和残酷迫害，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含冤逝世。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其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彭德怀元帅于1936年率部西征，解放了定边、盐池等地。1947年至1949年间又两次转战三边，打退国民党马鸿逵部队对三边的侵占，第二次解放了三边人民。三边到处留有他光辉的足迹，也留有他不朽的业绩。本文摘自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彭德怀自述》。

东征胜利结束后，红军回师陕北。1936年，约在5月下旬或6月上旬，中央机关驻瓦窑堡，在瓦窑堡以东地区开了全军干部会议，毛主席讲了话。组织了西征军及其指挥部，任务是扩大抗日根据地，接援二、四方面军出草地。以我为司令员，没有指定政治委员，但以刘晓为政治部主任。

我率一军团、十五军团分左右两路西进。一军团为左路进攻曲子、环县、豫旺，在曲子一仗，消灭宁夏马鸿逵之叶旅。旅长夫妇被俘，给以优待，放回后，影响很好，对在回族军队中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起了某些作用。十五军团为右路进攻靖边、定边、安边、盐池，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前方指挥部随右路十五军团行动。

8月初，继续西进。右路十五军团进占惠安堡、同心城，向宁夏开展工作；一军团进至固原、海原及同心城之间。东北军何柱国率1个师和军直属队驻固原城，1个师驻海原，1个师驻同心城及固原线。我军插驻其间，使其互相隔离。我写信给何柱国军长，说明抗日救国大道理，要他让出海原、同心城，全部撤至固原城及其以南，不要扰乱我军接援



彭德怀司令员在西征途中

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在他的军队移动时，我军给予方便及决不进攻的保证。何开始不相信，以后相信了，我军派朱瑞和他进行谈判，彼此遵守协议，他实行了。

8月中旬，一军团进占平凉（不含）、兰州（不含）之间的隆德、会宁等数城；一部伸出渭源，接援二、四方面军，在通渭一带会合。我率前方司令部进驻海原西北之打拉池。

张国焘司令部到达会宁，我与他直接通电，说我拟去会宁和他会见。张国焘当即回电，不要我去会宁，他即日和朱总司令等来打拉池面谈，徐（向前）、陈（昌浩）率部队前来。

第二天，张国焘到打拉池，徐、陈第三天还未见到。拂晓，我到张国焘处质问：徐、陈为什么还未见到？张说：“已令徐、陈率四方面军之主力及一方面军之五军团从兰州附近渡过黄河北岸，向武威（凉州）前进了。”他下达这个命令时，也正是他电告我时。我把毛主席1935年12月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起的作用，东北军、西北军同我们的统战关系同他谈，他完全不听。王宏坤之陈锡联、谢富治师和张国焘司令部，大概是由于西北马家军和王均军的阻拦，未来得及过河。

张国焘到了打拉池后，敌王均2个师尾追四方面军被截断部分前进。我与张国焘面商，只要被截断部分在正面阻拦该敌前进，一军团即可从追敌侧后进攻，在打拉池布置伏击阵地。这样，消灭王均部是完全可能的，这样还可与四方面军北渡主力取得联络。张口头同意，却秘密令王宏坤部向同心城方向撤走，破坏了作战部署。我又与张商，在海原和同心城之间布置伏击阵地，歼灭王均部。他口头又同意了，实际上他又令四军东撤了，使伏击计划又被破坏。

张国焘多次破坏作战部署，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豫旺以西大块土地。如果我军当时把王均军消灭，西安事变就可提早，我军就可能控制兰州和西兰公路以至甘肃全省。

10月初旬，王均和毛炳文两军尾一军团后追击；胡宗南率5个整编旅向一军团侧击；在蒋介石的压迫下，何柱国、董英斌两军亦由南向北迫进，

此时情况是很紧张的。我认为不打退敌人追击，陕北根据地没有粮食，如站不住脚，将被迫放弃陕北，东渡黄河，这种形势是很不利的。无论如何要挽救这种局势。遂决定迅速将一军团集结于山城堡之南，十五军团集结于山城堡之北，待胡宗南先头旅深入山城堡时，南北夹击。山城堡在洪德城以西 15 里，此地有数户人家，有一股笔孔大的泉水。胡宗南部当日离开甜水堡（在山城堡以西 60 里）后，即无处找到饮水，非到山城堡不可。该敌先头旅丁德隆部，黄昏才到山城堡，一军团从南和西面向丁德隆旅进攻，消灭其大半。此役虽小，却成为促成西安“双十二事变”的一个因素。

胡宗南并不死心，率 4 个旅为左路向盐池、定边前进；王均、毛炳文两军为中路，向吴起、保安（今志丹）前进；东北军为右路向华池方向前进。我军转移至洪德城与盐池间，位置于沙漠边缘埋伏着，拟待胡敌通过沙漠疲乏和饥渴之际，给以打击。胡部是主力，也最积极，我如能再歼胡敌 2 个旅，即可将敌人这次进攻打退。

12 月 12 日深夜，我和任弼时（此时，中央刚指定任为前敌政治委员）住在一个 1 米高、2 米宽的土洞（牧羊者住的）内，聊避风沙，点灯看地图。外面狂风、飞沙迷雾。译电员送来电报，高叫：“蒋介石被张学良捉起了！”以后，中央又来电征求对蒋处理意见。我和弼时经过反复交谈，一致同意中央放蒋方针。

13 日拂晓，胡宗南部乘夜撤走了，敌其他各路也均撤走了。张学良军集结西安，将洛川、庆阳诸城皆放弃。我一军团、十五军团、二方面军之一部，及四军、三十一军开驻庆阳、西峰镇一带，张学良送来部分棉衣和弹药。

挥师西征迎战友

刘华清

刘华清（1916—）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湖北黄安刘家院子（今大悟）人。1929 年加入共青团。1931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 年入党。历任少共黄安中心县委书记，红十五军团政治部敌工科科长，红三十一军司令部机关科科长，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供给部政治处主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六旅政委，第二野战军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及上党、邯郸、鲁西南、挺进大别山、淮海、渡江、成都等战役。建国后，历任西南军区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军副政委。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国防部第七研究院院长，海军副参谋长、总参谋长助理、副总参谋长，海军司令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副主席。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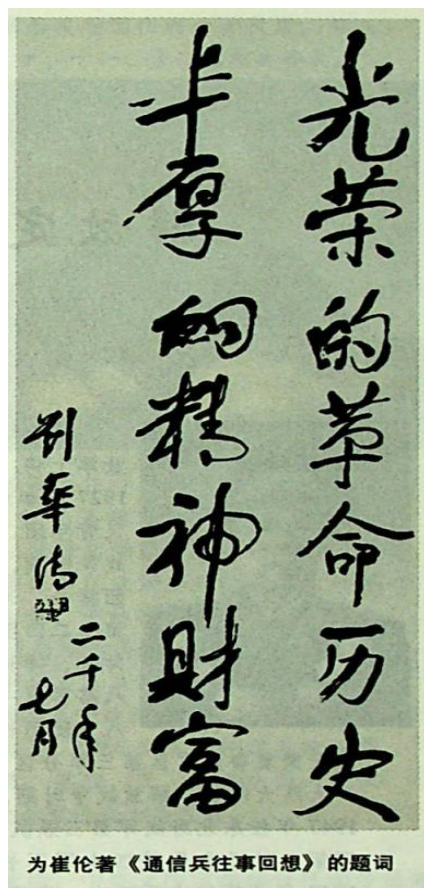
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后，蒋介石政府仍拒绝和谈，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向我陕甘根据地发动围攻。东有晋军、中央军，北有陕军，西有甘军，南有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形成对我四面包围之态势，并不断进犯我根据地。吴堡、佳县、绥德、清涧、延川等地，相继为敌人占领。为了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扩大抗日红军，援助绥远抗战，争取和东北军、西北军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中央军委于 1936 年 5 月 18 日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之一部，在洛川、宜川、神府开展游击战，钳制蒋、阎西渡部队及

渭北敌人的侵犯，以主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组成西方野战军西征，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5月19日，红十五军团从延川贾家坪出发，经安塞、靖边，越过长城，进抵绥远边境的宁条梁。我七十三师夜袭小桥畔镇未克，随即改为围攻，并采取政治攻势瓦解敌人。小桥畔守寨反动武装，在外国教堂神父唆使下，顽抗不肯投降。我军就近围寨，修掩体、挖战壕，携带云梯准备登城，还用火炮向寨内轰击，摆出一副攻城的架势。此时，围寨墙上传下口信，要求我方先派人进行谈判，为证实对方的诚意，军团政治部敌工部长唐天际同志，派我先到寨墙下与对方谈判，我同对方谈妥后，又同唐天际同志一起到寨子里同天主教堂神父、民团头子进行具体谈判，双方达成协议，敌人打开寨门，迎接我军，还送了些粮食和布匹。彭德怀司令员赞扬我勇敢沉着，敢于在两军阵前，敌人未停火的情况下与敌谈判，并给我以嘉奖。此后，红十五军团分路西进，七十八师攻克定边，歼敌马鸿逵一个骑兵连及保安团全部，俘敌350余人，缴获战马180匹，受到了彭德怀司令的表扬。接着部队继续西进，经过两昼夜的苦战，攻占宁夏的盐池城，又歼敌马鸿逵骑兵营及地方反动武装一部，还在该地发动组织群众，建立了城市革命委员会。七十五师袭击安边未克，同七十三师继续西进，于6月底攻战宁夏豫旺县城，歼敌马鸿逵骑兵旅一个营及地方民团一部，缴获战马数百匹，军团骑兵连扩大为骑兵团。七十三师进占同心城、红城水、下马关、王家团庄等地，并和七十五师协同围攻韦州，守敌2000余人据寨抵抗，在我击退马鸿逵骑兵旅援兵后守敌逃跑，韦州城被我占领，7月上旬，我七十三师、七十五师会合，西进同心城，接着又转到海原县一带活动，开辟新根据地，随时打击小股进犯之敌。以后，七十八师进到红城水，豫旺地区休整，发动群众，巩固新建立的根据地。

不久，十五军团奉命集中在豫旺地区进行整训，加强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提高军政素质。彭德怀司令员亲自到我军团，给团以上干部作政治形势报告，并连续开过几次干部会议，动员、布置迎接二、四方面军，实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进一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全国抗日运动的高涨。

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时至甘南。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计划，红十五军团于9月集中行动，按七十三师、七十五师、七十八师的序列，西出南下，向西兰大道挺进，协同一军团粉碎敌人对二、四方面军的堵截和追击。我七十三师一个团，于10月上旬进到会宁西南，与四方面军之三十军会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将介石在静、会地区集中五个军的兵力，分四路向我主力红军追击。红十五军团奉命掩护红一、二、四方面军东进陕甘苏区，在会宁以北节节抗击，采取积极运动防御的战术，在十五里之内辗转战斗，苦战三昼夜，阻击了胡宗南部等八个师及一个骑兵旅的进攻，然后向同心城、王家团庄一带转移，并准备打击进犯之敌。这时，敌人以两个师在正面吸引我军，主力分两路向我侧后迂回，形成包围势态，鉴于我军已完成掩护任务，即摆脱敌人合围，转移到豫旺地区，待机歼敌。



11月下旬，为打击胡宗南主力，壮大我军声威，红十五军团奉命协同红一军团，进攻山城堡之敌七十八师。红一军团由东南向西北攻击，红十五军团由东北向西南进击，在二、四方面军的配合下，经一昼夜的激战全歼二三二旅及二三四旅两个团，击毙敌旅长丁德隆，仅红十五军团就俘敌3000余人。山城堡战役，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给了蒋介石嫡系部队沉重打击，迫使敌主力停止进攻，向西撤退。这次战役后，红十五军团在该地休整，进行发动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活动。

解敌定边、盐池

韩先楚 崔田民



韩先楚（1913.2—1986.10.3）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湖北黄安（今红安）吴家嘴村人。1927年参加农民协会。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二二五团排长、连长、营长。1935年起任红十五军团第二二四团团长，第七十八师二三二团团长，副师长，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副团长，六八九团团长，三四四旅副旅长、代旅长，新三旅旅长兼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1941年起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大队大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1947年任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1949年任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第二副司令员兼四十军军长和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参加了东北1947年攻势作战及辽沈、平津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1950年起任志愿副司令员，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1953年起任中南军区参谋长。1954年起任副总参谋长兼礼让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1973年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崔田民（1912.3.2—1991.11.16）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曾用名崔逢吉。陕西绥德铁笏坪村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陕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保卫局局长。

长，国民经济部部长。1935 年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第六八九团政治委员，第三四四旅政治部主任兼冀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1940 年起任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兼新编第二旅政治委员，中共冀鲁豫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司令员。解放



战争时期，任晋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华北局党校第四部主任，政治部主任。1949 年任铁道兵团副政治委员。参加了邯郸、保卫承德、张家口及鲁西南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任铁道兵副政治委员。1950 年任志愿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高等军事学院速成系班主任兼政治委员。1966 年起任铁道兵政治委员、顾问。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36 年 5 月，红军东征山西回师陕北后，中央又决定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组成西方野战军，率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进行西征，以扩大陕甘宁边区，迎接二、四方面军长征北上，实现三军大会师，合力进行抗日革命。

西征军分左、右两路，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下辖七十三师，七十五师，七十八师，在军团长徐海东、军团政委程子华的率领下，5 月 18 日从延川王家坪出发，经贾家坪、贺家渠、化子坪蟠龙、横山，沿长城一线挺进三边。西征中，我师率七十八师，韩先楚任师长，崔田民任政委。5 月 28 日，我师进抵柠条梁，守军闻风而逃，该镇不打自开。七十三师夜袭小桥畔七十五师围攻安边？均未克，小桥畔为外国传教士所把持的神团占据，凭坚固守，负隅顽抗。因涉及宗教、洋人，为慎重起见，决定采用政治攻势瓦解敌人。我军逼近寨子，挖战壕，修掩体，携带云梯预备登城，还用山炮向寨内轰击，摆出一副攻城架势；同时，不断向寨内喊话，叫派人出

来和谈，否则就摧毁全城。这时，寨子里传出口信，要求我军先派人进去谈判。政治部敌工部长唐天际就派刘华清先到寨墙下与城墙上对方对话。刘华清和敌方谈妥后，由西征军政治部主任刘晓同唐天际、刘华清等率 10 余名战士进到寨子里与民团头头和天主教堂神甫进行具体谈判。慑于我军强大威力，谈判进行得很顺利。我军撤围，敌人打开城门，打洋鼓，吹洋号，列队欢迎我们，还给我军送了一些粮食、布匹。西征前，毛泽东指示：凡是不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道路的武装，我们不打。被我人民红军缴械的部队，只要他们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以放回俘虏，退还武器。此时，十五军团兵分两路，军团首长率七十三师、七十五师按计划向宁夏预旺兼程前进，策应一军团在宁夏作战；彭司令员命我师暂留受野司直接指挥，接替七十五师围攻安边。

6 月 14 日，宋时轮、宋任穷率红二十八军，接替我师围攻安边的任务。我师奉命西进，16 日行至定边城南，先头侦察队侦知定边城内驻守一个营（马鸿逵骑兵第一团二营，营长马彦），协同县保安团防守。我们立即电告彭司令员及徐、程军团首长，请求袭击定边城，同时进行地形侦察和攻城准备。至黄昏，一切准备就绪，部队进入阵地，待命攻城。就在这时，接彭司令员复电：“袭击定边，恐难凑效，仍照原计划前进。”（袭击定边是其它部队的任务，我师是主动请战）。我俩即到阵地召集 3 个团的团长、政委开会。崔田民宣读了彭司令员的电报，然后问“现在我们的部队都已进入阵地，大家说怎么办？”当时面临两个选择：一是遵照电令，撤出阵地；二是强令攻城，夺取定边。经过讨论，绝大多数指战员主张攻打定边，只有师政治部特派员，再三建议：彭总电报，就是命令，军令难违，应慎重考虑。崔田民说：“我们考虑再三，也讨论过了，抓住战机，消灭敌人，彭司令员会同意的。攻打定边城，决心不动摇”。随即由韩先楚部署了攻城：二三三团（团长彭义隆，政委周庆安）二三二团（团长颜东山，政委刘懋功）由西城、南城助攻，二三四团（团长何光宇，政委贺大增）包围东门。指挥所设城南门外龙王庙内。当晚便发起攻击，次日凌晨，三个团的主力，都先后攻入城内，韩先楚进城指挥战斗，崔田民在阵地指挥所发电报，报告彭司令员和徐、程军团首长。彭德怀很快就回了电报：“你

们机动灵活攻克定边，庆祝胜利。防守任务移交宋、宋指（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继续向盐池侦察前进。”



18日，我们将部队移交二十八军。19日，我俩同宋时轮等率连以上干部30多人，骑着在定边缴获的战马，先到盐池县查看地形，并作攻城准备，高岗、曹动之所带的骑兵团配合行动，担任警戒。当日下午，我七十八师部队集结盐池城下，在城头防守的马鸿逵官兵看见我们，轻蔑地说：“娃娃兵还能打仗？”。晚上开始发动猛攻，因向导带错了路，战士又长途跋涉疲劳，攻城没能成功。

第二天，我们决定休息一天，养精蓄锐，以利再战，故围而不打。

20日晚，攻城令下，一时枪声大作，杀声动地，号声冲天，我军指战员从东、南、北三面猛攻，在机枪的掩护下架设云梯，奋勇攀登，跃上城头，与敌展开肉搏战，不到凌晨3点，敌守军溃败而逃，战斗结束。

西征中，我七十八师5天连克两座县城，歼敌一个骑兵团、一个步兵营和两个县的民团武装，俘敌官兵及两县县长以下850余人，缴获战马600

余匹和大量军用物资。为此受到总部和军团首长的表扬。6月底，我军进至红城水，豫旺地区休整，发动群众巩固新建立的根据地。

这两次攻城战斗，在当时有重大意义。盐池，有取之不尽的食盐；定边有丰富的物资、布匹。给陕甘宁边区政府增加了一大批财政收入，解决了边区的实际困难。定边、盐池两县的解放，扩大了革命根据地，打通了前后方的交通联络，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



攻下定边城的红军七十八师于北大操场合影

红八十一师在西征

甘宁途中

李赤然

李赤然（1914—），原名李宗贵。陕西安定（今子长）瓦窑堡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4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中共安定县区委书记，红二十七军连政治指令部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五团政委、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一旅三团政委、旅政治部主任兼关中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西北野战军骑兵第六师政委。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十二师政委，建国后，历任政治部主任，副政委，高射炮学校政委，高级防空学校政委，空军第二军政委，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是中共七大代表，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36 年 5 月 28 日，还带着东征硝烟的红军指战员，又开始了西征。

西征一开始，我军捷报频传。

西征红军的右路军红十五军团，从延川县贾家坪一带出发，经永坪、贺家渠、蟠龙、安塞一线直抵靖边。首战柠条梁，守敌闻讯而逃，我军立即占领西征的要道，接着在安边以东击溃了由宁夏出战的马鸿逵部一个骑兵营，消灭敌军一个骑兵连，继而围攻安边（未克），留部分部队包围该城，主力继续西进。6 月 17 日占领定边，21 日攻克盐池，歼灭马鸿逵部骑兵二团一营三百余人（内有敌营长孙兆祥），6 月 22 日攻克王家团庄，全歼该地民团。6 月 27 日占领预旺县，歼灭马部四团二营营长孙长福以及部下 300 余人。接着我红军派出骑兵部队向东打台州，转战于河连湾广大地

区。7月下旬，红十五军团主力进驻同心城，大拉池一带，随即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并开展了争取东北军等各项工作。

西征红军的左路军红一军团，从延川出发，兵分两路，军团部和红二师经任家坪、蟠龙、保安（今志丹），直抵吴起镇（今吴旗县城）；红一师和红四师经延安、安塞，直抵华池，随即两路红军在吴起镇会合，召开了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战斗动员，准备干粮，做好临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嗣后，立即向曲子、环县挺进。6月1日，我红二师一团和五团将曲子镇守敌马鸿宾部一〇五旅冶成章（人称野骡子）部全部歼灭。红二师另一路在阜城附近与马鸿宾多次发生战斗，消灭了该地大部分敌人，接着占领了木钵，乘胜于6月3日击溃了马鸿宾部三个营，马家军受到我红军的沉重打击后，龟缩到清水河以西一线，再不敢轻举妄动了。我红一军团便西进至七营川、清水河一带，在那里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开展争取东北军等各项工作。但是，被我红军沉重打击后的敌人，并未改变他们的反动本质和不自量力的本性。7月中旬，马匪想打通固原至中宁的交通线，便勾结东北军中一贯与我相对抗的顽固军官之一的白凤翔部，向我红军发兵进攻。结果，敌先头部队白凤翔部一个团，在七营川遭到我红军痛击，被歼灭五百余人，缴获战马300余匹，以及大量军用物资和枪枝弹药等。从此时起，到九月这段时间内，这一线我红军与东北军和马家兵以清水河为界，隔河为峙，无大的战斗。

以彭德怀司令员、聂鹤亭参谋长，刘晓政治部主任的总部，率领我红八十一师为中路军，于五月底从延川县贾家坪出发，经过蟠龙、安塞、柠条梁，直抵安边城。该城地处要冲，被敌重兵固守，四周为开阔沙漠地，易守难攻。我师开进后，即对该城的东、南两面进行围攻，西、北两面的攻城任务由友军（指红军一编者注）担任，经过数十日反复强攻，该城仍未攻克，城内的地主反动武装张廷芝、张廷祥部和一部分国民党杂牌军负隅死守，数十日的强攻，使我红军伤亡较大，有5名连长，9名排长，百余名战士牺牲。同时，城东北方向的堆子梁的敌骑兵亦时对我骚扰。一次，敌驻堆子梁一个骑兵营向我师七连（连长吕振宣，指导员白树勋）阵地进攻，情况十分紧张。我和我的警卫员王强同志（现为兰州军区天水基地政

委，已离休），不顾敌人猛烈炮火的封锁，匍匐至七连阵地。这时，该连指战员情绪很乱，我们的到来改变了这种情况。我重新组织了该连的火力，规定敌未进到距我阵地 30 米以内，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开枪，不准投手榴弹，一定要沉着。就在这一瞬间，敌骑兵在敌机投弹轰炸的掩护下，手持大刀，杀气腾腾地冲到我军阵地前沿。这时，我命令部队把早已准备好的手榴弹投向敌阵。这密集的、突如其来的手榴弹，打得敌骑兵措手不及，一时间血肉横飞，鬼哭狼嚎，溃不成军，争先恐后向来路拼命逃窜。我们继续用手榴弹、机枪、冲锋枪、步枪的密集火力对近、远之敌以歼灭性的杀伤。此战当场毙敌 200 余人、战马 200 余匹。从此，这方面敌人就销声匿迹了，再不敢向我围城的红军挑衅。

在我师围攻安边城最为疲劳的时候，彭总要我师撤出战斗，到定边城休整。7 月上旬，我师进驻定边城，休整一月后，随总部进驻白城子，作为机动部队。

至此，我西征红军的各路部队，都先后开展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工作。

西征中在安边“围城打援”

李志民



李志民（1906—1987）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湖南浏阳人。1927年入党，1928年参加红军。历任红五军党委秘书长，红三军团政治部保卫大队政委、教导营政委，中央军委直属第八十一师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七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之后曾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组织部长、冀中军区副政委、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第二纵队政委，第二十、第十九兵团政委。参加了正太、青沧、平津、太原、兰州、宁夏等战役。建国后任十九兵团政委兼陕西军区政委，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高等军事学院政委，福州军区政委，中共中央军委顾问。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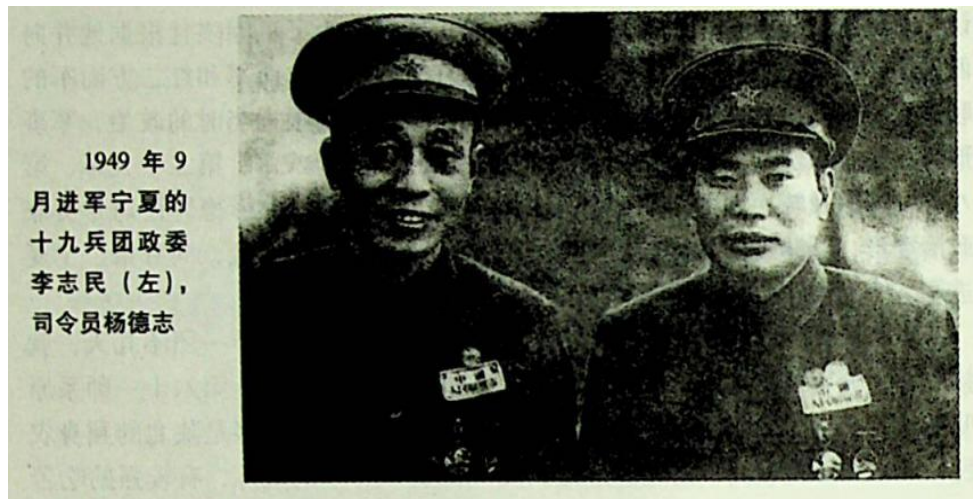
本文据李治民上将1983年5月8日的回忆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将风云录》整理。

1936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村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抗日先锋队“东征战役”的经验。同时，为了巩固陕甘根据地并向西发展，扩大红军和抗日根据地，并向南打通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的联系，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5月18日，中央军委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第八十一师以及骑兵团共15000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鹤亭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率部西征，向甘肃、宁夏进军。

5月下旬，我刚参加完“大相寺会议”返回第四师第十一团不几天，就接到军委调我任第八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参加西征的命令。第八十一师系原坚持陕甘根据地斗争的第二十七军缩编而成，部队成员大多是陕北的翻身农民，政治觉悟比较高，而且经过几次反“围剿”斗争的锻炼，有较强的吃苦耐劳精神，并具有一定的战斗力。师长贺晋年、政治部主任李宗贵（李赤然）都是陕北人；政治委员张明先是原第十五军团的干部。西征前夕，贺晋年、张明先都调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李宗贵继任政治委员。为了加强对第八十一师的领导，军委先后从第一方面军抽调了文年生、李寿轩和我，以及几个团级干部到第八十一师工作。文年生任师长，李寿轩任参谋长，我任政治部主任。

当我接到调令时，第八十一师已同第十五军团、骑兵团合编为右路军，随西方野战军指挥部从延川到新城堡集结。我与文年生一道连忙追赶部队。我们刚到新城堡，李宗贵政委即热情地给我们介绍情况，并亲自主持召开全师欢迎大会。文年生师长和我分别在会上讲了话，整个会场充满着团结战斗的气氛。这次大会也可以说是我部一次西征的动员大会。

5月27日，右路军第十五军团主力从新城堡出发。28日，第七十三师袭占柠条梁（今梁镇）；第七十五师攻击安边未克，继续西进，由第七十八师围困安边。这时，我刚到新城堡不几天，第八十一师即随野战军指挥部进驻柠条梁待命。我是分管政治工作的，历来注重部队的教育训练，把它作为提高部队军政素质、增强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方法。所以，部队一住下，我就向文年生师长、李宗贵政委建议利用这个时机开展战备训练，并对部队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反复阐明西征的重大意义，鼓舞士气。在教育中，我根据安边、定边地区系回族同胞聚居的地方这个特点，以及长征途中经过回民区时的工作经验，着重对部队进行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的教育，重申“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在回民家中吃大荤，禁止在回民中打土豪”等“禁令”，要求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是要尊重回族同胞的信仰和风俗习惯，例如：不准在回民面前说“猪”字，不准借用回民的炊具、餐具，不准带猪肉进入回民的家等等。部队经过教育训练，斗志更加昂扬。



6月10日，西方野战军根据军委指示，决定右路军主力第十五军团（暂缺第七十八师）继续向西南推进，夺占小台子、萌城、豫旺县城及其以北地区，并以一部分兵力进占同心城。另由第二十八军同第八十一师以及骑兵团组成中路军（又称北路军），担任夺取安边、定边、堆子梁等地，在南至薛壕口、小河畔，西至定边、盐池，北至绥远地界，东与老根据地连接这一广大地区内进行“赤化”工作的任务，并准备消灭敌人的增援部队。为加强中路军实力，军委决定第八十一师接替第七十八师围困安边、打击援敌的任务，令第七十八师暂配属中路军向西发展，待完成夺取定边、盐池的任务后，再回归第十五军团建制。

6月16日凌晨，第七十八师乘敌不备，一举袭占定边城，全歼马鸿逵部守敌；后又乘胜前进，21日3时在骑兵团配合下，攻占盐池，全歼马鸿逵部守敌两个骑兵团和民团共200多人，缴枪200多支，战马200多匹，给反共顽固派马鸿逵以有力的打击。在此期间，红八十一师再次攻击安边仍未奏效。

安边位于陕北的西部，与宁夏、绥远地区为邻，它北紧靠长城，西近定边，是我西征军与陕北老根据地往来交通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安边城很小，城墙坚固，守敌国民党第八十六师高双成部约一个团，兵力充足；而红八十一师只有第二四二团、第二四三团两个团（第二四一团调给红三十军），兵力仅千人左右，又缺攻坚火器。而且安边城四周都是沙漠，地域开阔，不能构筑工事。所以，安边虽小，却是一块“硬骨头”，

非常难啃。第七十五师和第八十一师先后两次攻击均未克。后来，野战军指挥部根据实际情况改令第八十一师“围城打援”。

6月24日，国民党第八十六师高双成部驻陕北横山的一个团，奉命向西推进，企图解安边之围，以控制红军这条交通线。横山距安边不过200多公里，按一般行军速度，四五天就可以赶到。但高双成部是一支地方杂牌军，军事素质差，而且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已经伸向华北，危及西北地区的安全，国民党军队中一些稍有爱国心的官兵，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已感不满，对打内战产生厌倦情绪，所以，这个团在途中磨蹭了近20天，7月13日才到了安边城外。



在定边九月骡马大会上交易的蒙古同胞

敌援姗姗来迟，第八十一师以逸待劳。战前，根据师部命令，我布置对全师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提出具体的战斗口号。围城部队要：“勇敢坚定，不让敌人突围”；打援部队要：“沉着应战，坚决把敌人打回去”、“坚守阵地，一枪消灭一个敌人”。各党支部、党小组也召开会议，保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领群众完成战斗任务。经过战前动员，全师上下求战情绪十分迫切，均表示要争取战场立功。

当时，安边城四周虽是一片沙漠，无法构筑工事，但从安边城北转向东南方向延伸的古长城，经过千百年的风沙侵蚀，已残破不堪，但其遗迹仍依稀可辨，宛如一条长蛇蜿蜒起伏于沙漠之中，尚可勉强作为红军防御

的依托。战斗打响前，第八十一师领导干部开会研究，大家认为，倘若安边守敌突围，与援敌互相配合，第八十一师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因此，决定部署小部分兵力，配置数挺轻、重机枪封锁安边城门，防止守敌突围，而以大部分兵力占据长城一线，抗击来援之敌。

高双城部开始发起攻击时，气势汹汹，从东往西进攻，企图一举冲垮第八十一师防线，与安边守敌会合。先以猛烈的火力向红八十一师阵地射击，继而，被驱赶的士兵嘶叫着“冲啊”、“杀啊”蜂拥着向我红军阵地冲来。第八十一师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敌军在沙漠中的一举一动完全暴露在红军指战员的视线和射界之内。文年生师长平时老成持重，对人和气，很受战士们爱戴；打起仗来非常冷静、沉着，经常亲临第一线，灵活、果断地指挥，表现十分英勇。李宗贵政委是从连队锻炼成长的干部，平时练就一手好枪法，打仗时边指挥边参加战斗，经常拿过警卫员手中的步枪，亲自消灭敌人的指挥官和机枪手等重要目标，很有一股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当时，我们全体师首长都在阵地上指挥，坚定地站在第一线同战士并肩守卫阵地。表面看来，敌人火力虽猛，喊杀声也大，但大多或疲惫厌战，或贪生怕死，“雷声大、雨点小”，前进速度十分缓慢。当他们接近第八十一师阵地时，红军指战员便以突然而又猛烈的火力还击，他们马上掉头往后跑。就这样，第八十一师从上午到傍晚，打退了援敌几次进攻，安边城内的敌人也不敢出城。晚上，援敌怕遭到红军偷袭，便悄悄地退回堆子梁去了。

击退援敌之后不几日，我接到驻在定边的西方野战军政治部刘晓主任“速来定边议事”的来电，便忙催马赶到定边城。刘晓主任告诉我，红军西方野战军攻克定边、盐池后，在这一带宣传抗日救国，政治影响很大。西北民族委员会蒙族工作部高岗部长在绥远地区蒙族首领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已取得成效。现在，蒙族首领派人来联络，要同红军结盟，联合抗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今后第八十一师可能进入绥远地区，开展“赤化”工作，所以特叫我来定边，一起商议同蒙族代表结盟的事。

蒙族同胞长年过着游牧生活，使他们的胸怀犹如那无边的草原博大、坦荡、豪放，性格坚强、不畏冰雪、不惧风暴。蒙族的结盟同汉族“拜把

子”的性质有些类似，一旦结为兄弟，便同甘共苦，真诚相助，生死相依。不过，汉族的“拜把子”一般都是几个情投意合的朋友结拜为异姓兄弟，大多带有个人行为的性质；而蒙族同胞的结盟，不仅是个人的行为，每个人还代表着自己的部落、群体，带有集体结为同盟的性质，因此他们极为看重这种行为，仪式亦相当隆重。这次结盟，红军方面有刘晓、我和高岗；蒙族同胞方面有蒙族首领的四名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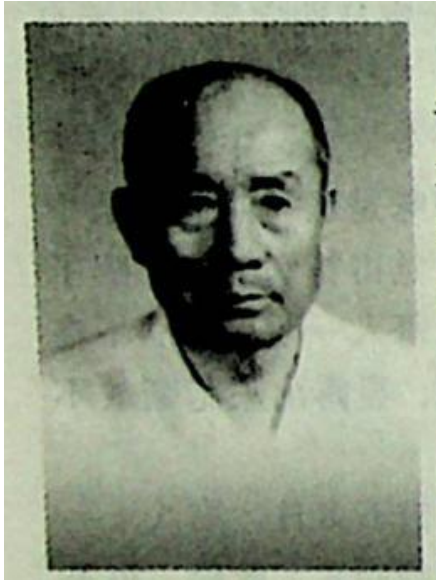
结盟仪式是按蒙族风俗隆重举行的。首先每个人报出自己的生辰，然后按生辰年月排列，年长者为兄，年幼者为弟。当时一位蒙族同胞年纪最大，尊为大哥；我年纪最小，排行老七。仪式开始后，由“小弟”我用铜脸盆端来一盆清水，送到大哥面前，大哥从长袍里掏出一块银元，轻轻地投入盆中，然后在铜盘中洗手。接着，从老二到老六依次洗手，但不再投入银元。最后轮到“小弟”洗完手，又端着铜盆到大门口，把那块银元捞上来，揣进怀里（银元归“小弟”所有），再把洗手的水泼到院墙上。大家都洗完手，表示身心洁净，永结同心。

仪式完毕，摆上酒宴，尽情痛饮同心酒。这酒宴十分丰盛，牛羊肉自不可缺，另有海参、鱼翅之类的海产佳肴，海参等高级海味是从马鸿逵部队中缴获的胜利品。我还是第一次尝到海参、鱼翅的滋味，觉得特别鲜美；喝了几口白酒，脸就通红。而蒙族兄弟酒量之大确实惊人，每人一两斤白酒不在话下，边喝边唱，手舞足蹈，似醉非醉，越唱兴致越高，显露出蒙胞豪放不羁的草原牧马人性格。

这次结盟是红军西方野战军统战工作的成果。只可惜不多日，第八十一师即奉命调往甜水堡待命，我也从此未能继续与蒙族同胞联系。此后，更是戎马倥偬，转战南北，失去了联系。1948年9月，我率部进军绥远、解放包头时，曾任包头市军管会主任，在包头驻扎1个月有余，也曾请人打听这几位结盟的蒙族同胞的下落，但因事隔十余年，连他们的名字也记不清了，便亦无从查寻。

西征中的安边之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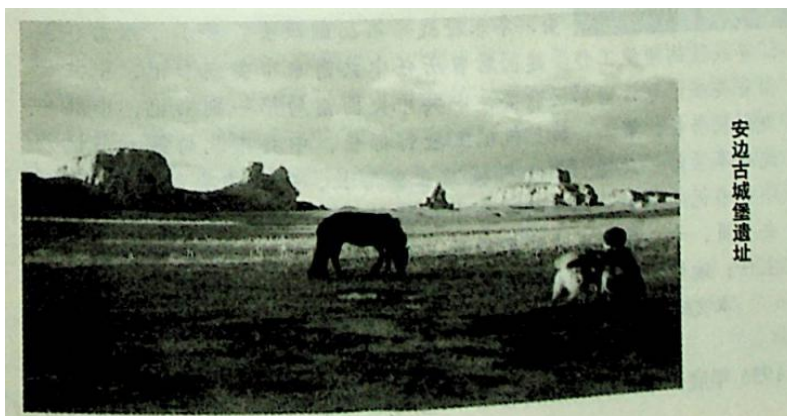
赵立业



赵立业（1908—）靖边县青阳岔人。1933年参加陕北红军。1936年任红二十八军排长，参加了西征。1945年任陕甘宁边区绥德军分区十团团长，1946年秋任绥德分区警二旅八团团长，建国后曾任河北省畜牧水产局副局长。

1936年5月22日，彭德怀司令员率领的主力红军已向三边挺进了，我红二十八军也接到指示，开始西征。我们从延川出发，向三边挺进，当部队到达三边的小桥畔时，主力红军已打下小桥畔和柠条梁，又乘胜去打安边。安边的守敌负隅顽抗，高垒固守，使我军损失不小。后来交给我部去打，攻打了50多天也没有打开，我红二团三连二排承担的处围攻安边城西门的任务。这个城比较坚固，守敌的头子是老奸巨滑的张廷祥和张廷芝，这股匪徒是有名的顽固不化的死硬派。部队干部战士的决心很大，士气非常旺盛。于是我们准备挖地道，爆炸城墙，带两架云梯，登城后近接描到敌人心脏消灭张匪指挥部。接受任务后，我带领的二排在离城门百米左右一处屋顶上修工事，布置了兵力，组织好火力，采取关住门打狗的办法堵住城门，以防敌人突然出城袭击我们。在挖地进时遇到了流沙塌方的危险，我们就边挖边用门板将流沙固定住。为防止暴露目标，我们在院内敲锣打鼓迷惑敌人，地道挖到城墙底下后，装了一千多斤的黑色炸药，利用敌人丢下的3枚炸弹起爆，只听到一声巨响，烟云起处城墙塌下了半边。由于发生了意外，把我们二梯队也埋在了土里。我带着一个排的兵力，架起了两架云梯登上城墙；与此同时，另一个排也冲进了爆炸口直插敌人心脏。但由于敌人迅速占领了突破口，火力又很强，这个排的同志

全部牺牲在里面。而我后续部队又一时没能接应上来，造成敌众我寡，我军伤亡很大。后来军指挥部采取果断措施，命令撤退。安边之战我军伤亡近千人，我们排只剩下我和张步业、曹怀英 3 个人，不少同志献出了生命，特别是东渡黄河的战斗英雄汪妮也牺牲了，这是我们部队的一个损失，使我们每个活着的同志想起他们心里就难过，人民永远纪念他们，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



安边战后，我主力红军西征到定边，先后打下了定边和盐池两座县城。为了适应形势需要，迎接新的胜利，在定边城，红军主力成立了军政教导队，唐加礼任教导队队长。全队分三个排，我担任二排长。首长们都兼任了教员，宋任穷同志给我们讲政治课，宋时轮和唐加礼同志讲军事课。他们都讲得很好，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使我们学到了不少知识。在教导队学习结束后，组织上分配我到军卫生队任指导员。不久，胡宗南匪军进攻陕甘宁边区，我又则到红二团任一连指导员。宋任穷和宋时轮领导的我红二十八军又一连打了几个胜仗，仅定边西南大水坑之战就击溃了胡宗南侵扰之敌，俘虏了部分敌人，缴获了一部分枪支弹药。

党中央毛主席领导我们经过东征和西征，打下一个巩固的陕甘宁边区，使之成为全国人民抗日的总后方。

东征西战的红二十八军

宋任穷

宋任穷（1909—2005）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湖南浏阳人。1926年入团，同年转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中央苏区历任红军连党代表，团、师政委。长征到陕北后任红二十八军政委、军长，援西军政治部副主任。抗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东进纵队政委，冀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中共平原分局代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旅队政委，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委。参加了淮海、渡江等战役的组织工作。建国后曾历任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兼云南军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副书记，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委，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是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主任；政协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本文选自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宋任穷回忆录》。

1935年底，中央决定由陕北红军组成红二十八军。任命刘志丹同志为军长，我为政治委员。参谋长是唐延杰同志，政治部主任是伍晋南同志。辖3个团，1200多人。绥德、吴堡战斗团编为一团，团长黄光明，政委王再兴；米西游击师编为二团，团长于占彪，政委柴成俊；清涧红四团编为三团，团长杨琪，政委陈仿仁。

红二十八军巧立不久，中央临时组建北路军，任命志丹为总指挥，我为政委。北路军除二十八军外，还有由二十六军改编的七十八师和陕北骑兵团。任务是向响水、横山一带挺进，配合红军主力打退国民党对陕北革

命根据地的“围剿”。北路军完成任务后，部队归还原建制，接受新的任务，志丹和我仍担任二十八军的职务。

1936年2月中旬，我红军主力挥戈东征，准备东出山西、河北、察哈尔一带抗日前线，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久，二十八军奉命由吴堡北上，向神木、府谷进发，打通陕北苏区和神府苏区，使之连成一片，巩固和扩大神府根据地，以牵制绥德、榆林的国民党军，策应主力红军东征。

国民党驻陕北的高桂滋和姜梅生等部得到二十八军北上神府的消息后，前堵后截，妄图阻止我军去路。我军屡挫敌军，在短短一个月内，先后在清涧、绥德、吴堡、米脂、佳县的重要城镇，打击敌人，胜利进入神府苏区。我党机关报《红色中华》多次报道二十八军胜利进军的消息。其中3月23日，以《陕北苏区与神府苏区已取得联系，红二十八军与神府红军会合了》为题，报道：“我军最近在吴堡、绥德一带积极向北发展，17日在米脂以东某地击溃高桂滋部5个连及保甲50余人，缴获步枪几支，敌人大部溃散，一部退守土寨。20日，我军与神府红军汇合于佳县以北之某地方，仍继续向北发展，在西七区将高双成部杨向之营2个连全部消灭，计缴获步枪80余支、短枪6把、机枪2架，……俘获营长1名、排长2名、士兵90余名。现我军正向太和寨方向乘胜追击中。”这里所说的20日的战斗，是指杨家堰战斗。这一仗打得很漂亮，战斗只用了1个多小时，全歼敌人1个营。这次战斗得到地方同志的很大支持，神府特委同志亲自给我们做向导，神府老三团也赶来参战追歼逃敌。在这次战斗中，三团团长江琪同志身先士卒，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献身。

经过1个多月的战斗，打通了陕北苏区与神府苏区的联系。3月下旬，中央电命二十八军从佳县以北东渡黄河，配合十五军团迅速打通奔赴抗日前线的道路。3月31日晚，我们开始渡黄河。王兆相同志率领神府三支队随二十八军同行。当我军出其不意接近对岸时，敌人才发现，急忙以火力阻击。我军战士冲上岸拔掉了岸边两个中心碉堡，经过一场激战，消灭敌守军1个营，占了罗峪口。罗峪口是个有几百户人家的镇子，我们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任命王道三同志为主席。

我们接着向北，很快打下了黑峪口，破坏敌防线 30 多公里。随后我们又由北向南，准备同十五军团会合。进入临县白文镇时，接到中央军委急电，令二十八军即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相机攻占中阳县三交镇，牵动和调动敌人，以打通前方与陕北之联系，保证主力红军背靠老苏区。我们即从白文镇出发，接连打败临县、方山、离石、柳林和中阳来犯之敌，4 月 13 日到达三交镇附近的留誉镇。

三交镇是中阳县西部靠黄河的一个重要渡口，河西是陕北苏区的绥德县境。该镇南北两面环山，西面临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镇内有重兵把守，沿河有坚固的工事。4 月 14 日拂晓，围攻三交镇的战斗打响了。志丹同志亲自到前沿阵地指挥作战，在观察敌情时不幸左胸中弹，伤势很重。裴周玉等几位同志抬到指挥部所在的阵地上，我跪下来摸他的心脏和脉搏，志丹同志因大出血已不能说话，不多时即溘然长逝。我把志丹同志牺牲的消息电告党中央，派人护送志丹同志的棺材过黄河，运往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红军东征的胜利，震惊了蒋介石，先后调遣 30 多万军队进入山西，协同晋军堵截红军东征抗日，又令东北军、西北军进攻陕北根据地，大规模内战迫在眉睫。党中央认为，困难当头，双方决战，无论谁胜谁负，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称快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命令红军于 5 月初全部西渡黄河，回师陕北。二十八军随红军主力于 5 月初回到陕北。

蒋介石拒绝我党提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继续调兵遣将，“围剿”陕北根据地。党中央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积极贯彻“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决定主力红军西征。西征的红军组成西征野战军，分两路从延川地区出发，向陕、甘、宁边界地区挺进。红一军团为左路，红十五军团为右路。此时二十八军由宋时轮同志任军长，我任政委，属右路军。定边和盐池打开后，二十八军奉命在这两个县驻防，两个团在定边，一个团在盐池，军部设在定边。

在定边和盐池驻防期间，部队在搞好整训的同时，主要是向人民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领导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和地方武装。首先建立区乡革命政权，之后成立县革命政权。还成立了不少群众团体，如抗日救国会、青

年救国联合会、抗日少年先锋队等。并组织赤卫军、游击队等地方武装。我们对开明地主采取团结的方针，不没收他们的财产，对其中拿出粮食支援前线的人，我们还赠送“团结御侮”的锦帐予以嘉奖。

定边、盐池一带回族较多，我们在工作中注意严格执行民族政策，搞好民族团结。回族群众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起来，回民联合会、回民解放会、抗日救国会和回民游击队等相继建立起来。回、蒙、汉族代表在定边举行了盛会，互表民族团结、驱逐日军、争取祖国独立解放的心愿。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中共中央命令红一、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部，南下集中到西安附近。这时，国民党胡宗南、关麟征、曾万钟部向陕甘宁边区进攻，被我击退。为了追击敌人，中央军委令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袁任远）和二十八军临时组成追击军，罗任司令员，我任政委。根据中央命令，我们追而不击，主要防范胡宗南对张学良、杨虎城两部进攻。我们到平凉后停止追击，驻平凉、崇信。在此期间，我们向群众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抗日救亡。不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追击军的任务即告完成。

1937年2月27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的指示。按照中央决定，由红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和三十二军组成援西军，刘伯承同志任司令员，张浩同志任政委，李达同志任参谋长，刘晓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先在镇原一带集中，准备相机援助和策应西路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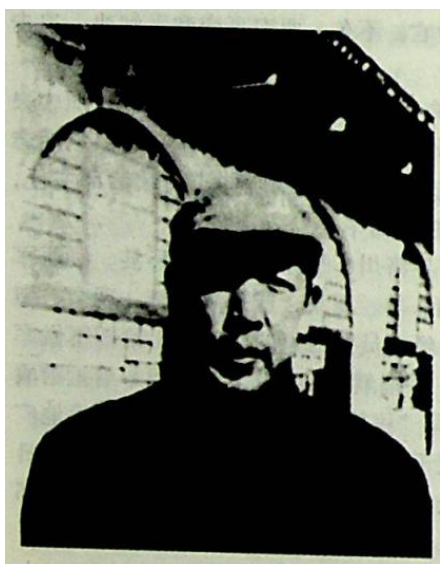
镇原东邻庆阳县，西接固原县、南界洛川、平凉县，北靠环县。援西军进驻镇原后，家家户户或捐献粮食、猪、羊、蔬菜，或捐献鞋袜、现金，慰劳部队，以保军需。阎孟村的孟耀祖，经动员把他家的碉堡让出给四军做军部，又将40亩地让出供部队做操练场，并捐献小麦500多斤，四军给孟赠匾两面，一面书写“爱国可亲”，一面书写“民族先锋”。援西军在镇原等地广泛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扩大红军，派干部到国民党部队进行工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争取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当时的镇原县县长邹介民，经过做工作，积极同我们合作，支持抗日，为我军筹集粮食等，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1937年7月底，援西军司令部在镇原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刘伯承同志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一、取消援西军；二、全部援西军立即开赴三原，接受改编。

二十八军编入以贺龙同志为师长的一二〇师，陕北的二十九军、三十军等编为一二九师。

在定边三个月

李维汉



李维汉（1896—1984）又名罗迈。湖南长沙人。1918 参加组织新民学会。1919 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 年参加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 年回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和湖南省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主持八七会议，并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1929 年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兼上海市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书记。1931 年赴苏联学习。1933 年回国后，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中央党校校长、陕北公

学校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1946 年参加中共驻重庆、南京代表团，协助周恩来工作。后任中共中央城工部副部长和部长、中央统战部长。建国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政务院秘书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全国政协秘书长和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四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主任。

本文节选自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回忆与研究》，李维汉著。

1.组织定边工作委员会。1936 年 9 月，毛泽东叫我去他那里。我到达时，宋任穷已在座。毛泽东对我说：准备打宁夏，夺取银川，因此要组织定边工作委员会，进行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要我任工委书记，宋任穷（驻防军政治委员）、宋时轮（驻防军司令）、高岗、贾拓夫为委员，与定边、盐池县委密切合作。9 月 22 日，我同宋任穷一道去定边。临行前，洛甫对我说，组织部的工作由他照管。到定边 10 多天后，接到他的来信说，中央

认为中央组织部长改由陕北同志担任为好，决定由郭洪涛接替我的职务。我立即去信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后来知道，是博古任部长，郭洪涛任副部长。我的免职是出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等的要求。

定边工作委员会做了下列工作：同定边、盐池两个县委商定了白区工作计划；查明了吴忠渡河点和攻城有关的一些情况；组织了回民游击队；为团结哥老会开了香堂。工委的第二项任务是加强内蒙的工作，做了一些伊克昭盟的工作，但不多。

定边工作委员会存在的时间不到两个月。因为情况变化，原计划取消，工委宣告结束。

2.组织筹粮委员会。红军三个方面军在会宁、静宁会师，经过山城堡对敌战斗后，全部后撤休整。红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驻在定边附近。党中央又电示我和董必武（中央党校校长。当时中央党校也迁到了定边）负责组织筹粮委员会，高岗、贾拓夫均为委员。1936年12月初的一天，我去总指挥部。彭德怀问我筹粮情况，我说，只能保证3个月。他说，可打安边。我说，也筹不了多少。他说，中央在考虑来个“小长征”，打到汉中去。

从彭德怀处回定边不过两三天，又接到他的电报，说发生了西安事变，捉了蒋介石，红军主力即日南下，不用再筹粮了。筹粮委员会也就结束了。

定、盐城市工作的两个教训

(1936年8月24日)

罗 迈

在定边、盐池两个城市中，我们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同时在对商人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在工人斗争中也犯了错误。

在现在的形势下，我们党、苏维埃和红军的一切活动，要适合于抗日统一战线开展的需要与苏维埃的新经济政策。党与苏维埃依据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曾经对土地政策作了重要的改变，而经济政策对于城市工作的重要，犹如土地政策在农村工作的地位一样。我们在苏区之中，无论在城市和农村，都要作出一个模范来影响与团结白区的人民到抗日战线上来。

“工农兵商学联合起来”，这个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不单是为白区提出的，同时是直接地为苏区人民提出的。我们首先正确地实现这个口号，给白区人民一个榜样，告诉他们，在苏区，正因为有了苏维埃和红军，正因为有共产党直接领导之下，抗日人民统一战线有了一切便利的条件建立起来了。我们人民红军一经占领了一个城市，即宣布人民有抗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尽力帮助人民在实际上取得这种自由；宣布取消一切苛捐杂税，以减轻工商和人民的负担；赞助工人和劳动者改善生活的要求，使他们能够积极起来参加抗日斗争；宣布保护工商业家的营业自由（只要他们不是汉奸卖国贼），并欢迎一切私人资本的工商业家与苏维埃经济机关合作，共同来繁荣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事业，以便改良抗日红军和人民的生活。苏维埃欢迎一切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并尽力恢复和扩大各种大小学校，推广真正的国难教育。这些主要的政策，都是苏维埃要诚意实行的。

依据上述的策略来检查定边、盐池城市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我们不但宣布了而且实现了人民抗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不但宣布了而且实际取消了一切苛捐杂税。我们没有做到的是，未能迅速地恢复各种学校，利用旧的学校、机关，帮助原来的教员来进行国难教育。对于这个缺点，应当立即开始改正过来。此外，我们进行了组织工人和领导工人改善生活的事情，在争取工商业者方面也得到部分的成效，但同时我们在这两个方面犯了相当大的错误。正因为犯了错误，所以没有能够使商人稳定起来而愿意同我们诚意地合作。特别是在工人方面，还没有能使群众开始积极地参加抗日的和苏维埃的一切活动。

错误在那里？

首先说到对商人方面的错误，主要表现在过左的作法。苏维埃对于工商业者，不但不进行没收，相反是要保护与联合他们来共同抗日，共同繁荣抗日根据地之经济事业。为着这个目的，党和苏维埃最近还正式宣布，在清算封建残余的时候，对于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土地不没收，商人兼大地主的，也只没收其地主部分，商业的部分不许侵犯。对于工商业者，我们一般的原则是只没收他们当中的汉奸、卖国贼、反革命分子的财产，因为凡属汉奸、卖国贼、反革命分子，无论何人，都应该没收。工商业家之中属于汉奸、卖国贼、反革命分子的，当然也要没收。但是红军进到定边、盐池两个城市后，没有完全遵照这个原则，例如在盐池，没收的11家商店，只有两家是依没收反革命的原则没收的，而其他各家则一般的是商人兼地主，却连商业部分也没收了。这不能说是由于不了解新政策，因为对于商人兼地主，只没收地主部分，这并不是新政策，而是老政策（在长征中还多次中令过）。新政策是说小商人的土地不没收，而商人兼地主则只没收其地主部分。所以对于凡是兼地主的商人，并商店没收之，是连老的政策都被抛弃了。又如在定边所没收的商店中，其中朱友才一家，是作木匠起家的酱园店老板，因为他在民国十八年任过收税员和现在还放了3分利的高利贷而被没收了。据说，当时县委县政府不同意没收，群众更没有要求没收，只是在旁边眼望着没收。除此，还有一件影响极坏的事情，某部在定边筹款，抓到土豪时，召集商界抗日救国会的全体委员，当面拷打，迫

使全体委员担保，第二天就追担保人代垫罚款，致使商人怀疑、恐怕以至携眷逃跑。这种办法，在红军中和地方上是屡被斥责过的，但个别同志依然毫不顾忌地重复！所有这些与统一战线策略和经济政策相违背的过左行为，以后无论在地方上和红军中，都要保证不再重复！

有些同志觉得如果坚持统一战线策略和经济政策，那么，没收的范围虽然比以前缩小了，而红军要款解决给养，又怎么办呢？诚然，没收的范围是比以前缩小了些，但我们认为抗日事业是每一个有良心的爱国者都应该负责的，我们的口号是“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我们欢迎并且鼓励一切爱国者捐助抗日战费，对于富裕阶层的人们，我们要求他更多地捐助，向他们解释，公开地告诉他们，红军帮助他们摆脱了一切苛捐杂税的负担和种种压迫，红军是如何在艰苦奋斗着，红军的给养要依靠于他们的捐助。我们一点也不强迫他们，而且反对平均摊派的办法，但我们要求他们自愿地捐助，愈多愈好。我们相信，如果能够善于把他们说服过来，我们的收获，一定比没收几家商店要多得多。

现在说到工人斗争的教训，但在这里只涉及原则上的几个主要问题。

在苏维埃政权下，不但要使工人群众得到一般的解放，还要领导工人进行经济斗争，满足他们的日常经济利益的要求，这是无可争辩的。但共产党领导工人经济斗争的立场，与狭隘的经济主义者和行会主义者没有共同之点。经济主义者或行会主义者常常迷醉于工人眼前的局部的经济利益，看不见工人阶级的总的利益和政治任务。共产党则不然，她在领导工人阶级为着满足日常经济要求而斗争的时候，同时使这种日常经济要求服从于工人阶级的总的利益和当前的革命任务。所以我们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导师，是工人阶级具有远见的先锋队。更具体地说，就是我们苏区里面领导工人经济斗争的时候，要使之适合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展和苏维埃的经济政策，因此，工人的经济要求，就要有一定的限度。这种限度的大体的界限，就是工人阶级要向工商业主要求工钱改善待遇，同时还要能争取工商业主参加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还要使他们在苏区经营工商业有利可图（能够赚钱）。这样，他们才愿继续发展工商业，工人生活也可以继续改善，很明显的，在革命的现阶段上，苏维埃少不了私人资本的工商业，

苏区的工人，也少不得资本家。以前的汀州的工人斗争中，犯了“左”的错误，结果工商业衰落，商店倒闭，工人大批失业，这个历史的教训是不应该重犯的。可是在定边、盐池两个城市的工人斗争中，还或多或少地重复了这种错误。例如，纯粹工资平均增加了 55%，最高的还增加至 73%。此外，还机械地规定了八小时工作制，规定了老板给工人发衣服鞋袜，工人回家半年不得扣工资，工人临时参加苏维埃工作在一星期到两星期者，工资照给，等等。

其次，在定、盐城市之中，初眼望去，好像所谓工人，都同样是在商店里作工，彼此没有差别。可是如果进一步看的时候，你就知道，首先这些商店有的是专做买卖的店铺，有的是手工的店铺，又是各营一业，很少相同。因此，各个店铺里的生产条件，劳资关系，工人生活也就互有区别，不相一致。我们领导工人经济斗争的时候，就要按照每个行业、每个店铺里的具体条件来分别提出要求，签定个别的合同，这样才能满足工人实际的具体的要求。可是我们的同志却采用平均主义的方式，用一个合同来代表全城市工人的要求。这种方式就不能不发生合同中的条件对于某些店铺太高了，而对于另外某些店铺则太低了的毛病。举个例子来说吧，商店中老年店员生病时，有些在习惯上已经是由老板供给医药、饭食，工资也是照给的，可是在合同中却被限制在两个月内才有效。这种平均主义的方式，不能切实地去解决工人中的具体要求，因此也就不能提高工人对于经济斗争的认识与一般积极性。

在定边、盐池工人斗争中，还有一种极坏的方式，就是一些领导同志那里代替和包办工人的斗争事业，而不是领导工人斗争。经济斗争是工人阶级最实际的学校，让工人自己商议决定应该提出什么要求，并向雇主提出这些要求，和雇主谈判，以至于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包围雇主和怠工等方式来争取要求的全部实现，或双方让步签定妥协的条件。总之，一切都让工人们自己动手来作。共产党和上级工会的领袖，当然不是要袖手旁观或者做尾巴，而是站在领导的地位来帮助工人取得胜利，并使他们不走上偏向，在每一个斗争的过程中，随时帮助工人认识斗争的经验和教训，这样，就能使工人从斗争中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认识自己的力量，学习阶级斗

争的方法等等。假使工人在开始斗争的时候，还只认识到某几个要求对于他们是迫切要求，因此热烈地提出来，并且热烈地斗争着，而对于另外某几个要求（这些要求在我们上面的同志看来是必要的。如革命纪念日放假之类），则不感觉需要，因此而表示很淡漠，那时我们也用不着着急，硬要一次解决所有在我们看来是迫切的要求。因为要使广大群众行动起来，就必须根据群众切身需要，根据群众在目前发展阶段上所具有的战斗力的程度而提出斗争的口号和方式，只有当经济斗争的果实是经过工人自己热心斗争得来的时候，工人才会用一切力量去保护这些果实，而不许资本家夺回去，才能使工人斗争提到更觉悟的程度。记得在汀州，某部分工人表面签订工会所提出的合同，背地里又与资本家暗订让步的但事实上有效的条件。这是一种最好的实例用来证明劳动合同只有从工人热心斗争中签订的，才是工人所宝贵的。但在定、盐那里，却采取了相反的道路，同志们不根据群众切身的需要，不根据需要在目前发展阶段上所具有的战斗力的程度，而凭自己主观认识，从自己袖子里拿出一个现成的合同来代替工人的要求。签订合同的一切手续，主要也是由领导工人斗争的同志代办的。有些同志还诚意地断定：“工人的要求应该一次解决好，不然我们似乎对不起工人。”“如果让工人自己动手，那会变成无政府状态，有害于革命秩序。”“要使工人完全了解合同的内容吗？唉！干部都不能了解，何况工人呢！劳动法难道是工人了解后才公布的吗？”从这几句话中，可以全盘明了定、盐劳动合同是怎样产生出来的以及它对于工人有怎样的影响。因为合同是代办的，而且是平均主义的，所以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发生对合同解释的纠纷，劳资间许多有利于工人的习惯在合同中没有提到，所以定边工会中曾发生雇主混入操纵的事情，而合同中的某些条件，的确是干部尚不懂得，而何况工人！

因为定、盐工人斗争中犯了上述的缺点和错误，便影响到工人之中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积极性没有能够相当地提高，工会会员对于红军还存着疑虑心理，稍有误会，即发生逃跑。这样，要使定、盐工人积极地参加政治活动，做到工会成为苏维埃的柱石，还是我们面前一个未曾解决的艰巨的任务。定、盐的党在工会工作方面，不应该满足于现状，而要坚决地从表面进到深入，虚心地去倾听每个店铺里工人的意见，真正地解决他们的实

际而迫切的需要，细心地去解释他们中间的怀疑以至于恐惧的心理（这些怀疑或恐惧或者是由我们的错误所引起了，或者是由雇主方面的造谣），我们都应毫不放过地去帮助人们消除干净。我们要用各种方法去从政治上教育工会会员，吸引他们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从工人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给他们以党的教育，培养出工会中党的骨干，是保障工会中政治任务实现的主要条件。

（原载 1936 年 9 月《党的生活》第 10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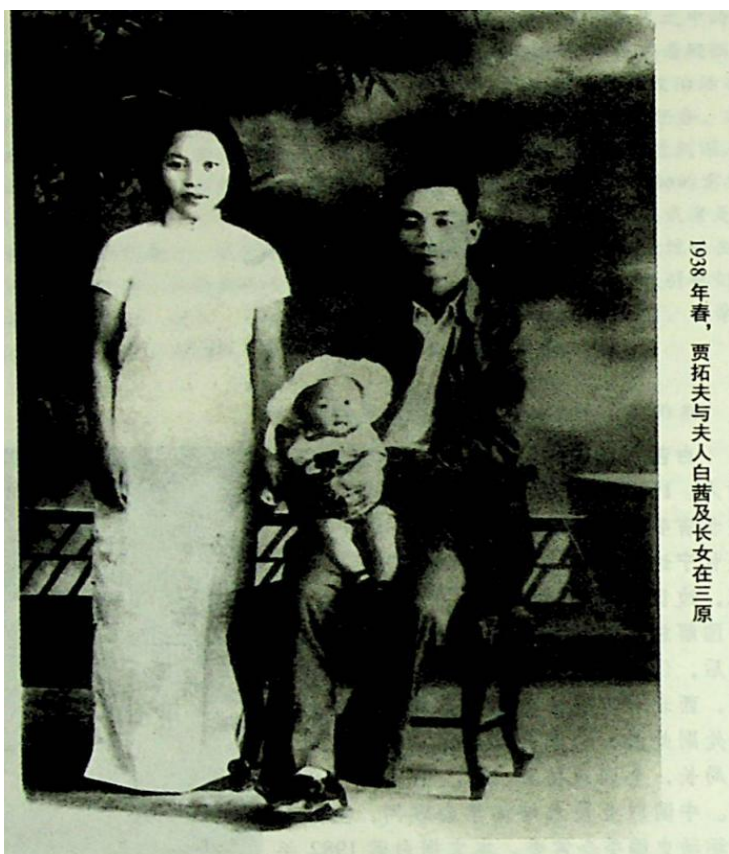
忆 拓 夫

白 茜

白茜（1918—），女，清涧县高杰村人。193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少共陕北省委妇女部部长，三边特委妇女部长，陕甘宁边区妇联主任，中共西北局妇委书记，边区参议会参议员，中央妇委委员，中国解放区妇联筹备会副主席。1949 年 4 月后，任西北局妇委副书记，西北妇联常委，西北军政委员会监委委员兼民政部社会处副处长，国家劳动部保险局、培训局副局长，全国政协五、六、七届委员会委员。中国职业技术培训学会顾问，全国妇女运动史编委会常委。本文据白茜 1982 年 6 月 7 日、1986 年 9 月 8 日回忆，马骥整理。



贾拓夫，又名贾宏光，陕西神木人。1936 年 1 月，我们在瓦窑堡不期而遇中结识后结婚。介绍人是我入党介绍人郭洪涛，证婚人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当时郭洪涛亲自批准一块银元，交际处办了个“酒席”，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李维汉、林伯渠、郭洪涛等中央领导和边区机关的许多同志都来热热闹闹地庆贺了一番。李维汉还以我们的名字作了新婚贺词：“无玉不爱，有夫可拓”引得在场诸公兴趣横生（我当时叫白爱玉）。婚后第二天一大早，拓夫就奉中央指示到关中赴任特委书记兼关中特区司令部政委。



1938年春，贾拓夫与夫人白茜及长女在三原

1936年5月，中央决定红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西征，以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6月三边解放后，中央和新成立的陕甘宁省委派贾拓夫、毛齐华等组成中央巡视团，到三边巡视工作。我当时是西北工委妇女部长，也随团前往。临行前，中央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对落实工商业政策、少数民族政策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到定边后，我留定边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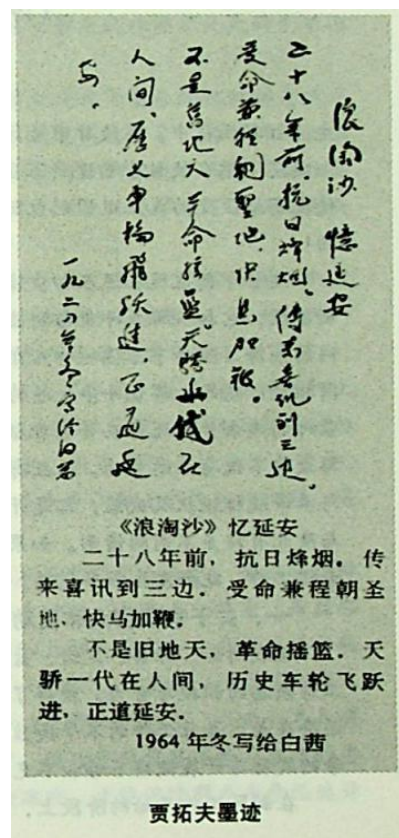
1938年春，贾拓夫与夫人白茜及长女在三原县委妇女工作部部长。拓夫则在定、盐（主要在盐池）巡视，他们配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率领的经济工作团，深入基层发动群众，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认真区分地主剥削所得和经营工商业所得的界限，对在打土豪中发生的不该没收而错误没收部分，坚决纠正退还原主。巡视团还反复教育干部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坚决废除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不利于民族团结的陈规陋习。11月，拓夫接替张德生担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我也改任特委妇女工作部部长。拓夫在三边工作期间特别重视调查研究，不到半年时间就跑遍了定、盐大部分地方，写下了

多篇调研文章，仅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党的工作》上刊登的就有《关于新区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八月份定、盐赤化工作的前进》、《定环通讯》等3篇。

在定边和我一起搞妇女工作的还有杨芝芳（高岗爱人）、钱希钧（毛泽民爱人）、阎清芳（赵通儒爱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健全各级妇女组织，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思想，鼓励同旧的习惯势力作斗争，禁（大）烟、放脚、剪发，动员妇女上学，参加社会活动，参加革命工作，参加生产劳动，繅皮子、做军鞋，不要拉男人参加革命后腿等，努力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消息传来，人们高兴万分，奔走相告。在定边召开了群众庆祝大会，我和拓夫都参加了大会，董必武、李维汉还讲了话。群情振奋，我的心情也非常激动。大会向中央致电，提出公开审判蒋介石，并要求把蒋介石押到边区，接受人民的审判。

对西安事变，中央从全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应张学良、杨虎城将军邀请，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协助张、杨处理西安事变，并决定重新组建中共陕西省委，领导陕西国统区的抗日救亡斗争。西安事变发生后不几天，接中央电报，拓夫和我，还有警卫员孙福武和马夫4人，快马加鞭，星夜兼程，赶赴肤施（延安）。到延安后，他未休息，饭都没顾上吃，就随周副主席等乘飞机前往西安，我和欧阳钦等坐汽车随后赶到。12月25日，新的中共陕西省委成立，拓夫任书记。从此，我们离开了三边。



关于新区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1936年8月20日)

贾拓夫

主力红军西征中，在陕甘宁地区开辟了纵横800余里新的苏维埃领域，基本上实现了党在陕甘宁创造新苏区的任务。然而，我们还须做很多工作，才能使现有地区变为真正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并求得更大的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

陕甘宁新区现在还在初步赤化的阶段上，这是在红军的胜利中，开辟的新苏区，它和从群众斗争与游击战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陕北苏区，有许多不同的条件。陕甘宁苏区的特点在于：（一）这些区域国民党统治虽被红军铁拳所摧毁，然而，群众斗争一般的还在开始生长与发展的过程中；（二）地主、豪绅的残余势力还存在并在积极的拼命反攻！被打倒的反革命地主、豪绅在群众中不仅有他的影响，而且有着密切的联系；（三）过去没有党的基础，党与革命政权组织及武装，都是开始创造；（四）在经济条件及民族关系方面也与陕北有许多不同的情形。如果我们不了解新区的这些特点，那么，我们的赤化工作，就会发生很多问题。特别在工作方式上会产生严重的结果！

一、关于争取群众和发动群众斗争

就我所知，环县、定边、盐池这些地方的赤化工作，虽然由于我们新区工作同志的积极与努力，获得了一些成绩，但工作的落后和进步的迟缓现象还存在着，并且工作的不平衡性还是十分严重，其最大的原因就是群众斗争的发动与开展做得不够和不充分！

在新区工作开始的阶段上，发动群众斗争是中心的一环，谁能够抓住这一环，谁能够为当地群众当时最迫切的要求而斗争，谁就能够把群众抓

到自己手里而迅速的开展新区各种工作。环、定两县一些工作进步较快的区乡（如环县洪德区三家峁岭乡及定边三区个别的乡），他们把群众发动起来，群众情绪就大大的提高，逃跑群众就都回来了，革委及群众组织也很快的建立起来，以至我们动员群众当伕子运输伤兵都可以很快的做到，再去检查那些工作落后的地方（如环县之胡家洞子，定边之四、五区），恰恰是在那里没有很好的发动群众斗争。

在环县、定边、盐池，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是粮食和牲畜（牛羊驴），土地还是其次的，这就需要我们大大的去发动群众起来分地主、豪绅的粮食、秋苗和牛羊。但我们对群众迫切要求斗争的领导是极不够的！定边二区群众纷纷跑到区政府来混饭吃（群众说这是公家的，我们穷人应当来吃），黑夜里偷豪绅、地主的粮食。这显然是群众要求粮食要饭吃的表现，然而，我们在那里工作的同志却骂这些群众是流氓，而不去抓紧群众这种要求大大的发动他们挖豪绅粮窖、割地主秋苗的斗争。

有些新区工作的同志下乡去工作，差不多把全部力量放到组织群众建立革委上面，而不去立刻积极的发动群众斗争，这些同志好象以为把群众组织起来，政权建立了，才能斗争。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其结果往往是斗争也发动不起来，而群众组织与政权也建立不好，这是不善于把组织群众建立政权和发动群众斗争密切的联系起来！

打土豪是发动群众斗争最主要的和最好的方式，但我们有些红军部队在打土豪中间表现脱离群众的现象。打土豪不去积极的发动群众，而由自己一手包办已经是不好的了，打过后也不把土豪东西尽量的发给群众更是不对。定边、盐池打了很多土豪，但分给群众的东西是不多的。并且好多时候打土豪不出布告，不在群众中做深入的宣传解释，把打土豪单纯看做为了筹款与部队给养的目的，而以发动群众斗争是次要的，或者仅仅是口头上说重要。这种观点应当坚决反对，因为这是开展群众斗争争取群众中极大的阻碍，这须引起红军中政治机关严格的注意。

打土豪如果不执行明确的阶级路线非但不能发动群众斗争，而且会在群众中造成恐慌逃跑现象！这在环县开始的一个时期，表现十分严重。我在环县县委检查了4家被打的土豪，而这4家实际上都是富农和中农。盐

池打地主兼商人的一家，将地主家庭连店铺东西“一把抓”。定边将一个木匠小商人当土豪打了。这些严重现象的结果，自然会造成群众的恐慌，以致如象在黑城岔群众逃跑的不敢回来，回来的又逃跑了。因此我们需要冷静的正确的去分析阶级，坚决执行明确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才能保障群众斗争迅速开展。

在打土豪中，对于土豪也不应看作是完全没有分别的一个东西。土豪不只有大有小，而且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也有不同。在新区为了争取群众，在开始应当先打最大的和为群众最痛恨的土豪，因为这是最容易发动群众的。对于在群众中还有影响的土豪，在群众斗争还不很深入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打，对于哥老会的土豪分子，估计他在群众中的影响，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是应当的。然而我们在打土豪中并不都这样去做。譬如我们定边五区有个土豪在年荒时曾给群众散过粮，所以远近群众都讲他好，皆呼为善人，据说以前土匪也不轻易来骚扰他的，但我们一去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他打了，结果使很多群众对这件事不满意，并引起群众的逃跑，使那里工作发生许多困难。这不过是一个例子罢了！就是对于应当打的土豪，我们也应尽量避免一些过火的行动，如象我们打土豪时打得尽光，把土豪抓来给以严刑拷打，这些都会在新区开始时期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恐慌。

为了争取群众，我们不仅在打土豪和发动群众斗争中须注意上述的问题，就是其他方面即使是最微小的事件上的都应时刻注意，不做一点违反群众利益和意志的事情。如我们部队在定边烧土豪家里的门板木具，杀吃土豪的牛，环县有部队拆庙里的门窗当柴火烧，都引起群众的不满和反对。

最后关于发动群众斗争的方式，应当充分估计到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形和群众斗争的情绪，不应把我们在老苏区那一套老的动员方法，到处刻板的运用。然而我们许多同志并不如此注意，把新区群众和老苏区一样的看待，结果斗争不能广泛的发动或根本发动不起来。

很好的去领导群众，并把斗争尽量的深入和扩大，争取广大群众坚决的在党与苏维埃领导之下，仍是陕甘宁新区目前巩固与发展的极重要的工作。

二、发动群众与反革命斗争

正因为是新区，反革命、地主、豪绅的残余还存在，并比从前更积极的活动，所以发动群众起来与反革命作斗争，就成了争取群众巩固苏区的先决条件。

新区虽然是在红军的统治之下，然而反革命的活动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可以利用尚存的反动武装来进行公开的活动，他们也可混到群众中甚至革命机关和武装队伍中来进行秘密的活动，他们在政治上散布很多谣言来欺骗群众，他们也实际的恐吓影响和组织群众的逃跑并破坏我们的革命工作。我们每一个政策及工作，都会遇到反革命各种方式的反抗，反革命多假冒红军来破坏红军的信仰，引导群众来反对红军。

在环县胡家洞区，因为反革命的区长指挥着少数武装坐在山上影响群众，所以那里的工作不能开展，定边四、五区因为有一两股反革命武装的活动，所以群众不敢回来，工作受到阻碍。因此，不消灭这些反革命的武装，群众工作是很难做起来的。

我们同志往往只看到反革命公开的活动，而对于反革命的在群众中甚至混到革命队伍中来秘密的活动，则表现估计不足，引不起警惕。在定边开始的时期，反革命的侦探、坐探在城内积极的活动，反革命分子隐蔽在城外附近村庄指挥着城内的他们来活动，但我们没有及时的给反革命活动以打击，反革命从城内运出三四十支枪支，然而我们在事后才晓得。最近时期，由于我们提高了对反革命的警觉，所以，反革命的坐探也破获了，反革命隐藏的枪支也发现了。

揭破反革命的各种欺骗我们显然还做得不够，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并不十分注意，不能有系统的把反革命欺骗的实质及时在群众面前揭发以争取群众。在定边，反革命散布了许多反革命的谣言，如说陕北苏区完了，一个红军也没有了，安边堆子梁开来几百白军，红军不久就要走了，红军要抽丁，红军活埋了很多学生，红军走时要把青年妇女统统带走，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对于反革命某些欺骗宣传，虽然我们在定边城内是揭发了，所以定边城内大部分青年男女都回来了，但是我们在其他各区就做的非常

不够，至今群众在反革命欺骗影响之下没有回来的还不在少数，特别是青年职业学校数十学生，现只到校十来人，而大多数在反革命欺骗之下不知所往。

反革命常常利用我们工作中某些缺点和错误，在群众中尽量扩大反宣传，使群众对我们不满和反对，在定边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如打错土豪，反革命就说红军先打土豪，后打商人，最后还要打群众，影响着群众，使群众恐慌。由于我们及时的到街上沿街挨户的解释宣传，才把反革命的这种欺骗揭破，把群众的恐慌消灭。但我要说，我们对反革命的每一欺骗不是都能及时警觉与揭发的，解释与揭发不能深刻与普遍是有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新区每一个工作的进行特别在工作方式上应当严格的注意，不给反革命以任何的借口，要能深入的解释和宣传，使群众不受反革命的影响！

在定、盐其他，真正能与反革命斗争的组织与领导至今还未能建立起来，革命委员会之下的肃反委员会事实上是空的招牌，还没有有能力与反革命斗争的干部！

同反革命斗争的最大弱点，还是没有能把群众发动起来，去反对反革命！反革命无疑的还影响着部分的群众，而我们没有争取过来，就是已经开始参加斗争的群众，我们也还未把他们的斗争情绪提到与当地反革命斗争的高点！因此，我们同反革命斗争，还没有在群众中树立下广大的基础。这就是我们同反革命斗争的弱点，而反革命恰好施用各种方法来活动。

因此我们须要用一切力量去发动群众的肃反斗争，这当然和争取群众并发动他们的斗争不能分开的。只有在争取了群众并把他们的斗争发动起来，并加强我们的宣传发动，揭破反革命的一切欺骗与影响，尽量提高群众对反革命的阶级仇恨并抓住反革命危害群众利益的某些实际例子去斗争，我们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同反革命作斗争！

发动群众同反革命作斗争是深入和开展新区赤化工作不可分离的重要部分！

三、武装群众的问题

在新区武装群众，首先建立精干的游击队，是一个极重要的工作。因为同新区地方的反动势力斗争并消灭他们，必须依靠群众自己的武装力量，而且新区的巩固与发展也必须在广泛的游击战争中才能获得。游击队的巩固与发展，也必须在广泛的游击战争中才能获得。游击队是巩固新区的基本力量之一。

但是建立游击队必须依靠群众斗争的发动与开展！必须吸收在斗争中真正积极勇敢的分子，必须有很强的干部领导和共产党的骨干，然后这个游击队才能担负起他的任务。否则，游击队就会瓦解，环县几个游击队的叛变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定边建立游击队当中发现极严重的问题。城区前后组织了两个游击队，第一个12个人，而这12个全部是当红军进城时才脱离民团的团丁，副队长就是高桂滋的护兵和“铲共义勇队”的班长，不仅大多是鸦片烟鬼而且有的打土豪分了东西去养活婊子（卖淫的），打土豪打到中农，在群众面前狐假虎威。第二个14人，内有11个烟皮，3个团丁。1个在白军当过营附。这些人是如何扩大来的呢？说来倒很滑稽可笑。第一，他们下命令每村来1人；第二，他们去宣传，凡是抽大烟而没烟抽的都来当游击队，当游击队有烟抽；第三，他们又花钱，家庭不好的每人每月发□元。五区游击队扩大了十几个，而送到的9人中有5个烟鬼。五区又是怎样扩大来的呢？是我们放一个白军下来的当队长，要他去“招兵买马”，于是他就大肆宣传说，凡是在白军民团干过事的都要当游击队，并且每村要派1个来当游击队，这是上级命令，不来就要派骑兵来抓人。这里面不仅是错误，而且还有反革命的活动。在二区扩大游击队，是集合群众站队点名编游击队，结果群众逃跑。盐池委哥老会分子去为我们扩大游击队，结果召来许多坏的分子。

这里就说明，定边这一时期的扩大游击队是完全走了极端错误的路线，不但脱离了群众，而且脱离了我们的基本群众。因而在方式上就不是通过我们的宣传鼓动在群众自觉的自愿的条件之下，去扩大游击队，而是强迫命令的招军买马的，并很多是拿极不正确的口号（如钱、烟）引诱来的。

试问：这样的游击队还能够负起他们的任务吗？这样的游击队要使他脚踏环县游击队的覆辙，是不会有事！

定边党已开始惊觉起来了，正在用极大努力来改造这些游击队，坚决清洗坏分子，派强的干部去领导，并建立党的基础与政治工作，同时坚决转变扩大游击队的路线与方式。这是完全对的。扩大游击队不能只图数量，而尤其重要的还是质量。

定边、环县的经验，应当成为我们所有新苏区扩大游击队的教训！

关于建立赤少队群众武装的问题，应当注意的是不要操之过急。因为在群众斗争还不深入的时候就去建立赤少队，特别在方式上如果不好的话，那一定会引起群众的怀疑而不好进行。在定边，我们的同志曾经企图用“抄名册”的办法把赤少队建立起来，然而都是失败了，并且反革命利用这个事实造谣说红军“抽丁”，引起群众的恐慌和逃跑！所以我的意见，只有在那些斗争比较深入的地方，才开始组织赤少队，而不应企图一下子普遍的建立赤少队，并且要反对“抄名册”的办法，而必须经过深入的宣传鼓动。

（原载 1936 年 9 月 14 日《党的工作》第 12 期）

难忘的 1936 年

史梓铭



史梓铭，原名史志纯，陕西清涧县人，1936 年任少共定边县委书记。建国后曾任武汉机械厂党委书记，我国驻布隆迪大使。1982 年 6 月在中苏友协工作。

1936 年红军西征前夕，少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征求我的意见，问是否愿意随军西征，我表示愿意。于是，我就被分配到红军西征干部工作队，干部工作队主要任务是开辟新区的地方工作，每解放一个地方，首批党政军和群众团体负责人全由干部工作队委派。定边、安边、盐池三县的领导班子，出发前都是在瓦窑堡确定的。

定边县委书记刘悠安（江西赣南人，长征干部，后在平江惨案牺牲），组织部长王聚德，军事部长曾子刚，我是少共县委书记，县苏维埃副主席康建熙，工会主席马汉山，由我们几个人组成县委常委班子。安边县委书记慕纯农（又名米纯良），少共县委书记贺崇华，少共县委儿童书记耿志明。盐池县委书记惠庆棋。

我们从瓦窑堡出发时，由各县县委书记具体带队随军西征。我记得，定边县的干部约有二十多人，其中少共干部就有十二人。王占琪是少共县委组织部长，王国藩是少共宣传部长，刘玉亭是少共少队部长，张启贤是少共儿童书记，其他同志到定边后都分配到区上搞少共工作。

当时王玉海带领游击队在吴起北部一带活动，我们在瓦窑堡出发时，陕甘省委就确定他带领游击队护送我们去定边，并任命他为定边县苏维埃主席。我们到新安边以后，安边县（当时安边城未解放）的干部就留在这

里办公。定边县的干部继续前进，定边解放的第三天我们就进了城。到定边后，我们马上就开展工作。当时主要任务是以 1935 年瓦窑堡“十二月决议”为内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建立区乡政权，打土豪、分财产。时间不长，我们又选拔了一批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王玉海正式任县苏维埃主席，左生泰（姬塬人）任副主席。左生泰是个很好的同志，可惜身体不好，于这年 8、9 月间得伤寒病故了。宋绍文当了县委宣传部长，张启贤调走后薛生荣当了少共儿童书记，还有武维邦、左怀玉等人都是从定边高小里选拔的。

定边解放后，共建立了六个区。一区是城区，二区是白寨子区，三区是大涧子区，四区是羊圈山区，五区是姬塬区，六区是罗儿峪岭区。城区书记李尚培（后任少共县委书记），二区书记马世良，三区书记白进宝（后被叛匪打死，由李进桐接任），四区书记白加采，五区书记王学廷，六区书记樊金堂，后高明扬。各区都建立了游击支队，人数多少不等。二、三、五区的人数多一些，大约各有几十人。

著名的山城堡战役前夕，定边县委成立了征粮工作队，到各区搞征粮工作，支援前线红军作战。我是三区征粮工作队队长兼游击支队政委，王聚德是五、六区征粮工作队队长兼游击支队政委，白坚（中央党校高级班学员，被派到县上帮助工作的）是二区征粮工作队队长兼游击支队政委。三区区址设在大涧子，我到那里有个姓魏的木匠，是个河南人，表面上看他胆子大，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所以就让他担任了游击支队队长。有一天，情报说敌人要来大涧子了，我决定游击支队马上转移，但姓魏的却不走，说情报是假的。最后我即带领队伍走了，我们刚转移到二乡，就遇到了被张廷芝民团追赶的少共中央干部杨纪礼，他说敌人是真的来了，我马上带领部队向靠近五区的邵家梁一带转移。第二天，姓魏的写“鸡毛信”传送给给我，说大涧子没有来敌人，让我带队回去。我没有相信他的鬼话，就住在邵家梁一带搞了半个多月的征粮工作，圆满地完成了县委分配的征粮任务。事后得知，姓魏的早就跟张廷芝民团勾结了。他写信骗我们回去是要消灭我们。以后姓魏的被抓住，在定边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枪毙了。

山城堡战役前夕，定边的形势是比较紧张的。宁夏马鸿逵部队一度窜到盐池县惠安堡、红井子一带，安边的张廷芝匪部一度包围定边城，我们在三区派人进不了城，县上派人又下不来，彼此失去了联系，我心里很着急。山城堡战役胜利后，县委派骑兵支队队长樊同仁带领骑兵来接我们回城。他传达县委指示说：山城堡战役胜利了，歼灭胡宗南七十八师一个旅零两个团；围困定边张廷芝匪部被我蒙古骑兵支队和红二十八军打跑了，征粮工作应停止了，县委指示让他们骑兵支队带我们游击支队回定边城。当时我们听了这些消息很高兴，还杀了几只羊，大家做的吃好的，表示庆祝。当时中央党校也派出一些学员在梁台一带帮助征粮，被敌人全部俘走了，后又被我红军打败敌人营救了回来。

我们回到定边后，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罗迈（李维汉）正在定边，他接见了我。他说，刘悠安同志被敌人打伤了，要调回省委去了，让王聚德同志担任县委书记，让我担任县委组织部长（少共县委书记由李尚培同志接任），时间是在 1936 年 12 月。刘悠安受伤的经过是这样的：山城堡战役胜利后，他带领警卫员到三区检查工作，刘悠安在大涧子宁富贵家里吃饭，正好敌人的便衣侦探早到了一步，也在宁富贵家里。宁富贵夫妇和敌人便衣侦探事先串通一气，还有我们的一个区长也投敌叛变了。刘悠安同志不明真情，正在招待刘悠安吃羊羔肉蒸乌馍时，敌人出了一个暗号，叛特三个人一齐动手，把刘悠安和警卫扣押捆绑住了，收了三支长短枪。当时敌人决定把刘悠安解送安边请赏，将警卫员就地处决，但因为警卫员是定边当地人，经群众求情释放了，只捉了刘悠安一个人往安边解送。敌人押送刘悠安走到傍晚时，刘感到身上捆绑的绳索松劲了（用皮绳捆绑的），恰好远处有一群羊回圈，刘即机智地说：“看那边是谁的人来了！”宁等一时慌乱，刘便乘机逃掉了，只是负了点轻伤。

西安“双十二”事变后，到了 1937 年春天 2、3 月间，我又去了一次三区。当时国共已达成协议，我党为了围绕抗日，同意将苏区改为特区，苏维埃制度改为民主共和制度，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抗日统一战线已形成，土地革命马上要结束。因而，我党中央通知在此之前抓紧把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我第二次三区之行就是搞分配土地工作的，我到达后，先找

区乡干部研究确定成立了分配土地委员会，接着粗略地摸了一下底，然后基本上按人口平均把土地分了下去，没地农民拿到了土地证，现在回忆起来，因为形势紧迫，当时的任务是搞的粗糙了一点，此后不长时间，我被调任庆阳县委组织部长，离开了定边。

忆中央三边工作巡视团

毛齐华

毛齐华（1903.12—1997.3）又名齐华，上海嘉定人。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之一。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华书局印刷总厂党支部书记、总厂工会党团书记兼工会秘书长，上海沪青年团部委，中共中央地下印刷厂厂长、支部书记，中央武汉印刷厂厂长、支部书记，武汉印刷总工会党团书记等职。抗战胜利后，任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负责人。上海解放后，任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秘书长，总工会秘书长。建国后任国务院劳动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劳动》杂志总编等职。1965年后历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主席。本文系毛齐华1983年1月25日给中共定边县委党史办公室的来信。



1936年2月中央红军东征，后回师陕北。5月又进行西征，连克定边、盐池等城镇。

党中央为了贯彻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精神，广泛开展“革命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向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展开斗争”的宣传，于1936年5月又制定了对民族工商业实行保护政策的决定。

为此，中央决定指派贾拓夫和我率领中央巡视团，从中央驻地瓦窑堡出发，路经保安（现在的志丹）、吴旗等地，直达三边（包括定边、盐池等新占领地区）进行巡视工作。临走前，总书记张闻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召集我们谈话，他们对我们去三边沿途情况和对落实工商业政策、少数民族政策中应注意的事项都作了重要指示。我们巡视三边的主要任务是贯彻中央指示、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当时参加中央巡视团工作的有工、青、妇、文等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如：工会负责人邓振询、妇女工作负责人李坚真和白爱玉、宋任穷同志的爱人钟月林等，其他同志的姓名我想不起来了，好象还有秦力生。

此时红军与东北军已经达成联合抗日协议，当蒋介石下令张学良进攻中央驻地瓦窑堡时，中央已经准备撤出瓦窑堡，我们三边巡视团的同志先走了一步。

与此同时，当时的国民经济部长毛泽民也带领了一个经济工作团，深入定边、盐池搞经济工作，动员生产和运输食盐。而我们主要是搞党政工作，落实政策。所以一到三边地区，我们就召开了党政干部会议，宣传党的政策，执行中央指示要严格把地主剥削的部分和经营工商业的部分区别开来，对当时不该没收而被没收的财产，则坚决退还了原主。

当时驻防定边的红军部队军长是宋时轮、政治委员是宋任穷，我们一起学习中央文件、开会，向工商业家们宣传党的政策。不久总政部主任刘晓也来到定边，我们就经常在一起开会、研究问题。尔后我还带领了一部分同志又到盐池，继续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当时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高岗已住在盐池，主要是负责做蒙古的民族工作。当时还有一支骑兵部队，受

蒙古工作委员会领导。我们为了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搞好与少数民族的团结，高岗、贾拓夫和我三人一起在定边，根据蒙民的风俗习惯，设香案、拜把和蒙民头人结拜兄弟，表示友好。当时他们提出要红军供给他们武器，我们发电报请示彭德怀司令员，回电批准给他们五支步枪。同时，我们也设法找了一些回民头目从敌占区来到定边谈话，宣传党的政策，进行迎送活动。

其时，高岗和我个别交谈时，曾谈到，在中央红军未到陕北之前，他受朱理治、郭洪涛等人的迫害，被关押坐牢，以致臀部生湿疣，至今未愈，叫冤诉苦。我说他：“你到了中央为什么不把这一问题提出来去治疗？”他说：“不好意思提。”后来我把这一情况向周恩来、张闻天同志作了汇报，恩来为此特电通知当地红军部队医生给高岗治疗。

我们工作了一段时间，中央决定三边地区成立特委，汪锋任特委书记，汪锋同志一来到三边提出我们要留三边工作，让我担任特委宣传部长，并且准备主办一个刊物，为此电告中央，中央回电，因当时和我一起在中央白区工作部任秘书的邓颖超另有任务即调做机要工作，叫我马上回中央白区工作部工作。因此，我随即离开三边，此时已到秋收季节。

中央党校一局和中央机关一起从瓦窑堡迁到了保安。这时粮食十分困难，连南瓜充饥也接济不上，于是中央党校由校长董必武带领全体教学人员，又从保安迁到了定边。直到“双十二”西安事变以后才陆续迁到延安东郊桥儿沟教堂内继续办学。当时定边的商业较繁荣，商人用骆驼把土特产品运往平津，再从平津把布匹及日用品运回定边。我们红军部队到这里，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极大支持。在极其困难的时期，三边人民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做了很大的贡献。当时三边人民在当地政府和群众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和土豪劣绅展开斗争，除了把大批的牛羊、粮食分给当地贫苦老百姓使用外，还拿一部分顶公粮上缴。搜查了不少老财们的家，从他们土炕里挖出大批的鸦片土、银元宝等财产，上缴给财政部门，解决了当时的财政困难。

正在开始活跃的蒙古民族

刘 晓

在红军西征胜利影响下，在蒙委工作同志艰苦工作下，特别是在中央对少数民族的正确策略下，蒙古族确实表现了一种新的活跃还只限于部分的蒙人，但这是整个伟大蒙古民族觉醒的开始，我们应正确的这样估计。看呢！下面的事实如何的使我们兴奋。

英勇的蒙古游击队

当着红军发展到三边且胜利的攻取了定边盐池二城，更加激起了蒙古群众的斗争情绪。现在有不少的蒙人在红军帮助之下，也武装起来了，他们组织了救蒙游击队，他们要誓死反对侵占蒙古土地，欺压蒙民的段宝山、高双城等大小军阀和天主堂的洋胡子。他们英勇无畏的在蒙地边境驰骋着，他们不许一个人侵犯他的境地，使段宝山闻之胆寒。他们是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最近扩大到 xx 人左右。他们个个都是具有很热烈民族意识的英雄。我还记得当我们送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的一手握着火枪，一手握着我的手壮烈的说道：“我们回去誓死为蒙古独立而奋斗，我们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呀！”接着跳上了马，大家合奏着雄伟的成吉思汗出征歌飞也似的去了。这使我们多么感动！

段宝山初次尝试了蒙民的铁拳

依据着洋人帮助，段宝山部队驻在堆子梁来和红军作对，不仅如此，他们还经常到蒙古地搅扰，他本不觉得什么，因为过去蒙人被他们压迫惯了，那晓得现在蒙人胆大了，不比以前了。当段团来骚扰时，大家都拿起枪来打，打得这些土匪落花流水的乱跑。胆大的还说，我是官军，不要打，但蒙民回答说，我们不管谁，谁抢我们东西就打谁。有些更说，我不打官军打土匪，难道你们是官军会抢我么？

豪绅地主在倒霉

在红军到达三边后，很多豪绅地主都跑到蒙古草地去了，因为他们每人都都在蒙古草地或多或少占有或租有牧场，这些豪绅地主自以为得计，认草地为世外桃源，哪晓得事出意外，蒙人不比以前，蒙官 xx 司令竟下令驱逐，甚至有些地方提出要分他们牛羊牲口，吓得这些地主豪绅连滚带爬又逃命了。

群众大会中的蒙古代表

不管豪绅地主怎样造谣，但蒙民在实际经验中认识红军是他们的朋友，他们与红军保持了一种最亲谊的友爱关系。凡是我们的每一次开大的群众大会，除了他们不知道外，总会派代表来参加。我记得有一次在定边开军民联欢会，他们来了 20 多人参加，并且派了代表登台演讲。代表是一位 20 多岁青年，能说很流利的汉语，他把蒋介石卖中国卖内蒙的罪恶都一一数出，他更激昂地说，要救蒙就要打倒卖国贼蒋介石，他说许多蒙人自己认为自己没力量，但这里不止，这里有如此之多英勇红军帮助，有如此之多的汉人同情，还有外蒙，更有几十万内蒙百姓的生命和热血，还怕什么？说到这里，他差不多要流眼泪了，台下的蒙人也都站起来异口同声的高呼着誓死要救蒙古，蒙古独立万岁。这把全会场二千多群众与红色战士都感动到发狂起来。

（原载 1936 年 8 月 6 日《红色中华》）

打土豪 分田地

张守杰



张守杰（1909.6—1991.1），定边县红柳沟人，1936年5月参加革命，1936年8月入党。历任定边县二区武装委员、宣传部长，盐池县委、五区、二区区委书记、组织部长，陕甘宁边区银行三边分行秘书，西北野战军随军后勤秘书，分阳县分行秘书，乾县支行经理等职。建国后在宝鸡分行、西安市分行、北关办事处、劳动局，定边县手工业局、工业交通局历任督导员、检查科

长、主任、处长、组织科长、工交部长，1962年7月退休，1983年12月享受县处级待遇，1987年享受地（师）级待遇。

1936年农历4月25日，由韩先楚、崔田民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七十八师解放了定边县城。28日上级就派白永贤到红柳沟成立了苏维埃三乡政府。乡主席高维珍，土地委员魏凤义，肃反委员李国治，粮食委员党海孝，武装委员是我。

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统计户口、定成份、废除国民党的一切苛捐杂税。当时，红柳沟的学儿庄、白家寨子，驻扎一个伪民团，红军派队伍赶走了伪民团。解放了白家寨子，分了土豪白万福的财产，骡马交给部队，家产、农具分给贫苦农民，粮食留给部队和地方干部。随后，我们乡干部跟着红军到二道沟、红井子、大水坑等地，进行扩乡建政工作。接着，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先后把

牛家寨子的牛千、酣官水的刘凤银、红井子的张培承、武家滩的武生富、李复渠的李文华等打了土豪。

当时，由于党的政策宣传的不够深入，群众发动的不够广泛，在召集群众来开会时，个别群众总是忐忑不安，有的不敢来，有的来了又不敢说话。同时，我们一有行动，驻扎在惠安堡的白军就知道了，闹得人心不安。我们到贫雇农中一了解。原来是有些被打的土豪暗中和白军通气。我们就召开了两次积极分子会议，商议对策。最后决定先割掉白军的“通风耳”（电话线）。当晚，我们就带了一部分积极分子，把通惠安堡的电话线割了三十多里。返回村子，又把几个不规矩的土豪拉来整了一顿。这才把白军和土豪的反动气焰压下去了，也安了群众的心。

我们在打土豪，分田地同时，对社会不良风气也进行了整顿。当时，地方上有些死狗流氓，整天耍赌盗窃，打架闹事，吸食大烟，闹得群众不能安生。我们乡干部首先对这些人加强教育，对屡教不改的人，由积极分子拉上，并带上纸帽子游村。对有些不劳动的二流子，交给群众监督劳动改造。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宣传教育，以及干部的言传身教，这些人基本上改造好了，社会风气有了显著好转。真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群众安居乐业，人人都夸边区好。

峥嵘岁月

左有礼



左有礼（1910—2000）定边县姬塬镇人。1936年6月参加革命，曾任定边县五区苏维埃政主席，定边县一科科长，三边地委组织部干事。1949年8月任定边县委书记，1950年任定边中心县委书记兼县长，1953年调西北局畜牧局任畜牧处副处长。1959年任农业部畜牧处处长。“文革”中受迫害回到家乡，1986年重新安置，享受正厅级待遇。

1936年定边解放不久，县上就派出武装工作队，到农村打土豪，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农历六月，县上派王学亭、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左生泰、县委组织部长王聚德等五、六人，到姬塬郭崞岭庄，当天就在郭万里家里召开了有六、七十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上，宣布郭万里、田生芳为土豪，并将郭万里的一百五、六十只山羊，五头牛，三头驴，以及衣服等统统分给群众。按当时政策土豪的工商业财产暂不没收的规定，将郭万里跑运输的四头骡驴没有分。第二天，赵生福带两名赤卫队员将郭万里、郭万库、田生芳三人押送县城，夜宿羊圈山时，郭万里逃跑，其余二人送县处置。

打郭万里土豪的第二天，在姬塬建立了区苏维埃政权。区委书记王学亭，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是我，副主席是赵生福，土地委员左有忠，赵生芝负责动员农民出毛驴，转运物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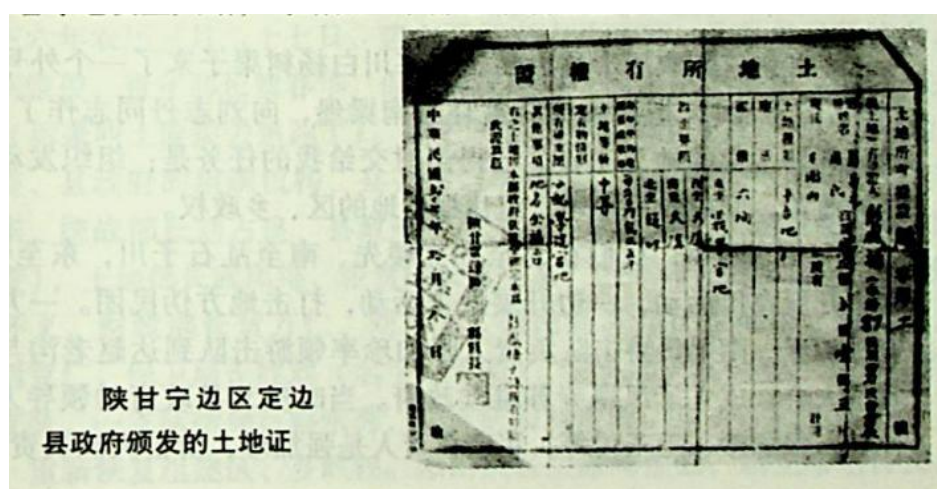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定边县在城区建立了一区，羊圈山建立了二区，白湾子建立了三区，孙克崞岭建立了四区，阳山涧建立了五区，胡尖山建立了六区，

新安边建立了七区，姬塬是八区，罗峪岭建立了九区。1937年初，八、九两区划归定环县领导（县政府设在河连湾）。不到一年，定环县撤销，八、九两区原归定边县领导。

1936年定边刚解放时，党的力量比较薄弱。当时除定边、安边两城镇内有地下党员外，乡村几乎没有党员。由于党的宣传工作没有跟上去，因此群众对我党的主张认识淡薄，思想上顾虑重重。加之定边解放时，被击溃的伪民团一部分逃往安边，一部分持枪潜回农村，伺机进行破坏捣乱。1936年秋，我5名红军战士在乡下买蔬菜时，夜宿在郭园峁，被反革命分子郭昌举、郁德智纠集一部分落后群众，用斧头、铁镢头全部活活打死，把尸首抛到水穿洞里。我县政府发现后，立即组织人员调查破案，不久将杀人犯郭昌举、郁德智逮捕镇压。

1937年秋，姬塬八区潜回伪民团分子马德宝、郭万根，暗地勾结区财政部长李子明、区炊事员赵某和当地流氓徐治经，抢走区政府长枪三支，抢走定环县委组织部长赫文义和通讯员的两支枪。这伙匪徒抢走枪支后，为非作歹，结伙行劫，给群众生命财产带来了很大威胁。一次，马德宝等一伙匪徒在孙克峪岭拦路抢劫脚户时，被我游击二支队曹占荣部击溃，逃窜安边。

为了保护群众生命财产，保证后勤供应的安全，定边县驻军在羊圈山、姬塬、罗峪岭等地设立兵站，每站派一个排红军战士驻守。



往事漫忆

贾生财



贾生财（1895.9—1983.2），吴旗县吴仓堡王崖村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入党。历任安边县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主席，定边县中心区区长，盐池县政府一科科长，定边三区区长、五区区委书记。建国后曾任定边县民政科科长、县委组织部部长、县监委会副主席、主任，县检察院检察长，县粮食局党支部书记，县人委党支部书记等职务，1963年退休。

一九三三年农历十月由吴旗宁塞川白杨树渠子来了一个外号刘三洋的人（详名记不清），把我领到甘肃环县南梁堡，向刘志丹同志作了介绍。从此，我就开始了党的地下工作。记得当时交给我的任务是：组织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开展农民斗争，组建根据地的区、乡政权。

一九三四年，我们在北至孙克崾崄，南至乱石子川，东至伙槽涧一带，一边开展宣传活动，一边开展游击活动，打击地方伪民团。一九三五年农历五月初五，南梁堡游击队负责人强加珍率领游击队到达赵老沟与我们一块召开了大会，成立了凤凰寺苏维埃政府。当时庆北县政府的领导人是马西、马仲林、强加珍、王玉俊等，军事负责人是强加珍，游击大队负责人是樊仰山、樊国山（外号樊麻子）、郑占奎。接着，我们发动了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村农会、分会，举村长，分会长，组织了赤卫队。共分四个大队，一大队长杨万青，二大队长刘四，三大队长傅登明，四大队长白云富。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日。樊云山带领游击队，在赤卫队的配合下，攻打当地的伪民团。消灭了团首申国光、申国彦，活捉团丁二十多人。缴获二十多支枪。这一下引起了当地伪民团的恐惧和反扑。六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伪民团首温士学，先后杀害了我地下工作者杨生福和韩三娃。赤卫队搬来了游击大队，在新安边的案水井一仗，消灭了温团全部。活捉了团首温士学，缴获三十多支枪。农历七月十五日，强加珍带领游击大队，在华山城一带，同高七保、贺凤喜、刘正兴带领的三百多名团丁打了一仗，歼敌二百多名，缴获手枪两支、长枪三十多支，生俘二十多人。赤卫队在游击队的配合下，一连打了几个胜仗，歼灭了当地伪民团的有生力量，大大长了贫雇农的志气。推动了农村苏维埃政权的建设。

一九三五农历十月，毛主席率领红军长征到陕北。十月二十日，毛主席和刘志丹在旋水川会师。会师后，在直罗镇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了胡宗南一个旅，我参加了支前送粮队。同年十一月，毛主席及中央机关移住瓦窑堡（现在的安塞县）。当时由于西靖边游击大队叛变，被宗文耀带到安边驻扎，地方伪民团头子赵坤、周桂堂、蔺士勋。蔡峰、张老七等趁此机会，带团丁一千多人。侵占了吴旗镇、新安边一带，到处杀人放火，糟害百姓，闹得鸡犬不宁，区、乡、村政权大部分被破坏。三六年一月，刘月山率领我骑兵游击队在我带领的赤卫队的配合下，一举消灭了驻扎在吴旗镇和凤凰寺的蔺士勋和蔡峰民团。

一九三六年农历三月二十七日，建立了新安边县政府，县委书记慕纯农，组织部长李维俊，青年部长贺春华。保卫局长姓刘（名字记不清），县政府主席王明英（后来叫土匪捉去逃跑了）。副主席王文随。同年五月。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县委、县政府的组织机构，县委书记李维俊，组织部长何明孝，青年部长贺春华，统战部长刘占良，县政府主席是我，副主席王文随，秘书李世平（后叛变），土地部长武凤维，粮食部长訾克恭，内务部长魏文进，文化教育部长赵怀义，财政部长贺万仁、刘玉堂，国民经济部长张德山、陆少朋，工农主席刘克仁，保卫局长姓刘（名字记不清），军事部长耿全胜。还成立了两个游击支队，一支队指导员蔡永秀，二支队长刘世清，共一百五十多人。

接着，重新恢复组建区、乡政权。阳山涧区主席马生云，副主席赵怀义，区委书记黄肖选，共辖六个乡，十八个行政村。新安边区主席拓炳仁，区委书记崔进恭，共辖五个乡，十六个行政村。孙克崾崴区主席白登第（后是高生贵）。区委书记牛生春，共辖五个乡。十六个行政村。罗涧区主席梁荣，区委书记訾克宽，共辖五个乡，十五个行政村。各乡都组织了贫农协会和建立了党的组织，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并配合游击队同地方民团张子英、贺凤喜、泥耀亭等作战。同年六月，伪民团进攻苏区，县游击队在红军三十军（军长阎红彦）的支援下，在腾渠梁消灭了泥耀亭（外号泥巴子）匪团全部，赶走了武正帮，唐三宣匪团。

一九三六年十月，新安边县和定边合并。三八年定边成立专员公署。阳山涧建立中心区，我担任区长，韩孝忠任区委书记。当时，由于我们组织了农民运输队，向外运盐，换回布匹、棉花、火柴等群众生活日用品，解决了群众的生活困难，使广大群众相信了党的领导，增强了对敌人斗争的信心。

在组织群众积极发展生产，开展生产自救的同时，我们还领导群众同地主、土豪作斗争。大地主刘汉丁一贯残酷剥削人民，对抗政府，村政府为了支援部队，给他推派了三担公粮，刘拒不交纳，我们就组织群众和刘汉丁斗争，迫使刘汉丁如数交出了公粮。

一九四七年春，马匪侵占三边。三边地委，专署和定边县政府搬到新安边川。同年五月，由彭德怀同志率领的西北野战军，赶走了马鸿逵匪军，收复了定边，住了四十多天，西野走后，马鸿逵、张廷芝匪徒第二次又侵占了定边、安边，定边县政府撤到张崾崴。地委、专署退到吴旗县。定边成立了游击大队，大队长是县委书记郝玉山，安边成立了第二游击大队，我们区游击队配合作战。同年七月，孙克崾崴区游击队叛变，打死了区委书记王禄，政委杨振歧，区营长高生祥。以后各区都成立了武工队，我任五区武工队政委，当时定边县共有九个区，叛变了七个半区，只有杨山涧区和新安边半个区没叛变。一次，张廷芝匪徒来阳山涧骚扰，我们区武工队配合，多次打击了马匪和张廷芝的清乡团，保卫了人民。

一九四七年七月份，我们一边坚持武装斗争，一边发动农民起来清算地主王亭选，将牛羊（不记数）和五百亩土地分给农民，这年是个大旱年。十月，马鸿逵的一个团到张河湾抢农民的草，我带领武工队和五百农民同马鸿逵打了一天，不仅马匪没有把草抢走，同时还从敌人那里夺下绳五百多条和一部分手榴弹。至此以后，马匪和张廷芝的清乡团一直再没敢侵占过阳山涧。我区也没有一个人投敌叛变，为革命做也了一定的贡献。

到前线去

——1936年定边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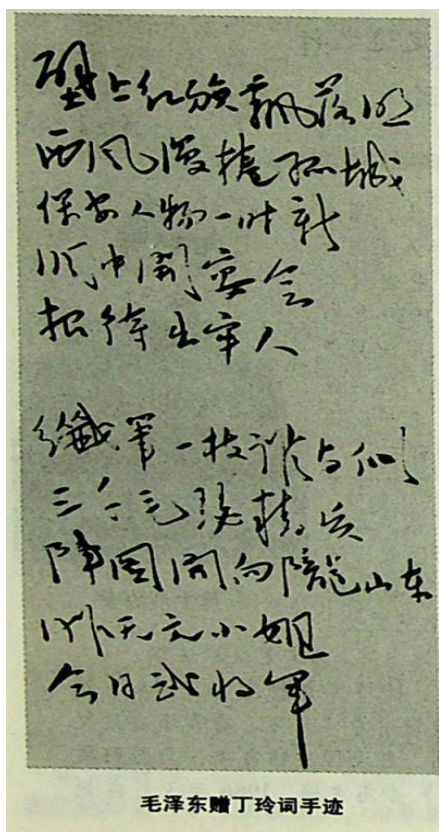
丁玲

丁玲（1904—1986）著名作家。女，原名蒋伟，字冰之，湖南临澧人。1922年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后从事小说创作，发表《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1930年参加左联，主编《北斗》。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左联党团书记。1936年夏，逃离被国民党囚禁三年多的南京，经上海、北平、西安，于11月到陕北保安。中央宣传部在一孔大窑洞里开会欢迎她，毛泽东主席据此写了《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后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红军大学教授、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陕甘文协副主任。后参加土改，并写成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获斯大林文艺奖金。建国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和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1955年被错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主要成员。1957年被错定为“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1978年平反后，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理事、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中国》杂志主编。1986年3月在北京逝世。主要作品编为《丁玲文集》。



丁玲于1936年

丁玲曾数度深入三边战斗生活，写下了许多反映三边的文章，主要结集出版在《到前线去》一书，本文即选自该书。



一月初，我随红军前方总政治部驻在陕北定边县绍沟沿村（今冯地坑乡稍沟塬）。这时正准备同胡宗南打最后一仗，指战员都很忙，没有时间与我交谈，我抢在这个间隙随几个同志去定边县城。别的同志都有工作，我呢，只是怀着着急的愿望想去看看慕名已久的董老（必武）和成仿吾同志，还有我在上海平民女校的同学钱希君。

这绍沟沿是个小村，离沙漠区很近。虽说叫村，实在地面上没有房屋，只有几十孔窑洞，散在辽阔的黄土高原上的一条小沟里。沟里没有水，是一条干沟。人们用水都是在一些深窖里把头年冬天收下的积雪汲出来用。积水中杂有枯树叶子、碎纸头、破布片、驴粪、羊粪……。

除做饭、饮马外，每人每天限用一小盆。水成了最珍贵的东西，好像这时人们才懂得生活是不能没有水的。好在我是带着最丰富的幻想和热情投奔到这不毛之地的。尽管朔风习习，满目荒凉，我在全是陌生人中却处得愉快快，整天沉醉在这广大自由的天地里，感到四处都洋溢着勃勃生机。

这天，太阳刚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的时候，我在一群新集合起来的一伙人中间，策马东行。空气很冷，很新鲜。路很平，塬上极少树棵，偶然看见几棵长不大的杨树。满天红霞，不是灿烂如锦如火，倒似从冰霜中冷冻过的那样浮着一层既淡又薄的雾似的轻纱，笼罩大地，含着一种并不强烈的淡淡温柔，却很能稳定我容易激动的心情。我极目环宇，悠然自得，脑子里浮现出古代的诗歌。那些印证着此情此景的诗句，是多么豪迈和使人舒坦！这里是冬日，又似霜晨；是征程，又是遨游；是战士，又似游子。蹄声得得，风沙扑面，我如在梦中，如在画中，只是从同志们那里传来的欢声笑语，才使我想到我是在那里，正向那里去。



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有关定边的报道

忽然，从我右边跃过一匹枣红马，而且传来一声挑战的颤抖的声音：“丁玲！敢撕开缰绳跟着我们跑几步吗？”这是贾拓夫同志，一个温文尔雅的陕北干部。他曾经告诉我，1934年陕北红军为了取得与中央苏区的联系，派他到上海，辗转到了江西，而后随中央红军长征，绕了一个圈子，胜利完成了任务回到陕北。在这两年的艰难跋涉中，他从一个知识分子学生变成一个老练的革命干部。他是一个平和的人，怎么今天也向我挑战了，欺负我是一个刚刚坐在马上的人吗？不行。我现在也骑着一匹马，也是一匹枣红马，是头一天任弼时同志批给我的，是一匹草地来的马呢。我不答话，真的撕开马缰，站在马蹬上，夹紧马肚子放马驰骋。于是我前边的马，后边的马，都跑开了。我们正走在大沙漠的边沿上，我只看见细沙像水似的在沙漠上流淌，风在耳边轻扫，象腾云驾雾一样。我渐渐松弛了第一次跑马的紧张。过不一会儿，我的手没有劲了，腿也软了下来，可是我不服输，浑身无力地坐在马上，心中晃悠着望着遥遥跑到前边去了的贾拓夫。他忽然把马停了下来，哈哈大笑：“好样的，丁玲！”马都停了下来，我的马也挤了上去。我安定了，赧然地傻笑起来，感谢那个聪明的贾拓夫同志。大家都兴致很好，缓缓地策马而行，不觉地到了定边城。时间才下午三点，太阳已经挂在西边的天际，这里日照真短啊！

晚上我住在钱希君家里，又疲惫又舒畅地酣睡了一夜。第二天早饭后，她陪我去拜访董必武和成仿吾。董必武同志过去早有人向我介绍过，但讲得较简单。这次见面，觉得更加亲切。他嘱咐我：“丁玲！到了这里，你一定不要客气，想什么，需要什么，都说出来。你讲客气，就要吃亏了”。他送给我一件整狐狸皮，火红火红的，好看极了。后来一位女同志被派到大后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正用得着，我把狐皮转送给她了。董老给我的印象是无论在什么时候，他都对人亲切，很会体贴人。当我要去见成仿吾同志时，我的想象却很丰富。创造社最初的老一辈作家留给我的一些印象，我对成仿吾同志是有所想象的：在文学上，他主张浪漫主义，创造社最早就是这样主张的。他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一定很洋气，很潇洒。因为我见过一些这样傲气十足的诗人，他们趾高气扬，高谈阔论，目中无人。他在国外学军械制造，或许是庄重严肃。又听说他在过黄埔军校，那一定又是一种军人气概。是的，他写过火气很重的文章，是不是有点张飞李逵式的气质呢？他是我们湘南人，是不是也有一点本乡本土的南方蛮子的倔强脾气呢？没有见到他之前，我确实对他作过各种揣测。但当我一见到他，第一个感觉，就是我想象的全都错了，错得简直有点失望的样子。他怎么只是那样一个土里土气，老实巴交的普通人呢？我后悔，为什么我单单忽略了他是一个经过长征的革命干部、红军战士，一个正派憨厚的共产党员呢？我们一谈话，我就感到舒服，他是一个使你可以在他面前自由谈话的人。他不会花言巧语，也不是谈笑风生，但他使任何见到他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一个尊重别人，对什么人都平等对待的人。他是一个普通人，却又不是一般普通人能够做到的那么热情、虚心。这便是我在定边第一次见到的成仿吾同志。

链 接

广暴纪念在定边

丁 玲

飞机今天没有来，好像有个失望的东西在每个人心中因旋。

“哼！就昨天来侦察一下算了么？他娘的卵用！”

门口有卖甜酒酿的过去了，小商人又进了城。街两边也堆了些白菜和萝卜。穿老羊皮大衣，和长袍的人多了些。不时有系铃铛的小驴走过去，上边端坐着一个定边女人，罩头的丝巾丢去了，换上黑色的丝绒帽子上钉一排五颜六色的假珠宝东西。

“今天十二了，下午3点钟开纪念会。”这句话在每个部门、单位传着。一些方块大字从一些屋角里拿了出来，上面写着纪念广州暴动，开展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

小旗子也拿在手上，一些粗糙的手。许多动人的口号，许多人们的心里话，都写在上边！

“同志！你那歌还没有唱熟，你再练习练习吧！”

“姿势随便一点，不要老站在台当中不动，同志，你看我……”这是准备在晚会上表演的剧社里的同志在排练着。

在太阳照耀的空场上，七八个、十几个人一团，热烈地讲着九年前的今天，广州暴动的一些光荣的史迹。

有一点风，天气还显得十分冷，虽说水一滴在地上就结冰。

胖胖的商会副会长，腆着大肚子，踱过了县委的办公室，又踱到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部长房里，重复说着他要打电报给蒋介石的事：

“这个不对呀！用向老百姓募捐祝寿的钱买来的飞机不去打日本，却天天来定边城恫吓我们老百姓，害得许多小商都不敢进城来！他们一天不做生意，就没有饭吃呀！这到底是个什么道理！红军要打日本，他反而阻止，我们应该打个电报去问问呀！”

电稿很快就有人替他拟好了，他还啰嗦着，他幻想着蒋介石会有电报回复他。开会时间到了，有的队伍走进了城隍庙。城隍庙里，先来的群众拥挤在大殿上，大殿两廊是泥塑的判官们。哗笑声从人们口中流出。

队伍陆续进来了！党校的学生也排队来了！他们举着旗执，整齐地站在前面、主席台上的人出现了，坐在地下的队伍都唱起来了：“广州暴动苏维埃，中国革命新纪元……”

一群回民也和汉人一起走进大殿。戴着皮帽的蒙古人，带着和善的笑容，一个挨一个的踏进了会场。

开会了，主席团的人都站在台上。

“啊！你看祥升店的老板也在哪里，他做什么呀！他不是红军呀！”

“那个铁匠，你看那傻样子……他不傻呢，他还说话，他说的多快呀！”

“莫做声，听他们讲什么。”雷样的掌声一阵响了过后，又响了一阵。

“纪念广州暴动！……”两廊上，后边台阶上的群众在哄叫声里也跟着举起拳头。

许多人，一个又一个地演讲之后，天色暗了下来。队伍连结成一条长龙，穿过钟楼，从一些布店，皮货店的门前向东门走去，两旁店里又走出一些看热闹的人，看见队伍里的熟人，就大声喊着：

“张大娃子！你也参加了，好哇，到哪达去？”

“加入游行！”

于是这时的龙更加长了！

出了东门，队伍便趑向南走。在晚霜里，长城象一条灰的线，远远的水波似的伸展在沙漠的原野上。

城隍庙里地上，零乱堆着一些转块，几盏吊灯，在主席台上悬挂了起来。人影在灯下晃动。

等到人群回来，演剧就开始了！这些戏都是临时赶编赶排的，由一些没有经验的演员来扮演。但是却得到群众的欢心。每一个节目演完，台底下那些盘腿坐在地下的人群便喊着“再来一个！”站在两边的人也欢笑拍手响应着。

屋檐的麻雀被惊醒了，飞到了枯树上，又从枯树上飞到黑暗里躲去了。

演剧继续着，着红衣的舞蹈也在掌声中出现在台上了。铅色的天空，沉沉的罩着会场，繁密的星辰，眨着眼，人们忘却了冷，在塞北的冬夜。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远远睡觉的号音送来了！人们的兴味还浓烈。在全体合唱的歌声里才从那矮的门口被吐了出来。他们还不断的唱着和重复着一些口号！

在天上，静静地躺着一条淡淡的天河。

（原载 1936 年 12 月 28 日《红色中华》副刊）

毛主席召见马怀藺

金三寿

金三寿（1900—1986），回族，宁夏吴忠人。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陕甘宁边区三边专员公署委员、民族科副科长，回民支队队长，回汉支队副支队长。建国后，历任宁夏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宁夏省交通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吴忠回族自治区副州长、州党常委、政法党组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粮食厅副厅长，银南行署副专员，自治区第三届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候补代表、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1936年夏，定边、盐池解放后，国民党宁夏军阀马鸿逵惶惶不可终日，陈重兵于黄河以东，企图东阻红军西进，西防回族人民东去。但是，人心的向背并不以武力决定。深受马鸿逵剥削压榨的广大回族人民，向往共产党，盼望红军，不少人冒着生命危险，偷越马鸿逵的“封锁区”，来到解放区定边谋生，参加革命。吴忠大寨子的马怀藺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1978年金三寿（左）与原宁夏区妇联主任、民委主任、延安民族学院校友苏冰合影

这年秋天，我随马怀藺住在定边城内张文举小店里，一天，接到设在定边的中央少数民族委员会负责人的通知，说经过和毛主席通电联系，毛主席请我们到保安会面。闻此喜讯，我们当即准备，第二天就动身。我们一到保安高桥，就见路边张贴着“欢迎回民领袖马怀藺！”“欢迎哥老会领袖马怀藺！”等大幅标语。到保安后，由郭洪涛同志接待并安置了马怀藺一行人的食宿。过了两天，毛主席在百忙中抽暇接见了我们。当时，在毛主席住的窑洞外面挂着一幅十分醒目的大横幅：“欢迎马司令！”窑洞里陈设十分简陋，只有一张办公桌，几把旧椅子。马怀藺首先向毛主席汇报了他个人的基本情况和我们一行到定边的经过。

马怀藺原名马相如，后来根据中国历史上“廉颇藺相如列传”的故事改名。少年读书，中学毕业后曾在绥远干过事，结识了刘志丹、高岗等人，对共产党、红军有了初步的认识。回家后，白天从事农业劳动，晚上和我等一些贫苦的回族农民聚集在一起，宣传苏联十月革命、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一九三六年夏末，听说红军到平凉、泾川一带，马怀藺就有心到那里去。后来听说高岗等人在三边，他就动员我、马存彪、金凤歧等人，投奔定边。为了途中的安全，我们转山绕道，日夜兼程，经马家滩进入三边苏区所辖的盐池县境内，不日到达定边。

毛主席听完汇报，十分高兴，问马怀藺：“我们去大西北，需要多少军队？”马回答：“一个军就够了！”毛主席哈哈大笑说：“不行吧！”马说：“到宁夏、青海、甘肃等地，回民多，不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去的军队再多也不行！”毛主席点点头说：“听你的是，将来解放这些地方时，军队不准在清真寺和回民家里食宿，更不能吃猪肉，一定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这些，后来成了解放军的纪律之一）毛主席接着又提出可不可以宁夏组织一支回民游击队，到贺兰山一带活动，为解放宁夏做准备。马怀藺说：现在还不行，贺兰山离苏区远，回旋余地小，四面无援，首先在三边搞回民游击队，然后向西发展。经过三个多小时谈话后，毛主席用一块白布，亲自给马怀藺写了委任状：“西北抗日救国军第一路游击司令马怀藺”，并赠送给马怀藺骑马一匹，驳壳枪一枝，银洋二百元，希望他回三边后着手组织回民游击队。

马怀藺和我们一行一回到定边，就由少数民族委员会和三边特委主持，召集已来定边的部分回民，在张文举小店内成立了回民游击队司令部，司令马怀藺，政委李静波，受到宋时轮、宋任穷所率红二十八军在政治、军事、装备方面的热情支持。不久，就成立起了回民游击队第四、五两个支队，马世武、马化堂任四支队正、副队长，马存彪任五支队队长，我任司令部后勤科科长。

由于这支队伍的成份严重不纯，人员多系马鸿逵部下的逃兵，加之装备又差，所以开到灵武东面的磁窑堡和马鸿逵部队相遇，吃了败仗（当时马怀藺未去），于是五支队叛变，逼缴了四支队的武器，一部分投靠宁夏马鸿逵去了，一部分跑散又回到定边。

回民游击队失败后，中央调马怀藺到瓦窑堡住红军大学，1937年学习期满后分配到甘肃平凉一带，以哥老会的名义为我党做地下工作，因病在长武县去逝。

三去定边 至今难忘

李坚真

李坚真（1907—1992）原名见珍，女，广东丰顺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东江区委妇委书记，闽粤赣特委妇委书记、长汀县委书记、福建省委常委和妇女部部长、中共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部长。1934 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后任中共陕北省委妇女部部长、中央妇女部部长、中央妇委常委、中共中央东南局妇女部部长、华东局妇委书记。建国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妇委书记、粤中区委第一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监委书记、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省纪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曾当选为全国妇联执委。是中共八届、十一届侯补中央委员、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本文是作者 1985 年 6 月 10 日回忆，李志旺、陈定贵记录整理。



1942 年李坚真与丈夫邓振询在上海合影

三边重镇定边，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我去过三次。第一次是 1935 年随中央红军长征路过定边南部山区的几十个村庄。第二次是西征红军解放了定边、盐池等县后去过定边。第三次是 1936 年冬天到定边搞过群众工作。

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红军第一方面军八万多人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于都出发开始长征。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行军一开始我被编在一纵队（名义叫纵队实际上是中央机关），中央领导同志多数编在一纵队。和我一块行军的中央领导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叶剑英、徐特立、邓颖超、罗迈（即李维汉）、李德、谢维俊、廖志高、廖四光、宋任穷、成仿吾、钟赤兵、贺子珍、贾拓夫等。我的主要任务是搞群众工作。1935年1月中央召开遵义会议后，我被调到干部队修养连当指导员。红军过草地时休养连解散，组织上又把我分配到干部团和宋任穷等同志一起工作。董必武是我们干部团的支部书记，钟赤兵是搞军事的，任军事队长。贺子珍搞机要工作，还有一些受伤人员也同我们干部团一块行军。是年10月我们纵队经过甘肃，进入陕西境内，从定边县南部山区的几十个村庄通过，于10月19日胜利到达吴起镇。到吴起镇后，同志们在回忆行军途中的情景时，才听说到有个“鸡叫一声听三省”的老爷山。老爷山有个古庙，有和尚，山高缺水，同志们在这个地方还住过一宿。陕北群众拥护中央红军的热烈情景，至今还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红军每到一处，虽然群众一开始因不了解我们而害怕，特别是年轻漂亮的农村小姑娘更害怕我们，简直是闻风丧胆，销声匿迹。这大概是封建势力统治下的妇女，长期被军阀、地主、土豪劣绅欺压、蹂躏造成的恐惧。但是经我们宣传，群众不但不害怕了，而且还十分热情的招待红军。群众对红军真好，他们把猪肉、羊肉、烙饼拿来给我们吃。有的群众背着羊肉翻山越岭，步行几十里路来慰问红军。这是我第一次经过定边到达陕北吴起的情况。

第二次是1936年6月21日西征红军把盐池县解放后，我随部队留在定边住了几天就走了，当时我来定边的任务是搞党的政策宣传，安排伤病员，我还看过产盐的老池盐坝。

第三次是1936年冬天，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派我和蔡畅、刘文安、廖志高等同志去定边搞群众工作，这次我在定边住的时间比上次长。这时，中央党校来到定边，校长是董必武，教务主任是成仿吾，还有红二十八军也在这里驻防，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我和他们见过好几次面。这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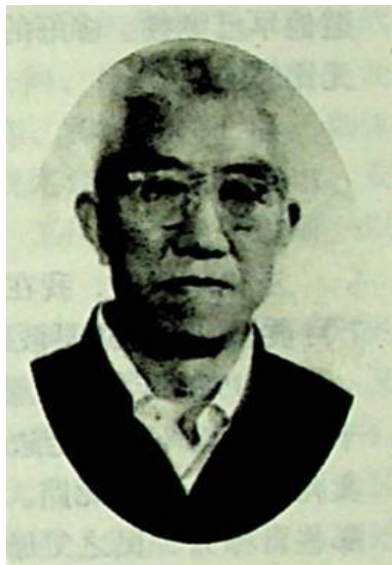
我们的任务是给部队搞粮食吃，搞房子住。下乡动员群众多种粮食作物，发展蔬菜生产。还动员组织妇女给部队做衣服、军鞋、手套、米袋、凉晒咸菜等。我记得当时定边群众很封建，男女之间不能接触，我们工作队的同志下乡到了群众家里，妇女们总是揭开窗帘偷偷看我们，不敢和我对话。我还记得定边周围沙子很多，每次下乡要走沙路。有一次我从马背上摔倒在沙窝里，迷失了方向，幸亏有个放羊的老百姓，把我领出沙窝。总之，定边群众非常厚道、热情，他们把好饭让给我们吃，把热炕让给我们住，所以，即使战争年代生活艰苦，但我们觉得生活十分愉快和有意义，一块工作的同志不分男女之别，在沙窝里比赛摔跤，我虽是个女同志但力气还不小呢！有的男同志摔跤也要输给我。我这次去定边组织上还有个意图，想把我留在三边当特委书记，后因为种种原因，我离开了定边，回到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怀顾当年事 历程多艰辛

——在定边工作的片断回忆

李志恒

李志恒（1903—）山西应县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宁夏盐池、陕北地区搞地下工作。1936 年定边解放后在定边市政府、三边专署工作，任副市长、工商救国会会长、专署秘书长。建国后在鞍山市工作，曾任中央冶金工业部鞍山钢铁公司设计院党委书记、冶金工业部国家检察院主任。本文是作者 1984 年 9 月的回忆，刘殿卿整理。



1903 年，我出生于山西应县的一个雇农家庭。自小当童工。1921 年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以出卖劳力到盐池县学当油画匠。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搞地下革命活动。

—

1928 年夏天，驻防盐池县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开赴西安。随之宁夏马福祥的回军和国民党地方党部相继进驻盐池县。当时，蒋介石已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已转入低潮，白色恐怖笼罩一时，党的组织遭到破坏。我从乡下回到县城找不到我们的同志，犹如鱼儿离水痛苦至极。正在这时，我从敌人报纸上看到“渭华起义”的消息，便决定到渭华去找党组织。不料，走到定边恰好遇见了熟悉我的共产党员王化南同志（王是党派

到驻定边国民党八十六师任和亭团搞兵运工作的）。我把情况说明后，他便把我留下来在定边跟他一道工作。我的公开身份是油画匠，可以在社会上活动。1930年春，王化南把我叫去说，组织调他到别处工作，叫我给他缝两套便衣，我把此事办了，他临走时把我介绍给龙惠民和高志超同志（他们都是在榆林六中念书时入党的党员。当时龙任定边县教育局局长，高任定边县建设局局长），并向我们叮嘱：“任和亭团是个反动的封建地主民团（后被井岳秀改编为警备二团），从团长到连长（不设营）都是地主出身的本地人，非常反动顽固。”还告诉我们，他在任和亭团安排了两个同志：一个叫段经文，一个叫赵锦生（此二人对后来任和亭团哗变起了决定性作用）。

我同王化南从此再未见面。全国解放后，我曾多次打问他的下落，才知道他早已牺牲。多好的同志啊！我为他不能分享今天革命胜利的喜悦而感到无比悲痛。

二

王化南走后，我在龙惠民的领导下，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于1930年7月被国民党定边县政府逮捕入狱，其原因是：

自1928年以来，陕北三年无雨，造成近百年所未有的大旱年。真是赤地千里，颗粒不收，定边也是如此，逼得穷人剥树皮、刨草根、吃“观音土”，卖儿卖女，走投无路。乡下的人成群结队，扶老携幼，纷纷进城逃荒要饭。那些自称为“民之父母”的定边县长李兴田和杂税局长张德山等一伙贪官污吏们，不但不体恤饥民，反而变本加厉敲诈勒索，鱼肉乡民。什么户籍人口税、房产税、买卖营业税、屠宰税、印花税、牲畜税、皮毛捐、婚姻登记费等等苛捐杂税层层加码，连赈济款也都装进他们的腰包。人口市上每次成交后的那种悲惨情景，穷人家孩子端着破碗被地主老爷赶出大门的可怜情景，激起我无比同情和悲愤。于是我把七、八年来给人家搞油画积攒下的二百来元钱，全部拿出来分给那些嗷嗷待哺的饥民，并且

愤不由己地当众大骂狗官李兴田、张德山一伙，因而被逮捕入狱。入狱三个多月，李兴田和审判员何绍南对我进行过数次软硬兼施的威逼利诱，妄图得到什么，然而他们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敌人在搜查我住的那间破房时，除了我那件旧被毡和吃饭用的一个沙锅、两套碗筷，还有几把油漆刷子、画笔及五色碟子外，再一无所获。黔驴技穷，那个张德山又诬赖说：我老婆原是他未过门的外甥媳妇，说我娶了良人的有夫之妇，也被我的“三媒六证”反驳的理屈词穷。加之党和惠民、志超等同志的多方奔走营救，由高志超出面，将我保释出狱。出狱后惠民、志超等同志严厉批评了我，说我盲目蛮干、不自量力。我接受了组织的批评。后来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虽然那件事当时影响大，穷人是需要我那二百元钱的，但更需要我帮助他们拔掉穷根，党有更重要的任务待我完成，而我则以感情用事，险些儿因小失大，给党的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教训是深刻的。

三

我出狱后，党派李临民同志到定边搞地下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我仍然以油画匠为名，在西街街面上租赁地主余鼎九市房一间，挂起了“同德会油画社”的招牌。李临民同志也辞掉了原搞的教育工作，和我住在一起，具体地指导我工作。他常常在家和来往同志洽谈工作，我则经常出外在定边、安边、盐池及柠条梁等地给地主官吏们和机关、学校、工厂、商店等做活，以便了解情况，回来给临民汇报。

为了更好地掩敌耳目，避开敌人的注视，我们还吸收了三个无家可归的穷苦孩子（即丰智明、程凤楼、侯虎子），这样即便这些孩子能安度荒年，又为革命培养人才。可是人多口多，生活难以维持。于是李临民决定买一匹马，给“永具明”和“福成元”等商店揽的磨面粉，当无麦可磨时，就给商店拉货物。这样名为油画铺，实则是党的地下联络点。在敌人眼皮下平安无事地开展工作。

在此期间国民党八十六师的任和亭团和段幼安旅前后两次哗变，我才知道这是我党搞军运工作同志们的成果，但还不知具体是谁搞军运工作。在那时保守机密是铁的纪律。尤其对搞哗变工作的同志，那更是严格，上下都是单线联系，不允许有横的关系存在。党要你知道的事，组织告诉你；不许知道的事，绝对不打问。如：我有时碰到找临民谈话的同志，从不打问，我们党的这种保守机密、严守纪律的作风，许多老同志习以为常，至今不逾。到定边解放后，我才知道李临民和李静波、马定邦，还有一个打进任和亭团给高广裕当护兵姓高的同志（绥米人，名字记不起），他们当时都是搞兵变工作的。而我自己只是为党做了一点掩护同志的工作，协助同志们侦察了解了一点敌情。这几年间，我利用旧的习惯，结拜了崔岳岚、郭维纲、武培德、高俊民、汤若舜等几个干兄弟，培养了丰智明、程凤楼两个徒弟，还以“得志当为天下雨”的形式给他们灌输革命理想，完成党交给我的物色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团员的工作任务。

四

1935年，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在川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继续北上。与此同时鄂豫陕红二十五军亦北上。蒋介石为止惊慌失措，慌忙调兵遣将，纠集井岳秀、高双成、杨虎城、张学良、马鸿逵、汤恩伯、胡宗南、高桂滋等部，妄图一举摧毁我陕甘及陕北革命根据地，把中央红军主力置于死地。高桂滋的八十四师开进陕北，他借机回定边来探亲，为本家及亲属们助威。定边县长张炯堂和大恶霸余鼎九等一伙定、安两地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亦狐假虎威，一时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然而“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不久，就传来了我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的喜讯。敌人闻风丧胆，那些自知罪大恶极的地主老财，一个个携带老婆孩子和财物四处逃亡，连那些大商店的老板也都把财宝货物运走，逃之夭夭，只留下一两个照门人。

当时驻防定边的城防部队是丁志诚（又名丁盘生）营。丁是地主反动势力的鹰犬亲信，头脑简单、愚蠢骄横，部下多系他的亲友和结把子弟兄，是有名的“草包三抢营”。不仅武器陈旧、火力稀松，而且士官一点军事素质也没有。他们整天抓人挖战壕、扒沙子、在城墙上修筑碉堡、清查户口和来往行人，准备顽抗死守，威胁城里人都上城替他们守卫城防。这时程凤楼也被抓去守城，丰智明给商店拉货到宁夏去了，侯虎子已病故，只剩下我和李临民二人。丁志诚派其走狗魏步月盯着我们，于是我俩研究决定先出城避一避。

出城后，李临民到沙场村，我准备往南山，向吴旗镇方向去找党中央。当我走到南山的陈西掌村时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放了定边城，全歼丁志诚营，丁跳墙摔断了腰，后逃到安边去了。这已是1936年的夏天。消息传来，我连夜赶回定边，就在解放定边城的第三天早晨，守卫城门的同志细问了我后，放我进城。一进东门到旧衙门前就碰见了程凤楼，他见了我非常高兴，第一句就说：“我们胜利了！李瑞璋一进城就找咱们，问你去哪？”并说：“红军打进城把监狱里的犯人都放了。”我回到家里，马剑冰又说：“红军一进城，就来了一位军官找你。叫很快派人把你叫回来。”边说边给我一张纸条，是李瑞璋写的。我即去找龙惠民（他在城里没有走，其他教育局、建设局的同志都走了），和他一道找组织部长王聚德，向组织汇报了我俩的工作。王聚德听说我会画画，就叫我和张剑印同志一起画漫画，做政治宣传工作。

在战争年代那种特定的环境下，每开展一项工作困难都很多，画漫画没有颜料，又没处买，我就把自己的油画颜料拿出来用。一面画画，一面还要到城门洞里防空，哪里有个安稳的工作环境？自定边解放后，敌机每天上午盘旋在上空，反复轰炸。党动员群众：上午出城防空，下午回家。机关带上办公用具出城办公。记得有一次在西街“德兴义”铺面前，一个卖柴的被敌机炸成肉浆，死得十分残忍。这种事，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义愤，都纷纷起来痛斥蒋介石卖国贼屠杀无辜老百姓的滔天罪行。我和张剑印在旧衙门的墙壁上画了一幅见方三、四米的漫画，题为“打倒蒋介石”。“打倒”二字用真体字写，“蒋”字画成蒋介石面向法庭站着受

审的样子，“介”字画成被砍掉脑袋还未倒下的尸体；“石”字则画成蒋介石被砍落在地下的头。远看是“打倒蒋介石”五个大字，近一细看是蒋介石被砍掉了的脑袋。群众看后拍手称快。不少人当场高呼“打倒卖国贼蒋介石！为死难者报仇雪恨！”就在此后不久，一次我和定边县委书记刘悠安出城防空办公，被叛徒打伤，离职疗养了一个时期，从此以后复杂的斗争形势更加引起了我们高度的注意和警惕。

记得定边刚解放时，苏维埃政府还没有成立，政权机构叫革命委员会。主席是王玉海，副主席左生泰，内务部长赵兴诚，副部长程凤楼。在那战争年代，工作繁忙，生活艰苦，左生泰和赵兴诚病累交集，调延安党校学习，不久就先后病逝了。程凤楼也在保卫延安的战斗中光荣的牺牲了。此三人终年时都仅有二十一、二岁，年轻有为，是党的宝贵财富。每当我随起和他们一起的那些斗争年月，心里总有说不出的难过。

五

1936年7月底，西征红军围攻安边两个多月未克。彭总下令叫文年主率八十一师全体指战员到定边休整。于此同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央西北办事处、团中央、中央国民经济部、中央财贸机关、中央文教机关、中央党校等许多机关，还有陕甘省委、陕甘省政府、三边特委等地方机关亦相继来到定边。时值盛夏，这些中央、地方机关和红军的大部分战士还穿着破烂不堪的旧棉衣，有的甚至还穿着缴获国民党的军衣和打土豪分地主的衣裳，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急待解决更衣问题。这就需要大量的布匹，同时还需要有大量粮食、文具、纸张、医药器材等日用品供给。可是商店铺紧闭，只留下看门守摊的不敢出来。一方面没有货物（货物早就转走了），另一方面即便有也不敢拿出来卖，主要是怕白军回来了报复。在此情况下，我看到解决供应问题比搞宣传工作更为重要和紧迫。于是便主动找组织部长王聚德，提出把城关小商贩和大商店动员组织起来，好解决这急待解决的问题。组织支持我，随后王聚德就和我一同到旧商会召集

大小商贩开会，把商会改名为：“工商抗日救国会”，大家还推举我当“救国会”主席。于是在县委领导下，我把城内和东、西、南关的商贩发动起来，把他们的存货都搬出来卖给国家支持红军。但我们用苏票买货商人不行，因为苏票到外地不但买不来货，而且被国民党查获还有生命危险（当时在定边推行的苏票是用白老布油印的，并盖着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大印）。这时我请了董老到会给大家作报告，大意是说：江西苏区的群众如何推行使用苏票，如何维护苏维埃政府……。结果费了很大劲，作了很多解释，还是行不通。我又到中央国民经济部找到毛泽民部长，汇报了使用苏票不便的实际情况。毛部长就亲自去“工商抗日救国会”，把全体商会的商贩们召集起来，讲了党的各项政策，如保护工商业政策以及经营政策、贸易政策、土地政策，鼓励他们到白区购买我们急需的布匹和其他日用品。并说：“有多少买多少。要白洋有白洋，要银子有元宝，要金子有金子，甚至珍珠玛瑙也有的是，可以以物易物，既不花苏票，也不用法币”。会后大家一下情绪高涨，所有商贩都积极行动起来。群众了解了党的政策，都踊跃到白区去购买我们急需的货物，使百货源源不断地流入定边。有的资本不足，还支付给他们资金，让其往回购货。其中最积极的是南关开店的阎殿臣，他始终拥护我党，每次会议后，他都带头先走一步。还有石印工人梁明德、回民杨彪、金三寿。



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

我们这种很好经济贸易形势却被安边的敌军张子英和张廷芝弟兄所发觉，他们派匪军四处拦截，抢劫货物和银钱。有的连人抓去，不但罚款，还要判罪，严重地打击我商贩和堵塞我货源交通，极大地影响着我解放区党政军民的生活问题。怎么办呢？就在这关键时刻，毛泽民和高岗把我和“聚义阳”留下看门的陈寿天、“元升西”的周旭初叫去说：“敌人封锁我们，不让货物流通，你们可不可以和安边通一下气？让货物流通。”当时周旭初就提议叫我去，毛部长本来想叫“聚义阳”的陈寿天去（因该店老板还在安边，所以陈去最保险）。但经周这么一说，毛部长接

着就对我说：“志恒，你去一趟吧！”既然组织决定，就坚决服从，我满口答应。并向毛部长提出两点要求：一、要求商会给我拿出几百元钱，以备去安边送礼用；二、把“聚义阳”的轿车借我坐上去安边，我还在石印部印了名信片。一路上我在想办法看怎样才能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至于个人安危已置之度外。车行到安边西门时，东门外就把我们一个村粮秣干部拉出去枪杀了。守城的卫兵问车夫，我拿出印好的名信片给他看后，便放我进城。一进城我先到安边商务会长畅少堂家里，他一见我就吃惊地说：“这时你来干什么？”我不慌不忙的回答：“我来是叫你们发财的”。他一听“发财”二字，就把我领进屋问：“你刚才说发什么财？”我就把定边红军国民经济部有多少金银、大烟土和珍珠玉器，要和商人以物易物，换大批布匹、医药、文具、纸张等告诉给他，并说：“这是千载难得的好机会。安边存这么多货物，不换取这些金银财宝，那才是愚蠢。这不是发财是什么？”他听了说：“还要和张司令说通才行”。当晚畅就跑到剿匪司令部张子英家中把我的来意如实做了汇报，张一口答应帮这笔发财生意。次日上午张把我叫到他公馆，详细地盘问了我的情况。我说：“我亲眼看见用骆驼和骡子驮到定边的金条、元宝、大烟土，用油篓装的珍珠玉器，什么都有。张司令，咱们岂能让这些财物流到别处去？所以我来请司令发这笔财。”他老婆阴险地试探问我说：“李师傅，你也红了（赤化）？”我说：“那里，我还当我的油画匠。红军到定边，大家叫我来应应差罢了。”接着张又问我：“红军进城杀了多少好人？”我说：“人家没打土豪也没有分田地，更没有杀过了个人，军纪严明，公买公卖，秋毫无犯。”张说：“我派一人和你一同去定边一趟。”翌日，正遇张廷芝弟兄给他祖父过周年，我借机送重礼，他们也都以礼接待了我，第三天我要走时，张子英派姓董的副官坐他们的轿车同我一起来到定边，受到我党政军负责同志的接见。从此，定、安两地物资交流便畅通无阻，顺利完成了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得到毛泽民等领导的表扬和鼓励。

出乎意料的是，时隔不久，畅少堂和那个董副官给我写来一封信，并附寄一张《上郡日报》，至今还记得登载几句骂我的话：“赤匪李志恒窜到安边煽动游说。其人善为说词……。”信中要我：“不要多心，是为掩盖上级对他们通共党的疑虑而投的稿”。

在安边时，我还见到由定边逃跑出去的许多同志，我把党的政策一一给他们作了宣传解释，后来他们都一个个回到定边。如郭维刚、崔岳岚、武培德、汤若舜、何建元、丁子齐、汤中甫、赵秉日、高俊民、郭子范、甚玉莲等。

六

1936年12月，传来“西安事变”的消息，整个定边城顿时象山洪暴发似的沸腾起来。广大群众敲锣打鼓，欢呼跳跃，和中央、特委等地方党政军的干部、战士，云集在北街老爷庙前，召开“祝捷大会”。到会的首长有董必武、毛泽民、罗迈、成仿吾、丁玲、王首道、贾拓夫、揭俊勋、毛齐华、白爱玉、罗梓铭、文年生、高岗、王聚德、唐振烈、秦力生、杨一木、赵通儒、张剑印、康建熙、左生泰等，有的首长先后讲了话，我代表“工商抗日救国会”也讲了话。大会还通过了给党中央的电文。最后，会议在“枪毙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响彻云霄的口号中宣告结束。会后，我动员大小商号杀猪宰羊、磨白面，并拿出最好的大米慰问红军和中央及地方各机关的同志。大家欢聚一堂，共进祝捷酒餐，我还画了一幅题为“西安事变”的漫画，散发到各地。其内容是：蒋介石在临潼温泉洗澡，被张、杨二将军活捉，蒋孝先被打死在温泉的澡堂门外。当周恩来同志到温泉浴池时，蒋全身只穿一条裤叉躺在地上，一动不也不敢动地乞求饶命。

两天后，特委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当时在定边的许多同志对党中央的这一决策还很不理解，后来经过传达解释，方知释放蒋介石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

“西安事变”动摇了安边反动顽固阵营里的一些人。有些原来从定边逃到安边的，现在又从安边逃走，没处逃走的也象惊弓之鸟，龟缩在城里惶惶不可终日。而我们解放区却一天天壮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定边的工商业也如春天的花园，万紫千红，欣欣向荣。贸

易局支持小商贩兴旺起来，动员他们粉刷铺面、整理货架、打扫卫生、挖通水沟、垫高马路、美化市容；组织他们到外地办货购回我们所需。食盐、皮毛、甜甘草的销路也随之广开，市面显得非常活跃。

七

从定边解放到 1936 年底，定边市一直是革命委员会，市委书记白享贤。市革委会主席李德元、儿童团长薛生荣、军事部长张德胜。后来以选举正式产生定边市苏维埃政府。我被选为市政府主席兼工商抗日救国会主席和县戒烟所所长。当时南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是牛生科，北乡的姓方，名字记不起了，乡支书是邢贵章。

我到职不久，特委和县委一再指示，要求下面抓紧结束土地革命工作，否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成立，国共合作苏维埃政权就要改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到那时再不能打土豪分田地，群众得不到土地是会骂我们的。特委的同志还亲自到市协助搞分房分地工作，把地主的土地和房产一律分给贫雇农和工人、市民了，但对地主的工商一律给予保护。群众要求划分白 X 的果树园，经我们到果树园给群众讲党的园林政策，才决定不分，而是收归国有。

定环县回忆点滴

陈玉山

陈玉山（1915—1985）陕西延川人。1934 年入党。历任延川中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红军东北工作团组员，红 15 军团 75 师 3 团干事，金积县游击队政委，定环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科长，第一野战军后勤部财经队长、运输部政委、军政部政委。1956 年转业，任甘肃省畜牧厅厅长、交通厅厅长。

本文是作者 1982 年 3 月 17 日回忆。

1936 年，西安“双十二”事变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并逐步在发展，所以到 1937 年春，陕甘宁省委和省政府决定成立定环县。将定边县所辖的三个区，即黑城岔区、姬家塬区、罗儿峪岭区和环县所辖的耿家湾区、甜水堡区和洪德城区的一部分统归一县，定名为“定环县”，县址设在黑城岔，但因当时环境不好，土匪很多，如大土匪头子赵思忠，外号叫赵老五和他的下属小头目缪富录、耿子平以及敬明君等匪徒经常出来活动，破坏捣乱，故我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人员经常不能固定在一个地点居住，根据形势，到处流动，如在五谷掌、姬塬、蔡窑子等地都住过。当时的县、区领导人是：县委书记刘昌汉（陕西省子长县人，1969 年病故），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苏明升（宁夏盐池县惠安堡狼儿沟人，据说于 1947 年病故），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陈玉山，县委组织部部长赵征壁（清涧县赵家河人，现在青海省西宁市造纸厂工作）。县军事部长白希儒（陕西省宜川县安河渠人，现是甘肃省国防工办的顾问），县保



陈玉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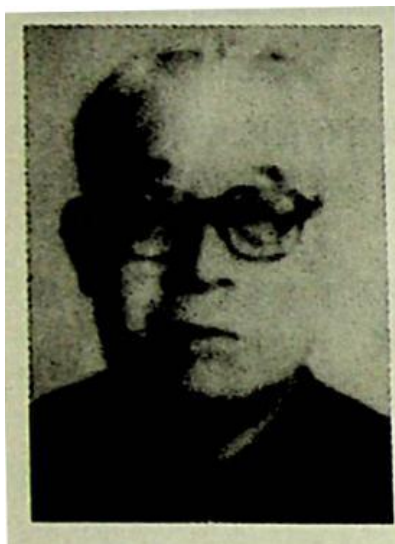
安科长陈永富（山西省人，据说现在公安部某处工作），甜水堡区区长王得才（宁夏预旺县红城水人，1939年病故）。耿家湾区区长阎兆才（环县本地人，现情况不明），黑城岔区区长是谁想不起了，区委书记郝文义（现改名叫郝占山，在甘肃省酒泉县城内住下养老）。姬塬区区长田大润（定边县本地人，以后听说是定边县委宣传部长或是裁判员，现在的情况不明）。左有礼是定边本地人，究竟当过区委书记还是区委秘书，我记不清了，现在他在农业部畜牧兽医总局工作，罗儿崾崴区区长是个本地人，姓名记不起，现在情况也不知道。

1936年革命形势越来越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陕甘省委、省政府领导认为定环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于1938年春撤销了定环县，工作人员一律合并到环县，将原定边县所属的三个区机构、工作人员及所辖区域都移交定边县所管。

1939年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了，再不能叫苏维埃政府了，也不能称主席，咱们实行民主选举，县上叫县长，区上叫区长，乡上叫乡长。

三边党政组织建设情况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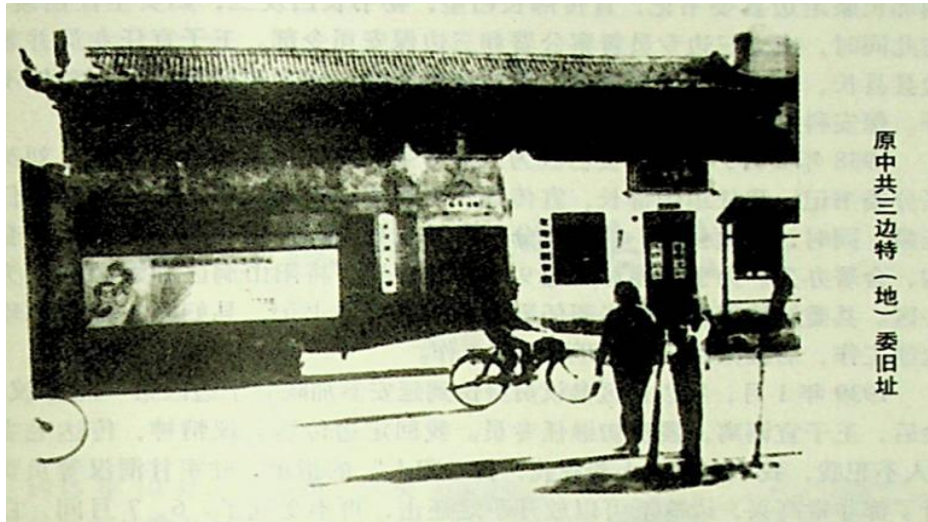
惠庆祺



惠庆祺（1912.10—2003.4），清涧县双庙河惠家塬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历任村地下党支部书记，清涧县苏维埃二区赤卫军支队政委、清涧县城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延水县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县苏维埃政府部长、游击支队政员。绥清延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绥德县委宣传部部长，陕甘宁边区盐池县委书记、定边中心县委书记、三边分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关中分区党委（地委）组织部部长，陇东南特委副书记。建国后历任庆阳地委书记，平凉地委书记。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干部局局长、商业部干部局局长，供销总社监事会副主任、监察组长、顾问。是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36年5月，红军西征前夕，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组织部长罗梓铭、苏维埃政府主席马锡武等，召集我们一些人开会，研究西征中拟攻克各县领导配备及开辟新区工作应注意事项。李富春指着地图任命干部，刘悠安为定边县委书记，慕纯农为安边县委书记，我为预旺县委书记。由各县委书记带队组成地方工作队，随军西征。打下盐池后，又临时决定我改任盐池县委书记。是年7月，中央及陕甘宁省委派大批干部组成中央巡视团来三边各地指导工作。随之在定边成立三边特委，张心余（张德生）任书记，他以书记身份到盐池，帮助我搞了一个工作计划，我很感谢他。秦力生搞白区工作，在盐池住了好长时间。10月，贾拓夫到盐池，他是第二任特委书记。当时正是山城堡战役前夕，形势比较紧张，我们准备放弃盐池，贾作为特委书记亲自坐镇盐池指挥。西安“双十二”事变后，贾拓

夫夫妇调西安工作，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任组织部长。贾走后，三边特委书记由原中央组织部长罗迈（李维汉）代理。未几，罗回延安，原陕甘宁省委组织部长罗梓铭到定边正式任三边特委书记。



1937年5月，我到延安参加全国党代表大会，我是盐池代表，王聚德是定边代表。7月，我调任定边中心县委书记（特委已撤销），到定边正赶上参加县党代会。我在会上作了报告，报告是朱协辉和我商量写的，又得到边区巡视员高峰的帮助。会前组织已确定朱调离三边，大会选我为定边中心县委书记。是时，王子宜是县长，王聚德是组织部长，白步华是宣传部长，李尚培是青年团书记，肖志珍是妇女主任。肃反委员会主任是邹衍桃，他给李富春当过警卫员，很活泼。

定边中心县委分管安边、盐池两个县委和鄂托克旗工委。10月，三边特委再次建立后，撤销定边中心县。特委书记白如冰，组织部长刘英勇，我是副部长兼定边县委书记，宣传部长白坚，秘书长白友三，妇女主任白凌云。与此同时，成立三边专员督察公署和三边保安司令部。王子宜任专员并兼定边县县长，白寿康任保安司令，副司令赵苍璧，实为边区特派员，对外不公开。保安科长邹衍桃。李维钧、邓国忠任特委巡视员。

1938年2月，三边特委已改为三边分委，白如冰调绥远省工作，刘英勇任分委书记，我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王聚德，秘书长白友三，妇女主任李玉娥。同时，定边县委、县政府分别合并于分委、专署。两个名称，一套机构，合署办公。为了加强对定边9个区的领导，将阳山涧区和姬塬

区划为中心区。县委统战部长白步华调任阳山涧中心区委书记，县妇联主任肖志珍调盐池工作，后被派往宁夏，开展秘密工作。

1939年1月，我以边区参议员身份到延安参加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会后，王子宜调离，强晓初继任专员。我回定边传达会议精神，传达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指示，驻军甘渭汉等负责人听了都非常高兴，说这下可以放开手足还击，再不受气了。6、7月间，白栋材接任分委书记，我仍任组织部长，王月明任宣传部长（7月后王春华），保安司令朱子休，参谋长齐渭川。8月，三边分区召开首次党代表会议，选举白栋材为分委书记，强晓初、朱子休、甘渭汉、王月明及我等为委员。大会报告是白栋材亲自写的，篇幅长，内容多，刚来两、三个月就写出报告，我很佩服他。大会报告开始是白栋材做的，讲了一半后，因为他肚子疼，后半部分由我读完。这次会后，我到延安学习，苏子章接任部长，之后再未回来。

二、几件具体事情

1.1937年5月，中央给各地有指示，让尽快把土地证发到农民手中。因为统一战线即将形成，土地革命要停止。所以，三边的土地革命粗一些，没有做细致的发动群众工作。

2.1937年7月，解放后第一次民主选举县、区、乡各级政府领导人。

3.1937年10月特委成立后，在定边召开了分区区书区长会议，总结前段工作，布置今后任务。刘英勇在会上做了扩大武装力量的报告。当时党的中心工作就是扩大武装力量。

4.驻定边国民党四九四旅经常和我们搞摩擦，他们常常是先请客后摩擦，请客是摩擦的先兆。因为不搞摩擦，蒋介石不给他们发饷。

初到陕北的中央党校

李维汉

1935年10月，党中央、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到达瓦窑堡，立即恢复中央党校。援瑞金旧例，仍由中央组织部负责管理。校长、教务主任由董必武、成仿吾分别担任，龙标贵负责总支工作。12月即开始招生，校址设在安定第二完小。根据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办了两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训练班：第一期主要是训练陕北干部，帮助他们熟悉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相应的一整套政策，包括富农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等，以便通过他们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第二期主要是传达和学习党



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分设三个班，由成仿吾、习仲勋、冯雪峰分任班主任，马树良、黄元庆任军事教员，同时还办了一个教员班，学员有白栋材、李景膺、吴文遴、马定邦、吉汉杰、姜旭等。1936年2月，主力红军渡过黄河东征，学校的部分学员和教员由成仿吾带队参加东征，学校暂停招生。此时，榆林地区的地方军阀高双成部队乘机袭击瓦窑堡，党中央撤至保安，中央党校也同时撤离。

1936年6月，中央党校到达保安，分散住在以任家坪为中心，上下二十里的一条大的山沟的4个村子里。此时，主力红军东征回来，从山西带回许多青年学生。大部分进了党校，设立了高级班、普通班。原来的教员班改称高级班，由成仿吾任主任，白栋材任班长，另设8个普通班。高级班的党员大都同时兼任普通班的主任或教员。这种形式一直持续到定边，

迁到延安后才改变，在保安，新增白区（即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班和白军（即国民党军队）工作班，专门训练去白区和白军中做秘密工作和统战工作的干部。此时，董必武仍讲苏维埃建设，周恩来、邓颖超也到白区和白军工作班讲课，我给同校部驻在一处的高级班讲党的建设。党校物质条件较差，住的、吃的、烧的都困难，书籍很少，更缺乏马列著作，但大家情绪饱满，求知欲十分旺盛。

1936年9月，天气冷了，为了解决学校的吃、住、烧等问题，中央党校又迁到定边。不久，四方面军也带来一个党校，与中央党校合并，人员就更多了。好在定边的物质条件比较好些，吃的问题基本解决，大家可以比较安心地学习了。

红二十九军纪事

刘葆璋

本文选自陕西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一书，原题为《陕甘苏区红二十九军纪事》，本书编者有删节。

红二十九军的建立

1935 年 11 月直罗镇战役之后，中央决定由陕甘省委军事部组建红二十九军，陕甘省委军事部长肖劲光兼任军长，陕甘省委书记朱理治兼任政委，谢嵩任副军长，甘渭汉任政治部主任，陕甘省委军事部抽调了一些人员组成军部领导机构，军司令部设侦察科（后改称第二科，科长郭应春）、管理科，还有一个警通排，一架电台；政治部设立了民运科，后勤部只有供卫组。部队由宜川独立营 2 个连、中宜独立营和延安、甘泉独立营各一部



组成，合编时取消营的建制，以连为单位互相交叉，把4个连编为二五五团，团长董英明，政委刘永源；把2个连编为二五七团，团长乔凤鸣，政委尹国赤。另编一个军直属特务连。总人数约五六百人，在羊泉塬、中宜地区活动。1936年2月中旬，军部将红宜独立营2个连和1个游击队又编为二五六团，团长曾来估（即曾征），政委徐国珍；下余1个连编入二五七团。军司令部又设立（作战科）；政治部又设立了宣传科、敌工科，此时，全军约900人。当时部队领导干部的配备，连级以上大多是经过长征考验的同志，战士绝大陕甘苏区的老同志。



二十九军成立以后，担负了南线根据地的巩固和向东发展的任务。相继在宜川、洛川、韩城、合阳、昌水等地区开辟了游击区，并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东北军中进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4月，副军长谢嵩升任军长，政治部主任甘渭汉任命为政委。6月，北线榆林国民党二十二军一部准备偷袭瓦窑堡我党中央驻地，中央命令二十九军迅速北上，保卫瓦窑堡，保卫党中央。瓦窑堡保卫战后，部队到永坪休整，主要补编部队。从兄弟部队调拨来3门“八二”迫击炮，并跟来一个排长和八个炮手。此后，又从二五六团调出1个连，一部分组成1个炮兵排，其余组成1个电话班和无线电队。部队由北路军（吴岱峰为司令员）调来1个连队补入了二五六团，曾来估调走，徐国珍任团长，李长伟

任政委。军司令部成立了一科（通讯科）成立了供给部，部长由姚醒吾担任，后勤工作加强了。另外成立了卫生科，补充了工作人员。军政治部从连队又选拔了 30 多名十四五岁的小鬼：组成宣传队。由宣传科长李桂林领导，他们添置舞衣、帐幕、胡琴、笛子等乐器，排练了乌克兰舞蹈和小型剧目，到基层连队演出，颇受战士们欢迎。政治部各科增加了干事，并派刘随春任军政治部主任。各个连队均配备了 2 挺轻机枪和 100 发子弹，并招收了一部分新兵。至此，军直各机构基本健全，连队兵员比较充实，武器和火力得到加强。随即队伍加强了对新战士的技术训练，如对迫击炮、轻机枪技术操作训练等。各连队除了坚持日常操练外还要进行政治、识字教育和投弹、刺杀以及战斗队列训练。各部队的组织观念和军队素质等都有所提高，基本上达到正规化的要求。

西征到定边

9 月下旬，部队移驻安塞，在这里准备西征，配合主力红军作战，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

9 月底，红二十九军从安塞出发，走上了西征的征途。在途中，传来我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境内会师的捷报，部队上下一片欢腾，士气颇为高涨。队伍路过保安城时，到处都贴满了“拥护党中央”、“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欢迎红军二十九军西征”等标语。部队通过街中间的一个黑门面的大门口时，我们看见周副主席站在石阶上，向通过的队伍挥手致意，谢军长也站在那里。部队过了保安城，在距城 10 多里的几个村庄驻扎。两天后，周副主席的警卫员吴开先来军部警卫排当排长，后又到四连当连长。

不久，二五五团到了吴起县西部的铁边城，后同军部和二五六、二五七团分开行动。一天，团部派我连到铁边城以西 10 里左右的一个山岔路口警戒。次日上午，周副主席随带 10 余名骑兵经过此地。下午，我们撤除了警戒。全团遂又前进到甘肃环县的洪德。

后来，二五五团奉上级指示，又回转到铁边城西部，再向定边方向前进。10月底，部队到了定边县境罗儿峪岭，保护二五六团给四方面军送棉衣的运输线。

11月初，部队到定边县。这时县城内还驻有中央党校和两个办事机构。此期间，安边小股民团经常出扰，到砖井一带抢劫，并抓走了我一些地方工作干部，其中包括军政治部群众科长赵振兴。我团在一个风雪之日，在砖井附近以北地区打垮安边民团数百人，以后又在砖井派驻两个连防守。同时，我团西出盐池县，在近百里周围搜索，扫荡了小股敌人和土匪。经过10天的清匪活动，大大安定了群众的情绪。11月中旬，上级命令红二十九军加



强构筑定边、盐池县两城周围的防御工事，准备足一周的粮草。随后，谢军长在干部会上讲到，胡宗南准备向定、盐一带进攻，我军任务是坚守两城一周，拒敌于坚城之下，以利我主力红军从外围全歼敌人。于是，我军全力以赴修筑防御工事，用了约20天时间，在定、盐两城外围和城墙上修了坚固的堑壕、地堡、火力点、单人掩体等。在这期间，敌人每天上午派两三架飞机在定边、盐池及姬家塬等地进行轰炸，部队和群众都有伤亡。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在驻地周围修了不少防空洞。敌机的轰炸使商店不能正常营业，群众不能正常生活，军民对敌人切齿痛恨。12月初，胡军已进至盐池西南40里的红柳沟一带，敌人轰炸、扫射更加频繁和疯狂，甚至全日进行。军首长向干部们传达，胡军可能于12月11日或12日，以全部兵力向三边进攻，我们要把三边变为埋葬胡军的坟地。各连队很快作了政治动员，补发了手榴弹，检查和加修了防御工事、防空洞，加强了值班和哨所检查，部队处于高度的战备状态。到了11日，未听到敌人的消息。12日上午8时左右，一架敌机掠定边城头低空疾飞而过，没有盘旋扫射和投弹。这架飞机与往日不同，大家都感到奇怪。次日上午10时，军部召集连以上干部传达上级通知，才知道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在陕西临潼活捉了蒋介石。干部们听了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你一言、我一语，都说应把这个坏蛋头子赶快杀掉，消除全国人民的深仇大恨。次日上午，驻定边

部队集合在城外，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同志向部队作了报告。他讲了西安事变的经过和当前的形势，关于西安事变怎样解决，蒋介石如何处理，董必武同志强调，党中央会有正确办法的，总之是要争取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赶出去。这个报告，为解决部队中一些同志的不同认识，统一大家的思想，起了一定作用。

两日后，二十九军奉命开往盐池县大水坑一带，追击南逃胡军。

1937年初，部队开始转为剿匪。红二十九军和归二十九军指挥的高锦纯骑兵团，剿灭流窜在三边一带以范玉山为首的300余人的骑兵土匪。三边一带基本得到了安定。

6日，甘政委从延安开会回来，在连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了中央关于要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日抗战的指示精神，红军要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陕甘宁边区要改为陕甘宁特区。同时，向大家强调：不管怎样改变，我们的军队和特区仍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条决不改变，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决不改变。

不久，红二十九军改编为八路军陕甘宁特区留守兵团特务营。一个月之后，又改称为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二团。从此，红二十九军走上了新的历程。之后，它在保卫党中央，加强军事、政治、文化教育训练和开展边区生产中，做出了新的贡献。

从井冈走来

——戍守定边

周仁杰



周仁杰（1912—2001）原名周球保，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湖南茶陵黄家村人。1930年入团并参加工农红军，1931年转党。历任红八军排长、连长，红六军团营长、团长、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第二团团团长，先后驻防三边、陇东。解放战争时期进军东北，历任旅长、师长、副军长，参加了东北1947年攻势作战及辽沈、平津、渡江等战役。建国后曾任中南军区海军副司令员、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南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是第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本文摘自学苑出版社出版的周仁杰回忆录《从井冈走来》。

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被国民党剿杀了10年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红军，以民族利益为重，将在陕甘的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华中前线，力促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为迎接全民族抗战的到来，1937年8月下旬，党中央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主席提出：在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为巩固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陕甘宁根据地，使其成为全国抗日的大本营，组建边区留守部队，由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指挥。10月，为了加强领导

和便于指挥，中央军委决定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对内改称留守兵团，将留守部队统一编制为警备团，肖劲光同志任留守兵团司令员。

西安事变前不久，我和谭家述等5位同志奉方面军命令，来到保安进入“红大”一科插班学习。1937年1月5日随“红大”迁抵延安，是年“红大”改为“抗大”。8月底，我们从“抗大”毕业。在这段时间里，全民族抗日运动高涨，“抗大”学员个个磨拳擦掌，同学们带着毛主席“勇敢、坚定、沉着，在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的题词，离开延安奔赴各抗日战场。当时我被分配到军委四局任教育科长。虽不能如愿赴抗日前线杀敌深感遗憾，但还是满腔热忱地投入了保卫边区的工作中去。

一、延安受命，保卫边区西北大门

1937年11月初，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任命我为留守兵团警二团团长。组织上要我尽快交接工作，参加留守兵团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12月，我和原二十九军参谋处长（后改任警二团参谋长）张文舟同志一起参加了会议。党中央、中央军委、边区政府十分重视这次会议，毛主席、周副主席、王稼祥、张闻天、林伯渠等领导和留守边区各部队的主官都参加了大会。会上，中央军委颁布命令取消过去各单位杂乱的番号，实行新的编制序列，宣布成立兵团司令部、政治部等直属工作机关；确定“加强战斗准备，部队实行正规化建设，统一战线教育，增强部队纪律，紧密与人民的团结”为留守兵团近阶段的主要工作等等。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留守兵团的正式成立大会，是一个统一干部思想，确定兵团建设方向，制定部队正规化建设措施的决策性大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针对有些同志不安于留守的情况说：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所在地，是领导全国人民抗战的大本营，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这是我们的“家”。有了这个“家”，开出去的部队就有回旋余地；这个“家”平安，前方的部队才能放心杀敌，我们留守边区和在前线抗日救国

是一样重要。他还风趣地拍着肖司令员的肩膀说：我在延安就是靠留守兵团吃饭。毛主席的话，表达了党中央对留守兵团寄予地深切希望。参加会议的同志受到了很大鼓舞，深感肩负保卫边区的担子的份量。为此，肖司令员在会上提出“任务重于生命”作为留守兵团的行动准则，号召留守兵团全体同志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边区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兵团首长会议结束后，迎来了 1938 年新年。元旦一过，我与张文舟同志启程赴定边。出了延安城，策马在延定大道上，我不时回头看看身后越来越远的宝塔山。心中不禁涌起对延安的无限思念之情。在延安学习、生活、工作的一年中，能及时聆听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的教诲，对做好自己的工作获益不浅，但为了保卫边区，保卫好八路军、新四军的“家”，我必须愉快地赴边区西北大门去戍边。一路上，我们晓行夜宿，马不停蹄，安全经过统战区的宁条梁、安边城国民党十一旅防区，于 1 月 7 日顺利到达警二团驻地定边城。甘渭汉政委等领导同志热情地欢迎我们到职。

来到定边的第二天，警二团党的领导小组（那时还没有党委）召开会议。甘政委先向我简要地介绍了团领导小组成员和部队、三边党政军以及友军、敌情等情况。对于这些，我与文舟在延安利用开会的空隙和来定边途中，已详细地交谈过，听了甘政委的介绍，心中更清楚了。接着由我和文舟同志传达兵团第一次首长会议精神。在我们传达会议精神后，党组结合三边情况展开讨论并决定：剿灭土匪，保障边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加强军民军政团结，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在搞好友军关系的同时，保持高度警惕；加强新形势下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部队管理，建立健全正规的工作、生活、训练制度，向正规化迈进。党组成员一致表示，在留守兵团的领导下，守卫好边区的西北大门。最后，党组成员作了新的分工：甘政委仍为党组书记，我任副组长，抓全盘工作；甘政委除部队工作外，参加地委常委，侧重抓统一战线、友军工作；我和文舟分管作战、军事教育、行政管理、供给等工作；刘随春主任协助甘政委分管政治工作。并决定召开营以上干部参加党组扩大会，贯彻党组会决定。

定边戍守生活虽然很艰苦，情况又错乱复杂，但我们在留守兵团的领导与三边人民的全力支持下，不仅完成了戍边任务，而且把由游击队组成

的警二团锻炼成为有战斗力的正规部队。定边的戍边生活，也是我戎马生涯中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

二、坚持统一战线，针锋相对反摩擦

三边是定边、安边、靖边的统称，定边是三边首府。当时，三边分区人口不足 10 万，是陕甘宁边区人口最少的分区，但它的土地面积却有 2 万多平方公里，是陕甘宁边区土地最广的分区；定边是一座塞外城市，它距延安 500 余里，是陕甘宁边区的一个突出部，因它地处 4 省交界，东为陕北，南通甘肃，西界宁夏，北接内蒙，自古以来为边塞要地，是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门户，也是我留守部队的一个重要战略防御方向，日寇、顽军对此城虎视眈眈。

开完党组扩大会，我与张文舟同志准备察看三边的地形地貌，深入了解友军、敌情及三边风土人情和物产等，以充实我防守三边的战斗方案，切实担负起边区西北方向的警戒与战斗任务。经团参谋处图上作业后，作战科郭应春科长率骑兵分队随我们一起察看地形。

我们一行人从定边城出发，经市区出西门，只见城内外商埠、客店、货庄林立，商品繁多，虽是严冬季节，四面八方的客商来来往往；骡马队、骆驼队络绎不绝，市面上是一派兴隆景象。骡马店内一垛垛牲口草料堆得像小山一样，城外骡马大道四通八达。文舟同志对我说：定边虽地处边沿，土地贫瘠，气候寒冷，但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加上三边的咸盐、毛皮、甜甘草这“三宝”远近闻名，定边成了 4 省客货集散地。我军解放定边前，这里是兵匪掠夺百姓发家的好地方，解放后，定边逐步成为 4 省边缘区的政治、贸易、交通的中心。我们骑马绕过南门沙丘的友军营区，向定边城东北方向的安边行进。战马在荒漠和干枯的草地上奔驰，沿途行人稀少，村落稀疏，我回头远看定边城，像一叶小舟漂泊在一望无垠的沙海中。

塞外寒风刺骨，一阵阵北风卷起残雪和黄沙打在头上、脸上，疼痛异常。文舟笑着我说：团长，先见识一下三边的风。这时郭科长接茬说：三

边地接毛乌素大沙漠，冬春季节长，冬季气温在零下 30 度以上，年均气温仅 7 度，冬季天气虽然冷，但风并不大，每当冬末春初“风月”到来之时，狂风铺天盖地而来，从早到晚刮个不停、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人们无法外出，屋内点灯都看不清人脸；虽然门窗紧闭，可黄沙仍从门缝窗隙钻进来，不一会，室内就落满了一层层黄沙。风季沙丘移动频繁，不仅步兵迷路，骑兵也迷向，行人掉进甘草坑内不能自拔，三边的风厉害得很！听着郭科长的介绍，望着茫茫沙海，不禁想起我的家乡湘赣。那里虽然贫穷，但山青水秀，部队坚持斗争，有水、有野菜、野果充饥，这里却是另一番情景。我下决心掌握新环境中的实际，以利边防斗争。

我们一行人时而下马观察、标图，时而慢行议论，当来到定边安边之间的砖井镇附近时，郭科长报告四九四旅部署一个营在此驻防，这个情况我和文舟早就注意到了，也一致认为这是友军为了与安边十一旅取得战役上的某种配合而设置的，因而观察得格外仔细。实地勘察使我对防区内的地形地物、友军情况有了进一步认识。当晚我们赶回了团部。

不几天后，我与文舟等同志去定边城西北的宁夏盐池县，察看我团二营部队的防区。徐国珍营长详细地汇报了二营的情况及周围敌情，看了盐池县和主要防区，感到满意。在返回定边时，我们来到西北著名的盐湖花马池、苟池。同行的同志说：这些盐湖原是蒙古人的，后来兵匪骚扰，几易其主。我军 1936 年攻克盐池后，为尊重蒙古族人民利益，主动将盐湖交还蒙族人管理，蒙族人很是感激，允许我军无价采盐，几年来一直和睦相处。这里生产的湖盐，质量好，产量高，不仅保证了边区军民食用，而且是边区最重要的出口物资之一。看着一堆堆待运的洁白湖盐，望着碧水荡漾的盐湖，我告诫二营的同志，要进一步搞好与蒙族兄弟的关系，保护好盐业生产。

定边、盐池两座城市都座落在古长城内侧。长城，中华民族的象征。少年时，不知听外祖母讲了多少次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参加革命后，在战争的间隙中，脑海中多少回构思过长城的雄姿；受令戍守定边，多年的愿望实现了。我们沿着蜿蜒在荒漠上残破不堪的古长城行进，心中不禁感慨万千。长城这一雄伟的建筑是古代几千万华夏血肉的结晶，它深刻地表

现了华夏文明的气魄和力量，也是愚昧时代的壮举；它在冷兵器时代，不知抵御了多少次外民族的入侵，而今天它已不能成为抵御敌人的屏障了。构筑的砖石长城可以被枪炮所摧毁，而炎黄子孙心中的万里长城是任何异民族摧不垮的。我们要用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保卫陕甘宁！保卫中华民族！

国共统一战线形成后，边区处于相对的和平环境，但国民党顽固派处心积虑地破坏统一战线，制造磨擦，在边区周围集结兵力，名为增强抗战，实为压缩、包围陕甘宁边区。他们利用政治土匪、游杂部队进犯和骚扰我边沿区，抢劫百姓钱财，破坏我地方政府机关和党群组织，刺杀我党、政、军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破坏我边区生产建设和正常的生活秩序，企图削弱、孤立以致消灭我军。定边由于地理位置特殊，不仅民族关系复杂，敌、友、匪情更为复杂。

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国民党令四九四旅2个团北进，企图占领定边城，被我红二十九军（警二团前身）阻于城外，故该旅旅部率一个团驻定边城东关外（其中1个营驻砖井），另一个团分别驻城西关、南关，形成三面包围定边城态势；在安边，驻有国民党邓宝珊管辖的十一旅；在北面内蒙方向，有国民党委任的所谓伊南游击司令章文轩，率骑兵于我边沿区苟池一线；在盐池县正西方驻扎着马鸿逵部队，一直叫嚷要收复盐池县城。1939年初，国民党又令二十六师何文鼎部进驻内蒙，逼进我边沿区乌审旗，鄂托克旗。此外，三边境内有多股土匪滋扰，情况错综复杂。

警二团与三边分区党政机关紧密团结，坚持贯彻抗战方针，做到坚持团结进步，反对分裂倒退，彻底消灭匪伪，保卫边区安全。

当时，与我军直接往来的是国民党四九四旅，双方警戒哨相距不过几十米远。四九四旅在派系严重的国民党军队中，是受排斥的杂牌地方部队，该旅旅长蒋云台为人开明，思想有进步倾向。我们认为：只要坚持抗日第一、以礼待人，坦诚相见，我们是能够赢得他们的同情与支持，争取共同抗日的。因此，我军主动密切与友军的联系，甘政委和我多次去四九四旅旅部拜访蒋旅长。当友军缺粮时，我们主动将有限的粮食匀出一部分支援他们。冬季，我们将从野外打回的沙柳枝、刺草等柴草匀出部分送给友军

取暖，我军行为使友军深为感动。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渠道宣传我军抗日救国宗旨，启发他们的觉悟。随着交往的增多，蒋旅长同我和甘政委的私交也不错。渭汉同志为了从政治上、思想上影响他，曾多次向蒋云台赠送哲学、政治经济学、毛主席著作等政治性书籍。每到中国的传统节日，双方都相互拜会吃请，关系是融洽的。蒋旅长对我军也很友好，他曾经主动送回在该旅红军长征途经甘南时的少数被俘人员，严惩扰乱我地方行政、抢劫商号的士兵，将一名对我军不友好的团长调离部队等。警二团与四九四旅在三边驻防期间关系一直良好，没有发生过摩擦。1939年7月该旅南调陇东时，蒋旅长表示：我到哪里也不会打八路军。蒋云台在解放战争中率部起义，解放后曾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1985年我路过兰州，他主动前来看望，故人见面，回首往事，格外亲切。

在统战工作中，我们做到既友好热情，坦诚相见，又时刻保持警惕，防止意外事件发生。蒋旅调防陇东后，驻安边的刘保堂十一旅派其一团三营来定边接防，我军仍象以往一样开展对友军工作。刘保堂本人是比较开明的，对我军也尊重友好，但其部属有许多顽固派分子，驻定边的三营营长宋子元即是其中一个，这支部队素质也极差。宋率部来定接防后，认为得到了“聚宝盆”，不顾一切地大批收购烟土，强迫商民贩卖；用法币强迫群众与其调换白洋，牟取暴利，以办学为名，私造捐册；强行募捐；多处设卡，敲诈往来客商；他当面对我军表示友好，背后污蔑我们是“伪政权”；他们干涉我地方行政，迫害威胁抗日师生；部属装扮成八路军下乡抢粮，败坏我军声誉等。对宋子元及其所部的恶劣行径，群众十分气愤，对此，我军多次给予有理有节的斗争，迫于形势，宋在表面上不得不有所收敛。

1939年冬初，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侵占我淳化、旬邑、正宁、镇原、宁县等5县和边境6区。宋子元见时机已到，公开在部队中叫嚷：准备打八路军，把八路军赶出定边城。

11月22日夜，宋子元以一个连的兵力偷袭我驻定边城西门外的保安司令部骑兵营，打伤哨兵，抢劫客店，企图消灭我留守的骑兵分队，占我骑兵营营房。枪声一响，我命令部队立即进入预定作战方案的阵地，随即与

甘政委等领导进入作战指挥所，我一面命令部队严密监视城西关、南关的敌人，防止事态扩大；一面派一营长郭玉兰带两个连跑步出南门，朝枪声方向运动。随后，我与甘政委登上城西南的土堡，甘政委派人呼喊：“不打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但宋子元狂妄自大，不听劝告，仍向我留守的骑兵分队攻击，为解骑兵分队之围，我令一营将宋营部队包围起来，迅速反击，不到一小时战斗，打死打伤宋营多人，将其 1 个连全部缴械，俘获人枪各 70 余。

事发后，我们及时将事件真相电告边区政府和留守兵团领导，同时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反摩擦的准备工作。为使定边人民了解这一事件真相，三边专署出了“告民众书”；为引起党内警惕，三边地委在党内出了“告同志书”；为表明我军诚意，次日晨，定边城各城关仍象往常一样大开城门，行人自由出入。

宋子元挑起的摩擦行动失败后，当晚跑到安边求援搬兵，第二天又派部队在城外修筑工事，并四处散布谣言：“安边调来了几个连，榆林要派兵打八路军，兰州要派飞机炸定边城”等等，以此恫吓民众。对此，我和甘政委立即出“告军民书”，以安民心；并由三边专署派人到一、二区借粮，买粮，由三边地委派得力干部去各区、乡安定群众情绪。我军民齐心协力，做好了反摩擦准备，使顽固派不敢轻举妄动。

在做好反摩擦准备的同时，我军从抗日大局出发，争取和平解决事端，提出和平解决的 4 个条件：1.友方公开承认错误并惩办宋子元；2.取消敌对现象，友军一团三营调防，巩固双方友好关系；3.划定驻防地；4.友军不得干扰我政府行政工作。这与后来留守兵团的指示是完全一致的。由于肖司令员与邓宝珊将军交往甚厚，双方都主张立即派代表来定查明情况和平解决。十一旅刘保堂旅长亲来定边，向我军表示歉意，承认此事完全是宋子元的过错，撤了宋子元职务，三营移防安边，接受和平解决的 4 个条件，我方即将俘虏、枪支如数归还友军。由于上下努力，很快了结这一事件。

这次反摩擦斗争，打退了顽固派军事上的进攻，军事上争取了主动地位，显示了八路军的军事素质优良；在政治上，获得了三边人民的拥护、

支持；有条件地放还人枪，表明了我党我军的深明大义，扩大了政治影响，就连友军士兵对惩办宋子元也拍手称快。

三边是陕、甘、宁、内蒙四省边缘区，定边是客货集散地，匪患严重。在三边活动的土匪大多有政治背景，如：在土地革命中遭我斗争打击的恶霸地主武装张廷芝股匪；与日伪勾结的汉奸武装薛子茂股匪；以及范玉山、张廷祥大小多股土匪。这些土匪是顽固派和日寇、伪军骚扰边区的别动队，他们散布谣言、制造摩擦、抢劫民财、奸淫烧杀、破坏治安，无恶不作。加之土匪大多是骑兵，地形熟悉，小股活动，昼伏夜出，四处窜扰，行踪诡秘，匪情成了根据地边沿区的大患，剿匪是当时戍边的一项迫切任务，但剿匪斗争比对付顽固派的斗争更为复杂。

为了抑制匪情和彻底消灭之，根据留守兵团指示，我们做到：

（一）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如：范玉山股匪是定边境内一股较大的土匪，我们对其晓以大义，然后以警二团出面，邀请其大小匪首进城款待后谈判，但其匪性顽固，极其蛮横，我军遂将其捕捉，未进城的匪徒大部逃窜，不久即被我军清剿。

（二）对小股散匪，以骑兵分路奔袭、迂回包围，一股一股地歼灭；对于因生计所迫，铤而走险的散匪，只要他们改邪归正，就给以出路；至于匪首和惯匪，交地方政府公审。处以极刑，起震慑作用，以鼓舞群众同土匪作斗争。1938年6月，三边专署在定边处决了惯匪宋闰兰、艾中福。

（三）在匪徒活动频繁的区域，集结兵力，武装清剿。1937年底，我们以骑兵大队（后改为骑兵团）、保安司令部骑兵营、警二团精干轻装连队等兵力，对定边的官滩、盐池的八蜡梁和安边的仓房梁一带的张廷芝、薛子茂等股匪进行连续清剿。我们先以骑兵侦察，跟踪，待判明匪路后，以步兵围点埋伏，骑兵拦路堵截、合击，猛打穷追，将这几股土匪大部歼灭。

（四）对没有明显政治背景的土匪，利用其民族情绪，宣传抗日，晓以大义，使其不做亲者疼，仇者快的事，一致对外，团结抗日；同时，政府用出布告，发宣言宣传我党我军主张，以宣传、教育群众。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至 1939 年初，三边基本上平息了匪患，同时还抑制了宁夏的张廷祥、蒙古的章文轩等退回国统区，使三边人民在安定的环境中生活、生产，促进了边区的发展。但斗争并没有结束。

三、整军备战，向正规化迈进

警二团前身红二十九军是 1936 年 3 月中旬在富县套通塬正式成立的。由宜川独立营、中宜独立营和延安、甘泉独立营各一部以及陕东抗日支队、义勇军等地方武装编成，辖五、六、七 3 个团，陕甘省委军事部长肖劲光兼军长，政委朱理治（未到职），副军长谢嵩，副政委甘渭汉，不久谢、甘两同志升为军长、政委。是年 11 月，为配合红军主力西征，红二十九军从富县、韩城开赴定边、盐池一线接替红二十八军的防务，军部率五、七团和直属队驻防定边城。六团驻防盐池城。国共合作后。1937 年 8 月红二十九军改编为一二九师特务营；是年 10 月，改为留守兵团警二团，原五、六、七团分别改为一、二、三营。

当时，三边地委在定边城内西南角，三边专署在城内东北角，保安司令部在城内西北角。那时，定边刚解放不久，敌情、匪患都很严重，友军呈三面包围态势，为保卫革命政权、三边地委和专署的安全，巩固边区西北的战略要地定边、盐池，防止突然事故，我们决定原驻防部署不变，二营仍驻防盐池城，一营驻定边城内东北角，三营驻城内西南角，团部及直属队、机炮连驻城内东南角的定边小学附近，保安司令部骑兵营驻城西关外。不久，警二团为训练班、排、连干部，开办了团教导队。办教导队不仅提高了基层干部素质，而且担任了大量军事勤务工作。并且是团掌握的机动部队之一。

警二团的基础是陕甘边红军地方部队，经过战斗生活的锻炼，连排以上干部不少是经过长征来陕的老红军，大部分战士都有 3 年以上红军军龄。来三边后，还收容了许多长征中掉队的伤病员、被俘跑回来的红军指战员，连队党团员比例大，指战员们有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

风。但由于刚从地方部队整编不久，作风制度不统一，组织不健全，纪律松弛，军容不整，游击习气较浓，加之没经受过大的战斗，更没有机会进行严格的正规训练。改编后，戴起了青天白日帽徽，指战员的思想不通。尤其驻守定边后，处于相对和平环境，定边的行商很是富庶，市民和农村却非常贫困，部队生活十分艰苦，社会上不健康的东西侵入部队，一些同志滋长了害怕艰苦，贪图安逸的思想，战士开小差现象时有发生。主力红军东进抗日后，又有些同志不安于留守，向往抗日前线。面临这样复杂的情况，怎样把警二团建设成一支具有坚强战斗力的正规部队，完成好戍边任务，是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我和甘政委等领导反复研究，团领导小组决定在部队中传达贯彻兵团第一次会议精神，从部队实际出发，紧紧抓住政治思想教育这一环节，明确留守部队的历史使命，制定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整顿部队；强化军事教育，提高部队战斗力。

（一）做好新形势下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使指战员们安于留守边区，为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而热爱三边。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部队由残酷的战争状态转入相对和平环境，由运动、游击状态转到长期驻守，由革命的武装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武装转到与国民党统一抗日等等，确实是新形势下的新问题。记得在兵团第一次首长会议上，毛主席曾告诫与会领导同志：现在要重点抓一抓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党的建设，领导要深入到连队支部去，解决好部队的思想问题。因此，我们在传达兵团首长会议精神中，紧紧围绕毛主席赋予留守兵团“保卫河防！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的战斗任务，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使同志们认识到：经过 10 年内战，我们保存的陕甘宁根据地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局面是多么的不易，它对于领导、坚持抗战是何等重要，我们留守边区的任务是很艰巨和非常重要的。

边区人口少，兵员非常缺乏。我们曾经连续几次组织班以上干部去敌后解放区接兵，不仅没接到新战士，而连接兵的干部队伍也被前方留下；同供给处主任去敌后解放区做生意的一个班战士，也被留在前方，这些同志在前线立功提升，进步很快，而留守兵团的干部战士，特别是营以上干部，基本上是 8 年一贯制，连找一个伴侣也不那么容易。在干部使用问题

上，我们确有教训，干部长期不流动，有厌烦情绪；驻一地久了，受环境影响出点毛病；因党内斗争影响，受到不公正待遇等等，思想工作难度较大。我们一方面教育大家服从革命大局需要安于留守，同时还采取调整工作、调出学习、办教导队、边区内地干部战士有计划地探亲等方法来稳定部队，号召大家充分利用根据地和平环境，加紧学习军事、政治、文化，掌握更多本领，以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

改编后摘下红五星，换上青天白日帽徽，许多干部战士都想不通，有个别战士甚至开了小差。我们反复说服教育大家，八路军是从红军演变发展来的，仍然是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我军衣帽变了，性质没有变，根本任务、宗旨没有变，我们仍然是人民军队。有的同志还联系改编以来人民群众的态度说：改编后，不仅我们想不通，边区群众中议论也很多，但实践表明，我军为人民利益而战的宗旨没有变，群众仍象往常一样拥护、支持我们。老乡们说得好：“我们不看你穿什么衣，戴什么帽，我们只知道你们是毛主席领导的红军，是我们穷人的队伍。”那时，我们对指战员几乎天天讲统一战线，讲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等，启发提高认识。经过艰苦耐心的工作，终于扭转了这一思想弯子。

在解决这一思想问题时，还涉及了如何对待逃兵的问题。旧军队枪毙逃兵习以为常，我们在战场上也枪毙过逃兵。如何对待和平环境中开小差的战士？起初，团的主官认识上有分歧。那时，我们都年轻，我性格急，不同意象以往一样对逃兵处以极刑，造成僵持。但经过坦诚交换意见，充分研究，基本上统一了认识，认为应严格区别战时逃兵与平时的开小差，对平时思乡开小差的战士只要没有政治背景，不携带武器，就应以思想教育为主，启发其觉悟，对这些人处以极刑是错误的，从而避免了往常以极刑制裁开小差的战士的做法。

针对少数同志滋长的害怕艰苦、贪图安逸情绪，我们引导大家回忆参加革命以来历次艰苦的斗争，从中吸取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老同志感慨地说：现在再苦，也苦不过雪山、草地，那么多的同志英勇地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我们现在苦一点算得了什么？大家认识到人民军队时刻要同人民同甘共苦，人民在受苦，我们怎能去贪图个人一时享乐！为配合思想工

作的开展，充分发挥连队党团员骨干作用，树立标兵模范，各连队俱乐部搞得很活跃，同志们因地制宜制乐器、自编自演，活跃业余生活；同时发动群众，人人动手打柴种菜，打井取水、磨豆腐养猪、做土风镜、修补房屋、加厚草垫等，努力改善生活，使部队吃得饱、穿得暖、睡得好、安于三边留守生活。

此外，我们根据兵团第一次首长会议精神，建立了政治教育制度：在营以上干部中组织政治学习小组，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联共（布）党史，学习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时事政策讲话，做到领导干部学习先行，使其对下级实施教育时有一定水平。在连队，每周4次政治课，以兵团政治部编的《政治课本》为教材，也结合形势任务学习毛主席著作、讲话。那时交通不便，从兵团发的时事教材，到定边最快也要10天半月。延安广播新闻，二团没有收音机，为了不耽误学习，我们用电台通讯的空隙抄录新闻，提供给部队学习时使用。兵团为团营设政治理论教员，连设专职文化教员，这些同志大多是抗战后从各地来延安的知识青年，有知识，热情高，为部队文化学习添了活力，受到了部队的欢迎。

在留守边区的8年中，我们正是依靠这些经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才不断清除了部队中各种不健康的思想，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克服重重困难，完成戍守任务，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制定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实行正规化的管理教育，提高部队战斗力。

在留守兵团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上，虽然颁布了各部队的统一编制，但还没来得及建立统一的规章制度。警二团虽已编为正规兵团，并没有摆脱游击战争环境的影响，营以上干部来自各个方面军，因处于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国工农红军没有统一的文本，因而作风制度上不统一；连以下干部没有受过系统的正规训练；指战员们过惯游击生活，军容不整，比较散漫等。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支部队没有严格的纪律，没有正规的生活、工作制度，是打不了大仗、硬仗的。根据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抓正规化的精神，我们连续召开座谈会，征求各级领导意见，将各方面军有自己特色的管理制度加以汇集整理，从本团和驻地实际出发，在不

长的时间内，逐步建立了出操、会操、擦拭武器、值班、值勤、射击等军事、训练制度，建立了班务会、连点名、点验、请销假、报告等生活管理制度，建立了文化课、课外游戏等文化学习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在现在看来都很简单，但在当时我们却费了很大气力，它虽然很不完善，却是具体可行的，为部队逐步向正规化迈进奠定了基础，对保证戍边各项任务的完成起了重要作用。

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一支部队良好的精神风貌是有战斗力的外在表现，严格的纪律是战胜敌人的保证。驻防定边后，部队物质生活，特别是文化生活很贫乏，因缺房，连队列宁室（俱乐部）搞不起来。部队驻城内，除军事操练外，无事可做，比较散漫。因此，我们首先从一日生活制度上抓起。部队从早起出操、军事操练、游戏、班务会、晚点名到就寝，各项活动按计划实施，动作整齐划一，活动紧张有序，还根据天时长短，组织球赛、翻越五道军事障碍等战士喜爱的体育活动，有时还点上汽灯，团演出队自编自演，搞得很热闹。除此外，每周班务会、连务会总结检查，各营半月向团汇报一次，一月书面报告一次，团每月向兵团作书面报告。在严格管理的同时，我们深知制度建立后，干部的表率作用尤为重要，因而强调从干部做起，凡要求战士遵守和做到的，干部首先要遵守和做好。那时，我们都是 20 多岁的青年，朝气蓬勃，雷厉风行，以身作则，与战士同生活共操练，上下关系融洽亲密。由于领导带头，要求严格，耐心引导，使部队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建立了较好的军营生活制度，无论在军营内还是在社会上，部队讲究礼节礼貌，战士外出不仅自觉请销假，在外还能做到双人成伍，3 人成行，行走不吃东西，指战员们都能自觉地把遵守纪律、执行规章制度做为革命军人的职责，并引以为荣。那时，定边群众拿我军与友军比较说：“还是八路军像革命军人。”

在要求干部严格管理的同时，我们还教育干部要从部队实际出发，体贴战士、关心战士。在管理教育中要发扬红军的爱兵传统，要有阶级情、同志爱，自觉清除军阀残余。为此，明文规定取消连队禁闭室，经常召开干部会，要求干部学会科学的管教方法，坚持查铺查哨，要以情带兵，以

情感人，在日常管教中逐步掌握这门艺术，使同志们认识到科学的管理教育不仅在当时，即便是将来的军队，也是值得带兵者不断研究和探讨的，它是一种大量的经常性的富有生命力的工作，是建设正规化军队不可缺少的一门科学。

定边、盐池地接荒漠，风大沙深，尤其冬春风季，黄尘淹没城市，自然环境恶劣，加之住房简陋，要做到内务整齐划一、室内外清洁，是件很困难的事，而且三边缺雨少雪，细菌繁殖特别快。来定初期，干部战士水土不服，因而发病率较高，由于缺医少药，医疗水平有限，重病号必须用担架送延安，往来千余里，不仅削弱了部队战斗力，也增加了人民负担。因此做好这一工作，不仅是建立整齐清洁军营生活的需要，而且是关系到降低部队发病率、保证战斗力的大事。所以，我们下大力去抓这一工作。在夏秋时节及时修补好住房，早晚扫除，挖井担水泼地压尘，经常清理厕所，泼撒石灰水或自制的药水杀菌，改造环境。除此外还建立枪枝每日擦拭，每周检查的武器擦拭制度，建立连队竞赛、各营每周检查制度等。使部队基本上做到了内务整洁统一，环境卫生，各种武器保养良好，部队病号减少，减员保持在最低限度，保证了戍边任务的完成。

（三）实行正规化军事教育，提高部队素质。

三边敌情匪情严重复杂，我们要时刻做好战斗准备，担负起保卫边区的战斗任务，但又不象前方部队的战斗那样频繁，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主要靠教育训练来提高。边区处于相对的和平环境，也具备一定的教育训练条件，因而我们将做好战斗准备和教育训练紧密结合，总体思想是：教育训练为战斗准备，保证战斗胜利；战斗促进教育训练水平的提高，检验教育训练成效。就我个人来讲，参加红军后就进军校接受正规严格的训练，毕业后一直带兵打仗，都是用战斗间隙来练兵，直到长征来陕北，也未曾有机会抓过系统的、大规模的军事全训，现在无论对部队、对我个人确实机会难得。当时，我们从警二团是由地方游击队转为正规兵团不久的实际出发，努力按照正规化要求进行教育训练，注重基础训练，打好底子，坚持教育的系统性；从地区特点出发，抓好特种训练，坚持教育的针对性。

为加强教育训练的领导，成立了以团长为主任，副团长、参谋长、政治处主任及各营营长参加的团教育委员会，集体领导团教育训练工作。各营成立以营长为组长、营领导和各连连长参加的教育小组。团教育委员会定期召开例会，检查教育训练进度，总结经验教训，部署下一步训练等；还按教育科目、阶段不定期举行会议，研究解决教育中的实际问题。各连在新科目开展前，都召开连教育准备会，每个班都推选一名军令长、有战斗经验或有文化的优秀战士担任学习组长。团的教育情况，每月向留司作一次书面报告。由于领导重视，组织健全落实，从开始就形成了一个教育训练网。

警二团当时的武器装备主要是近距离射程的杂色步枪，少量轻机枪，团直有一个重机枪和迫击炮的混合连，武器破旧落后。但我们的战士大多经历了3年以上的战争考验，因此在训练中，注重突出我军传统战法，在熟练掌握现有武器基础上，提高部队的技术、战术水平。我们从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4大技术入手，对部队进行系统的训练。当时，教材、器具都很缺乏，我们自编教材，发动群众自己动手将破旧木条拼装成射击靶，用沙柳枝扎成假设敌，作战科、列宁室做出各式各样的军事沙盘，作训图表；我们要求每个班都要创造出特等射手，投弹、刺杀能手。训练中，以射击、投弹、刺杀为主。那时，条件虽然很差，但战士们生龙活虎，朝气蓬勃。三营南面的空地对着城墙，日久黄沙与城门堆平，是个天然射击场，指战员们用石灰水在城墙上描成靶练射击，一些战士还在晚上瞄香火头。各连在营区内外按50米距离插一木牌，随时练目测，各营还运用比赛，观摩等方法相互学习提高。经过一年多的训练，步枪100米至250米的命中率由原来的30%提高到85%~90%，重机枪命中率提高到71%~80%。土工作业我们结合修整定边城墙进行，因地处荒漠，土工作业快，工事不坚固，因而是次要训练科目。由于我们重视基础科目训练，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在1942年秋，留守兵团与三五九旅在延安机场举行一次技术比武。三五九旅率队参赛的是副参谋长陈外欧，留守兵团原是兵团参谋长曹里怀率队参赛，因他有事，兵团指定我率队。三五九旅的前身是战功赫赫的红六军团，是我成长的“家”，陈外欧与我不仅是老战友，而且是同乡。然而在比赛场上，我们谁也不甘落后，斗智斗勇，竞争激烈，结果三

五九旅射击、刺杀夺魁，留守兵团投弹、土工作业、爬山等项第一。三五九旅是保卫边区的劲旅，战斗力是强于留守兵团的，我们能取得这样成绩，是对军事教育训练的一次检验，也是我们向抗战主力部队学习的好机会。

基础科目训练告一段落，即转入战斗动作与战术的训练，我们从制式教练、班排连攻防到营团实兵演习，循序渐进，重点是连以下的战术指挥与战术动作。要求战士能灵活运用各种战术动作，各级干部要提高本级作战指挥和教育管理能力。教育中做到：抓重点，不贪多，少而精，无论是课堂、操场还是打野外，都抓住科目重点进行训练；干部精讲，示范教学，战士演练。各级军事主官做到精讲多做，多打形象比喻，切忌枯燥，班排长或学习组长示范动作准确迅速，战士操练严格认真。课目大多在野外进行，先是白天练，后转为夜晚练，使战士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熟练地灵活运用战术动作。在这基础上，实施班排连战术演练，步步衔接，深入提高。这样做，干部很辛苦，每次必须先到野外看地形，作好想定。同时，我们做到课内教育与课外教育相结合。练兵热潮中，干部战士热情是很感人的，在野外生产、打柴休息时，带队干部随手指一目标，让大家目测距离，识别地形；或根据地形出一情况，边答边做；活动后，干部都要作出恰当的结论，并提出改进办法，这样生动具体，提高也很快。列宁室在文体活动中，也将训练内容穿插进去，使战士们在娱乐之中学习军事知识等等。

三边地居荒漠，在沙漠地区作战与打敌骑兵是个新课题，故强化特种作战训练。在三边戍守，这是必须研究和掌握的基本战术。因此，在部队进行基础科目训练的同时，我与各营、连长率先在风沙中摸爬滚打，练骑术、熟悉沙漠习性，并请骑兵团、保司骑兵团有经验的同志当教员，了解掌握骑兵的战术特点与活动规律，在研究步兵沙漠对抗特点的基础上，演练步、骑攻防战术，先以团骑兵团通讯分队代敌，后来请骑兵团与保司骑兵团参加演练，规模较大一次曾动用两个骑兵连代敌。步骑对抗从白天到夜间，由好天气到大风沙，规模从小渐大。初期虽因天气、通讯等限制，演练不成或造成误会，但我们坚信，做任何事只要认真、有恒心，不怕苦，没有不成功的。经过多次演练，逐步掌握其规律性。首先要掌握自然规律，沙漠区域气候变幻莫测，那时没有气象预报，我们连简单的预测设备也没

有，训练仅靠出门观天色，有一定盲目性，有时训练只好中途“收兵回营”。我们经常去有经验的老乡处请教，注意积累资料，从中找出变化规律。其次，训练选择好时节、地域，保证训练计划的落实。

沙漠地域广阔，适宜骑兵活动，但其目标显著，不易隐蔽。因此步骑对抗，步兵不能撒得太宽，兵力要相对集中；特别是夜战，联络手段落后，兵力分散易暴露目标也易被敌各个击破；兵力按火力射程成梯形配置，这样，火力既集中又分层，杀伤力大；针对骑兵运动快的特长，我们以静待动，以逸待劳，准确判断敌骑路后，选择有利地形设伏，乘敌行进不备或立足未稳，以突然动作，猛烈火力袭击敌人，使敌人优势变为劣势。

为使我军演习不致使友军生疑，我们都在离城较远的地域实施。后来，改为夜间秘密行动，练夜战。虽因自然条件和科学手段等方面限制，训练效果曾受到一定影响，但我们以勤补拙，沙漠战斗、夜战、对敌骑兵攻防战术水平都有较大提高。

沙漠地带构筑工事，即便是野战性质的也不坚固，有时刚挖好工事，一阵大风过后，工事不见了，连地形都变了样。因此，要保卫边区西北的战略防御支点定边城的安全，城防固守训练也很重要，但因环境影响，受到较大限制。定边城墙历尽风沙侵蚀，早已破烂不堪，我军驻防后，没有财力修筑大的工程，只能小修小补，如果有战事要固守此城，困难很多。当时，我作为该地区最高军事指挥员，心中很不踏实。为此，我们做到：一是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注意观察各方动向；二是加强巡逻警戒，干部增加查岗查哨次数；三是部队演练分期分批进行，使城内保持一定兵力，演练部队，坚持日出夜归。后来，我们还设计了一个巷战方案，参谋处多次在图上作业，因受形势局限，没有进行大的实兵演习。

在定边驻防期间，环境虽比较安定，但生活是艰苦的，指战员们体质较弱，在这样情况下进行大规模军事训练，指战员们非常辛苦。因此，我们要求各级领导既要与战士同甘苦，又要用科学方法来带兵，关心体贴他们。野外演练负荷重，注意速度与休息，自做土风镜保护眼睛，在沙漠中学会饮水用水等。同时，为了不使训练呆板、枯燥，大力开展军体活动，以活跃生活，强壮体魄，提高学军事的积极性。

那时开展军体活动，既无器具又没教材，活动经费更是少得可怜，即便有钱，在定边也买不到好木料做器具。但是，我们认为，只要对提高战斗力有利，困难再多，也要克服。团里将有文化的同志组织起来，以红军内战时期经验、前线抗战部队的经验为主，还收集国民党、日本、德国的教本作参考，从各方吸取精华，编成适宜我们实际情况的教材；发动群众，因陋就简，自制器具，自建场地。每日清晨，我们和战士一起出操，有专职教员带领干部战士们跳高、跳远、超越木马、矮墙等五道障碍，指战员一起打篮球等，部队生机勃勃。体育活动不仅改变了文化生活单调的状况，而且强壮了体魄，增强了集体荣誉感，严格了组织纪律性。就这样，军体活动从无到有，由部分带动全体，丰富了教育内容。

在军事教育中，我们除注重培养指战员机动灵活、坚韧不拔、勇猛果敢的战斗作风外，还始终抓住干部这个重要环节。部队教育训练的课程，干部都是先走一步，以提高教育水平，还要进行高层次的科目训练，以提高战术技术素质和理论水平。在连排干部中，建立军事研究组，学习步兵战术、抗日游击战术；营团干部学习论持久战、游击战略战术，研究抗日经验。团里开办教导队，轮训班、排、连干部，学习时间视情而定，每项三个月至半年。教导队长由团参谋长、营长、科长轮流兼任，除设专门教员外，团领导和机关的科、股长也兼任教学工作。

在三边，警二团的军事教育持久扎实，系统正规，高潮一个接一个，不仅“四大技术”取得显著成绩，掌握了一套在塞外沙漠中对敌作战本领，而且为部队日后发展培养了骨干，打下了正规化建设的基础。当时，就连友军四九四旅的官兵也讲：“八路军真是好样的，这么苦把兵练得这样好，怪不得汉奸、土匪都怕八路军。”确实是这样，我们在三边经受了剿匪、反顽斗争的检验。移防陇东后，在伊除国民党顽固派别动队赵老五经营多年的匪巢——甜水堡的攻坚战，扫除顽固派包围、封锁边区的进攻出发地一线据点马渠、小园子等和守卫边防的战斗中，显示了它坚强的战斗力，使祸害曲、环多年的顽匪望风而逃，惊心丧胆。历史实践证明了警二团完成了它所担负的任务。

（四）以战斗姿态加紧生产，改善生活，克服困难。

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物质贫乏，加之后来国民党经济封锁，边区军民生活一直非常艰苦。初期，根据国共两党改编协议，国民党不得不拨给八路军薪饷，但少得可怜，八路军总司令每月只发5元钱的津贴，战士每人每月仅有1元。这点钱，战士连生活必需用品都不能购置。部队每人每天只有5分钱菜金，买了油盐就买不了菜蔬，有时连饭也吃不饱。那时，很少见到衣服上不打补丁的战士，有的同志到了冬天还穿单衣裤，下雪天赤脚穿草鞋上操。部队的物质生活如此艰苦，而担负的剿匪、边防、训练等任务却又非常频繁紧张，穿衣吃饭成了大问题。

为了克服物质上的困难，改善部队生活，1938年7月第二次兵团首长会议提出了“生产、学习”的口号，同年12月留守兵团第一次党代会发出“以战斗姿态加紧生产，变部队为集体的生产场所”的号召。抓生产，我们起初没经验，起步晚了些，仅仅从眼前改善生活出发，利用战斗、训练间隙和课外游戏时间在驻地打井取水，屋前屋后种菜，种烟草、做豆腐、生豆芽、养家禽、烧木炭、开作坊磨米面等；还组织小部队外出割刺草，自做鞋袜，自织手套，将指战员们微薄薪金省下来的钱集中起来开办合作社，与三边党政军群开办“四义店”等。困难激发了大家的劳动热情，部队生活得到一些改善，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质贫乏问题，仍不能减轻人民负担。为此，我们将定边的地情民情，又作了一番调查研究，决心放开手脚，发挥部队集体优势，充分利用三边丰富资源，在原有生产规模基础上，从小到大、从近期到长远、从着眼改善生活到争取自给或半自给，从农副业生产到发展多种经营，生产运动初步开展起来了。

三边地广人稀，农业靠天吃饭，是缺粮区。因此，解决吃饭是个根本问题，我们就抓住农业生产这一环节。1938年，在城内外开荒20多垧地，初步解决部队吃菜难问题。是年秋，派两个连到二区开荒种粮。三边开荒有两个特点，一是春天风沙大，开秋荒不开春荒，二是地接荒漠地力薄，一面开生荒，一面丢熟荒。指战员们以极大热情投入生产运动，当年开荒2500多垧地，收成虽一般，还是稍弥补了部队粮食不足和解决了家属口粮问题，也减轻了三边人民的负担。老乡们见了我们就说：“八路军又能打仗，又会种地，当兵的都象八路军，老百姓就有好日子了。”

利用三边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广开门路开发资源。食盐、皮毛、甜甘草是三边的三宝，我们就在三宝身上作文章。食盐是三边主要特产，边区军需民用离不开它，也是出口的主要物资。可是打盐是件非常艰苦的劳动，皮肤在盐水中浸久了易裂，影响人体健康。因此，我们一面努力改善打盐队的伙食，保持体力，一面加强医护，防止疾病，同时打盐队经常轮换，做到既搞好生产，又不削弱战斗力。为了不在盐业贸易中吃亏，供给处还选派精干的同志向商会学习鉴别食盐质量、购销盐的方法。打盐队吃住在盐湖边，生产出一堆堆食盐，用骡马、毛驴队将盐运往延安、庆阳、关中等地，自产自销换回边区紧缺急需的粮食、药品和不能制造生产的日用品。

三边荒漠上生长的甜甘草是一味很有名气的中草药，也是边区出口的重要物资。各营起先用业余时间在地附近挖甘草，后来到几十里远近的荒漠去挖。我们曾挖到一条碗口粗、2丈4尺多长的甘草王（根部断了未能全部挖出），当地老乡见了大为惊叹，我们将它送往延安新市场生产成果展览会展出，参观者看了赞叹不已，三边甜甘草名气更大了。



三边驻军在定边城隍庙前打装甘草

三边荒漠草原上食草野生动物很多，主要有野山羊、鹿、獾子、狐狸等。为了猎取这些野生动物，我们派人调查其活动规律，学习掌握猎取方法，然后，以小分队、班组在不同季节围猎。当然，不是每个野猎分队都

能满载而归的，有的经常扑空或猎获很少。荒漠草原上野山羊成群结队，但奔跑速度快，围猎有不少困难，我们将围猎与练射击结合起来，每次埋伏射杀收获不少，部队既提高了射击技术，又猎获野味改善了生活。獾子行动灵敏，其居住的洞穴有3个以上洞口，而且生活规律独特，白天钻洞，晚上活动，不易捕捉。但它再狡猾也不如战士的办法多，捕猎分队白天查看好洞口，在獾子出入的各个洞口装上带有食物的夹子，抓住它怕光的弱点，夜晚以灯光照射，或在洞口用烟熏，逼它出洞后捕杀。这样虽然很辛苦，但战士们兴趣很高。每当我回忆这段经历，又联想起在定边吃老鼠肉的趣事。

我住房隔壁的一间大房曾是粮仓，仓房地下尽是鼠洞，后来存粮用完了，仓内有一个四方形大木柜残存一些余粮，每晚老鼠出来寻食，成群结队窜来窜去，扰得人不得安宁。那时生活很困难，多日不沾腥味，警卫排长贺回生提议灭鼠吃肉。他捉了几只先试了试，老鼠这东西看起来叫人恶心，但肉细味香，以鼠肉伴酒，真是美味。警卫排在仓房内安上鼠夹，每天捕捉，连续几个月，捉了上千只老鼠。起先大多数同志不敢吃，看到我们吃得有滋有味，禁不住肉的诱惑，也跟着吃起来，赶到粮仓翻修，才结束这场“战斗”。

定边是四省客货集散地，经商是生财之道，但我们一无经商经验，二无资金，供给处开办的合作社本小利微，虽赚了一些钱，给指战员分了些红利，但微不足道，只能维持现状。我们决心发挥强项，扩大骡马运输队。当时警二团有几十匹大牲口，运输能力强，主要将自己生产的食盐从定边、盐池运往陇东驿马关转口西峰镇，换回粮食（主要是小麦）、布匹等。那时没有平坦的公路，黄土道崎岖不平，运输队虽饱经风沙饥渴，非常紧张劳累，但得利颇丰。当时定边陇东来往客商很多，骡马大车长途运输要在车上放足够的饲料、饮水，占去很大位置，开骡马店是桩好买卖。我们抽调人员在定边至驿马关的交通干线上，选点开骡马店，很快发展到大店5处、小店11处，既解决了自己运输队的吃住，又方便了往来客商和骡马队，生意很兴隆。因警二团把骡马店从三边一直开到陇东，受到了个别同志的责难：警二团手伸得太长了，把生意做到别人防区来。对于这些议论，我

们认为：为了不饿死，不冻死，响应党的号召，靠劳动获取报酬是无可非议的，况且搞生产、做生意也有个竞争。

开展生产运动，广开门路是为了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渡过难关，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但因无经验，不成功甚至赔本的事也有。我们曾办了一个皮件厂，想通过商人转口到国统区，因技术力量不足，资金太少，开张不久收益甚微，只好作罢。在这过程中，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做生意与民争利，影响兄弟部队团结，个别人还受到腐蚀等等。当然，这些毕竟是次要的。

我们在生产运动中，不断总结，避害趋利，采取积极措施，用自己双手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为部队正规化建设提供了保证；不仅如此，还造就了许多不怕困难、能劳动、会理财的好同志。如供给处几任领导姚醒吾、周力、强鸿吉，合作社主任谢友新等同志为警二团开展生产运动，渡过难关作出很大贡献。他们不仅出主意、想办法、带头生产，而且一尘不染、廉洁奉公。这些同志爱吸烟。烟瘾都很大，但从未买过一根纸烟，姚醒吾、周力始终抽水斗，至今我仍钦佩这些同志的廉洁精神。

（五）戍边 3 年、鱼水情深。

警二团驻地在留守部队中离延安最远，加之当时通讯联络不便，因而独立性强，遇事要机断处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养成自觉尊重地方党政领导，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作风，依靠党的领导和人民支援来完成戍边任务。

定边是一个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城市。1935 年 11 月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陕西省委决定成立三边特委，领导三边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因叛徒出卖，特委遭到破坏，陕甘宁省委又成立定边、盐池、安边 3 个县委，坚持斗争。1936 年 6 月，韩先楚率红二十八军解放定边、盐池后，第二次成立三边特委，1937 年 5 月改为定边中心县委。是年秋，日寇侵占绥远，严重威胁陕甘宁边区，故边区党委决定第三次成立三边特委，1938 年初改为三边分区党委，领导三边党政军民准备抗击日寇、保卫边区的斗争。

三边人民是具有光荣传统的人民，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八路军感情深厚。定边解放后，中央党校、少数民族委员会以及中央财贸机关部分同志先后进驻定边，受到热烈欢迎。为迎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和与蒋军追兵决战，中央电示李维汉、董必武成立筹粮委员会，在刚解放不久的三边就地发动群众，筹粮筹款支援前线。筹粮委员会协助三边特委深入乡村城镇，号召为了抗日救亡，“有钱出钱，有粮出粮”，仅用1个月时间就完成筹粮任务，并筹款两万余元，有力地支援了红军前线部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三边人民一如既往。警二团驻守三边3年多时间，得到了人民全力支援。刚进驻定边时，我们无塞外荒原生活经验，衣食住行都离不开人民的帮助。从指导抹房、做饭开始，手把手地教，逢年过节，抬着猪羊及其它慰问品敲锣打鼓来慰问。1938年的“八一”纪念日，定边群众送来几百双军鞋，当时，指战员还没学会做鞋本领，真似“雪中送炭”。那时部队剿匪、训练任务紧张，地方政府动员群众几乎每月用牛车帮助部队运柴草，部队的重病号也大多是老乡用担架送延安治疗。修整城防，三边专署组织了成千上万群众参加劳动，商会为此捐现洋5000元，全部购买器械。部队刚到三边，不懂风沙习性，几位在野外割刺草的战士，躲避风沙袭击时被埋在甘草坑内，过路群众刚脱离险境，听到呼救声，冒着生命危险将战士从死亡线上救出来。定边商会的会长陈寿田、委员李子建等，为警二团的生产运动尽心尽力，特别是闫殿臣同志始终如一，就是我部移防陇东后，他仍一如既往为我们服务，至今我与他仍保持着深厚的情谊。写到这里，我很自然地想起一位纯朴、忠厚的老中医为我治病的事。

1939年8月，我率部队在沙漠练骑术，回驻地后就病倒了，病情又急又猛，整日昏迷不醒。这可急坏了甘政委等领导，他们派人四处求医买药，均不见效，我的生命处于垂危中。当时在定边商会学习的彭生悟，听说盐池有一位老中医医术高明，即向团里报告，团领导立即派人去请。那年，袁炳戾先生已是年过花甲，来定后顾不上休息就来到我的病床前，一边号脉，一边观察病情，过了一段时间他面带难色地说：“这位官长病很重，我开个方子，好孬就这副药，你们做主的人一定要签个字，不然我不能开方下药。”袁老先生话语严肃诚恳，团里当即召开党组会，决定救人要紧，由甘政委在药方上签字。团卫生队长很快买来药，老先生一一过目，亲自

下药煎熬。我服药后不多时，渐渐苏醒过来，后又连服几次，终于转危为安。团里非常感激，给钱给东西老先生都不收，后来以警二团名义给老先生送金匾，以表谢意。这些情况，是我病愈后团里领导对我讲的。我一直想去看望老先生，因不久部队移防陇东，此事成了一件憾事。1985年我重返盐池，得知袁老先生后代解放后移居银川。几经周折，我终于见到袁老先生后代，才得知老先生原籍山西，是前清秀才，祖辈四代行医，因家贫不得志，靠教书和行医生活，于1946年9月去世。袁老先生现在子孙满堂，我向他们表达了对老先生的深切感激、怀念之情，此行了却了我多年的心愿。

三边地广人稀，情况复杂，警二团是主要的军事力量，完成戍守任务可谓困难重重，但由于党政军民亲密团结，步调一致，共同戍边，完成了戍边任务。我感受最深的是：一越是困难的时候，党政军团结的越紧密；二是遇事都做到及时商量，出了问题主动承担责任，各自作自我批评，从不诿过，真正做到了革命友谊第一，克服困难第一，一致对外第一，这就是我们完成戍守任务的可靠保证。三边地委、专署、保安司令部的主要领导白如冰、刘英勇、白栋材、王子宜、强晓初、白寿康、朱子休、齐渭川等领导同志对警二团工作和生活极为关心和支持，他们除经常来团部与我们在一起研究工作外，还常常到各营看望指战员，征询意见并解决实际问题。地委凡传达与讨论上级的重要政策及指示，都请团领导或派员参加。甘政委一直担任地委常委职务，参加各项决策活动，我们与专署的往来更多了。特别是我与强晓初专员无话不谈，军政相互之间有求必应，合作紧密。在领导同志影响下，地委和专署的工作人员对警二团的工作给予多方支援，逢年过节，党政军人员一起联欢、座谈，加深了革命情谊。部队也有计划地分头深入群众中征求意见，为老乡打井、挑水、背柴、打扫除、看病等。当时定边只有警二团有2部电台，三边党政军重大问题向延安的请示报告和党中央、边区政府对三边党政军的指示，都由警二团联络传达。党政军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保卫边区西北大门而努力地工作。

戍守三边已是50年前的往事，弹指间，我早已过了古稀之年，每当回忆起三边战斗生活，心情很是激动。是勤劳忠厚的三边人民，用小米和酸

菜养育了八路军警二团的将士，在艰难的岁月里，军民结成了相依为命的亲密关系。正是由于人民的支援，警二团不仅清除了匪患，胜利地进行了反摩擦斗争，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保卫了边区西北大门，圆满地完成了留守兵团赋予的战斗任务，而且把警二团锻炼成八路军后方留守部队的主力团队，培养了许多军政人才，使警二团向正规化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1939年冬，我部奉命准备移防陇东。1936年11月红二十九军进驻三边到1939年12月移防于警一团，警二团在三边驻防整3年。3年时间并不长，但它是我几十年军旅生涯中很值得回忆的一页，12月16日清晨，定边党政机关和群众顶着凜冽的寒风，聚集在南门外欢送警二团南下。一排排香案，一碗碗米酒，一颗颗红枣，深情地体现了三边人民对子弟兵的厚意。看到这动人的一幕，我首先想到的是：鱼儿离不开水，人民军队永远离不开人民。

难忘的教诲

肖劲光

肖劲光（1903—1989）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湖南长沙人。1922年，由团转党，曾两次赴苏联学习。1933年任闽赣省军区司令员、红七军团政委。“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和李德将黎川失守、浒湾失利责任全加给肖劲光，他被诬为“罗明路线”在军内的代表，准备公审处死。经毛泽东力争，才保住性命，受到开除党籍、判刑5年处理。遵义会议后任红三军团参谋长，红二十九军军长，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总



司令兼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是中共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本文摘自《中共党史资料》第20辑《陕甘宁边区的反摩擦斗争》。题目为编者所拟。

1939年冬天，邓宝珊所属的新十一旅第一团第三营一个姓宋的营长，率领士兵强占我驻定边县城的警二团所属骑兵营的三处营房，致起冲突，双方开枪打了起来，各有所伤亡，我骑兵营追到宋营营房内，并收缴了对方一部分枪枝。两军对峙，箭拔弩张，各不相让，如不抓紧处理，很可能酿成一起极其严重的事件。

闻讯后，我立即致电邓宝珊，根据警二团的报告，向他通报了事件发生的经过。电文的最后有这样几句话：“恳求速电制止，如将该营另调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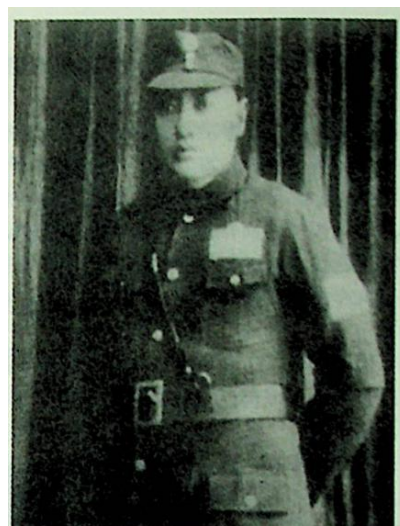
八路军警三旅旅长贺晋年

处，以平公愤，并将敲诈人民、贪脏枉法、破坏团结、制造分裂、肇事凶犯之宋营长撤职严办，以惩刁顽，而维法纪”。毛泽东审阅电稿时，将这段话全部划掉，改写成：“事件发生谅系宋营长受人挑拨所致。现在事态颇为严重，敬恳我公速电制止该营长，勿再寻衅，然后查明事实，合理处置，并可否将该营另调他处”。他还在电稿的旁边加注提醒我：“肖：后面口气太硬不好”。平常，对于邓宝珊，我还是把他同国民党其他将领区别对待的，但当上述定边事件发生后，我正在气头上，对口气这样生

硬的话，也都没有改动。直到看到毛泽东修改的地方和提醒我的话，仔细想了想，才认识到自己的粗心和意气用事。从这件事上，也反映出我对于毛泽东经常讲要努力争取中间势力，不同对象要区别对待等指示，还理解不深。如果毛泽东不把最后那些指责和带命令口气的话，改得比较缓和，邓宝珊先生看了，很可能勃然大怒，至少是心里会不高兴，定边事件的处理，就可能节外生枝，迁延时日。

事态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只有像毛泽东这样，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办法。邓宝珊收到我的电报后，果然态度很友好，回电主张和平解决，并建议双方立即派代表到当地去查明处理。我方派贺晋年为代表，到达定边后，会见了邓宝珊派出的代表王参谋和当地驻军陈团长、徐县长等人。双方态度友好，召开了欢迎大会，并承认事件的发生，首先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部队军纪败坏，领导无方，预先不通知，就占驻我军的营房造成的，表示要将宋营长调防，希望双方友好相处。贺晋年经过调查了解，证明事件的发生，确实是由于对方个别下级军官的不友好行为所引起，而不是来自上面有意制造的摩擦事件。现在双方意见基本一致，只是在“谁先开的第一枪”等个别问题上，各执一词，事情发生在黑夜，一时也难以查清。对方态度好，我们就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的部队，将所收缴的对方的枪枝和其他物品，如数送还。同时要求部队认真总结一下这次事件的经验教训，看看以后处理类似事件不用武装冲突，是否还有

别的和平解决的办法。我在发给驻定边部队领导同志的一份电文中，陈述了这些意见。毛泽东在审阅这份电稿时批示：“很好，照发。”后来，我把贺晋年调查处理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如实向邓宝珊作了通报，并对他能够秉公处理，不使事态扩大的公正立场表示赞赏和感谢。毛泽东审阅时又作了批示，要我把这份电报迅速发给邓宝珊，很快了结了这一事件。就这样，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一场风波迅速平静下来了，当国民党西安天水行营打电报来，要我报告定边事件的发生和处理经过时，我在回电中只用了“现已和平解决，和好如初”等几句简单的话，就算作了交代。



国民党十一旅旅长刘宝堂少将

步履苍尘

——三边工作回顾

邓国忠



邓国忠（1917—2000）陕西清涧人。1928年入团，1935年转党。参加了东征、西征。历任中共定边市委书记，定边县参议会议长，盐池县委书记，三边分区保安处副处长、处长。建国后任宁夏省公安厅代厅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处长，陕西省公安

厅副厅长，铜川市委第一书记，咸阳地委第一书记，省监委副书记，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心小组组长，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陕西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本文选自邓国忠回忆录《步履苍尘——我的回忆》一书。

第一次在三边工作

1937年1月我回到中共三边特委时，陕甘宁省委决定撤销三边特委，成立中共定边中心县委。中心县委除主管本县的12个市、区工作外还领导中共盐池县委的工作。在三边特委撤销时，中共陕甘宁省委组织部长兼三边特委书记罗梓铭仍回省委去了，原中共三边特委组织部长朱协辉调任定边中心县委书记，原定边县委书记刘悠安调回省委。当时特委征求我的意见是回省委还是留定边工作，我表示可以留定边工作，于是中心县委即决定我任中共定边市委书记。

1937年我到中共定边市委时，当时没有市委书记，市委工作由共青团市委书记李尚培兼管。原中共定边市委书记在冬季形势紧张（胡宗南准备进攻三边）时不告而走。市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德元是一个吸鸦片的人，你不叫他不来。市政府的工作没有人管。实际上政府工作也由市委兼办。而市委也只有我一个人，原团市委书记不久也被调走了。所以摆在我面前的任务，首先是设法抽调干部，充实和调整机构以利开展工作。这样我就经过和中心县委商量免了市长李德元的职务，调来市商会会长李志恒担任市长，由他将市政府的工作担负起来。调北乡支部书记王xx担任市委组织科长。为了加强赤卫军的训练和城市的治安工作，提拔杨月亭担任军事科长，刘xx担任特派员，并配备了一个市妇女主任专做妇女工作。

定边市开始只管城市南北两个乡，后来将原城郊的第一区辖区也都划归市上管辖。当时定边虽已解放半年，但一切工作还属创建，而且由于冬季一度形势紧张，所以人民的思想情绪很不安定，有许多人对红军能否在这里长期待下去，思想上有一个大问号。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便将形势宣传、思想教育、安定民心作为首要任务，利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有利形势积极开展宣传工作，使民心安定下来。由于定边地处陕甘宁绥四省交界地带，商业比较繁华，来往人员复杂，当地地痞、流氓、暗娼、烟鬼（吸大烟）、小偷较多，社会秩序很不安定，所以我们大抓了社会治安工作，严厉打击了坏人。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有些流氓小偷利用晚间到处偷拆房子（在解放初有些地主、土豪及不明红军政策的人逃到白区，家里无人管房子），也有些土匪、小偷偷盗牲口，抢劫财物，搞得人心不安。因此，我们就发动群众、组织民兵巡逻严密监视坏人，抓到了一个经常偷拆民房盗卖木料的犯罪分子李大海，经过县保卫局判处（当时还没设法院），召开群众大会处以死刑，从此社会秩序大大好转。与此同时我们也加强了党团组织、基层政权、群众组织（工会、妇联、民兵、商会）的建立与整顿。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农业手工业生产、教育、商业等工作，使我们的工作逐步走上了轨道。

1937年，我在定边市委工作了半年。在这期间重点抓了基层组织、政权的建设，党员的发展教育，干部的培训，为以后的工作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赵苍璧于1938年

1937年上半年，适逢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出现了和平的时期。正当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又开始了对中国的武装进攻，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七七事变即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使全国形势进一步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陕甘宁苏区改为特区，以后又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

1937年7月间，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了建立参议会的任务。定边县将我由定边市委调出担任定边县参议会的议长，负责筹备定边县参议会。当时抽调的还有杨岐山等二、三人，印刷了一些表册，做了一些调查摸底工作。在10月间，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工作的需要，又决定成立中共三边特委，建立三边分区专员公署。三边特委书记白如冰，组织部长刘英勇，宣传部长王聚德，统战部长白坚，秘书长白友三。从此，我又到专员公署工作。我到专署之后，首先的一件事就是迎接国民党的四九四旅部队到定边驻防。当时的四九四旅旅长是蒋云台，他是甘肃鲁大昌部的一个旅，

是由甘肃的平凉开来定边，名义上是为了抗日开来定边。与此同时开到定边所属安边的还有国民党的新编十一旅，旅长是刘保堂。其实这些部队到达定边，与其说是抗日，不如说为了防范监督八路军更为确切。我记得在

11月初，我以三边专署秘书长的身份持专员王子宜给蒋云台旅长的信，曾和定边县保安大队长刘生一起到离定边五里路的杨油房村去迎接了蒋云台。该旅到定边后，开始与我方关系尚好，以后在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方针下闹了不少摩擦，直至调走。

我在专署工作时间不长，由于冬季征粮任务紧急，即下乡进行征购粮食工作。在1938年初回机关后，由于特委统战部长白坚一直未到职，部内无人，宣传部长王聚德亦调绥远大青山工作，部内亦无人，所以又将我从专署调到特委宣传部任干事并兼统战部干事，主管两部日常工作。当时三边特委也改为三边分区党委，书记白如冰已调绥远，刘英勇接任分区党委书记，调盐池县委书记惠庆祺接任组织部长，秘书长仍是白友三。就这样我在三边特委分区党委工作了一年，直至1939年1月调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为止。在1937年10月成立三边特委的时候，同时成立了三边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白寿康，副司令员赵苍璧（分区保安科长），参谋长齐渭川。

我在三边地区工作的这段时间（1937到1938年），当时在三边的驻军是红二十九军，后改为警备二团。军长先是谢嵩，后是李仲英，政委甘渭汉。改为警二团后，团长周球保，政委甘渭汉。该团当时驻在定边、盐池，保卫着陕甘宁边区的西北大门。在这两年中正处在国共二次合作和抗日战争的初期，我方与国民党在三边的驻军，与宁夏马鸿逵部及绥远省的伊克昭盟地区的关系都还较好，未发生大的冲突。但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驻防安边的国民党军队的地方武装保安部队已开始向我区边境骚扰。为了保卫边境安全，我还曾带一个骑兵连到定边五区阳山涧驻了一段时间。在这两年期间，开始定边为中心县，以后成立了三边分区机关，定边各区直属分区领导。

定边、盐池在陕甘宁边区来说，算物产比较丰富，商业比较繁华的地方，那里出产咸盐、皮毛、甘草，收益比较多。加之地广人稀，人均占有土地较多，虽然土地沙化瘠薄，气候多旱，但仍有“十年九不收，一收吃几年”的说法。由于这里气候严寒，每年只种一茬庄稼，且多为糜谷、荞麦、洋芋等秋粮，人民生活比较困苦。如遇天灾，粮食歉收，多靠从宁夏方面运粮接济。

有所谓“年成好了吃粗粮，年馐不收吃细粮”之说。我在三边的这两年，虽然不是丰收但属平常，所以每天吃粮都是小米、黄米干饭，吃菜都是土豆、白菜、萝卜，在机关一月吃不到几顿白面、肉食，生活非常艰苦。但大家都已习惯，精神上仍很愉快。

当时我们机关干部的生活也和红军战士一样，吃的粮食是靠政府按标准供应的，吃菜是靠政府发放的一点伙食费维持的，衣服也靠政府发，几年一套，甚至连衬衣也没有，衣服烂了，补钉加补钉。房子内盘上土炕，冬天烧点柴火暖炕过冬，甚至连柴火也是自己到野外背回。出门下乡都是靠自己两条腿走路，不管天寒地冻，不管炎热流汗，均是如此。正因为我们的财政很少收入，经费非常困难，所以许多离家近的同志，往往从家中要点衣服或弄点钱以弥补不足。我在 1938 年与郭启云结婚时，除她家竭力帮助外，还写信向家中要了四五十元的白洋，以作缝制衣被、招待亲友之用。

二次到三边工作

我从 1940 年 6 月到边区保安处工作到 1941 年秋季时，国民党顽固派又积极准备反共，向陕甘宁边区搞摩擦。当时国民党驻绥远的何文鼎部也奉命要向安边进发。为了加强各地的情报工作和保卫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从边区保安处抽调干部加强各分区保安科的领导力量。具体部署是：派刘子义到绥德警备区任保安科科长，于桑到关中分区（马栏）任保安科副科长，赵苍壁到陇东分区（庆阳）任保安科副科长，邓国忠到三边分区（定边）任保安科副科长。我们在接受任务后，于 9 月份分别到各地区工作，我在 9 月底到达三边分区保安科。当我到达定边时，何文鼎正准备南下。为了迎击国民党顽固派，中央已调三五九旅相继到达三边，王震同志也已到达。但后来因我方有所准备，何文鼎部未敢南下。之后三五九旅即陆续南调，不少部队去南泥湾开荒种地。有名的南泥湾大生产即从此开始。

我到三边分区保安科担任副科长后，不久三边地委、专员公署为了加强定边市的社会治安工作，决定在定边市成立公安局，并由我兼任公安局长。当即由定边县警卫队抽调了两班的武装改编为警察，另抽调了四五个干部作为局里的工作人员，这样就很快把工作开展起来。

定边县地处陕西、甘肃、宁夏、绥远四省交界地区，市区商业繁华，来往商人比较多，加上当地盛产咸盐、皮毛、甘草，来往驮盐，贩卖皮毛、甘草的人川流不息，加上宁夏马鸿逵部的逃兵不断逃入定边，致使定边市的社会情况比较复杂，因此对搞好社会治安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根据当时定边的具体情况，我们着重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一、加强基层治安组织即治安委员会、治安小组的整顿与领导，使其对基础情况有所了解；二、加强对旅店、饭馆及一些特种户口和来往人员的了解，特别对一些重点户口作深入了解；三、有重点地清查户口；四、晚间派警察建立巡逻制度；五、对发生的一些治安案件及时侦破处理；六、配合分区和县保安科进行一些对外情报及嫌疑人物的调查控制工作。经过一段工作，对定边市公安工作摸索了一些经验，初步奠定基础。

我在三边分区保安科和定边市公安局工作了不到 10 个月，地委又决定派我到盐池县任盐池县委常委兼保安科长。

在宁夏盐池县工作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留下来的最后一块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原属宁夏的有豫旺、盐池两个县，但在西安事变后豫旺县未能恢复并于 1937 年将县级机构撤销了，剩下的原属宁夏地区只有一个盐池县了。盐池县归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管辖，地理环境与定边一样，是陕、甘、宁、绥四省的交界区，尤其与宁夏紧密相连。驻防宁夏的马鸿逵部及其反动政权，虽然在抗日战争期间与我方大体处于互不干扰的和平共处状况，但是他们贼心不死，经常窥视我方情况，有时还派武装人

员袭击我方地区，捕捉我方人员。尤其严重的是经常派遣密探探入我区进行侦察活动，派遣特务对我方干部进行收买拉拢策反工作。

我从1942年6月到1946年6月底，整整在盐池工作了四年。1942年6月至1944年底担任县委常委、保安科长，1945年1月到1946年6月任中共盐池县委书记。当我1942年6月去盐池县时，原任县委书记李维钧，县长阎自尊，保安科长杨存富都调走，新上来的县委书记是肖佐汉，县长是孙璞。当我1946年离开时，新到的县委书记是郭子清，县长仍是孙璞。

盐池县是陕甘宁边区西北边的一个县，地处原宁夏省的东南角，在1936年红军解放盐池后，设立五个区，人口不到两万，但地域比较辽阔。就这样靠五区西北边的原属盐池的惠安堡一带当时还未能得到解放，仍属马鸿逵管辖。马鸿逵也还在那里摆了一个盐池县政府。盐池县的大部地区是平原，畜牧业比较发达，盛产甘草、皮毛。所谓盐池实际上除惠安堡有点盐池外，三边的盐池大都属于定边，盐池并没有多少盐。当时的盐池城内也没有多少住户，商贾也不多。盐池附近沙漠并不多，可是一刮起大风就黄沙遍地，每年冬天黄沙就把西城墙堆平，每年春天我们都要动员群众去挖掉沙堆，可是第二年又复如此。这和定边的情况类似，但好处是盐池的沙堆比定边少一些小一些。

我在盐池工作的几年形势比较稳定，所以每年的工作也比较正常，大体是以组织群众发展农、牧业生产为主，也发动群众搞一点挖甘草等副业。盐池工商业不多，只是宝生等几家商铺大一点其余都属小商，手工业也很少。在1943年由县参议会议长靳体元出面兴办了一个元华工厂，纺毛线，织毛呢布，由于机器粗糙，工人技术低，所以毛布质量也很粗。

在教育事业方面，全县只有几个小学，县城有一个完小，根本没有中学，解放前上中学要去银川，解放后上中学要到定边。除了生产、教育工作外，经常工作中还有发展教育党员，训练整顿民兵，培训教育干部，维护社会秩序等等。

由于盐池紧靠宁夏，所以我们的工作除了上述经常性工作外，还有两件重要工作。一是要经常了解宁夏的动向，配合部队保卫盐池的安全。为

了便于工作和保护群众，我们从 1943 年开始在二、五两区还建立了骑兵游击队，马是发动群众捐献的。二是要在宁夏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和建立地下党组织。这项任务开始由县委统战部主办，以后在二区余庄子和五区红井子建立了二个据点，划归三边地委统战部管。到 1945 年成立了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由赵忠国（孙殿才）任书记。同时还成立了宁夏人民解放军，赵忠国任司令员，邓国忠任政委，梁大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在司令部下成立了回汉支队。支队长先是刘振玉，后是郝耀，副支队长是金三寿（回民），政治委员梁大钧。回汉支队的人员大多是马鸿逵部的逃兵或由宁夏跑过来的贫苦农民。这支队伍在解放战争中对保卫三边起了积极作用，他们在宁夏解放后都成为各级党政的骨干。

我在盐池工作期间，当时县上的生活也是非常艰苦的，除财政上按规定拨少量办公、伙食费，还要靠县上自己组织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县政府办了一个农场，各个单位都自己种菜、养猪解决吃菜问题。为了弥补经费不足，县上还自己办了一个商店。此外还派警卫队、游击队进行缉私，查缉大烟。不过查缉的大烟，除少量县上可以支配外，多数都要上交。大概在 1945 年，我二区游击队追缉从包头（日本占领区）返回路过盐池的甘肃的贩卖大烟的商人时，缉拿了几百两大烟，全部都上交给了陕甘宁边区政府。

另外，在 1943 年我们在机关开展整风运动时，当时县上也发生了逼供讯的错误，造成肃反的扩大化，把二三十个干部打成了特务。好在不久中央发了平反纠偏的指示，县上很快给这些同志平了反，未造成重大损失。经过这次运动，我们得到了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

参加保卫三边的斗争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喜庆胜利。可是反共顽固派蒋介石却另有打算，他在表面上伪装要和平，打电报邀毛泽东到

重庆和谈，而在实际上却乘日本投降后接收了日本一批武器和战利物资之机，积极部署新的反共战争，妄图消灭共产党、解放军。

为了迎击国民党反动派新战争，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中央指示，除了抽调一批干部去东北工作外，积极组织力量对保卫边区和打击反动派的斗争作了新的部署。其中有一条，就是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对地方党政机构实行了精简。为了加强社会治安和对外情报工作，各地委组建了社会部，统一领导保安和情报工作，各专员公署撤销了保安分处，设立了治安秘书，边区保安处原设在各分区的情报据点划归地委社会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西北局又将我从盐池县委调回三边地委社会部任副部长。我是 1946 年 6 月底回到地委社会部的，距我 1938 年在三边分区党委工作时已经过了整整八年，虽然人事已经几度改变，面目全非，但驻地仍然是那个院子，并无大的变化。

当时的地委书记是高峰，后来又增添了一位朱敏副书记。组织部长孙润华，宣传部长贾怀济，统战部长赵忠国（孙殿才）同时又是宁夏工委书记，秘书长李会友，社会部长赵文献、副部长邓国忠，专员是吴志渊，以后又增加了一位陈思恭为副专员。这时驻防三边的警备三旅除了第八团外，旅部及其他部队都已调离。三边军分区司令部由起义部队新十一旅旅长曹又参任司令员，郭宝珊、牛化东任副司令员，王子庄任参谋长，郭炳坤、惠世恭、孙润华相继任副政委。

当时三边地委新管的地区有五个县：定边、盐池、安边、吴旗、靖边。另有二个工委：宁夏工委、伊克昭盟工委。宁夏工委下属二个据点：余庄子、红井子；伊克昭盟工委下辖两个旗工委：鄂托克旗工委、乌审旗工委。在 1946 年底一度将宁夏工委、伊盟工委合并为绥宁工委，地委副书记朱敏兼任书记，我任委员之一，主管社会部工作。到 1947 年夏季又将绥宁工委撤销，分设宁夏、伊盟二个工委，我仍为宁夏工委委员。当时社会部除管五个县的保安科工作外，还管宁夏工委两个据点上的外情工作、伊盟工委及所属二个旗工委的社会科工作，此外社会部本身还有一些直派外情人员，所以工作是很繁忙的。

我到地委社会部后，主要分管情报工作。因机构有新的变化，所以我首先一方面熟悉各方面的情况，一方面着手安排调整以后的工作部署。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和筹措所需经费，还在定边开办了一个商店。

我到地委不久，三边分区即抽调部队和部分干部前往横山协助榆横特委解放横山县。当时社会部的赵文献部长也被抽去横山。在横山解放后，我三边部队及干部除了少数干部留下工作外均返三边。但是过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件，原在横山被迫起义的王永清部又叛变了。王部叛变时还将我伊盟工委书记赵通儒等好几个负责干部抓到榆林去了。

在东线王永清率部叛变的同时，宁夏马鸿逵部又派骑兵十九团窜入我盐池境内之兴武营。为了打击马鸿逵部窜入盐池之敌，我三边部队在当地民兵、游击队的配合下，经过周密侦察部署，突袭收复了兴武营，缴获了不少物资，马敌狼狈逃窜。在这次袭击马敌当中，地委社会部与盐池县保安科在侦察了解敌情方面起了积极配合作用。

1947年春节以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派来了一个工作团，由教育厅副厅长江隆基带队前来三边进行土改工作。当地也抽调了一批干部配合，我当时也参加了去盐池土改的工作。我们在3月初到盐池后又分配到各个区、乡，我是到五区南山一个乡上工作的。我们到乡上先是了解情况，然后才拟进行土改。可是很不凑巧，我们连情况还未搞清，胡宗南即向延安进攻了，我军于3月19日撤出延安。随之马鸿逵、马鸿宾部也开始向三边进攻了。

3月24日，我们正在盐池五区南山苏堡子乡进行调查了解情况时，有一个乡干部来告诉我们，他听见在盐池县城方向有大炮声响，是否那边有啥事？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延安失守情况，也不了解宁夏马鸿逵部向三边开始进犯。我们当即一方面派人到盐池方向了解情况，一方面找了乡上几个干部去大水坑方向探听有无敌情动向。24日晚，我们在向大水坑（该地紧靠宁马统治之惠安堡）方向前进时，在一个芨芨滩突然听见许多马跑的声音，我们怀疑是否马鸿逵的骑兵来了，随即隐藏下来。仔细又听，听见马鞍上的蹬老响，经分析估计这些马上好像无人，可能是敌人的马跑了。遂之我们即分头向马来方向挡马，经过几小时的追挡抓到了约20匹马。以

后查明，这些马正是马匪骑兵团跑出来的。我们即将这些马交给了盐池县政府。盐池县后利用这些马组建了一个骑兵游击队。

大约是 26 日上午，我和警卫员李秉章乘马回到定边。当我们到达定边时，我驻盐池守城部队新十一旅一团也正由盐池撤出向定边以东砖井方向前去。后来该团团长赵级三在定边失守后率部叛变投敌。在该团从盐池撤出时留下一个连队作掩护，后来这个连遭马敌围歼。我到定边时，三边地委书记高峰仍在定边城内。当时守定边城防的部队是新十一旅二团，团长是李友竹。我在定边吃了一顿饭。高峰向我说明了敌情后，要我立即到羊圈山方向去找回汉支队和定边保安营，成立一个西线指挥部，由我和回汉支队政委梁大钧担任正副指挥员，领导回汉支队、保安营及当地民兵，抵御敌人。我当天晚上到达羊圈山以东之郭家掌，找来梁大钧、郝耀（回汉支队队长）、杜亚夫（保安营长）等传达了高峰书记的指示。当时羊圈山方向已有马鸿宾的两个团压过来，我方一边抵抗，一边动员群众疏散了该地仓库存粮后，随即保安营向东、回汉支队向南分头转移。当我们在羊圈山东边一带活动期间，还收留了从盐池敌占后逃出来的部分干部，其中大部分是边区政府来三边参加土改的干部。这些干部随即分别编入回汉支队各中队负责政治思想工作，他们对部队的巩固起了积极作用。

敌马鸿逵部侵占我盐池县城后，集中主力向定边压来。在定边城南闾门的战斗，我警三旅八团遭受严重失利后，我守定边城防的十一旅二团于当天黄昏乘机突围。

在闾门战斗失利定边失守之后，马鸿逵匪部随即又侵占了安边、柠条梁等地。马鸿宾匪部随即向陇东环县方向前进，在其南进途中曾与我回汉支队在定边、环县交界处的王彪台遭遇。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方武器又差，因此我方损失了十余人。是役支队长刘振玉被俘，实一大损失。之后，我们即东向定边南山，与三边地委机关汇合。从此我又回到了地委社会部，即三边保安分处。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地委社会部成立、分区保安分处撤销后，经过半年时间的实践，专署只设一个治安秘书，确实不能担负起治安任务，因此边区政府又决定恢复了各分区保安分处，取消了治安秘书，保安分处和地委社会部一套机构，两个牌子。

在 1946 年冬季，马敌侵占盐池兴武营之后，我们已察觉敌人的这一举动只不过是即将大举进攻的序幕。为了防止敌人的突袭与免遭大的损失，地委决定一切工作按和平与战争两手准备，在敌人未来之前按平常工作进行，敌人一来即转入战争。与此同时将地委与县级机关的文件、物资以及家属从定边、盐池、安边等地先期转移到南山。正因为如此，所以在马敌进攻时，我们在这方面未受大的损失。但是由于马敌进攻时未能主动放弃不便固守的盐池、定边，而采取了固守城市的错误方针，所以导致了警三旅八团为了保卫定边而与强敌激战遭受重大损失。该团在以后经过整顿归还了警三旅建制离开了三边。

在定边、盐池、安边、柠条梁几个城镇被侵占之后，我三边地委及定边、盐池、安边等几个县的机关干部和地方武装部队都撤到南山及吴旗县作为根据地进行活动。

值得庆幸的是，在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后，我西北野战军在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的英明指挥下，接连打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大胜仗，消灭了大量敌人，俘虏了李纪云、麦宗禹、李昆岗等指挥官，缴获了许多物资，严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鼓舞了人民的士气。之后又接着出兵陇东消灭了马鸿宾敌一部，然后在 6 月间又挥师北向收复了定边、盐池、安边、柠条梁等地。马鸿逵驻守三边之敌闻风而逃。在收复安边时还抓住了国民党的定边县长徐绍林。在收复三边后，我们三边地委机关与定、盐、安几个县的领导同志与一部分干部也及时回城进行支前与开展地方工作。

西北野战军在三边驻了一个短时期，经过休整 7 月即向榆林开拔，包围榆林，这就是第一次打榆林。虽然在胡宗南部急驰声援下，我军从榆林撤退，但乘机又在米脂县沙家店消灭了敌三十六师钟松部，取得了重大胜利。之后又在挥师南下途中打开了清涧城，抓住了敌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并在延川三岔地区狠狠打击了敌人。

在西野收复三边期间，我也回到定边。当时我有一项任务就是设法了解掌握敌情，除派干部在边境了解敌情动态外，就是派秘干深入敌后了解

宁夏敌情，主要是军情。当然同时也布置了解敌占期间的敌人活动情况与我方人员的变化情况等。

当我西野部队在 1947 年 7 月中旬离开三边挥师东进“围榆打援”时，宁夏马鸿逵部又大举向三边进攻。在敌人未进入我区之前，我们先收到了我情报员从盐池边境传来的一封秘密情报，说明宁马已动身大举再迫三边。我当即将此情报告知地委书记、专员和军分区司令部负责同志，经分析认为情报具有可靠性，遂决定进城部队及工作人员从第二天开始重新撤退。在我们撤退之后的第三天马敌又第二次侵占了三边。从此我们又与马敌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斗争。

在这两年期间，敌人基本上固守了几个城市，在城市附近的平原区亦主要是敌人组织的一些地方保安团队进行活动，并在城市、平原地区建立了部分反动政权和保甲制度。广大山区都在我地方武装及各县党政领导之下。为了打击敌人，我定边、盐池、安边几县还经常派地方武装深入敌后，摧毁其反动政权，捕捉反革命分子，教育群众，震慑敌人。例如，定边游击队在县委书记郝玉山同志带领下，奔袭了敌人所占定边、盐池县城之间的盐场堡盐务局，对敌人的影响很大。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中，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斗争是艰苦的。敌人虽曾扬言要组织力量进山搜剿，但在我方积极主动袭扰敌人的情况下，敌人由于兵力不足，始终未能得逞。敌人所占城市及平原地区，虽然亦曾建立了反动政权，但广大群众的思想仍倾向我方。

在敌占三边期间，马鸿逵部经常驻防三边的部队是一个骑兵旅，即十九、二十两个骑兵团。另外敌人在定边、安边成立了一个保安团，其团长是张廷芝，1000 多人。在盐池成立了一个保安大队，大队长刘占金，约 200 人。

在马鸿逵部第二次占领三边后，虽然时间较长，但在 1948 年 3 月初我西北野战军在宜川和瓦子街大捷歼灭胡宗南部 3 万人及驻守延安之敌逃跑之后，形势逐步起了变化。尤其在我军三大战役胜利，南京、上海解放，西安解放之后，敌人只守城市，不敢再到山区骚扰，我区比以前更为平静。

为了打击驻守三边之敌，在 1949 年 6 月初，中共三边地委根据当时胡宗南敌正在准备反扑西安，马步芳、马鸿逵敌拟配合胡宗南的作战计划，大部南下关中，宁夏空虚，三边敌人惶惶不安的情况，决定集中三边所属的新十一旅二团、回汉支队和定边、安边的游击队，突袭安边之敌骑十九团，给敌予以打击。同时决定在这次行动中，军事指挥由军分区副司令牛化东、副政委孙润华负责，地方工作由地委常委、组织部长王金璋，地委常委、保安处长邓国忠负责，大的行动四个人共同商量，并组成了指挥队。在地委做出决定后，军分区及有关方面立即作了部署。6 月 13 日将我各部队及地区和安边县有关干部都集中在安边城南 30 华里以南孤山涧地区，一切准备就绪，并向全体干部战士作了动员，交待了任务，大家情绪极高。为了便于保密，当晚天黑之后即开始向安边城进发。由于 6 月天气日长夜短，所以到了安边城下已到了深夜，安边城内的敌人与群众已经入睡。我部即按照原定部署，由二团从东城与南城向敌进攻，留下西门给敌退路，同时在西关以外布置回汉支队及定边游击队对逃敌进行伏击。事实亦正和我们原计划的设想一致，当我二团在东城与南城展开攻击之时，敌人还在睡觉，一听枪声便慌忙集合从西门逃出，奔向定边去了。我们在 14 日拂晓前即收复了安边，缴获了一些战利品，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在我部收复安边后，部队分别部署了防务，地方干部分头在城郊进行群众工作。当日我临时指挥部即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在会议上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牛化东副司令认为我收复安边后，敌人跑回定边后还要侦察了解我军情况，估计三天内不会返回，我们可以先在安边做几天地方工作，部队也要休整一下，然后再撤出。这个意见得到了二团负责同志的赞同。我的意见是，我们的兵力有限，敌人在三边驻有骑兵两团，加上张廷芝保安团共有 3000 多人，比我们的力量大两倍。定边离安边只有四五十公里，敌骑要来只要几个钟头即可到达。敌人虽然逃跑，但是城内估计还会有敌人安插下的人，他们很快就会将我军情况报告给敌人。为了防止不测，争取主动，可将二团主力立即撤出城外，部署在安边西南猫山地区，监视定边敌人动向。另留少数武装部队掩护地方干部在城内进行群众工作，如有敌情在我主力掩护下，立即沿城东边墙（长城）向南撤退。但是这个意见未能得到牛副司令和军队同志同意，他们认为待两三天没有问

题。于是在军分区副政委孙润华同志的同意下，提出向地委发电报请示。遗憾的是他们在报告地委时只讲了军方同志提出的估计和意见，未将我们的不同意见报告地委，使地委在决策上受到影响，未能及时回电。以致我军未能及时撤出，导致在第二天反被敌包围的险阻困境。

在我军 14 日收复安边后，广大群众喜气洋洋，欢迎我们回城工作。当然他们也有顾虑，害怕我军人力太少，不能久驻。我们在 14 日开会研究行动计划后，即到安边城内了解了一下情况，当日无事。在第二天（15 日）一早即派出骑兵侦察员向定边方向了解敌情，当我侦察部队向定边方向走了 20 多公里时，即发现马敌大量骑兵蜂拥向东而来，我骑兵侦察员立即返回安边向指挥部报告敌情。当我们听到敌骑已来反扑的情况后，我们马上上城墙观察时，看到敌骑已分两路迂回包围安边。随之，指挥部即找二团负责人研究敌情，布置了防范措施。

敌人一定要返回，这是我们原先所估计到的，但是来得如此之快，我们是估计不足的。尤其严重的是我们袭占安边之后，未能将部队及时撤出，以致反被敌人包围，几乎造成惨重的损失。

当我们被敌包围之后，我们从城墙上看到开始来的是十九、二十两个骑兵团，赶晚上又来了张廷芝的保安团（步兵），大多驻在沿城数里的地方，尤其靠南山的地区兵力较多，显有逼我撤退中伏击我军之阴谋。敌人的图谋，我们已经识破，但是到底如何对待这个敌情呢？我们当时在讨论中发生了分歧。牛化东同志认为安边城墙坚固好守，不易攻，甚至说敌人如攻城，我们用砖头都可以把他们打下去，我们不必马上突围，如果突围可能遇到伏击损失更大。而我和王金璋认为，现在是敌强我弱，我如坚守，弹药不足，附近又无援兵，最近的援兵也在榆林、延安，路途很远。敌人的援兵从宁夏来就会很快。因此要下决心突围，即使受一定的损失甚至比较大的损失，也比守在城里受的损失会小，否则有不堪设想的后果。会议经过认真讨论，激烈的争论，最后意见统一了，决定立即做好准备，当晚黄昏时间突围。为了在突围中不失机密，所有干部把笔记本都销毁了，电台的密码也销毁了，从而就使我们与地委的通讯断绝。但可惜的是，当晚上做好撤退准备之时，牛化东同志思想又动摇了，迟迟不下命令。他说，

这样多的人出去可能比守城遭受损失更大，不好向上交待，从而又耽误了突围时间，以致当晚未能撤退。

到第三天（16日）的上午，我们收到了马鸿逵部一一七师师长马英才、骑兵旅旅长王伯祥、敌保安团司令张廷芝署名，派一个群众进城送给牛化东的一封劝降信，要求限期投降，否则城破之时，玉石俱焚等等。我们看到此信之后，方知敌师长马英才、旅长王伯祥也从宁夏赶来，必然又从宁夏调来一部军队，更增加了敌人的兵力、火力，看样子敌人是很快就要围攻我们了。我们必须下决心很快撤退，绝不能再优柔寡断，贻误时机。所以指挥部又开会研究，决定仍在当晚黄昏时分撤退。为了迷惑敌人，我们亦以牛化东副司令的名义，给敌人马英才等三人回了一封信，主要内容是论述了全国军事形势，东北、华北、北平、天津、南京、上海、西安均已解放，全国各地以至兰州、宁夏不久也将要解放，希望他们洞察形势，立即放下武器，弃暗投明，再不要执迷不悟了，为非作恶，成为历史罪人。在我们的信交原送信人带回之后不久，大约上午12点左右，敌人就开始向我们东西两关的部队开展了猛烈的火力攻击，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又一次向我东西两关展开了强大火力攻势。敌人除有大量轻重机枪外，并配有轻重迫击炮助威，使我部队干部、战士数十人受伤。

为了不失时机及时撤出，我们仍按头一天晚上的部署，利用晚上黄昏（七八点钟）敌人开饭时间，一举从西门向南撤退。前边有一支部队开路，左右两边有两支部队掩护，后边有一支部队殿后，防止敌人尾追。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在撤退时还在城墙上留了一个小分队佯装守城，待部队全部撤走后，这个小分队也从城墙下预先挖好的地洞撤出。在这次撤退时，正遇敌人晚上吃饭并准备集结攻城之际，所以我们撤出后除在南山坡遇到叛徒赵级山带的几十个人被我一打即逃外，再未遇到重大敌人。除两个医务人员、几个担架队员后来被敌在山坡上搜捕外，全部安然撤出，取得了突围的胜利。

在这次撤退中，我和警卫员李秉璋同志也和大家一起行动，由于行军急速，口干舌燥，身体颇感乏困。到了南山坡上看到许多战士都在一个水窑边上喝水，我也喝了一碗，原来那水很凉，又多泥糊，所以一喝下去，

使喉头受到很大刺激，从第二天起我的喉咙就发哑，说话非常困难。过了好几个月才逐渐恢复正常。

奇怪的是，在我们撤到南山坡已经走了 10 多里路时，又发现安边城内火光冲天。原来敌人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撤走，东西关两边的敌人仍在进行攻城，所以对打起来。以后还是群众讲了情况，敌人才扫兴而去。

在这次安全突围胜利之后，三边地委开会总结了这次袭击安边敌人的经验和教训。在会上我讲了一个看法，我认为地委根据当时形势分析，组织袭击安边之敌是对的，事实也证明我们袭击敌人是成功的。但在进城之后负责军事指挥的同志对敌情估计不足，而且存在有轻敌的思想，不愿及时撤出，导致被敌包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险遭重大损失，这是错误的。而在最后能下决心突围，并在正确分析估计敌我形势的情况下，利用敌人在两次攻击之后准备新的攻城之前的间隙进行突围是正确的，而且也是成功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总之，我们是两头对，中间有错误，这个教训是深刻的，也是沉痛的，大家也同意我的看法。

在敌人两次占领三边的两年多期间，我们地委社会部（三边分区保安处）的工作，主要是：一、镇压反革命分子，维护社会治安；二、侦察了解敌情；三、瓦解敌人；四、开展社会情报工作；五、保卫地县领导机关安全。

经过分区保安处（地委社会部）及各县保安科同志的努力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在两年多的敌占期间，我们胜利地完成了维护社会治安等各项任务。为维护我区的社会治安秩序，我们逮捕判处了许多反革命分子，其中有经边区保安处批准定边处决的国民党特务、定边县长徐绍林，有经分区保安处批准处决的盘踞盐池、环县边境的土匪头子赵清彦。但在我们的工作中，为了侦察了解敌情、打击敌人，也受到了一些损失，付出一些代价。例如：我们在撤离定边时留下的原保安处商店永胜西经理（民主人士、神木人）被马匪残害；我们在伊盟地区工作的干部邓发财（原名郑宗藩）在带领游击队袭击马鸿逵援助榆林部队时牺牲；我保安处干部韩丕民和通讯员郝占忠在定边边境侦察敌情时不幸被逮捕。



我们在社会情报工作方面，向绥远、宁夏、甘肃、西安等地都派遣或建立了一些情报关系，大多数都是作了一些敌情调查，接交了一些人，其中起显著作用的就是我处干部王玉同志领导的在傅作义部工作的地下党阎XX与杨XX，他们对傅作义做了不少工作。这个关系开始由我们领导，以后，经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转交中央社会部领导。另外，派在宁夏的樊实效、卜志珍等同志在了解敌情与社会调查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这对我们在宁夏解放后接管和布置工作起了一定作用。

三边到伊盟

齐心支抗战

白如冰



白如冰（1912—1994）陕西清涧袁家沟人。1928 年入党。曾任中共清涧东区区委书记绥清县委书记，红军总供给部副部长，三边特委书记，绥蒙工委书记，绥远省委书记，晋绥边区党委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部长，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局长，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山东省省长；任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本文是作者 1985 年 8 月 1 日的回忆。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三边再次成立特委，组织决定让我担任特委书记。三边特委成立的时间大约在 1937 年的 10 月份前，当时人们还穿着夹衣，没有穿上棉衣。特委干部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延安派来的，如我和白寿康、赵苍壁等。二是陕甘省委调来的，如白凌云、肖彩峰、白成铭等。三是在定边工作的，如王子宜、白坚等。此时三边特委不归陕甘省委领导，而是陕甘宁边区党委（政府）领导，也就是归延安领导。三边特委的组织领导是：我任书记，秘书长白友三，组织部长刘英勇，宣传部长白坚，统战部长白步华，蒙民部长赵通儒，回民部长杨一木，青救会主任白成铭，妇联主任白凌云，工会主席肖彩峰，定边县委书记由原定边

中心县委书记惠庆祺担任，组织部长王聚德。特委的管辖范围是：定边、盐池、靖边三县和内蒙（主要是开展伊克昭盟和三段地工作）、宁夏地区的工作。宁夏地区的工作主要由李仰南负责，安边城是我们的友区。特委机关住着两个院子，北院和南院。南院是杨铜匠的房子，当时并未没收。

三边专署专员由王子宜担任并兼任定边县县长，一科（民政）科长康建熙，二科（财政）科长杨作风，三科（教育）科长何建元，保安处长赵苍壁，保安司令部司令白寿康。

为什么要再次成立三边特委？原因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从察哈尔侵入绥远省，又从绥远省的东部继续向西部侵入，对我方威胁很大。为了加强对三边和内蒙、宁夏地区的领导，巩固西征红军解放一年之久的定边、盐池等县苏维埃政权，把党的基础工作搞好。再加上三边当时情况十分复杂，安边城西征红军攻打数月未解放，张廷祥、张廷芝民团仍在那里为非作歹，国民党十一旅也在那驻扎。当时的定边城更为复杂，城外住着国民党四九四旅，旅长蒋云台，城内我警备二团守卫，团长周球保（即周仁杰），政委甘渭汉。我记得安边十一旅有几个营也在定边城外驻扎，旅长刘宝堂，管的两个团里有共产党打入，同时还成立党的特支。对四九四旅我们采取的方针是：既团结，又斗争，这样做有利于抗日战争。由于定边工作任务重困难大，敌我错综复杂，三边特委再次建立因而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我去定边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领导好三边工作；二是搞好少数民族工作。说具体一点就是把蒙、回、汉工作搞好，加强蒙、回、汉团结，共同抗日。过去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高岗负责，我到定边，他回延安，少数民族工作统归三边特委领导。其次还要搞统战工作。

伊克昭盟当时管七个区：准格尔旗，达拉特旗，扎萨克旗，郡王旗，东胜县，鄂托克旗和乌审旗。这七个区就有七个“王爷”统治，每个王爷都掌管一定的武装力量。我记得有三个区我们建立了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通过开展工作，有的王爷思想倾向我们，有的王爷却很反动。

1938年4月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成立蒙古工作委员会（后为绥蒙工作委员会），我离开特委调到蒙古工作委员会担任书记兼绥蒙游击司令部政委。三边特委改为三边分委，书记由刘英勇代理。

开始我们在靖边县的张家畔办公，和我一同去张家畔的还有赵通儒、白成铭、白凌云。杨一木去宁夏开展工作。后因在这里领导伊克昭盟和绥远河套的工作不便，中央决定要我们深入到伊克昭盟内部开展工作。同年5月，蒙古工委带领一个骑兵团由张家畔出发，经过定边、盐池、三段地、鄂托克旗等地进入到伊盟的桃力民一带。同年11月中央调我任绥远省委书记，我和于占彪、白成铭、白凌云、韩是今、杨建林等同志一起去了大青山，伊盟工委书记由赵通儒担任。

三边特委建立的同时就成立三边抗敌救援会。主任由搞青年工作的白成铭担任，还有搞妇女工作的白凌云，搞工会工作的肖彩峰等同志参加成立的这个机构。“抗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各方面的力量，一致抗日。“抗会”这个机构在尚未建立政权机构的地区，既施行“抗会”的权力又施行政府机关的权力。

定边县是个盛产“三宝”（咸盐、皮毛、甜甘草）的好地方。这些土特产，有的要销售到宁夏、内蒙等地，特别是大烟当时在定边流行不少，有少数干部，由于思想不健康，和一些商贩挂勾，从中捞油水，有的甚至在稽查过程中，私拿受贿，玷污了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称号。为了纯洁党的组织，把干部队伍整顿好，防止我们的干部沾染上这种坏作风，1938年上半年，定边开展过反腐化、反贪污的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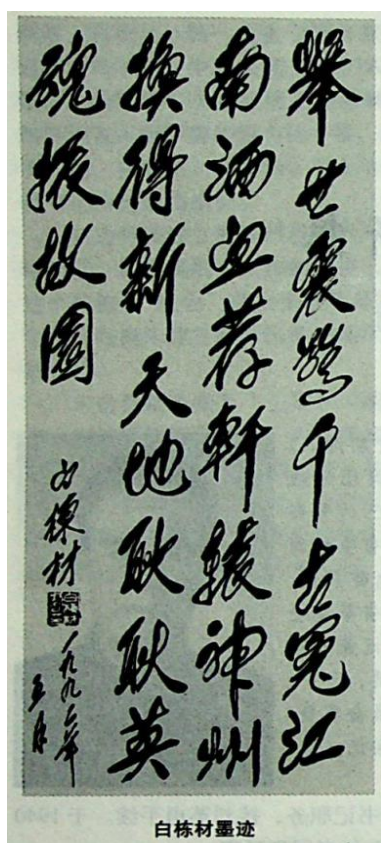
往事断想

白栋材

白栋材（1916—）清刺县袁家沟人。1935 年入党。曾任陕北区苏维埃主席团巡视员，陕甘宁边区党务委员会副书记，三边分委书记，延安中央党校五部主任，吉林省委组织部部长，图门市委书记，江西南昌地委书记，江西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省长，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是中共十届候补中央委员，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本文是作者 1985 年 6 月 21 日的回忆。

我是 1939 年 4 月到定边担任三边分委书记职务，接刘英勇手续。于 1940 年冬将分委书记手续交给自治民接任。1941 年春回到延安。



在我任职期间分委、行署的组织领导是：分委秘书长白友三、组织部长惠庆祺（9 月后是苏子章），宣传部长王春华，统战部长王月明，副部长朱静波，妇女主任李玉娥，工会主席姓刘，行署专员强晓初，专署秘书长李志恒，一科长高向贤，二科长杨作风，三科长王振寰，四科长冯景旺，保安司令朱子休。

分委管辖范围是盐池县、定边县，约 9 万人，盐池两万，定边 7 万多。分委机关住在杨铜匠的院子里。

三边工作了一年多时间，至今在我脑海里经常浮现的有这么几件事：

一是 1939 年秋天分委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会址在定边。详细情况我记不清了。

二是 1939 年夏季动员民工和警备二团干部战士参加修建城防工事，如挖防空洞、修炮楼等。为什么要修筑工事呢？因为当时定边的情况比较复杂，城外有国民党四九四旅驻，旅长蒋云台。还驻国民党十一旅的几个营，旅长刘宝堂。城内驻的是我们地、县机关，保安司令部，县保安大队。警备二团，团长周球保（周仁杰），政委甘渭汉。此时正值抗战时期，敌人飞机有时也来定边上空，所以从有备无患的角度出发，修筑定边城防工事，主要是修了几个炮楼，炮楼的炮眼直接对着城外国民党部队。再就是把靠城墙的沙挖掉。因为陕北风沙很大，经常刮风，把沙子吹到城墙根，基本和城墙一样平，牛车都可以从城墙上赶进来。

三是 1939 年宁夏工委当时工作也开展的不错，和我直接联系的李映南经常来定边汇报工作。当时很秘密，只有我一个知道。那时《三边报》办的还很不错，经常可以看到报纸。

四是：为了支援抗战，我们还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我记得组织干部都捞盐、挖甘草、纺毛线。分委机关在彭滩办农场，种粮食、种蔬菜，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解决机关干部的生活困难问题。农场我去过几次，有时骑马，有时步行。当时农场种菜用称杆吊水浇地。

还有一件事记得最深刻，就是中央党校在定边。记得 1936 年 7、8 月间我随中央党校来到定边城，党校地址就在南城墙内（现定边中学校址）校长董必武，教务主任成仿吾，教育处长张子良。我当时在教员班担任四班班主任。我们经常听董老和成老师的讲课，然后再给学生讲，一面学一面讲。定边籍学员我对赵峰还多少有点印象。其它学员中印象较深的是冯德厚（又叫冯志明）。中央党校在 1936 年 10 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在定边和红四方面军的党校合并，在此期间党校还抽教师、学员下乡筹粮，支援抗战。我也搞过这项工作。“双十二”事变后党校就搬走了。为了庆祝西安“双十二”事变的胜利，定边还开过庆祝大会。在大会上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又叫罗迈），红二十九军政委甘渭汉讲了话。之后，中央党校搬出定边去延安办学。我记得 1937 年阴历腊月三十除夕之夜，我们到了离

延安 20 里左右的乔儿沟住宿。大年的晚上，天气十分寒冷，加之连续行程的疲劳，晚上吃了顿捂米饭，盖着白天穿的衣服，枕着砖头。艰苦的生活环境，对革命同志没有吓倒，仍然信心百倍，大家为抗战的全面胜利，为祖国的解放，为新中国的成立奋斗着，生活着。

我在三边分区的两年工作

王世泰

王世泰（1910—）陕西洛川人。陕甘边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1926年入党，曾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警备三旅政委兼三边军分区政委，中共三边地委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军长、第二兵团政委。建国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铁道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副主任，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政协甘肃省第二至第四届委员会主席，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本文选自《王世泰回忆录》，题目是编者所加。



驻守三边

1942年12月到次年1月，警备第三旅正式开赴三边接受防务。从1943年1月到1944年12月，我在三边工作了整两年。这两年的工作可以说搞得比较好，曾受到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表彰奖励。毛主席亲笔题

词，给我们获奖的 22 位领导干部颁发奖状。获此殊荣，是对全分区党政军民同心协力、艰苦奋斗所取得各项成绩的充分肯定。

我初到三边时，地委书记是高峰，专员是罗成德。按照党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一律“执行一员化领导制度，划分军队防区”的指示，西北局和联防司令部任命我担任三边地委书记兼分区司令员，高峰任地委副书记，地委组织部长王春华，统战部长孙殿才，宣传部长贾怀济。由于贺晋年在延安党校学习，司令部的全盘工作由我负责，参谋长张文舟负责部队训练，副政委吕振球和政治部主任陈仁麒抓整风学习和政治教育，副旅长兼警备七团团团长黄罗斌管生产。

三边分区辖定边、盐池、靖边、吴旗 4 县，人口约 15.5 万，北与绥远伊克昭盟接壤，西与宁夏为邻，相对而言，是陕甘宁边区比较富的一个分区，其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是食盐、皮毛、药材。当时盛传着这样的说法：“三边有三宝，食盐、皮毛、甜甘草”。食盐历来是朝廷的专卖品，本小利大。这里盛产的以甘草为主的上百种药材，不仅在国内知名度很高，而且远销南洋各地。所以，这里的商业贸易兴隆，市场繁荣。东经太原和内蒙直达北京、天津；南往关中、西安到上海、广州口岸；西经平凉、庆阳到兰州、青海、新疆；北经吴忠、银川到包头。三边从事商贸的资本家有 100 多户，其中大商家就有几十户。由于边区对工商资本家采取保护政策，所以，这里的商业贸易搞得非常活跃，多年形成的客户关系比较稳定，远道大宗买卖都是明码电报交易。市场的需求和贸易的繁荣，大大推动了采集业、养殖业、加工业和运输业的发展，不少人从事这方面的产业，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三边的农业生产比其他分区的条件也相对好一些。靖边、盐池一带普遍推广水漫地，认为是提高农业产置的有效途径。水漫地的灌溉方法是时任靖边县委书记惠中权提出的。他重视靖边生态发展，大力提倡种树种草并取得一定成效。他的政绩受到边区政府的奖励，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后调任边区建设厅副厅长兼毛主席的特殊“秘书”，直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调查研究。当地农民按照水漫地的灌溉方法，充分利用夏、秋雨季，把洪水及其裹挟下来的牛羊粪和有机物聚到川洼地中，经过自然发酵，成了很好的肥料，同时解决了干旱的问题。当地农民就有“伏里漫

过盖（指膝盖），不怕来年晒”，“秋里漫一水，不当饿死鬼”的说法。可见，水漫地在当时对农业生产所起的重要作用。所以，这里群众的生活相对比较富裕。加之三边所属县都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解放的，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这就为我们搞好边区的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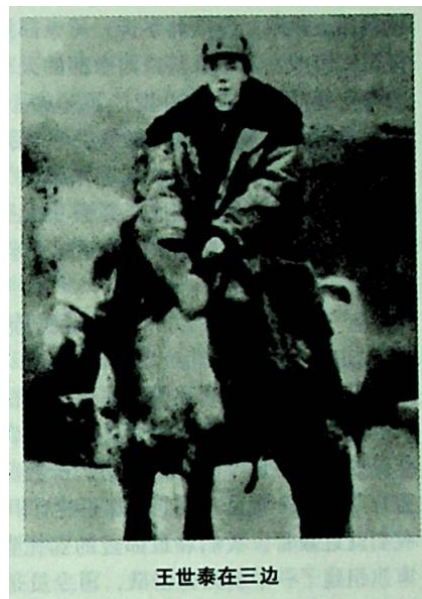
当然，也有不利的一面。三边北部沿长城一线，国民党部署了第二十二军第八十六师、骑兵六师、新十一旅；在伊克昭盟的扎萨克旗、乌审旗至鄂托克旗一线部署了东北挺进军新骑五师。西边马鸿逵、马鸿宾的第十一军暂编第九师、第三十一师、第一八六师和骑兵第一、第二旅就驻扎在灵武、金积、韦州一线，从北到西用六个整编师、三个整编旅构成了两道紧密相连、互为策应的封锁线。而当时我驻守三边的警备三旅，只有3个团，总兵力只有3694人。在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尤其是1943年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严峻形势下，我们面对的压力相当大，防务也异常艰巨。但是，我们终于战胜了各种困难，不仅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而且，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就。特别是生产、训练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搞得扎实而富有成效。

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是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根据地的十大政策之一。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寇惨无人道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发生极大的困难，粮食、油盐、被服、经费都很缺乏，如果不解决这个困难，抗日战争就无法坚持。他们企图把共产党、八路军困死、饿死。在这严重关头，怎么办？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1943年1月，党中央、毛主席向全边区党政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根据党中央、毛主席部署，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向所属各部队下达了大生产的各项指标。

为此，警备第三旅八团开赴甘泉县的清泉沟屯田垦荒。警备七团两个营开赴三边天池子，组织挖甘草专业队。

在大生产运动中，各级干部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为战士做出了榜样。各团也涌现出了一批先进模范人物。七团第七连一班班长张治国，33天挖甘草1580斤，创造的价值可供三人一年的全部费用，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荣获毛泽东、朱德等6位领导亲笔题词的奖状。



练兵运动热火朝天

开展练兵运动，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自1943年起，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9月5日，毛泽东电示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在冬季五个月中实施全军普遍的彻底的军事训练，准备迎接大规模战争。”并强调“把此事看作一个严重任务”。10月，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主席提出要进行战备动员，要求边区部队“今年冬季来他一个很好的训练，达到一个当两个的目的”。“其方法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训练的目的在于，既要加强当前的对敌斗争，又要准备将来部队再发展的骨干力量。

联防军司令部根据上述指示精神，在9、10月间，先后召开了部队团以上参谋长会议和边区高级军事干部会议，讨论了冬季训练的指导思想 and 训练方法，确定了“以兵为主，人人皆兵，个个都练，士兵的教育又应以技术为主”的训练方针。按照联司的有关指示和决定，警三旅广大指战员连续两年掀起训练热潮。1943年冬天，司令部与政治部举行射击比赛。我代表政治部打靶，10发打了100环。司令部的人不干了，说我是军分区司令，又让我代表司令部打靶，结果10发打了90环。那个年代，官兵亲如兄弟，情同手足，相互之间那种和谐、融洽的气氛至今令人难忘。

经过两个冬季的严格训练，部队广大官兵的技术与战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旅轻武器射击完成全部练习的占95.8%，命中率达73.5%；手榴弹平均投掷41.31米；全副武装能超越百米障碍的占77.49%。

开展民族统战工作

在大力加强生产建设和军事训练的同时，我们还十分注重加强军政、军民和各方面的协同配合，尤其是深入切实地加强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三旅的防地及其周围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北面的蒙古族伊克昭盟，下辖7个旗县，我们在那里建有伊克昭盟工委，由赵通儒担任工委书记，我们就近兼管，我们和最邻近的鄂托克旗、乌审旗关系处的相当不错，在乌审旗组建了一个骑兵游击队，司令员是王越诚，1949年参加过开国大典。伊盟工委负责民族统战工作的干部曹动之，在这个地区也曾组建过一个汉族游击队，以后发展到一个营，曹动之任营长。三边还设有一个西北局办的民族学校，我兼校长，为民族地区的解放和建设培养了一批干部，天宝就曾是这个学校的学员。

抗战胜利后，新编十一旅率先起义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序列，成为国民党军队起义的火车头，与我们在这一时期所做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整风运动

我到三边时，整风运动的学习阶段已告结束，进入了审干阶段。1942年底，康生发动了一个所谓的“抢救运动”，制造了一个“张克勤案件”，并以张的假口供把甘肃、陕西、河南、四川地下党的同志打成了“红旗党”特务。1943年4月，康生亲自圈定名单，指令保卫机关一夜之间在延安抓了200名所谓的特务、叛徒、反革命。这一错误行动很快波及到各分区，三边分区也不例外。在审查中，把怀疑对象，主要放在从敌占区和国统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身上，认为这些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人都有政治问题，组织了一个学习班，有100多人，都打成“特务”，“反革命”。连我的秘书徐宗望和他的妻子蔡瑜都被列入学习班的名单。我把徐宗望叫来当面询问他为什么乱承认自己是特务？徐说：“没办法，车轮战，白天黑夜审。其中有一个问题说不清楚，我和同学们来边区时是乘火车来的。审问的人

认为能坐火车来的就是特务。”边区土生土长的个别干部没见过火车，想当然的认为坐火车的一定要有国民党的关系，就是特务。为了弄清情况，我又找了几个人谈话，结果发现都是冤假错案。其中有个娃娃，原来是刘志丹夫人同桂荣的勤务兵，后来上延安中学、延大，毕业后派到定边一个区当文书。连这个小鬼也被定成了特务。我对他的成长和历史了如指掌。我问他是不是特务？他说：“没错！”还重复编造的口供。最后我说：“是真的我明天就枪毙你。”他哭了，说“没有的事，是逼的没办法才编出来的。”这样搞的结果，最后连负责学习班的人都成了特务。警三旅参谋长张文舟，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我非常了解。联防军政治部突然来电报，说张文舟有问题，要调到延安去审查。吕振球拿电报来找我，我说：“不能去，去了就回不来了。”因为张涛的教训，我坚决不同意张文舟去延安，给吕振球出主意说：“就说正在进行紧张的军事训练，人离不开。如有材料，请转我们审查处理。”在这之前，旅政治部把教导大队一个队长关起来审查，我发现后很生气，立即找吕振球、陈仁麒谈话，严肃批评了他们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随便关人的错误作法，并明确指出下不为例，否则要负政治责任。

针对整风审干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党中央、毛主席及时进行了纠正。为此，我们根据中央的精神制定了一条：凡从国统区来的党员和学生、青年，有的人历史暂时查不清楚的，一律保留，等全国解放后再调查。在未作结论前一律以诚相待，大胆使用，充分信任，不能影响现在的使用，并对历史清楚的人进行了甄别平反。这样一来，抢救运动中遗留的问题才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保护了一大批干部。

1944 年底，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决定调我到关中分区担任司令员。手续移交后，我即前去报到，离开了三边。

我在三边工作时的一些情况

强晓初



强晓初（1918—）陕西安定（今子长）人。1934年入团，1936年入党。曾任安定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神府特区政府副主席，陕甘宁边区甘泉县县长，三边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中共中央党校五部副主任，延安大学行政学院院长，热河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建国后任中共松江省委第二书记、省政府主席，黑龙江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候补书记兼秘书长，第七机械工业部

副部长，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副省长，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是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本文是作者1984年3月22日为中共定边县委党史办公室所写的回忆。

1938年晚秋，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决定我任三边分区专员，并任分委常委。临行时西北局组织部崔田夫、唐洪澄给我谈话，将西北局给三边分委的介绍信交给我；边区政府代主席、建设厅厅长高自立（主席林伯渠中央派去西安和武汉工作）也给我谈了话，说为了先了解情况，可暂以视察员身份和朱开铨（当时边区政府巡视团主任）一起了解一段情况后，再正式接任行政专员工作。我表示听从组织安排，随即去三边分区所在地定边。大约用两个来月时间，对分区级和县的干部和工作情况有了个初步了解，于年关前后，接到边区政府正式任命，由我接替了前任专员王子宜的工作。

我在三边工作的三年中，地区人事变动比较多。分委书记先是刘英勇，不到一年西北局将刘调走后派白栋材接任，又不到一年西北局派白治民接替了白栋材的书记工作；分委组织部长，先是惠庆祺，惠调后由苏子章接任；分委宣传部长是王春华；妇女主任（妇委）先是李玉娥，后是邵清华。当时分委还代管中共宁夏工委，负责人先是李仰南，后是杨一木。

专员公署秘书是李志恒，后设秘书长是张子卿；承审员先是艾杰三，后是陈思恭；一科长是高凤岐，二科长是杨作凤，三科长是王振寰，四科长是杨xx，后是范学圣；保安处长是赵文献；税务局长先是梁爱民后为高秀山；银行行长是任楚轩、任远志；盐务处长先是陈康白，后为张永励。

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先是朱子休，后为郭炳坤，政治部主任吴士方，参谋长齐渭川。

八路军驻防三边部队先是警备二团，团长周球保（即周仁杰），政委甘渭汉。该团调陇东后，由警备一团接防，团长贺晋年，政委曹家庆。

当时，定边城郊还驻有国民党军队，先是四九四旅，旅长蒋云台（少将），后调防甘肃，由邓宝珊所属一个旅的一部分接防，旅长刘宝堂（少将），驻定边一个营的营长是曹又参，营副李友竹（李树林）。这两个部队都是杂牌军，虽一般表示与我方友好，但军纪败坏，违法乱纪、劫道、诈骗和闹事情况时有发生，给地方增添了许多麻烦，矛盾斗争延续始终。

三边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边防地区，西邻马鸿逵统治的宁夏，北接绥远（内蒙）少数民族区。边境发生纠纷，既要保卫边防，又不能给以迎头痛击，特别对蒙族要体现中央提出的“七擒七纵”的政策。三边地区盛产食盐、皮毛和中药甘草，号称三宝，税收居边区第一位，是陕甘宁边区财政来源的重点地区。在我工作的三年中，粮食自给稍微有余；以羊为重点的牧业和挖甘草等副业发展很快，加上大小盐池食盐的开发增产，所以经济比较繁荣，吸引外商来往不绝，皮毛行、甘草行、盐商和各种货栈、店铺相当活跃。与之同时，走私、贩卖毒品（鸦片）和偷漏税违法行为也十分严重。尽管我政府公安、税务部门进行稽查惩处，但有的奸商请驻定边国民党军队保镖，常常引起同所谓“友军”的纠纷，使专署不少精力用

在交涉处理这些问题上。好在城内多数商家还比较守法，突出表现靠近我政府的有两个老阔，一个叫阎殿臣，一个叫杨荫生；也有很反动的，经常受到我政府的惩罚，对一度拖抗政府税收的两个大老阔聚义杨的代理人陈寿天和元升西的周旭初，我们曾依法采取过拘留措施。以上情况说明三边当时的形势是很复杂的，斗争是相当尖锐的。

我在三边，工作做的不多，如前所述，除在地委领导和各级干部努力下对粮食、牧副业和盐业有所发展并在财政上对边区政府有较大贡献外，还从上到下建立了代销合作社，虽由于资金不足，很难与当时活跃的资本主义商业匹敌，但对农村还是起到了方便购销的一定作用。此外，还举办了一个规模很小的三边中学，记得任命的校长叫芦勤良，虽然学生不多，设备简陋，但这是个开创，为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还办了一个民教馆，馆长是孙方山；办了一个地方剧团，团长由孙方山兼任。这不但在当时起了一些宣传和群众文娱的作用，而且有些同志后来成了党和政府的干部。

三边在执行中央统一战线政策上大方向是对的，但也曾存在或发生过一些问题：

对驻定边的国民党驻军，很多干部鉴于其军纪很坏，抓鸡摸狗，拦道抢劫，群众不得安宁，所以有将他们挤走的思想。好容易 1939 年蒋云台旅调走了，但又来了刘宝堂旅接防，军纪一样败坏。尽管我们按照中央政策对其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策略，其上层对我方关系（其中有少数我党的秘密党员）还不错，但一些反共分子的捣乱也时有发生。最严重的是 1939 年秋末（具体时间记不准），发生了对方夜间偷袭我保安司令部所属骑兵营而引起武装冲突事件，由于我方有所戒备，在对方打响后，立即给以迎头痛击，很快缴了对方一个连的武器。第二天凌晨，在对方军官喊话说明误会时停战，并开始对话谈判。我们随时将事件情况报中央。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这一事件十分关注。毛主席高瞻远瞩，内部批评我们不应对同我保持友好的邓宝珊先生的部下有过激的行动；并指示我们马上将缴械人枪一律退还对方，并由双方上层筹划组织言归和好的联欢大会。遵此，三边党政军领导同志统一执行了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退还俘虏和所缴枪械后，经双方商定召开了联欢大会，八路军延安留守处派贺晋年代表和专员（我），

驻军负责人（甘渭汉）等都作了以团结抗战和解除这场误会为主要内容的讲话；对方刘宝堂旅长也亲自到会讲了话，他除表示道歉外，支持我方关于团结、友好、共同对敌的精神。从此这场武装摩擦就顺利地解决了。

我在三边工作的三年间，同宁夏接壤的西部边防基本平安，有时发现对方越境情况，经公函交涉，或表示警告后，也就平息下来。东部靠近安边，镇内驻有国民党“流亡”的定边县政府和国民党驻军。记得曾发生过一次对我边境扰乱，被我痛击后也就老实一些了。安边是陕甘宁边区许多县到定边交通要道，群众运盐必经之地。国民党政府便想方设法加收过境税等苛捐，人民来信来访告状者无数，为此我政府曾进行过交涉和打无数笔墨仗。这种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我离任。

比较麻烦的是北部边境。在少数国民党反共分子的唆使下，经常发生蒙古族武装扰乱，抢牛羊、抢群众钱物，甚至打死人。但我们只能执行中央“七擒七纵”政策，只许活捉不许打死，捉住后还要宣传一番，请吃请喝后再连人和武器放回。一次复一次，干部和群众很有意见，有时我们这些负责人也感到“宽大无边”，思想上有些不通，但组织上还是坚决按中央指示执行。日而久之，蒙古族士兵终究受到了感动，纠纷减少了，事实教育了我们干部和群众，深深体会到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正确。

大概是1941年5、6月间，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批准了我多次要求上中央党校学习的请求，并派罗成德同志接替了我的工作。

一项具有伟大战略

意义的事业

——关于定边产盐、运盐的回忆

罗成德



罗成德（1908—1990）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陕西延安人。1927年入党。1934年参加工农红军。抗战时期先后任中共鄜县（今富县）县委书记兼县长，三边分区专员兼城防副司令员。之后曾任热河省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国务院外贸部副部长，宁夏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邯郸市副市长等职；是中共七大、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罗成德在任三边分区专员时，领导三边人民开展大生产运动成绩显著，特别是组织盐业生产，对解决边区财政困难，作出重要的贡献。1943年1月西北局高干会上，被推为劳动英雄受到奖励，毛泽东主席给他的奖状作了“不怕困难”的题词。

从1938年起，蒋介石就密令何应钦逐步停止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企图用经济封锁的办法把我军困死。到1940年，日本侵略军推进到黄河东岸，与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他们封锁海盐内运，禁止湖盐生产，造成了不少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无盐的状况。国民党反动派置团结抗日大局于不顾，一意倒行逆施，不时制造军事摩擦。中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对陕甘宁边区的军民说：我们现在只有两种作法，一是解散回家，等大家搞到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了再来抗日，大家说行不

行呀？毛主席又说：既然大家说第一种办法不行，那就只能靠我们大家艰苦奋斗，开源节流，一面生产自给，一面抗日了。当时，陕甘宁边区只有 140 万人，又是贫困山区，搞钱搞物很不容易。党中央按照各地的经济状况，确定三边分区重点发展食盐生产，供应边区及山西、河北等抗日根据地，满足军民对食盐的需求，增加边区财政收入，以解决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兴办各项事业和军事装备所需的经费。所以，党中央给了三边人民生产食盐的任务。我从延安到三边前，中央和边区政府有些负责同志找我谈话，如八路军军委后勤部部长叶季壮同志就对我说：到三边去完成食盐生产任务，对我们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要当作一项硬任务、死任务去完成。



千方百计完成产盐任务

1. 加强领导。据说，三边解放后，中央就重视开发利用定边的食盐，1936 年后半年即成立了三边盐务局，首任局长任远志。1937 年三边专署成立后，由专署直接去组织和具体抓这项生产。1940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委派陈康白同志任局长。10 月，三边盐务局名义上属边府实归中央八路军军委。局长由军委后勤部供应部部长张永励接任。设会计处、总务处等，中央由任弼时和陈云同志分管。我是 1941 年 2 月任三边专员公署督察专员的。由于在延安动身前领导再三嘱咐，所以到职后就把主要精力用在发展运盐生产上，开始两三年内大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在盐池直接领导和参加修筑盐田、打盐和解决产盐工具、食盐运输等问题。



三五九旅四支队打盐时在长城挖下的住宿窑洞

为了进一步加强发展食盐生产的领导，1942年春，边区政府应三边盐务局的请求，准予在三边境内划出一盐业中心区，归三边专署直接领导，这样使得盐务行政与地方行政取得一致。三边专署委任了当地年高望重的刘季卿任区长。盐业中心区分署设在盐场堡，于5月25日召开成立大会，边府委员高崇山出席讲话。嗣后，各地都成立了盐务处，并由盐户民主选举成立了各池的盐务管理委员会。

2.扩大产盐基地。1941年前，归我们管的只有花马池（即老池）、滥泥池、莲花池、旱滩地几个盐湖，苟池、敖包池等湖则属国民党绥蒙管辖。1940年冬，绥蒙鄂托旗有个章司令，他遵循其主子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带领几十个骑兵，经常在盐场堡和苟池中间地带来骚扰，抢掠苟池一带盐民的财物钱粮，与我军寻衅摩擦。我三边骑兵营、警三旅等部在忍无可忍之下，终于还击，从而收复了苟池、敖包池、公布井三个盐湖。这样，从1941年起，我们的产盐基地扩大一倍多。

3.军民动员，开展生产竞赛。1940年10月，张永励同志到职后，看到定边盐池产盐的潜力很大，必须大搞，但光靠当地盐户，不能地尽其力，丰富的资源不能充分开发利用。于是，他又返回延安，向军委后勤部长叶季壮以及中央领导任弼时、陈云做了汇报后，中央先派了一批干部随同张永励到了三边，然后又派三五九旅四支队（相当一个团，支队长苏鳌，政委贺文学）开赴定边，参加开发食盐的大生产运动。三边专署为动员劳动

力，便是做了非常艰苦细致的工作，除动员三边保安司令部下属的保安大队、骑兵营、步兵两个连、驻军警三旅和地专及定边、盐池两个县的机关干部参加外，还采取了奖励群众到盐池居住打盐的政策，如凡来盐池一户奖羊一只，五户奖牛半头（折钱或羊五只），十户奖牛一头，同时还鼓励盐户雇佣长工或短工，以增加打盐的劳力。所以，当时可以说是“军民齐动员”了，每到夏季，总有三四千人参加打盐。



为了充分发挥每个劳力的作用，部队之间、干部之间、群众之间、干部军队和群众互相之间，广泛地开展了生产大竞赛，确实是你追我赶，热火朝天。打盐模范李文焕、高仲和还分别致函当时边区著名的劳动英雄吴



满有，要在不同的岗位上进行劳动竞赛。

4.扩大人工盐田，提高食盐产量。1940年以前，莲花池、敖包池、苟池和滥泥池有一部分人工盐田，老池全部是天然池田，完全靠天恩赐，产量甚少，且只能在夏季产盐，所以全部年产量不过数万驮。自海盐，湖盐被封锁后，定边食盐销售范围扩大，需要量大增。提高食盐产量有多种办法，但主要的是发展人工盐田。从1941年起到1943年，各池人工盐田成倍增加，总计有坝子2800多块（每块1至3亩不等），其中花马池和滥泥池两地就新修坝子1200多块。人工盐田比天然盐田产盐周期大大缩短，且每茬盐产量比天然盐田高，质量也好。为了把盐田内已捞起的盐尽快运上驼脊（堆盐的场地），盐务局副局长赵永付同志发明制造一种叫“土火车”的运输工具，大大加快了产盐进度。

由于产盐基地和人工盐田的扩大，产盐时间的延长，改良了一些工驮，定边的食盐产量1940年还只有数万驮，1941年就增加到48万驮，1942年增加到60万驮，创定边产盐历史最高记录。这一年就为边区收入上千万元，成为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5.艰苦奋斗。食盐生产季节性较强，多集中在6至9月。此时，半沙漠性气候的三边盐湖内，白茫茫一片，不长一棵较大的植物，太阳毒花花，整个盐湖像蒸笼一样，让下湖的人赤着脚在水里劳作，晒得没有落脚处，加之盐茬子扎得人钻心痛，实在难以忍受，没有坚强的艰苦奋斗精神的人是受不住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锻炼，也就习惯了，适应了。冬天，有时也出盐，这时候，大家就冒着刮脸的塞上西北风，赤着双脚在冰冷的湖中（盐湖水在零下二十几度还不结冰）捞盐，也是极其艰苦的，可我们的战士、干部和群众，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凭着那股艰苦奋斗的拼命精神，年年完成党中央交付的任务。

边区群众运盐忙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陕甘宁边区共辖三边、绥德、延属、关中、陇东5个分区，140多万人，加之生产落后，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山峦起伏，交通甚为不便。所以，运盐只能靠牲口驮、人背。要把几十万驮盐运往各个边区和边界口岸商埠，确实困难重重。特别是定边县人民群众，除生产食盐外，照样要完成运盐任务，还要解决各地运盐队在定边境内人的食宿问题和牲畜的草料问题。但是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为拯救中华民族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凭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拼命的精神，克服了种种困难，按时如数完成了运盐任务。

1.组织运盐队。陕甘宁边区政府按照各分区、县的情况，每年都分配不同的运盐任务，象定边这个当时只有六万多人的县，1942年的驮盐任务是两万驮。各地为完成运盐任务，从行政村直至分区，层层都组织了运盐队，每队小至几人、几十头牲口，大至几十人、几百头牲口。边区各县县长都带队到定边驮过盐，陇东专署的马锡武专员还亲自带队驮盐到过定边。定边到各分区的大路上，运盐队经常络绎不绝，到宽畅的路上，脚户们吆喝牲口声、嘻笑声、鞭子的响声，还有不同音调的山歌声，此起彼伏，热闹得很。像《陕北运盐小调》，脚户几乎都会唱。《运盐小调》里有这样几句唱词：“一道道水来，一架架山，翻山过水走三边；三边地方有三宝，大盐皮毛甜甘草。”“吆上毛驴走三边，为打日本去驮盐”，反映了边区人民抗日生产的愉快生活。有的运盐队给牲口携红挂绿，带着不同的铃铛，走在山间小道上，别有一翻风情趣味。正如当时脚户们即兴而歌的：“走头头骡子三盏盏灯，带上了串铃一哇哇声。”

2.开店种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解决运盐队人畜的吃住和草料问题，当时朱德总司令多次号召广开骡马店，他还提出了开骡店的一些具体办法。三边专署和定边县政府（当时是合署办公）于1941年在定边至延安、定边至庆阳两条驮盐路上的乔孤、孙克崾崄、新安边、板窑、羊圈山等地，开设了骡马大店9处，小店更多，各个店里经常住满脚户，他们自己生火做饭，牲口有草有料，十分方便。

夏秋季节，牲口可以放青，可冬春时节山草就不行了，牲口还要加料。为解决这个问题，三边专署和县政府根据定边的自然条件，号召农民大力种植苜蓿和豌豆。我们曾多次向农村干部和农民宣传种苜蓿、种豌豆的好处，并组织调运籽种，指导种植方法。农民由不认识到认识，后来主动多种，1942年5月一次雨后，定边就抢种苜蓿12000多亩，1943年种植更多，大约上了10万亩。除此而外，夏秋之季，政府还号召农民打贮野草。这样一来，虽然各地运盐队需要草料量大，也一直没有缺乏过。

3.修运盐公路。陇东、延安、关中几个分区到定边运盐，一次往返就得半个多月或一个多月，而且任务重，路又不好走，摔死牲口的事时有发生。加之，当时公粮任务重，一部分群众很有意见，一次，我们正在延安开征粮大会，有个带运盐队的县长，路上被雷电打死了，一个脚户就说：“雷公怎么不把毛主席打死呀！”这话西北局知道后，说是反革命，一定要追查。毛主席不让，他说群众负担太重，驮盐困难重重，对我们有意见，说句不满意的话也难怪。就在这次征粮会上，边区的征粮任务由20万担减为16万担，不久又决定修延安和庆阳两地到定边的两条运盐公路。修延安路的负责人是交通大学毕业的学生吕毅，他既是领导又是技术员，还是修路工人，那么苦那么累，从无怨言，从不后退，真是个好同志。这两条路从1941年筹划动工，到1942年就基本完工，经历了一年左右艰苦的劳动。路修好后，不仅运盐队的安全有了保证，而且加快了运盐的进度。

产盐和运盐任务的完成，保证了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比如1941年6、7两个月，定边县财政收入总计78.7万多元，其中食盐一项收就达49万余元，占总收入的60%多，而食盐运出边区转销，又有一笔收入。所以说，在全国看来，定边的盐池虽然小得默默无闻，有的地图上还找不到它，可对边区财政收入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做了应有的贡献。

塞上风云

一戍守三边纪事

贺晋年

贺晋年（1910—2003）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陕西安定（今子长）人，是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1928年入党，曾任陕北红一支队政委、红二十七军第一团团长、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师长、红二十七军军长、八路军警备一团团长、警备第三旅旅长兼三边警备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合江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八军军长、第十五兵团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装甲兵副司令员；是中共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本文分别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少将风云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鄂尔多斯往事》及《革命回忆史料》第3期。本书编者有删节。

驻防三边

1941年，我任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警备第3旅旅长兼三边警备区司令员。三边分区下辖定边、靖边、盐池、吴旗4个县，西邻宁夏，北接内蒙古伊克昭盟，是延安的北大门。地势居高临下，是战略要地，又是陕甘宁边区的经济中心和生产基地。分区内有着丰富的食盐资源，是边区的经济命脉。定边和盐池一带还盛产甘草，名扬海内外，素有“天下甘草数定盐”之称。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虽然国共两党第二次实现了合作，国民党政府也被迫承认了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他们很清楚，陕甘宁边区是其继续推行反共政策的最大障碍，故视边区为心腹大患。在整个抗战时期，他们对边区始终采取军事上包围，政治上打击，经济上封锁的政策，企图以此来消弱、扼杀边区，并伺机发动武装进攻，妄图消灭边区。

1941年10月，驻在绥远伊克昭盟境内的国民党新编第26师何文鼎部，突然南下向我三边分区进逼，侵占了我边区一部分地盘，挑起了摩擦战斗。如果三边失守，后果不堪设想。我即紧急电报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情况。

毛主席在接到我的紧急报告后，勃然大怒，拍案而起，马上召见我和王震（任359旅旅长）同志，亲自向我下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由王震任司令员，我任副司令员，组建一个野战兵团立即开赴三边前线。



王震在定边前线指挥战斗

野战兵团由第359旅第717团和四支队、留守兵团的警一团、保安司令部的保二团和骑兵团等部队组成，大约有6000余人。

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对我们说：盐池是边区的命脉，三边是延安的门户，绝不能让何文鼎占到丝毫便宜，要记住，你们此行绝不是做做样子，何来必打！

各部队接到命令后，以急行军速度奔赴前线。11月6日，在靖边的张家畔，召开了参战部队动员大会，王震司令员作了战斗动员。随即进行了战斗布署，一部兵力还前进到人烟稀少的内蒙四十里铺、黑头梁及安边、白泥井一线，准备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

当时，在安边地区还驻有国民党地方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的第11旅。我方对邓宝珊的统战工作做得较好，邓做出了第11旅保持中立的承诺，这是我军抗击何文鼎部入侵的一个很有利条件。

何文鼎得知我军已有充分的防范准备，就未敢继续向我边境推进。1942年1月14日，何文鼎部悄悄地龟缩回绥远原防地。事实证明，毛泽东所采取的措施是极其英明、极其果断的。

1943年春，我率领警备三旅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的号召，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在以前小规模生产的基础上，和边区党政军民一道，开展了以开荒种粮为主的大生产运动。除一部分兵力担负边境守备任务外，主力全部投入大生产运动。第八团赴甘泉县的清泉沟屯田垦荒，其余各团根据驻地条件，就近开辟生产基地。

为了配合大生产运动，旅政治部文艺宣传队还排演了秧歌剧《兄妹开荒》，首次登台演出即在部队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激发了干部战士艰苦奋斗、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的革命热情，连我那时也会哼几句歌词呢。

旅部警卫班有个战士名叫薛再清，加入我军才半个多月，年仅17岁。为了多开荒地，超过他人，有天晚上等全班同志熟睡后，悄悄穿上衣服溜出门扛着镢头跑到地里，趁着月光开荒。指导员查铺发现他的铺盖叠得很整齐，而人却不在时，还以为他开小差跑了，便备马追寻。后来在地里找到大汗淋漓的薛再清时，他已经完成了一天的开荒任务。

第七团七连一班班长张治国，33天挖甘草1580斤，创造的价值可供三人一年的全部费用，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荣获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亲笔题词的奖状。

第八团第二连战士郝树财，日开荒4亩3分，创边区个人日开荒最高纪录，被评为边区甲等劳动英雄，以“气死牛”之雅号，称誉边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自给他奖励一把镢头和其他纪念品。

通过大生产运动，使部队得到很大锻炼，改正了部队的思想作风，改善了官兵关系，增强了全体指战员的体质，提高了战斗力，为支持长期抗战，准备对日大反攻，积蓄了物质力量。

1941年5月18日，中共西北局作出《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食盐是边区的主要出口产品之一，运销食盐是增加边区外汇收入，发展边区经济的重要措施之一。《决定》指出运销食盐是党与边区人民迫切的中心任务。

边区政府还成立了食盐督运委员会，委任我等五人为督导运销食盐的各路司令。经过努力，当年运销食盐约 30 万驮（每驮 150 市斤）。1942 年完成 33 万驮，1943 年完成 38 万驮。

在大生产运动中，我被评为边区生产工作模范，毛泽东亲笔为我写了“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奖状。

“伊盟事变”后接待沙王



沙克都尔札布与其长子鄂其尔呼雅克图

1943 年 3 月 26 日，内蒙古伊克昭盟札萨克旗保安队和人民群众因不满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举行了武装起义。起义的群众包围了设在札旗新街的“伊盟保安长官公署”、“绥远蒙旗党务特派员办事处”、“绥境蒙政会”等国民党统治伊盟的机关，扣押了国民党的党政人员，杀死了一批长期欺压人民的国民党特务。以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札布（沙王）为首的部分上层王公喇嘛，也同情和赞助了起义。国民党当局对起义采取了“军事为主，政治为辅”的方针，动用武装镇压起义队伍。3 月 31 日，在蒋介石的指令下，陈长捷（任“伊盟守备军总司令”）、何文鼎（任“伊盟守备军第 26 师师长”）以“伊盟守备军”骑七师和 26 师的两个团开到札旗，包围了新街，向王府开火。札旗保安队在新街一带进行抵抗，挡住了国民党军队的攻势。这时，新街的蒙古族人民都动员起来，一面支援保安队，一面向西转移。沙克都尔札布等上层人士，也在部分保安队的护卫下离开王府逃亡。

国民党镇压起义军的部队遇到了起义军民的奋勇抵抗，攻不下王府，竟于 4 月 1 日向王府进行炮轰。镇压部队只是在大炮的掩护下，才以优势兵力侵占了王府。

我党中央十分关注“伊盟事变”，坚决反对国民党对蒙古族进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反对国民党对札、乌两旗的起义军民进行残酷的军事镇压。“伊盟事变”爆发后不久，在伊盟坚持地下斗争的党组织，即与起义军民取得联系，直接帮助了他们的反抗斗争。4月15日，乌审旗军民举行起义支援沙王，乌审旗工委立即将此情况报告三边地委，并派工委副书记曹布诚去迎接沙王，以设法保护他的安全。4月17日，三边地委及时研究了事态发展后，即以我和地委书记王世泰的名义向中共中央西北局作了报告，汇报了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分析了事件的起因、发展经过，并预计到沙王“不久即到我三边防区”，陈长捷会借此机会加紧“封锁边区北线”，建议“我方在军事上应十分慎重。在情况未弄清之前，绝不轻举妄动，要防止借此机会报复……卷入旋涡，陷于政治上不利地位。”为防备国民党反动派借此事向我发动突然袭击，5月7日，我又向贾拓夫并贺龙、高岗反映“三边地区宽阔，警三旅张家畔兵力不够分配，建议将我甘泉生产之八团，除留一个连进行播种，其余全部调来此地，加强防务及准备战斗。”5月13日，朱德总司令致电傅作义，揭露了陈长捷等借“伊盟事变”乘机进攻边区的阴谋。5月中，沙王及其部属在颠沛流离40余天后，终于到达了乌审旗红柳河以南地区保罗和硕庙。得到三边蒙汉骑兵大队大队长曹动之的报告后，即发报延安请示前去会见沙王。经批准后，我骑马离开定边。同行有赵通儒、曹动之、惠志高、高波（原名高如化），还有医生刘安国。在城川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到达西乌审。

初见沙王，给我们的印象是，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不甘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欺压，对于离乡背井，心情十分苦闷。他中等身材，面庞消瘦，虽年近七旬，在路上又受了许多磨难，但毕竟执政40多年，所以仍保持着王爷的尊严，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这是我第一次和蒙族上层人物打交道，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直到现在，时隔50多年，我仍能脱口说出“沙克都尔札布”这绕口的名字。

宾主落座后，相互攀谈起来。沙王不会说汉语，但一般汉语还能听懂。赵通儒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过去和沙王打过交道，和沙王比较熟悉。曹动之的家就在掌高图，他懂蒙语，给我们作翻译。沙王

向我们讲述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蒙古族人民在政治上欺压、经济上掠夺、军事上威逼的情况。陈长捷以解决军粮为名，大量开垦牧场，侵占蒙民生活基地，甚至连伊金霍洛旗成吉思汗陵寝地和沙王祖坟用地也不放过，使蒙古族各阶层都感到生存的严重威胁。沙王还用凄凉的语气，诉说了他冒风雪离王府外逃的情景。这几十天来，打打走走，始终处于一种不安定状态中。他们多数日子是野外露宿，连王爷老太太也一样睡在沙梁上，有时仅能用一口供两个人用的小锅，煮一点茶，吃一点炒米以充饥腹。堂堂一盟之主，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令人悲愤至极。我好言抚慰了一番，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劝他安下心来，好好恢复一下身体，休整一下队伍，我们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我察看了沙王的队伍，大约有百余人，多数是骑兵。装备还可以，有些武器甚至比我们还要好一些，受过一定的军事训练，有些战斗骨干，但是经过长期奔波，显得很疲倦，马也掉了膘，有不少家眷随行，这种情况，如果国民党大军南下进逼，他们是抵挡不住的。经与沙王商量，又请他们南移至靖边县长城区掌高图居住。到达掌高图后，我与沙王的儿子鄂其尔呼雅克图一起将其部属安置好，查看了地形，部署了警戒。沙王的保安队随后陆续到达约 800 余人，指定驻扎在西乌审旗边境什拉乌苏一带。这么多人马，粮草需要量很大。我抽调警三旅供给部财政科长惠志高、九团粮秣股长李尚清和白树清等组成了专门为沙王及其部属服务的供给处，负责筹措粮草。蒙族人喜吃炒米，靖边县动员群众制作炒米，保证供应。还从三旅抽调 600 套夏衣送给他们。东西虽然不多，但在当时对我们来说，确实是倾囊中所有了。我还特别交待旅供给部长王国端、政委杨林等负责接待的同志要注意工作方式，一切大小事宜都要取得沙王父子的同意后再进行。要尊重他们，他们的行动我们不要加以干涉。我在掌高图大约住了一二十天，经常去看沙王，向他介绍我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讲国内外形势。我还坦诚地讲述了自己对“伊盟事变”的看法，说明我党坚决反对国民党对札、乌两旗的起义军民进行残酷的军事镇压。我党从坚持团结、坚持抗日的大局出发，主张“伊盟事变”和平解决。但这种和平解决必须在当时条件下有利于抗战，有利于起义军民。事实上由于起义军民在兵力上远不及国民党的追击部队，继续硬拼下去必将遭到更大的损失，

而使日伪坐收渔利。当前要积极开展政治斗争，将陈长捷、何文鼎“灭蒙反共”的反动行径通电全国，申明拥护国民政府及抗战到底！同时，要求废除苛捐杂税，尊重蒙民习俗和撤换陈长捷、何文鼎。沙王对我的上述看法，基本上持赞同态度，再三表示他相信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是蒙古人最可靠的朋友，是始终帮助蒙古人的，感谢我们对他的关心和照顾。

为了进一步联络感情，我和赵通儒与鄂祺尔呼雅克图结拜为兄弟。我送给沙王五支驳克枪和一些绸缎、布匹。送给其他蒙族上层人士每人一身衣料和一些日用品。送给沙王保安队 40 支步枪及部分弹药。沙王回赠给我一匹枣红马，马不大，但跑起路来很稳，是匹好走马。沙王父子还请我们吃了“全羊”，这是蒙古族人民款待朋友的最尊贵的礼节了。

60 年代初，我因公去呼和浩特，还见过沙王的大儿子鄂其尔呼雅克图。回首往事，真是感慨万分。伊盟事变已经过去多年，沙王也早已作古，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是不会磨灭的。通过伊盟事变人们可以充分看到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政策和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的民族政策的鲜明对比，并从中得到深刻的教育。

邓宝珊部十一旅起义

十一旅的前身是冯玉祥旧部苏雨生在蒋冯阎大战期间趁机拉起来的几个旅之一。当时，谢子长、刘志丹等到宁夏的平罗、瓷窑堡一带活动，在苏雨生的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1930 年谢、刘向陕北特委要干部，当时，刘澜涛担任陕北特委秘书长，便介绍绥德第四师范、榆林第六中学及地方上几十名党员和进步青年到我党在该部办的学兵队学习。这些人毕业后有一部分就留在原部队中，更加强了我党的影响。十一旅便是九旅发展演变来的。

抗战胜利后，我党对三边地区的工作方针变化为：巩固发展我党和十一旅的统战关系，保存力量，促进该旅进步势力，待机发动起义，统一三边。

1945年抗战胜利后，胡宗南积极反共，为了加紧准备内战，命令邓宝珊将代旅长曹又参调到榆林，企图以武力整编十一旅，并预定史舫城担任整编后的师长。因曹又参不接受这种安排，邓宝珊便不准他回部队。这样，一、二两团形成武装对峙，剑拔弩张，随时可能发生变故。10月15日，副旅长吴棻命令二团副团长张鼎丞率领卫士10余人进驻安边“万发店”，对一团官兵宣扬整编的所谓“好处”，同时用封官许愿的卑鄙手段来瓦解一团。地下党组织经过研究，认为情势紧迫，如不及时起义，一团革命力量难以保全，十一旅的进步势力也会遭到摧残。因此，决定派冯世光、王子庄到定边警三旅部来找我汇报情况，并请求援助起义。

不几天，冯世光又于10月23日到定边向我汇报，说由地下党员赵武臣处长得知，二团已决定于10月28日以长途野营的名义进驻安边整掉一团。针对这一紧急情况，经请示中央军委同意，决定十一旅提前于25日起义。我对冯世光说，届时将派我旅的参谋长张文舟率领先头部队去安边，大部队随后就到，支援起义。

十一旅旅部及驻安边一团的起义工作，虽然处在急迫的情势之下，由于有长期的工作基础，组织领导又比较周密，进行是很顺利的。10月24日晚，牛化东、冯世光、李树林、王子庄、赵武臣、高昆山等同志，以及从我们这里派去的葛申同志，共同开会研究，由牛化东担任起义总指挥，并命令驻防白泥井的一团二营营长柴明堂要听从调动，同时将该营朱子春（地下党员）领导的第六连调进安边执行任务。

10月25日拂晓，起义军开始行动。首先，围攻旅部，扣押了副旅长吴棻、参谋长石佩玖，以及国民党安边县党部书记长、公安局长等人。同时，冯世光立即带人来到“万发店”，击毙了叛徒张鼎丞。

此时，城内的起义军已经占领伪县政府和国民党县党部，并控制了全城的制高点；张文舟带进去的四个连，分别到四座城门口和起义军共同把守，城内秩序井然，秋毫无犯。

10月27日，在安边城内召开了起义部队和警三旅的会师大会。十一旅的参谋主任王子庄代表该旅宣布武装起义，并作了攻打柠条梁二团的誓师动员，警三旅参谋长张文舟宣读了欢迎起义声明。

至此，红旗插上了安边城。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解放了定边、靖边县城后，曾攻打过安边和柠条梁，因为该处城墙坚固，暗堡工事密布，没有拿下来，现在安边的新十一旅一团起义了，只剩下二团在柠条梁，打下柠条梁，三边就一片红了。

张文舟出发前，我们曾商定，必须攻下柠条梁，把顽固、反动的二团消灭掉，十一旅起义的全部成果才能保住；否则，还可能引起其他的变化。由于柠条梁城外地形开阔，四周多沙漠，不易接近，所以该地易守不易攻。我们进安边后，宜从速用兵，采取偷袭手段攻打柠条梁。不料此着没有成功，偷袭被敌人发觉，张文舟即拍电报给我，打与不打让我决定。我马上从定边赶到安边。

我到安边后，决定把警三旅八团的6个连从吴旗调来，部署在柠条梁南面；七团两个连（有两个连留在安边）攻打柠条梁的西门；九团和十一旅一团的1个营从北面进攻，并决心以八团分成3个梯队从南面主攻，爆破手用炸药实施爆破，把城墙炸开后，突击队即用梯子登城，进城后向东发展。柠条梁只有两个城门（西门和东门），东门方向我没有部署部队，因为在那个方向上，有我们的一个骑兵大队，东南是陕甘宁边区，敌人若弃城而去，只能从西北逃向榆林，我们的骑兵大队就正好在半路上消灭他们。开始，军委答应给我们两门三七战防炮，准备用骡子驮载运来，后未运到。敌人的团指挥所设在柠条梁西北城角的炮楼上，打起来要费点事。

10月底的陕北，已进入隆冬天气了。我们三面进攻柠条梁的部队都住在帐篷里，周围都是沙漠，西北风一刮，飞沙走石，到处昏天暗地，黑夜更是伸手不见五指。指战员们亲自动手，割来荒草，铺在帐篷里面的沙土地上，累了就躺在上面休息休息，饿了就吃点干粮。

旅指挥所设在八团的西侧和七团的南侧之间。从10月27日开始，到11月3日对柠条梁实施进攻，前后共准备了一个星期。我曾亲自带人到城

墙根去摸地形。城上的敌人发现了我们的动静，有时一梭子机枪子弹扫过来，有时扔下手榴弹，我们就隐蔽好，等他爆炸了再往前察看。摸清了地形情况，我思考着拿下柠条梁的各种因素。一方面，过去我们的装备比现在差，攻坚战难以奏效，就是现在装备比过去好多了，敌人也还是居高临下，很难接近；另一方面，十一旅已经起义的人当中，虽然绝大多数跟我们党和人民是一条心的，但是也有少数军官对国民党抱有幻想，想升官发财，对人民军队的严格纪律生活不习惯，对我们不发薪金，还要自己搞大生产运动，也很不理解。这些不稳定的因素，时刻影响着起义部队。柠条梁不攻克，反动的二团不消灭，地方恶霸地主的基础也不会动摇。这样一来，不仅一团和旅部不能巩固，还会引起其他的变化。这是促使我们下决心非打柠条梁不可的主要原因。

我翻来复去地想着这些问题，一个作战方案便在头脑中逐渐形成：离城 50 米，围着柠条梁城挖一条堑壕，把地里挖上来的土，都朝城墙那面堆上去，给敌造成视觉屏障，另外从斜方向挖许多条交通壕与这条主堑壕相联。这样，我们的火力组织、人员运动和转移，就不受开阔地形的限制了。指战员们白天吃饭、睡觉。晚上在前面放个哨兵，后面的人就排开来，每人分一段，两三个晚上，这个野外筑城就完工了。

为了在总攻前更多地给敌人施加压力，从部署到旅指挥所面前（主要对准柠条梁的西南角）的迫击炮阵地抽调了两门炮，在柠条梁西门外的一座破庙的墙壁上，掏了个洞，把炮架在这里，迫击炮手在大练兵运动中，学会了红军时期赵章成同志创造的迫击炮直射法，几发炮弹就把西门轰开了一个大缺口。

没想到我们使用的这几招，在总攻前收到了镇住敌人的效果。战后我从俘虏那里得知（其中有个营长叫米吉三，过去我们也认识），当敌人看见我们把堑壕挖成后，离城这么近，他们站在城墙上都傻了眼，精神防线被我们击溃了一半。米吉三还对我说，因为过去他们了解警三旅没有战防炮，当西门炮楼被摧开一个大洞后，敌人便产生了一个错觉，认为我们没有平射炮的消息不确切，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总之，经过一周的战前准备，万事俱备，只待下达总攻命令了。

不过这期间也曾发生过两件事，完全可能动摇我们的进攻决心。其一，邓宝珊得知十一旅起义，慌忙把曹又参从榆林放回来，让他处置这件事。曹又参回到白泥井一团二营驻地，因不了解起义全部情况，便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我把部队撤回定边，柠条梁的问题不用武力，让他去和平解决。当时我没有时间去跟他讲道理，我考虑的那个因素几句话也说不清楚，所以把他的来信压下，没有回他的信。其二，没料到进攻的前夜，中央军委从延安给我们拍来一份电报，大意是红军在 1936 年时打过柠条梁，该地利守不利攻，估计我们打不开，不若巩固安边以待时机。这是中央军委的意见，我们该怎么办？前面已经说过了，打不下柠条梁，安边是很难巩固的。我们分析中央军委电报的精神，也不是完全不让我们打，只是担心我们打不下来。我军的作战传统有一条就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一定的可行条件下，一个指挥员应该有果断的决心，问题在于我们的把握究竟有多大？

这个电报正好在下达总攻命令前收到，已是深夜了。我把张文舟请来，马上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再检查了战前的准备工作：野外筑城，改变了不利于我的地形；在火力配备上，虽然没有攻城直射火力，这两天用八二迫击炮组织对城内敌人的密集射击，也产生了一定效果，总攻时，集中几十门掷弹筒，再组织好特等射手和机枪火力，完全可以把敌人压住；大练兵中，战士们都掌握了一套白刃格斗的硬功夫……这一切，都坚定了我们的决心。经过讨论，第二天拂晓发动总攻不变。

下半夜了，我跟八团团长郭宝珊通了电话（八团政委是高维嵩），我说，“你们的把握怎么样？伤亡可能要大一点，要忍得住……”电话里传来郭宝珊坚定的声音：“请旅长放心，没问题！”“那好，拂晓前准备好！”

4 点差 5 分，我又一次跟郭宝珊通了电话。他向我报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问：“上不去怎么办？我把中央的电报都压下了”，郭宝珊一字一字咬着牙说：“打不进去，我拿头来见你！”

4 点整，一声震天动地的爆破声从柠条梁南边城墙处传来。这时影影绰绰只见这里那里闪动着火光，从望远镜里看不清整个战斗进展的情况，只听见响彻天空的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看见西北风扬起的沙尘搅和着弥漫的硝烟，到处是一片混浊。

我的眼睛一直紧盯着手表。15 分钟后，电话铃响了，攻打西门的七团副团长马有才首先带人打进去了。但是那里不是主攻方向，我只放了两个连，没有后劲，突破口很难巩固住。电话向我报告：西门的敌人正在组织反扑，副团长马有才从敌人手中夺过大刀同战士们一齐砍杀敌人。我说，一定要他们顶住。南城的情况怎么样？八团的同志向我报告：因为是外部爆破，所以爆破效果不理想，云梯已搭上城墙，我们的掷弹筒和机枪把敌人的火力压住了！我心里沉了一下，炸不塌墙也是意料中的事，只要把敌人震慑住，能搭上云梯就行。不过，这样就会增加登城的伤亡……正当我寻思时，电话铃又响了：进攻南城第一梯队已经登城！我对着话筒大声说了一句：命令第二梯队赶快跟上！随即拿起望远镜向八团发起进攻的塹壕走去。

这时天已经放亮了。从望远镜里，模模糊糊能看见城墙上厮杀的情况。我们的战士用刺刀，敌人则用大刀，这场白刃战是十分残酷的，而且持续的时间也长。八团的第一梯队杀进去了，第二梯队、第三梯队也跟着杀进去了。登城后主要靠的是白刃战。战后，八团的同志向我反映，有个战士在肉搏中，头上被敌人砍了 11 刀，因为他头上戴着一顶我们部队在大生产运动中自制的毡帽，挨了这么多刀，却只伤及皮肉，未触及骨头，所以他能坚持拼倒好几个敌人，最后才支持不住晕倒在地，柠条梁就是靠这样的英雄战士打进去的！

八团进城后，战斗按照预定方案向东城发展，我和张文舟在城外沿着墙根往东走。进了城，通过望远镜，我发现西北角和北城的敌人还在抵抗，便一直朝敌人的团部走去。我们尚未到达敌人团部，在攻进城内的七、八团和攻打北城的九团及新十一旅起义军的夹击下，负隅顽抗的敌人被粉碎了。

我和张文舟在占领后的敌人团部里，给中央军委拟写了一份电报：已攻克柠条梁。同时我写了一封回信给曹又参旅长送去。听说他看到信时，说了一句：“他真的打进去了！”原来曹又参是不相信我们能攻克柠条梁，才想“和平”解决的。

戎马倥偬忆定边

张文舟



张文舟（1912—1986）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山西沁阳人。1932年入党，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察绥抗日同盟军第二师排长，红二十六军连长，陕北省委军事部参谋长，延川县委军事部长，红二十九军司令部作战科长、军参谋长，八路军留守兵团参谋处处长，警备三旅参谋长、副旅长，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参谋长，第二兵团参谋长。参加了延安保卫战及宜川、扶眉、兰州等战役。建国后任装甲兵学院第一副院长，装甲兵副司令员。

本文是作者1982年6月19日的回忆，赵存惠记录整理。

我曾前后三次去过定边：第一次是1936年冬至1938年；第二次是1943年至1946年；第三次是1947年6月。总共在定边生活长达7年，在我一生戎马生涯中占有重要的一页。

1936年，红军东征回师后，又于5月开始西征。西征是为了扩大根据地，实行西北大联合。大西北的杂牌军队比较多，哥老会等各种组织也多，因此，抗日的因素也比较多。“双十二”事变后，就形成了三位一体（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联合抗战的局面。定边和盐池解放后，先由红二十八军驻防。他们休整了一段时间后，就经羊圈山向西挺进，准备参加二、四方面军会师。冬天，我随红二十九军到定边接二十八军防务。二十九军军长谢嵩、政委甘渭汉，我当时是作战科科长。二十九军共辖二五五、二五六、二五七三个团，一千多人，无师、旅建制。1937年，我又任二十九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是刘随春，副主任张海堂。同年，红二十九军改编

为八路军一二九师特务营，以后又改编为警备二团，后并入三八五旅，为四团。

姬鹏飞（当时是一军团卫生部长）、赵尔陆、丁玲都去过定边。

我 1936 年到定边时，东西很便宜。一角钱买 36 个鸡蛋，部队缺吃的，用一点大烟土可换一副猪肝，双方都很高兴。请客五、六人一餐，花不了一元钱。

1936 年胡宗南的部队曾一度进到雷记沟一带，后又退到山城堡。

我记得赵通儒在 1936 年至 1937 年是中央少数民族委员会秘书长。

1943 年 1 月，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成立。这一年，我二次又到三边，任警备三旅参谋长。警三旅旅长是贺晋年，政委王世泰，副旅长吴岱峰、政治部主任陈仁麒，还有一个副政委叫吕振球（后牺牲了）。警三旅共辖七、八、九三个团。七团是 1942 年从米脂来的，是警一团改的；过一段时间，八团也来到了定边；九团是由边区保安部二、四团合并编成的。七团驻防盐池，团长刘殿英，政委左爱；八团驻防定边，团长郭宝珊，政委高维嵩；九团驻防张家畔，团长郭炳坤，政委周化彪。那时还有个骑兵团，驻三段地、东胜等地，团长是曹动之。

警三旅驻防定边时无大的军事行动，主要是练兵，还开展生产运动，自己打盐、挖甘草、开商店等，七团在白家寨子、八团在甘泉清泉沟、甜水堡等地种了不少地，产了不少粮。

在定边建筑纪念塔一事，可向吴岱峰、阴一刚了解，他们是具体筹建的负责人。史行设计，姚醒吾供给，请毛主席、朱总司令题了词。

1946 年兴武营战斗是八团打的，那时我已经调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工作。

关于十一旅起义问题：

十一旅有党的地下组织，贺晋年原在十一旅当过兵，认识的人多，地下党组织直接和贺取得联系。贺晋年的意思是让十一旅的党组织一直保持地下活动为好。但因张廷芝父子枪杀了十一旅旅长刘宝堂，企图吞并十一旅，进步力量要求我们支持。因此，王震带部队到三边驻堆子梁一带，八

团也移近安边驻防，使事件得到了满意的解决。十一旅共辖两个团，一团驻防安边、二团驻防柠条梁。二团团长叫史舫城，他带兵有办法，二团比较精干。1945年，史舫城想吞并一团，派他的副团长张鼎丞来到安边活动（后被一团打死），这下矛盾闹大了，非我们支持不行。我带4个连与八团进驻安边城附近，第二天开进城内，八团也到达。（一团已起义），召开军民大会，十一旅正式宣布起义。接着准备打柠条梁、消灭史舫城。柠条梁战斗，七、八、九三个团和十一旅一团都参加了。七团和十一旅一团冯世光连攻西面，八团攻南面，九团攻北面，东城放开。总攻开始后，七团用迫击炮平射，把城墙打了几个窟窿，八团全部和九团一个营，首先攻上城墙。最后，只有西北角的一个碉堡攻不下，史舫城住在里面，他杀马吃肉，表示死守。我部集中火力强攻，史舫城跑出被打死，战斗胜利结束。

柠条梁战斗时，土匪段宝珊准备来柠条梁支援史舫城二团。我们原准备埋伏打援，但他到蒙地边界扰了一下，就退回去了，没有敢来。

靖边是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于1935年解放的，1936年西征又解放了定边。毛主席说：“三边只占了两边”。十一旅在安边起义后，三边就统一了。

1947年陇东战役后，西野又回师三边，宁马骑兵闻风逃窜，我第三次又到定边。当时彭德怀是西野总司令，习仲勋为政治委员，张宗逊是副司令员，我是参谋长。彭总这次也到了定边。西野到定边的部队有：一纵队、二纵队、新四旅、教导旅，共约三万余人。

三边在经济上对边区支援很大，边区出口东西（食盐、皮毛、甘草）都产在那里。

关于安边事件与十一旅起义

黎光

我去三边工作过两段，第一段是 1940 年由边区保安司令部派去搞绥宁情报工作的，住在定边。和我一起派去的还有赵文献，他任三边分区保安科长。1942 年我回到延安。第二段是 1945 年春，仍是边区保安司令部派去，负责搞绥宁情报工作，我们这一次住在三边警备司令部，我名义是警备司令部的联络参谋，实际是情报组组长。所以，我们在工作上只和三边地委书记、警备司令部、保安科联系。日本投降后，三边保安科改为保安分处。

那时，有关情报和军事方面有这样两次重大斗争事件。

一是安边张廷芝枪杀了刘宝堂事件。十一旅是国民党的地方部队，驻在安边，1941 年前后，内部有三种势力：一种是顽固派，代表人物是史舫城等人，他们总想消灭进步力量；中间派是刘宝堂、陈国斌、曹又参等人。再一种是我们地下党，如牛化东、冯世光等人。张廷芝是地方民团，他们为了消灭进步力量，夺取十一旅的大权，阴谋搞了一次“鸿门宴”，在宴会上趁机将旅长刘宝堂打死，将所去的连营长等枪也都下了。那时，牛化东不在安边城里，便搞了两个营打了起来，是张廷芝部下一个中队长夏品山给牛化东开了一个城门，十一旅便打进城了。三边分区警备司令部为了支援十一旅地下党组织，消灭张廷芝，便派部队赶到安边，又从外边包围了安边城。这样就打了一个误会仗，张廷芝弟兄乘机跑掉了，后来张廷祥被捉住，在给刘宝堂开追悼会上打死了。十一旅给榆林报告的是张廷祥病死了，不然被送解到榆林还是放了。此后，陈国斌任了十一旅旅长。



担任公安部秦城监狱长时的黎光

二是安边十一旅起义。贺晋年到三边任警三旅旅长时，陕甘宁边区党委交给他一个重要任务即是做十一旅的起义工作。我那时来往于十一旅上层军官和贺晋年同志之间，做联络工作。国民党为了瓦解十一旅内的进步势力，1945年想将十一旅调离安边，当时的顽固派二团团团长史舫城（驻柠条梁）积极活动调防。贺晋年同志曾给十一旅内我们的人讲过三点：1.不离开榆林邓宝珊的领导；2.不能离开党的直接领导；3.不离开安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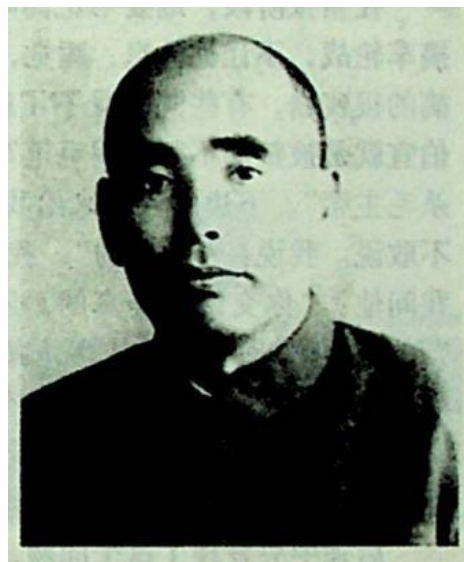
所以十一旅地下党派冯世光等人到定边同贺晋年商量，贺晋年又请示边区党委和中央军委，指示举行起义。这时，中间派一团团长曹又参苦于无法，进步力量不离开安边，但这是违抗军令，怎么办？只好到榆林去和邓宝珊商量。因为邓宝珊和曹又参曾给我们说过，他们是第三条路线，国共两党胜负很难说。所以，我们趁曹又参不在，就举行起义了。首先由冯世光迅速收拾了二团团副张鼎丞（这是个顽固分子），这样一团的起义部队和驻定边的八路军合兵去攻打柠条梁的史舫城，结果几天未攻克。曹又参在榆林打回来电报，叫一、二团不要打了，等他回来再谈。我们没理，赶曹又参回安边时，我们已把史舫城打死了，全旅起义了。曹又参回来说：你们共产党还要不要我曹又参了？我们说要呀，但有三点，一是发通电起义，二是还当十一旅旅长，三是什么，不记了。所以，他仍然当了新的十一旅旅长。

十一旅起义对全国很有影响，那时国民党大部队起义的第一个是华北的高树勋，第二个就是安边十一旅。

关于三边整风运动的回忆

孙润华

孙润华(1907—)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山东平原人。1931年参加红军，1935年入党，参加过宁都暴动和长征。抗战及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曾两次来定边，工作战斗了7个年头，历任陕甘宁边区靖边县县长，三边专署一科科长，定边县县长，中共乌审旗工委书记，靖边县委书记，三边地委组织部部长，三边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等职。建国后曾任宁夏省军区、甘肃省军区副政委，甘肃省监委副书记、书记，平凉专署副专员，甘肃省储备局局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本文是作者1985年5月29日回忆，李志旺、陈定贵记录整理。

1942年党中央为了提高全党马列主义水平，加强党的领导和团结，在全党普遍进行了马列主义思想教育，开展了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学习文件，武装思想，提高认识；第二阶段是检查错误，坦白交待问题；第三阶段是甄别错误。

三边整风运动是1943年7月间开始的，地委办了整风训练班，我被调去负责搞整风工作。当时成立了领导机构整风办，主任是我，支部书记郭子清（清涧人），还有一个工作人员叫沈儒强，搞收发工作。训练班的地址就设在毛纺厂的隔壁院子里。

在学习文件阶段，开始只有几十人。主要学习中央发的“二十二”个文件，后来增加到有二、三百人。三边当时管辖定边、盐池、靖边、吴旗

四个县。凡是来三边的知识分子都参加了整风训练班。学习进行了不长时间，康生搞了个小册子，主要是搞“抢救”运动，抢救“失足者”，大小问题自己做交待。在这个“小册子”的影响下，运动发生了直转变化。首先在警备三旅礼堂开了个大会，会上有几人做了假交待，打开局面。接着训练班全面开始，每人都必须交待，大都交待自己是叛徒、特务，不是CC就是复兴分子，

不交待的人是极少数的。

在紧张阶段，地委书记高峰亲自坐阵指挥，吃住都在那里。后来发展成搞车轮战，不让你休息、睡觉，逼迫你必须承认自己的问题，否则就不放过。搞的很残酷，有些同志受不了就胡编一套，假交待。我记得定边完小校长王伯宜就是被整的不行，用毛笔写了几个大字，交待说“马鸿逵派我到延安去杀毛主席”。下边的人拿来给我汇报，我问他“供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不敢说。我说：“是假的”，我让他把王叫来一块来我房间问一问。王来后，我问他：“你交待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违心地说：“是真的”。我说：“是假的。你回去好好休息，真的就交待，假的不可交待”。王伯宜是从马鸿逵那儿跑出来，到三边的，因有文化，后当了完小校长。

总之在第二阶段中，没有起好作用，伤害了很多同志。我当时也很怀疑，难道都是坏人不成了？但屈于当时的形势，我也不敢讲自己的想法。

后来中央发现了这个问题，及时进行了纠正。毛主席提出了“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制止了事态的发展，纠正了冤假错案，许多同志得到了解放。对于那些一时记不清楚或估计有问题的二十几人继续留下，搬到三边公学，由郭子清负责搞了一段时间，最后也得到甄别。此时，我已调到定边县任县长去了。

我所知道的三边保安部队

和三边整风

牛生祥

牛生祥（1928.3—）陕西省定边县黄湾乡牛峁子村人。1941年6月参加革命。1945年2月入党。历任定边警卫班长、区小队指导员、地委交通长、热河肖热风地区军邮办事处主任、军事助理、汽车队长等职；建国后，一直在湖南工作，历任省商业厅副厅长、厅长、财政厅厅长兼建设银行行长、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兼财政厅厅长、审计厅厅长等职，是中共十二大代表。1992年10月离休。本文是作者1985年6月的回忆。



1941年6月我在三边专署保安科警卫队当战士，住在专署前院。警卫队队长姓许，指导员姓何，是红四方面军来的老同志。警卫队隶属三边保安科领导，保安科长赵文献，10月份邓国忠任副科长，干部有：陈伟光、阎建华、雷迅波。是年12月保安科和警卫队分开，成立了警察队，有30多人，分三个班，主要任务是维护社会治安，查店、查户口、查走私，搞治安保卫工作。与此同时，定边成立了市政府，市公安局。市长韩月相，书记白加采。公安局长由邓国忠兼任。警卫队的主要任务就是看守监狱，保护地、县领导人的安全。

1942年邓国忠调往盐池工作，保安科由陈伟光接任。

1943年保安科改为保安处，马万里任处长，赵文献任副处长，阎建华搞侦察、审讯，雷迅波任秘书，同时我也调到保安处工作。

1945年下半年成立了三边分区保安团，马万里任团长，下辖三个营，定边保安营营长杜亚夫，警卫大队也被编入保安团。我当时还在警卫班，队长姓白，指导员姓惠，设有骑兵班，骑兵班长叫李智，副班长叫白生华。

三边整风运动开始我记得是在1942年底，开始时学习了些文件，还不紧张，不久就开始抓人，首先抓了交际处的一个干部，送到延安，说是特务。到1943年4、5月又抓了《三边报》主编王文歧，6、7月整风运动就逐渐深入了，抓的人也较多，我印象较深的是抓了个国民党邮政局局长，由地委书记高峰和保安科长赵文献亲自审讯。专署副秘书长仇可嶷也被抓起。邓国忠来定边开会带了个警卫班长，结果也给抓起，说有问题，关了几个月，后来才放了。8月运动进入高潮阶段，成立整风学习班，把机关很多人都关起来了，还有区、乡干部，约几百人。为了搞好整风运动，我们警卫班的任务除搞警卫领导安全外，主要为整风服务，如给整风会站岗，提审有问题干部，逮捕人等。警卫班直接受保安处领导。

7、8月搞抢救运动，开始时在警三旅礼堂召开大会，有很多人首先上会做了坦白交待，接着是人人过关，坦白交待问题，很多人都做了假交待，大会坦白，小会批斗。10月份运动转到了社会上，高峰进行了动员，还抓了一些商人，逼供讯搞得很厉害，搞车轮战，白天晚上不让睡觉，捆绑、带脚镣、手铐、非常残酷。后来毛主席发现了这个问题，及时做了指导，指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才制止了这种现象的继续发展。11月从整风班抽出了七、八个人，有周仁山，朱XX，胡XX等搞甄别写材料，大部分人都释放，只留下几十人，弄到三师。1944年春，我和赵文献带了两大包材料送到延安保安处，这次运动，错斗了很多，伤害了很多同志，特别是很多知识分子。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康生搞的小册子所造成的。

三边保安部队始末

李存全 李红先

李存全，定边姬塬人。1936年10月参加革命，历任三边游击三支队特派员、定边县保安大队副指导员、三边骑兵营政治指导员。建国后曾任包钢机关党委书记。



李红先，四川达县人，长征老战士。1937年由延安到定边工作，历任县警卫队、警三旅排长、指导员、科长等职，1946年调往陇东离开三边。建国后曾任南京军区空军后勤部顾问。妻乔月明，定边城关人，1937年参加革命。

1936年6月17日定边解放后，定边县委设立军事部，部长曾子刚；县苏维埃政府设保卫局，局长邹衍桃。10月，三边特委成立，负责地方治安保卫的机构是肃反委员会，主任韩继恩。1937年5月，三边特委改为定边中心县委后，肃反委员会改为保卫局，局长邹衍桃，管定边保安队和定边步兵连。是年10月三边特委三次成立，并建立起了三边保安司令部，定边保安队扩编为三边保安大队，同时成立了定边骑兵营。1938年秋天，抽三边保安大队的一部分人员，盐池县保安队的一部分新兵，合编了一个步兵连，为二连。此外，三边保安司令部于1937年组织了13个自卫军营（定边、盐池县每区一个营）、司令部直辖一个基干连。



保安司令部和所辖各部队的组织机构、领导人员、任务和变迁情况是：

一、保安司令部：1937年年底在定边成立，司令白寿康，下设参谋处和政治部，参谋长齐渭川，参谋黄维桓、陈思思，政治部主任李方元。与此同时，成立了阳山涧中心区保安队，队长贾生财；盐池保安大队那时也成立了，大队长贾志休。保安司令部管辖定边、盐池、阳山涧三个保安队，直接受白司令员的领导。

1938年6、7月间白寿康调离三边，司令员由朱子休接任（8、9月来）。这时参谋长是雷恩俊，政治部主任是吴士芳。司令部人员又得到了充实，记得有马翰山，他是从马鸿逵那儿跑过来的，先在司令部参谋处当文书，1939年下半年又当了参谋；王锐（清涧人）从边区党校军事班调来，任参谋，以前是军事教员，讲游击战术的，调来后主管训练、作战；政治部增加了张耀武，管宣传；姜玉轩（东北人）是宣传干事，这人很活跃，不识字，是东北军解放过来的；戚世荣是政治部青年干事；总支书记林政岐（江西人）。

1940年朱子休（镇川人）调走后由郭炳坤接任司令员。

1942年春骑兵二团和警备九团在靖边成立。12月，成立警备三旅，三边保安司令部即撤销。

二、保安大队和保安队：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定边县即成立保安队，队长（不详），指导员高浩贵。1937年10月三边特委再次成立，11月20日三边专署成立，定边保安队改为三边保安大队，大队长刘冠生（湖南人，一方面军长征红军），副大队长林波（湖北人），教导员项仕忠。辖3个班，一班长姓许，四方面军长征干部；二班长李存全；三班长戚世荣，四方面军长征干部；大队通讯员曹忠跃（吴起黄砭人）；共有四五十人。主要任务是警卫特（分、地）委和专署，看管犯人，也配合搞一些军事活动，如情报侦察等；同时开展打盐、挖甘草、种地等生产活动。1942年春，保安大队一部分开往靖边，编入警备九团。

三、骑兵营：成立于1937底到1938年初。营长师建章，教导员党永良、副营长李振海，下设三个连：一连连长张弟，指导员刘清海；二连连

长姓贺，指导员李登贤；三连连长张福群，指导员 1940 年后李存全。骑兵营的活动主要在盐池县的大水坑、倒塔一带，防备宁夏马匪东犯。在军事上，配合定边留守部队警二团防止国民党驻定边部队的摩擦。1940 年秋季在苟池附近和内蒙的章文轩部打了两仗，保卫了盐湖。在生产上主要是和四支队一起打盐，在二区黄沙窝一带种地、挖甘草等。1941 年调往靖边，与伊蒙骑兵三营合编为骑兵二团。

四、步兵一、二连：步兵一连是由自卫军基干连编建的，连长魏鼎山，指导员郭英秀；二连是 1938 年由三边保安大队的一部分、盐池县保安队的一部分新兵合编而成的，连长刘冠生，指导员李红先，副指导员李存全。这两个连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专、县和地方机关安全，钳制国民党在定边驻军的摩擦活动。平时主要是搞军事训练，同时进行生产自给。二连在二区白寨子种地，很有成绩。1942 年春开往靖边，编入九团，刘冠生任营长。

三边盐业生产回顾

张永励



张永励，八路军军委后勤部供给部部长，1941年春任陕甘宁边区三边盐务局局长，1943年任边区物资局副局长，建国后曾任国家商业部副部长。

1936年西安“双十二”事变后，国共两党逐步搞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蒋介石及其部下的顽固派，总是不断地和我们搞一些军事摩擦，

1940年起，停止给八路军发饷，于是毛主席提出是解散回家呀？还是自力更生坚持抗日呀？为拯救中国，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各项经济开支和各抗日根据地及抗日前线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费开支，我们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当时陕甘宁边区生产较少，收入最多的还是数三边的食盐。同时，国民党封锁大西北，甘肃、宁夏、陕南等地没盐吃；日本侵略者封锁海盐，山西、河北、河南一些地方也缺食盐，所以，陕甘宁边区就派陈康白同志于1940年春带人到了三边的定边县，在花马池、滥泥池、莲花池生产盐。不久，食盐生产就由中央军委去接管。1940年秋，八路军军委命令我去定边搞食盐生产，任盐务处处长，我当时是军委后勤部供给部部长。10月初我到了定边，看了定边食盐生产情况，觉得它的潜力很大，几百人来搞不能物尽其用，地尽其力，要解决我们各方面用钱的困难，必须大搞。于是，我又返回延安，向任弼时同志和军委后勤部长叶季壮做了报告，他们也同意大搞。这样军委又派了200多人随我二次到了定边。到定边那天，正是苏联十月革命节（11月7日），同时皖南事变刚发生，定边到处贴出不少这方面的标语。

1941年春，陕甘宁边区三边盐务处改为盐务局，我任局长，副局长秦武山，局下设生产处，处长杨勉；总务处，处长周康明；会计处，处长耿长明，后来还设保卫处、政治处、政法处，处长由警一团政治部主任兼。

从 1940 年冬开始，参加生产食盐的有三、四千人，包括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的一个支队（相当团），贺晋年率领的警一团的部，朱子休管的三边保安部队部分，三边地、专和定边、盐池两县的部分机关干部。当地盐民、部队就在盐湖边的长城上挖了几百个土窑居住，将花马池原来天然产盐，改为人工筑坝子产盐；改原来只是春天、夏天、秋天打盐为常年打盐。1940 年冬季，一次天下大雪，为了避免雪水把已结晶的食盐化掉，我们的战士冒着西北高原上凛冽的寒风和大雪，赤着双腿下湖，那劲头真不小啊！1941 年 1、2 月间，伊盟国民党的地方武装章文轩的部队有几十个人，在苟池一带和我们搞军事摩擦。我们和他打了一两次仗，把他赶走了。这样苟池也就成了我们的盐田。这一年，我记得生产食盐没有 100 万驮，也有几十万驮吧，毛驴驮一驮卖 20 元法币，骡子驮一驮卖 30 元法币，一年收入好几十万元！



整装待发的运盐驼队

有了盐，边区的经济活了。三边的食盐向四面八方都往出运，黄河以东，内蒙、宁夏、甘肃和陕西的关中、绥德、延安都有。运盐工作朱总司令很关心，我回延安向任弼时、叶季壮汇报工作时，朱总司令还找我给他汇报，解决运盐中的问题。所以，除组织群众运盐外，部队也搞过运盐。

有了盐，边区的经济就活了，各种事业都能办到。从白区换回来棉花、粮食、日用物资等等。那时，部队、机关经常拿军委的条子来盐务局取钱，象王震他那个部队就拿着军委的条子在盐务局领过钱。

1942年3月，我调离盐务局，由张善武同志接任。此后，盐务局也就由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接管了。

另外：一、那时国民党在定边也设有盐务处，处长任醒民，他们不搞生产，只和我们接头，买我们的盐，往白区运，当然，他们买的并不多，主要还是我们运的多。

二、我1943年从三边调回延安，任边区物资局副局长，局长是叶季壮。这年各分区设了物资分局，贾石任三边物资分局的副局长。以前只有三边贸易公司，下设有土产品公司、盐务局、光华工厂等。

三、我在三边盐务局时，打交道较多的是三边银行，行长先是任楚轩，后是任远志，三边专署专员1940年冬天前是强晓初，后是罗成德。

记老湖打盐

范自慎

本文选自陕西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革命小故事丛书——揄木炮》一书。

1944 年，国民党顽固派继续以几十万军队，包围着中国人民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

那时，我们警备三旅驻在塞北的定边县城，守护着边区北大门，抗击着西面宁夏的马匪，北面东乌审旗军何文鼎的一个旅，东面安边十一旅和榆林、横山的二十二军。我们在战斗的空隙，用一双劳动的手生产自给。我们挖出地下的甘草，铲出老湖蕴藏的食盐，换来棉花、布匹、粮食、药品、纸张，供给边区人民和党中央毛主席。

当时我在旅司令部任政治指导员，领着十多个战士，在定边城西 20 多里远的年马池（盐场堡）打盐。第一年的任务是 5000 驮（一驮约 300 斤）。我们打了 7000 驮；第二年的任务是 10000 驮，我们打了 15000 驮。现在回忆起 30 多年前的往事，仍觉得特别有趣。

—

那南北六、七里宽，东西十多里长的老湖，是一大片像玻璃一样的食盐海，闪闪发光，洁白可爱。它是沙漠上的美景，使沙漠不显得干枯；它是一块明镜，照映着日出的云霞；它是沙漠里的宝湖，哺育着当地的回汉人民，也哺育了边区群众和八路军的将士们。可是，你要是不摸它的脾性，不但打不下盐，还要使你吃苦头。记得第一次我们下湖打盐时，凭着一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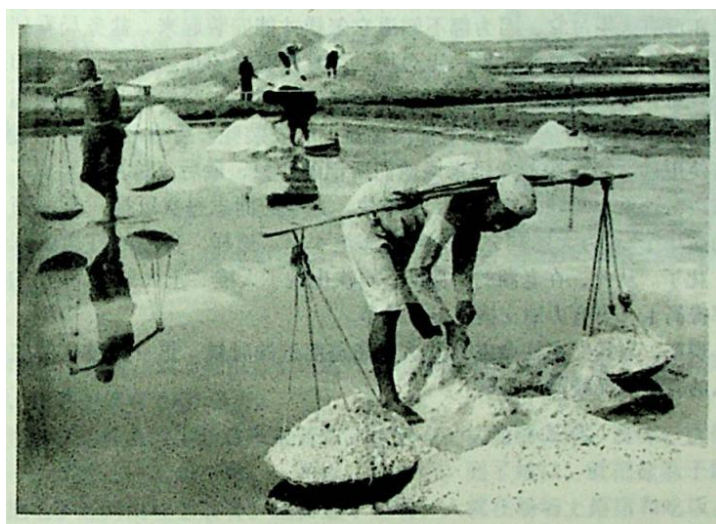
热情，有的赤着脚板，像下水摸鱼；有的挽起裤腿，像过河赶路；有的耙完一堆盐，随便把耙丢在水里；有的担完一担盐，把扁担顺手放下水去。这样就遭了许多麻烦，盐颗磨烂了脚板，盐水浸肿了腿，工具沾上了盐水干硬后像刀刃子，磨破了手，刺痛了肩，后来我们访了老盐民高仲和，向他请教，他说：“下湖打盐，穿带腰的鞋，盐颗就钻不进鞋内，盐水溅不到腿上。走动时，脚跟要抬起，不要在盐板上磨。打下的盐要担远。担盐时，工具不能沾盐水，担子不能放下肩。”我们就请他作了我们的生产指导员。他不只说了他多年打盐的办法，还教会我们担子不下肩的担盐法和倒盐法。我永远记着这位平凡的盐民，他热爱毛主席、共产党，毫不保留地帮助子弟兵掌握生产技术。他放下自己的活，给我们当现场指导。他家有妻小和年老的父亲，全靠他一人打盐过活，当我们送他几驮盐作为酬谢时，他拒绝了。他说：“八路军就是咱人民的队伍，我还能不帮助嘛。”

二

打盐的技术问题解决后，同志们的干劲更高了。从湖里担到湖岸，来回十多里，可是同志们每天迎着太阳出，送着太阳落，担子不下肩，步子不稍停，肩膀压的酸麻、发红、起疙瘩，可没有一个人叫一声苦。一个个担起担子，且歌且舞，有的唱：“宁夏川，两头尖，东靠黄河西靠山……。”有的唱：“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赶上毛驴去三边……。”这高亢嘹亮的歌声，伴随着担盐走动的舞步，像扭秧歌、耍龙灯。同志们还高兴地说：



“多担一担盐，就能多换回一斤棉花，一斤粮食。就能给革命多增加一份力量，给敌人多增加一份困难。”由于带腰鞋是烂军装作的，挡不住来回担盐飞溅的盐水，渐渐变湿渗透，夜晚脱下一看，腿已被盐水浸红发痛，睡在铺上伸不敢伸，屈不敢屈，像火烧，像针刺。再加上我们的床铺，一无铺草，二无铺板，仅是一个个沙泥堆起的土台。到夏天，跳蚤从地上、土台上跳到我们身上，吸血咬肉，扰乱的我们不能睡眠。搬到屋外去吧，那滚热的沙地，睡到上面烫的肉皮发疼，还有那暴风雨的突然袭击，大家只得住在屋内。聪明的战士们想了一个办法，把许多扁担，木桶用麻绳编起来，吊在空中，人睡在上面，既可以避免跳蚤的捣乱，还可以在空气中吊一吊，疲乏而烧痛的腿舒展舒展。战士们把这种睡觉法叫做“神仙睡觉空中悬”。有的吊得高，有的吊得低，同志们风趣地说：“这楼上楼上，只缺少电灯电话啦！”



三

每当小雨初晴，东南风一吹，湖里就长出一层颜色洁白、颗粒很大的盐来，比平常的盐层厚，挖出来就是一次丰收。塞外的气候变化无常，正如老乡们说的：“早起冷，上午晒，下午刮风惹大怪。”（惹大怪是指大风一起，飞沙走石，天昏地暗的情景）若不及时抢收，这些盐就会化成苦水，变成碯碯。为了抢收，我们就及时报告盐务局，动员周围党、政、军、

民一齐动手。这样一次就能打上亿斤的盐。真是人常说的：“三边好，有三宝：白盐、皮毛、甜甘草，白盐要算第一宝”。

四

第二年打盐开始，我们到盐务局去领工具时，在一座四间大房子里，发现里面堆放着被盐水浸过的许多木箱、木轨、枕木。我们问盐务局的同志后，才知道是三五九旅四支队在打盐中发明的人推运盐“土火车”。该部调走后，好几年没有人用过它，因为都不知道它怎样才能安装起来。盐务局看到我们只有十多个人，力量小，不一定会用，一直没有介绍过。这次同志们知道有这个玩意，大家要求试一试，取得盐务局的同意后，我们便开始了搬运。可是我们大家连火车是个啥样子都没见过，咋安装呢？后来经过研究、摸索，还请使用过它的当地老盐民来谈他们所记的印象，最后，总算安装成了。经过试运，效果非常好，装得多，运得快。力小的同志每次可推一至两箱（每箱约 300 斤）。力大的同志每次可推 3 至 4 箱。这样，我们的打盐就算“机械”化了。从此，在老湖的水面上，再次出现了人推“土火车”，我们的生产效率提高了，更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现在，当我们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飞速前进的时候，想一想过去的生活是多么的有趣而又鼓舞人心啊！

陇东运盐

杨正喜

杨正喜（1910—1995）陕西省定边县樊学乡赵塔圪村人。1935年10月参加革命，1937年10月入党。历任定边县第七、第八、第九区区委书记，定边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定边县委副书记兼县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1949年9月调往宁夏，历任中卫县委书记兼县长，宁夏省委直属机关党委书记、省人事厅副厅长，银川地委副书记，银北协作区主任、工委书记等职。“文革”中受迫害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之后任宁夏自治区党委委员、统战部部长、宁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1941年夏天，我任定边县七区区委书记兼运盐大队长。这个运盐队非常庞大，仅毛驴就有2000多头。

当时，运盐人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从定边、盐池到庆阳、西峰一次往返就得一个多月。一天走一站，一站六、七十里。到了站口，就把盐驮子卸下来，把毛驴赶到山坡上放青。还要选个场场，人就场场上露宿和吃饭。做饭时，我们先要找个离水较近的地方挖个坑，坑上面支上锅，再拣上些柴禾在下面烧，一会儿饭就熟了，大家吃着很香美。我们一道路根本不要买草买料，也不用花一分店伙钱。

我们运盐队驮运的盐，都是自己下池捞的。下池打盐有时要在水里泡几天，脚浸烂了，腿泡肿了，还要坚持着干，完不成任务不出池。在运盐途中，运盐的人每人身上都要捎着背一褡裢盐，少则三、四十斤，多则五、

六十斤。一背起身就是二十多天，有的人把脊背都压烂了，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大家都乐观。途中，有的人头发长了，就用剪刀剪；鞋破了，互相换着穿或缝补上几针穿，有时就光着脚跑……当时生活是十分艰苦的。然而，希望在前，我们的心情很愉快。“走头头那个骡子哟三呀三盏盏灯”……“赶上毛驴去驮盐”的民歌，洒满运盐道上。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自己打盐，自己运盐往往返返共走了三趟。换回来棉花、布匹和钢铁，解决了边区地方上群众穿衣和锻造小农具用钢铁的部分困难，为此受到了中共三边地委的表彰奖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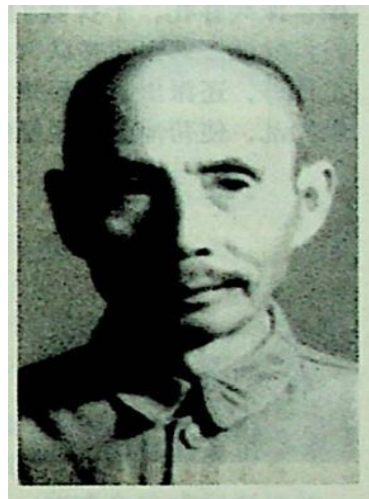


三边地区运盐队

三边税务局的成立与发展

原子美

原子美，山西稷山人。1936 年参加革命，曾在陕甘宁边区三边税务局、三边银行、定边县政府公益合商店及县政府二科工作。建国后曾任中共阿拉善左旗党委副书记。



1936 年夏，定边、盐池解放后，中华工农民主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来到这里。为了发展国民经济，增加财政收入，他派任远志在定边、盐池设立税务局，领导税收工作。定边税务局成立后，派我到盐池负责成立盐池税务局（于同年 10 月 1 日正式成立）。此后，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又在定边盐场堡、滥泥池、莲花池、羊圈山等地设立了税局；在盐池的青山和红井子设立了税卡（属盐池税务局领导）。同时定边税务局改为三边税务局，并成立了骑兵缉私队。

当时，延安派来许多同志到三边税务局工作，任远志任三边税务局局长，三边金库主任李青萍兼办会计。以后任远志调三边银行工作，由王世雄、梁爱民先后兼任局长。

税务局刚成立时，收税的项目主要是三边的土特产品，特别是盐税、皮毛税、牲畜交易税等。盐税收入最多，当时规定每只骆驼每驮盐收税 3 元，骡子和牛每驮盐 2 元，毛驴每驮盐 1 元。随后又根据事业的发展，开始征收百杂货税、烟酒税、营业税、所得税、牲畜屠宰税（只征收屠户的）等项。

当时的征收税率是低的，各种税的税率订得公平合理。对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征收税率更低，有的还免征。我们的财经虽然很紧张，

但政策规定不得横征暴敛、滥征滥罚，更不得搞苛捐杂税。所以，我们税收得到人民大众的好评，税收业务也得到不断发展，财经收入与日俱增。

在盐税收入方面，苟池盐池大，产盐多，税收旺。但因该盐池属蒙地所管辖，为了搞好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在苟池没有设立税务局，该盐池税收业务由盐场堡税局代办。为了工作方便起见，我们确定派出税收小组住在苟池东畔周家窑子办公。尽管这样，蒙地的国民党反动派还多次派军队来此寻机挑衅，制造事端。他们除在池子北畔驻扎军队外，还在池子南畔修了碉堡，派兵驻扎，干扰我们的税收工作。为了防止和避免敌人的挑衅和摩擦，我们除派干部由我带队（当时我是盐场堡税局局长）到苟池加强税收小组的工作外，还派出了骑兵缉私队到苟池进行巡逻，才有力的防止了敌人的破坏和捣乱，使苟池的盐税征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塞北毛织工厂忆述

朱霁云

朱霁云（1918—），四川黔县人，1941年至1943年冬任陕甘宁边区盐务局驻定边办事处主任，边区土产公司三边分公司经理，塞北毛织厂厂长；1944年至1945年任三边分区保安处侦察员、股长。建国后曾任吉林省公安厅厅长、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



一、塞北毛织工厂成立的原因

1940年，重庆国民政府突然宣布停发八路军的经费，并从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进一步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不言而喻，这一突然袭击，的确会造成根据地的一时困难，由于经济上的加紧封锁，边区棉花、布匹、药品及文具纸张等供应都很短缺。可是另一方面，我们边区的经济也是有基础的，也就是有办法与之作斗争的。我们党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加紧生产”，还要做到“丰衣足食”。

塞北毛织工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发展生产，保证供应”的方针成立的，也是根据三边地理条件成立的。“碱盐、皮毛、甜甘草”是三边的三宝。三边是出产皮毛的，当然还可以吸收内蒙古伊克昭盟以及宁夏的皮毛，用来发展皮毛工业，以解决边区对服装、被褥、鞋袄的需求，可以说这就是塞北毛织工厂成立的时代背景与物质条件，也就是塞北毛织工厂的任务。

二、塞北毛织工厂资金与组织领导

塞北毛织工厂在业务上是属于陕甘宁边区财政厅的，实际上是受陕甘宁边区盐务总局（设在盐场堡）领导。成立的时候财政厅厅长南汉宸给我们谈话说：“事情很简单，就是将盐税款用来买制服装的原料，即皮毛、布匹、棉花等，你们工厂将它制造成成品，即毛胎（套）、大衣、鞋、帽、袄等，运到延安来，供应党、政、军单位就是了”。

盐税款当时收入数目很大，所以工厂的资金是比较充足的，皮毛也就可以大量收购的。就是说资金、原料是充足的，这是有利的一方面；但当时没有机器，没有技术，更得不到动力，所以困难也还是很大的。

三、塞北毛织工厂的组织及规模

组织机构的确是很简单的，始终一共只有 5 名干部，开始（1942 年底）厂长朱霁云，副厂长郭进卿兼工务，会计白健民，营业采购朱霁云兼，工作人员杨贵庭，还有一保管员。后来郭进卿调离，财政厅又派杨仿人来任副厂长兼工务科的工作。再后来朱霁云调离，由杨仿人任厂长。

工厂的规模按资金计算，当时最高时期竟达五十余万元（记不准），工人达 300 余人，这个数目在当时确实很不小的！

四、塞北工厂的业务

总的任务已如上所述，具体任务分述如下：

1.造鞋，有布鞋、棉鞋（确切地说是毡鞋）两种。布鞋是将市布作邦，用牛羊皮作底，样式是大圆口，大底宽边，确实好看。毡鞋（这是当时最急需的）是用紫绒作毡制成鞋邦，用白毛毡作底，用青布沿边，轻便暖和。

不只步行轻便，骑马也可以踏蹬（不是那种大毡鞋），很适合游击战争的需要。这两种鞋产量很多，当时我到延安开会时，看到司令部的所有同志都是穿的这两种鞋。贺龙司令员、南汉宸厅长见到我都当面问：“这种鞋是你们造的？”“很解决问题”“西安、重庆也造不了啊！”这当然是表扬鼓励，但也是事实。

2.棉胎（其实应是毛套），即将羊毛经弹软后，制成衣套、裤子的形状，当作为絮冬衣的棉花。这品种数量很大，当时在缺棉花的情况下，士兵、机关工作人员在 1943 年到 1944 年很多都是采用了的。虽不如棉花轻暖，但也是解决了问题的。

3.毛帽，用绒毡加染成褐色，剪裁缝成带耳的帽子，又暖又美观，数量也很大。

4.皮大衣，原准备以造老羊皮大衣为主，并造些二毛皮、狐皮大衣供负责同志用。后因老羊皮大衣不可能每一士兵都发，所以只造了少数，造了几百件二毛皮大衣，几十件狐皮大衣运延安分发。

5.毛口袋，即将黑羊毛拈成线，用刀砍，织成毛片，再缝口袋，这种产品对于驮盐、运粮用处都很大。

从以上产品的情况来看，都是毛工业性质的，而且都是大路货（没有毛纶、地毯、长毛毯等品），所以可以说是纯粹直接保证供应的，当时是利润小、用处大，直接解决党政军的衣、帽、鞋问题，对于边区的建设即发展轻工业也是起了作用的。

五、塞北毛织工厂的经营活动方法

事情很明显，产品很复杂，人员（干部）确实很少（只 5 人），而且还要直接办理采购原料、运输等任务。所以从当时的实际出发，也多少摸索得一些办法，虽然思想不明确，但如今想来，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大致如下：

1.由定边的党、政、军集资，成立一皮毛公司，大量收购皮毛，以掌握原料。皮毛公司与塞北毛织工厂可以说是姐妹关系。由它收购原料，由塞北工厂制造，这样原料就有头绪了。

2.将羊毛拨发给毡房（私人作坊）叫交一定数量的毡，再由塞北工厂将毡加工制造成鞋、帽。这用如今的话说，就是加工订货。

3.由私家毡房自行收买羊毛，另与塞北工厂定合同，向工厂保证供应毡若干条，并由工厂加工，这其实也就是“包购包销”。

4.由工厂自行买进羊毛，招工匠来厂制毡。每张工钱若干（主要是制衣胎），这实际上是计件工资。不同于现代大厂的，主要是工具，如弹弓，捲帘子等手工工具由工人带来。当时这些工具很难大量买的，而且这些工具没有统一规格，买时很不容易识别其好坏。

5.染。当时染料困难，如用的橡子、洗毛用的皂荚等土染料也不容易买到。而伪造的洋染料如硫化青等却很多，也不容易识别。工序又较复杂，后来就干脆包给私人染坊，按件计酬。

6.至于皮大衣、布鞋等就全部由本厂完成全部工序。

正是掌握了原料，又将手工业作坊的力量，通过加工订货、包购包销的办法组织起来，产生了两个好的结果：（一）以塞北工厂为中心，几乎将定边的毡匠、毛毛匠、皮匠都组织了起来，为制棉衣、棉帽、棉鞋、皮衣工作，所以很快完成了任务。（二）在客观上发展了皮毛生产，组织了皮毛工业。虽然费钱费力是很大的，但发展了皮毛业。

由于毛制品大都统一于边区财政厅了，对地方工厂是有影响的，也直接影响了县、区办的工厂的原料。用如今的话说，是没有照顾到地方积极性。

由于当时虽将手工业中的毛皮工业大都组织起来了，但从政治上没有将手工业工人加以提高，使之走集体化的道路，当时这一工作却没有跟上去，更没有在工人中建立党的组织，教育工人，提高工人觉悟，发展党员。

所以后来因种种原因，塞北工厂合并入新塞工厂，主要搞纺毛线、织地毯等工业，那些已组织起来的毡房、毡工也就解体了。

忆三边师范与三边公学

刘若曾

刘若曾（1912—）湖北鄂城人。1938年陕北公学毕业后到延安鲁迅师范任教。1940至1947年历任陕甘宁边区第三师范、三边师范、三边公学教务主任、中学部主任、副校长、校长。建国后，曾任陕西省教育厅副厅长、厅长，华中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顾问等。本文是作者1985年1月12日为定边县委党史办公室写的回忆。

1936年冬，我在陕北公学分校尚未毕业，组织上就调我到鲁迅师范（该校当时设在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担任班主任兼教员。1939年夏，鲁迅师范和边区中学合并，定名为边区师范。同年秋，我自关中分区到延安，调任边区师范二队的队主任兼教员。

1939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确定在边区境内成立几所中学和师范学校，并确定在三边分区建立第三师范（当时的第三师范，后来的三边师范，都简称为“三师”）。根据这些决定，边区政府教育厅随即派卢勤良、文普华等同志来三边负责筹建“三师”。当时，学生来源困难。一则是三边分区所属的四个县（定边县、靖边县、吴旗县、盐池县），每县只有一所完小；每所完小学生毕业时的人数很少（一般都只有一、二十人），而且，毕业生的年龄都较大，有些家庭缺乏劳力，因此，再不愿意供孩子念书，就让其参加生产劳动。二则是不少群众的家庭观念、乡土观念浓厚，怕孩子念完书，远走高飞，离开家乡。1939年冬卢勤良、文普华等通过办冬学宣传、教育群众，进行招生工作。搞了整整一个冬天，第二年春，终于在定边北城根的一个古庙里（先在西街一个群众的大院内）办起了“三师”。1940年初春，他们向教育厅指名要我任“三师”的教导主任。我当即邀请孙桐同志（他是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全国解放后恢复了原名安其春。

现在国家经委干部局）与我同来“三师”（卢、文、孙和我，都曾同时在鲁迅师范工作）。

我和孙桐于1940年3月到达定边，5月“三师”正式开学。当时只有一个班，学生40多人。卢勤良任校长，兼带政治、历史课；我担任教导主任兼班主任，还带语文、地理课；孙桐带数学、自然常识、音乐、新文字等课。此外，还有几个职员，课程分为文化基础知识课、政治课、生产劳动三大类，而以文化基础知识课为主。学制定为三年，实际上为了抗日战争和边区建设的需要，学生可以随时被抽调出来参加工作。学生毕业或未毕业者大多参加基层的文教工作或政权工作。

革命事业总是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发展着的。这年秋天，我们“三师”成立了一个“地干班”，全称是“陕甘宁边区第三师范学校地方干部训练班”。顾名思义，“地干班”的学生主要是区、乡基层干部，任务是使他们扫除文盲或半文盲，提高文化。创办“地干班”是经过三边专署和边区政府同意批准的。陕甘宁边区在抗战的中、后期共有七所中学、师范学校。

“三师”是第一个创办“地干班”的。这就是说，从实际出发，主办“地干班”，扫除地方干部中的文盲或半文盲，并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创举。1941年秋天，我们又根据学生来源不足的情况，新开设了一个“预备班”。培养对象主要是曾经念过高小但没有毕业的学生，吸收到“预备班”学习一年，使其具备高小毕业程度，然后再转入正式师范班学习。办“预备班”也是从三边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成效显著，受到群众拥护。“预备班”只办了两期。从1942年夏到1944年夏，卢勤良因为他爱人病重送去延安治疗，后来就暂留延安，参加边区政府教育厅的整风运动。1944年秋，他重返三边时，学校已由“三师”改名“三公”。在此期间，我兼代了一年多的“三师”校长。

“三师”一直办到1944年5、6月间，延安民族学院（现在中央民族学院前身）搬迁到定边城和“三师”合并，定名为“三边公学”（简称“三公”）。“三公”分为三个部分，即：中学部（其中又分为几个班）；地干班；民族班（保留“民院”名称，下分回族班、蒙族班和其它民族班）。延安民族学院搬迁到定边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便利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

作。因为延安距少数民族地区较远，定边靠近宁夏、内蒙，同时三边分区生产食盐、皮毛、甘草，当时有所谓：“三边有三宝，咸盐、皮毛、甜甘草”。定边城为货物集散地，商业较为发达，往来人员较多，有民族工作可做。记得当时“民院”有两个政治、学习都很好的少数民族学生。一个叫天宝，藏族，是红军长征时吸收参加工作的红小鬼，解放后曾任西藏工委书记等重要职务；一个叫奎壁，蒙族，“文革”前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刘春、王铎、宗群、宋友田、王云以及张杰、海涛（女，回族）等同志，都是随“民院”从延安来的干部、教师。1945年日本投降后，原来“民院”的师生，大部分或返回延安不久即派赴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或经城川去内蒙一带工作。“三公”只剩一个回民班和少数原“民院”的干部、教师。同年冬郭子清任“三公”校长，我任副校长，王云任教务处长。1946年夏，郭子清调盐池县任县委书记，我接任校长。同年秋，马鸿逵窜扰盐池县境，形势较紧，“三公”奉命迁往吴旗县金佛坪，民族学院与“三公”分开，迁往城川。马匪旋即被我击退，三边公学又迁往安边县城内。

1947年3月，马鸿逵配合胡宗南向我三边分区大举进攻。“三公”随安边县委、县政府一同撤出安边，向吴旗转移。为了配合战争需要，三边地委决定解散三边公学。学校解散后，大部分的教职工和年龄大些的学生，有的直接参军、参战；有的转到地方参加游击队工作；有的搞战勤工作；“地干班”的学生各回原地；年龄较小而不愿回家的学生仍然留校，再加上有的带孩子的女教职工、老人、病号（不是重病号）和几个搞后勤工作的，共有二、三十名没有战斗力的老弱病残、妇孺，就由我负责带领着在三边境内打游击，实际上是游而不击。我们这支特殊的游击队每到一地，只要能停留一天以上，就向当地群众进行一些宣传工作，或者帮助群众搞些一般性的劳动。我们的行动，必须时刻和地方上保持密切地联系，比如说，宿营时，必须靠近地或县、或区、或乡的党、政领导机关，以便取得可靠的情报和信息，好确定我们的行止；出发时，由领导机关指定我们的去向，并派人给我们当向导，帮助我们找住处，搞饭吃，当然，我们自己也有七、八匹骡马，驮些布匹、麻油、食盐、纸张、文具等物，所以才能比较顺利地坚持下来。

1947年6月30日，西北野战军光复定边后，“三公”仍留在吴旗办“干训班”，由王云同志负责对马匪侵占定边、盐池时，未撤出去的干部进行收容、审查工作，我还是带着那支老弱病残、妇孺的队伍，在三边境内游而不击地活动着。

1947年11月间，边区政府教育厅调我回教育厅（当时边区政府在山西临县）我同江隆基同志（边区教育厅副厅长，战争前夕，他率领一个“土改工作团”来三边，战争开始后，他仍留三边工作），一道从吴旗出发，经过靖边、横山、子洲、绥德到佳县的木头峪渡河到了临县。我们到临县住了不多几天，边区政府又从河东迁到绥德县的义合镇。我也随着边区政府教育厅过河来。不久，我调延安大学工作。

我在三边师范的学习生活

朱瑜

朱瑜（1926.12—）陕西省定边县城关镇人。1938年1月参加定边县“七七”业余剧团。194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定边完小、定边县武工队和游击大队工作。1948年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边地委筹委会副主任。建国后曾任宁夏团省工委宣传部长、副书记，甘肃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酒泉地委副书记等职。“文革”中受迫害。后任张家川钢铁厂建设指挥部副指挥，冶金部陇西冶金设备制造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甘肃省七民央人大常委、法制工委主任。离休后任甘肃省慈善总会第一届会长、第二届顾问，中华慈善总会理事，著有《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概要》等书。



朱瑜同志非常关心家乡的党史工作，亲自撰写回忆录10余篇，本书收录其中的两篇。

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就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除在当时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延安兴办了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女子大学、民族学院外，又于1939年冬派芦勤良、文普华等同志到定边筹办陕甘宁边区第三师范学校（简称三师）。后改为三边师范。它是定边县有史以来第一所中等学校，隶属三边地委和专署领导。这所学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和人民教师。

三边师范创建于1940年春。由于学生来源困难，直到同年8月才正式开课。我是这年夏季在定边完小毕业升入三师的。记得三师招生简章提到学习的内容是：语文、数学、史地、政治等。目的是培养党的干部和人民教师。正式开课时，来自定边、盐池、靖边、吴旗、华池各县的学生不足百名，编为师范一班和师范二班。校长芦勤良，教师有刘若曾、孙桐等十余人。学生的生活按干部待遇，实行吃穿供给制，每人每年发一套单衣、一套衬衣，两年发一套棉衣，毕业后由党组织统一分配工作。

三边师范的生活比较艰苦。学校没有校舍，先是借用西街一家居民的院落，后来搬到北街的老爷庙和城隍庙内。没有桌凳，就坐几块砖头，双膝就是写字台。后来有人用一块小木板放在膝上当桌子用，上课是课桌，下课是自习桌。学习用具由学生自备。用颜料调和墨水，鸡毛杆刻个缝做水笔。用的纸又粗糙又黑，还是正面写了反面再写。当时没有钟表，各班都做一个小园木板，写上数码，中间立根铁钉，晴天放在太阳下看钉子影影对时刻，遇到阴天就无可奈何了。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学校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开展了勤工俭学活动，除坚持课余积肥、纺毛线、开荒种地外，学校还办起了粉坊、醋坊、豆腐坊，经常组织师生打柴，到花马池、苟池、滥泥池、莲花池去打盐卖钱。1942年大生产运动时，学校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生产搞得更是热火朝天，做到了经费百分之六十的自给。

三边师范的学风端正，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学以致用。例如语文课，选学毛主席、鲁迅、郭沫若等同志的文章，学后学生要联系实际写出心得体会；数学课多是运用当时当地的实际事例编练习题，进行演算；政治课主要学习社会发展简史和哲学、政治经济学基础以及时事政策，要求联系现实问题写出论文。每年夏季进行一次学期考试，年底又进行年终考试。成绩张榜公布。为了巩固学生课内所学的知识，并且扩大知识面，学校充分发挥学生会的作用（学生会正、副主席是刘山和郭永诚等人），积极开展各学科课外活动。学生按照自己的爱好和特长，选科参加。我爱好音乐，就参加课外音乐小组的活动，和我在一个活动小组的有陈杰、薛增荣、李

锦荣、郭永诚等二十多个同学。我们既学唱革命歌曲，又学乐器演奏和乐理知识，我就是那时学会了谱写曲子，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吹笛子。

三边师范除学习上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外，生活纪律也很严格。学生有违反纪律的行为，都随时登记入册。按照学校的要求，每个学习小组每周要开一次生活检讨会，简要总结一周的学习、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李锦荣同学有一次一周的数学作业未完成，生活上有散漫现象，经过小组生活会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李锦荣同学很快就改正了缺点。还有一次解得水同学对生活艰苦讲了一些怪话，发了点牢骚，小组生活会上给予批评帮助后，有了显著的进步，各方面表现都很积极。1942年春，学校响应党的号召，开展了整风运动，以反教条主义为主要内容，学习马列和毛主席有关著作，学习党中央重要文件，启发自我反省，大大地改进了学校的党风、学风和文风。

经过两年多的师范学习，使一批革命青年得到锻炼成长。1942年夏，我们三边师范第一班的学生经过考试毕业了，根据党的需要分配了工作。

三边公学简况

郭永诚

郭永诚（1925—）靖边县红墩润人。1940 年参加工作，1942 年入党。曾在三边师范、三边公学学习、工作，任教育、组织干事、党总支副书记。参加了新青团三边地委的筹建工作。建国后任宁夏干校副教育长、银川地委宣传部部长、宁夏京剧团革委会主任、宁夏自治区党校副校长、校长等职。是宁夏自治区第五届政协常委。

三边公学的前身是陕甘宁边区第三师范、三边师范。

1940 年初，在定边建立了陕甘宁边区第三师范。当时的校长是强晓初兼，副校长芦勤良，教导主任刘若曾。教员有孙桐、白玉、白燕、丁绍志、李彦、杨清轩等十余人。党总支书记文普华。学生七、八十人。到 1941 年秋季改名为陕甘宁边区三边师范。设有师范一班，师范二班，师范预备班，又增设地方干部学习班，新文字学习班等，学生共约有近二百人。教员增加到二十余人，如张源、王冰、吴淼、韩启晨、张棣根等。1942 年 7 月底，师范一班毕业，这是三师培养的第一批学生参加到革命工作岗位上了。1943 年，教师和学生全部参加了整风运动。这时的代理校长马俊杰，后是郭子清。

1944 年春，延安的民族学院搬到定边与三边师范合并，改名为三边公学。设有民族部、地方干部训练部、中学部（师范性质）。校长由三边地委书记王世泰兼，副校长卢勤良、教导主任刘春兼民族部主任，中学部主任刘若曾，地方干部训练部主任郭子清，总务处长先后宋友田、宗群、岳松等。总支书记王志强。

1945 年 7 月师范二班（即中学部的头一班）学生毕业（中途因工作需要调走一部分，毕业时只有二十余人），到秋天，民族部的学生全部到内

蒙去了。至此，三边公学的民族部即结束了。其他班因工作需要，不少学生陆续调出去工作了。当年9月间又增设教学研究班，由王云任班主任，设中文、历史、数学三个组，学生有二十余人。到1946年7月，这个班结束了。

1946年10月，因解放战争开始，马鸿逵对三边地区的干扰，三边公学由定边搬到吴旗县金佛坪。当时只有中学部的学生一百余人，地干部的学生全部出校工作了，这时三边公学的校长是刘若曾，副校长王岗，教导主任先后王志强、王云。1947年1月，三公又由金佛坪搬到安边城内。到1947年3月，因党中央撤出延安、马鸿逵侵占三边，三公又由安边县城搬出到安边南部山区、靖边、吴旗交界一带活动。这时学生和教师全部参加战勤工作。一部分由教师到军分区医院作护理工作，有的到电台作机要工作，有的到各县参加战勤工作。学校只留少数后勤工作人员和家属。到1947年8、9月间，因马鸿逵侵占盐池、定边时，一部分基层干部未撤出来，被敌抓去，有的自首。组织把这部分干部找回来后到三边公学进行审查。因此，把学校的工作人员调回来少部分进行这一工作。当时由冯浪、李新民二同志负责。大部分时间活动于靖边、吴旗交界一带。直到1948年初，又搬到吴旗金佛坪住下。这时，三边公学改名为三边干部学校。校长记不清是哪位兼任，副校长苏晓蒙、教导主任冯浪，后王伯宜、折永庆，设班次很多，有区书区长一级领导干部班、有一般干部班、有回族干部班、蒙族干部班、公安干部班、青年干部班、妇女干部班、中学班，约二百人。领导干部班班主任折永庆，回族班主任王茜，一般干部班主任张文厚、蒙族班负责人郭全德，公安班负责人刘君器（即刘德才），青年班负责人何汀轩，妇女班主任海涛、桑柯，中学班主任记不清是谁了（当时中学班学生很少，也没有正式上课学习，基本上是待分配）。到1949年8月间，三边干部学校由金佛坪搬到定边。这时主要是准备进军宁夏，把三边各县的大部分干部调到干校，学习新解放区各项政策，准备解放并接收宁夏的工作。1949年9月下旬，干校的学生陆续由定边动身到宁夏各县接收工作去了，干校校部于9月26日离开定边到宁夏去的。至此，三边公学、三边干校即告结束。

三边师范、三边公学、三边干校，均为党直接培养干部的学校。从创建三师起，这个学校所有的学生全部享受供给制待遇。中学部的学生，虽然以学习文化课为主（地干部也以学文化课为主），但在学习期间，因工作需要，随时可以调出去工作，不少学生就是在学习期，学业未完而调出去工作了，有的甚至刚入学几个月就调出去工作了。

在三边公学的学习生活片段

史继法

史继法（1931—）定边县红柳沟镇杜家沟人。1947 年入党并参军，在三边军分区工作。1949 年任宁夏军分区司令部参谋。建国后历任中共阿拉善旗委书记处书记，巴彦淖尔盟委秘书长，乌达矿务局党委书记，乌海市政府副市长、市委副书记等职。主编出版了《乌海市志》。本文选自定边县委党史办《三边风云》一书。

1946 年，我在定边完小毕业后到三边公学中学部学习。三边公学是陕甘宁边区的一所公办学校。

1936 年 6 月，西征红军解放了定边。解放前，定边只有一所高等小学，解放后于 1938 年设立了三边师范，是三边分区唯一的一所中等学校。1944 年，中央决定将延安民族学院蒙古族、回族学员及部分工作人员迁到三边，与三边师范合并，成立了三边公学。校长是卢勤良，副校长是刘春，总支书记王志强，学员共 400 多人。

民族学院后来迁往内蒙古伊盟的城川，三边公学仍留在定边。当时学校设有中学部、地方干部训练班由和回族干部班。中学部以学习文化基础知识为主，干部训练班以学习理论政策为主。无论什么班，都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以培养有坚定的政治方向、有一定文化知识、有一定政策水平的革命人才为根本目标。这所学校先后为党培养了数百名革命干部，不少同学后来都成为县、地、厅局级领导骨干和解放军团、师级指挥员。

三边公学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方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自己开荒种地办农场，自己种菜养羊、打柴、纺毛线，农忙时还下乡帮助老乡锄地、收割庄稼。1946 年我入学后，就到城西 20 里外的北梁一带打沙蒿柴，到北马坊给群众收割荞麦。学员生活是供给制，除伙食外，每年发一套单

衣，两年发一套棉衣。平时伙食是小米饭加盐水煮青菜，油水很少，每逢星期日才能吃一顿白面馍炖羊肉，算是改善生活。虽然艰苦，但学员的学习热情很高。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和平建设的愿望，于 1946 年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陕甘宁边区的形势开始紧张起来。这年的秋末，宁夏马鸿逵部不断侵犯我三边分区盐池边境，为了备战，三边公学迁到吴旗县金佛坪。

当时，定边到吴旗不通汽车，同学们自己背着毡子、被褥、书籍、餐具、小板凳，步行迁移 200 多里的路程，走了 5 天才到达。那时我才 15 岁，第一次步行这么远的路程。

金佛坪在吴旗镇南 20 里，依山傍水，土地肥沃。原先是三边最大的恶霸地主、民团团总张四疯子的庄园。他跟陕北军阀井岳秀是换贴兄弟，当过靖边、定边、保安三县民团团总。他的两个儿子张兰亭、张雨亭，一个曾是井岳秀手下的营长，一个是靖边县团总。张兰亭、张雨亭，谋人财产，夺人土地，杀人性命，霸人妻女，什么坏事都干。他的侄儿张福，更是一条牲口，连亲外甥女都拐去霸占了。三边有一首民歌《舅舅挂外甥》，就是唱这件事。张家在金佛坪有两处住处，一个是寨子，一个是村子。寨子在洛河西岸一个高山上，离村有 2 里来路，四面是断壁，只有一条路，修有坚固的寨墙，这是张家避乱之地，名叫“豹家寨”，平时不住人。村子在洛河东岸，还有一个石砌寨子，里边全是石砌窑洞，是他们的家院。在穷山僻壤之中，竟有如此气派的庄园，不知是多少代穷人用血汗砌成的。陕北红军闹革命时，张兰亭、张雨亭及他们的儿子张廷祥、张廷芝逃到安边，继续和边区人民为敌。1941 年“安边事件”中，张廷祥父子及其保安团被我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利用矛盾瓦解消灭了，张廷芝父子及其反共游击军被驱逐出安边。他们在金佛坪的土地、房屋都被分配给贫苦农民了。

三边公学迁到金佛坪后，住在八路军当年从事农业生产的营房中。简易的石板房，一大间住十几人，严寒的冬天，没有火炉子，只有两个石头小火盆，用木炭取暖，所以夜间很冷，常常冻得不能入睡。没有课桌，每人一个小板凳，一块木板放在大腿上就是课桌了。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

要，学校除了上文化政治课外，还特意请了八路军的工兵技术员讲解并实地表演造地雷、埋地雷的常识。

1947年的春天，学校又迁到了安边，这时三边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了。

春节过后不久，我安葬了祖母，便匆匆赶往三边公学。头一天从我家杜家沟到定边城，90里的路程，骑毛驴整整走了一天，黄昏时才赶到。就在这一天，敌人的飞机轰炸了定边。第二天，我同三公学校留守定边的4位同志前往安边途中，敌人的飞机又来了，这一天，敌机炸了安边，又炸了定边，战争已经爆发了。

安边，是1945年由我地下党牛化东等同志及曹又参将军率领国民党陆军新编第十一旅起义后获得解放的。这是明代建筑的长城线上的边防城堡，城池虽小，却甚坚固。1936年6月，西征红军解放了定边、盐池，却未能攻克安边。学校迁到安边后，驻在城内东南角的一座城隍庙里。

这时，学校已经无法正常上课了，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每天清晨早饭后，师生们都到城南10里外的土丘下疏散防空。几天以后，局势更紧张了，学校开始向山区转移。

那是一个晚上，校部通知准备转移，同学们都忙于清理东西，精减行装。中学部有8个安边同学，一个个回家送东西，有7个同学再也没有回来，只有王海龙同学，年龄稍大一点，家也不在城里，总算随大家一起转移了。不料第二天在转移途中，他的父亲就急急忙忙找来了，当晚住在大沙湾，王海龙也不辞而别了。安边是新解放区，要打仗了，家里老人不放心，这也完全可以理解。这几位当时没有跟学校转移出来的同学，后来大都参加了革命工作，有的还成了县级领导。

几经转移，学校到了安边东南100多里处的崔涧，暂时住了下来。这是一个山涧丘陵区，有十几户人家，在这一带算是一处较大的村庄了。这时学校除了断断续续上文化、时事政治课以外，又开始上护理课，李素本老师给我们讲抢救伤员、护理伤员的知识。

1947年3月，胡宗南侵占延安后，宁夏马鸿逵部也出兵向三边分区发动了进攻。3月24日侵占我盐池，4月3日又向定边发动进攻，我地方部

队主力警三旅八团和从盐池撤出的新十一旅一团，在定边城南暗门、彭滩一带与敌激战一天，终因寡不敌众，我军损失惨重。

由于三边部队主力在暗门、彭滩战斗中失利，马鸿逵部相继侵占了盐池、定边、安边、靖边 4 座县城及滩区。好端端的解放区，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不久，学校又转移到吴旗县山区腹地榆树坪。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山村，崇山峻岭之间只有几户人家，小河从村中穿过，流水潺潺，杏花含苞待放，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战火还没有烧到这一带，农民们正忙于春耕。学校只剩下几十人，年龄大一点的同学都陆续走上了战斗岗位，有的参了军，有的带领担架队支前，有的到地方上工作了。学习基本上停顿了，同学们帮老乡送粪、挑水，有时去山沟里打柴。自己站岗放哨，生活已半军事化了。

一天，刘万才同学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我是 1931 年 11 月 23 日出生，当时还不满 16 周岁，但从小生活在解放区，长期受党的教育，知道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当然，什么是共产主义，也说不清楚，总部认为共产党好。早在 1946 年定边上完小时，校长文普华就让我秘密地看过《中国共产党党章》，对我进行过重点培养，所以，当时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愿意”。当时，虽然形势险恶，但我对共产党一定会胜利还是深信不疑的。后来知道，1946 年寒假放假回家，家乡正在搞土改，我积极参加了本行政村的土改工作，帮助延安派来的土改工作队丈量土地，计算地亩，并动员祖父将我家多余的土地自动捐献出来，受到工作团张养吾（解放后任兰州民族学院院长）的称赞并向学校做了介绍。那时党组织还是秘密的。就在榆树坪这个小山村的窑洞里，在背包上用毛笔麻纸写了我的入党申请和个人自传。几天以后，王存同学告诉我，我已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候补党员。这一天是 1947 年 4 月 18 日。

在榆林坪入党以后，学校即分配我和几位同学参加了工作。先到杨清川瓦舍村三边后方医院当文书、保管，5 月间又调到三边分区司令部，张涛

副参谋长接见谈话后，我被分配到参谋处一科任见习参谋。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

延安民族学院迁定三事

张 杰

张杰，1943 年随中央民族学院来定边。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



张杰（右四）与总穆夫提扎巴拉长老（右三）于北也门

一、民族学院迁校定边

1943 年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党中央调整了民族学院机构。为使民族学院靠近民族地区（宁夏和伊克昭盟），决定由延安迁到了定边，并与三边师范合并，成立了三边公学，对外部保留民族学院名称。芦勤良任三边公学校长，刘春任民族学院院长兼三边地委统战部副部长。民族学院迁到定边，是为了便于招收毗邻地区的民族学员和扩大党的民族政策的影响。三边公学当时还举办了培训地方干部的训练班（简称“地干班”）。我在学校做图书管理工作，1945 年日本投降前夕，离开定边回到延安，另行接受工作任务。



1950年延安民族学院校友北京会合。左起前排：张杰、克力更、霍流；后排赛西娅、海涛、乌兰、云曙芬、云曙碧

二、领导重视民族工作

民族学院迁到定边后，三边地委书记王世泰、统战部长赵忠国（即孙殿才）经常到学校视察工作。当时三边地区有回民约二千人，他们大多数都是不堪忍受马鸿逵的压迫、剥削从宁夏逃到边区的居民和士兵。他们到边区后受到了热情接待。定边专为回民划了一块公地，修筑了“新华街”。同时，三边地委还在新华街成立了回民乡，召开了隆重的乡代表大会，选举了乡人民政府，推选民族学院的彭华庵（回族）为乡长，杨彪（回族）为副乡长，开展了很好的回民群众工作。与此同时，还在新华街建立了伊斯兰小学，入学回民儿童五十多名。

三、尊重回民宗教信仰，做好统战工作

为了尊重回民的宗教信仰，在新华街修建了清真寺，并聘请了阿訇，招收了“海里凡”。刘桂轩（回族）也到清真寺学经，当“海里凡”。

1944年初冬，闻讯两位著名阿訇马谦益和普耳马（名字记不起来了）从绥远（内蒙古）到西安和平凉途径定边时，三边地委即组成了专门接待班子。

马谦益和普耳马二位阿訇当时在绥远清真寺讲学，他们是朝见过麦加圣地的“罕智”。

接待工作是认真而著有成效的。首先，刘春与宋友田（民族学院做干部工作）找丁溪野（回族、民族学院工作人员，）与我做了具体安排，丁和我接受任务后又去找新华街清真寺阿訇杨学智接洽，强调做好接待工作的重要意义，以得到他们的密切配合。同时，我们又跟有关方面商谈妥当，对二位阿訇进出境时一律免验放行。

马谦益和普耳马乘驮轿结伴来到定边。他们到定边后被安置在最好的回民旅店，距离清真寺很近，便于到寺内礼拜。当时，正值伊斯兰教的开斋节，回民到寺内礼拜的人很多，经我们与杨阿訇商量，请客人带领开斋节的礼拜，热情而隆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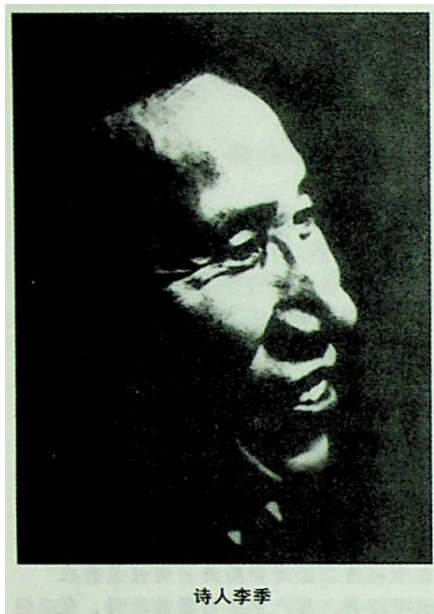
马谦益和普耳马二位阿訇亲眼看到回民乡的干部都是回民，定边回民真正享受到了行使管理本民族事务上当家做主的民族平等和民主权利，深受感动。二位阿訇还听到了当地回民不堪忍受宁夏马鸿逵的压迫、剥削而逃来边区过上好日子的诉说，用许多活生生的事例说明了边区人民充分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击破了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捏造的种种谣言。丁溪野和我还详细地介绍了我党的有关民族宗教政策。他们临出境时，说了许多感谢我们的话。事后得知，马谦益阿訇到西安后，用他的亲眼所见，亲身体会，讲了共产党的许多好话，讲了共产党所执行的民族和宗教政策的实际情况，影响很好。

忆诗人李季

张子良

张子良（1916—），河南省洛阳市洛宁县人。1932年毕业于河南澠池师范，1938年于西北青年联合救国会安吴训练班学习，后分配至八路军鄆阳后方留守处军人学校任文化教员。1940年调八路军总后勤部三边盐务局，1942年因病调吴旗县教育局，1944年分配到盐池县教育局工作。1947年，随盐池武工队与马鸿逵在盐池南部山区棉蓬洼战斗中被俘，后与十一旅二团政委高波一起被关押在兰州集中营。建国前国共进行北平谈判，共产党提出释放战俘，张子良于1949年8月被释放回三边。建国后在盐池县广播站工作。

我与李季同志相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他性格爽直豪迈，乐观练达，富于诗人的气质。提起往事，记忆犹新。



李季原名李振鹏，是河南省唐河县祁一仪镇人，1938年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任靖边小学教导主任。我俩是在定边县三边公学训练班学习时期相识的。半年多学习结业后，我被分配到盐池县石山子任教，他调到盐池县政府当秘书。我们是老乡，又都搞过教育工作，节假日闲时常在一起聊天，他还经常鼓励我写作。记得初见面时，听他的口音不像三边人，问起他的籍贯，他微笑着唱起了三边信天游：

“三边边就是我的家，共产党就是我的妈；你我不是也一样，都在革命大道上。”他对人态

度和蔼，平易近人，勤奋好学，不耻下问。他的生活艰苦朴素，常穿不吊面子的老羊皮袄，走到那里跟当地老百姓一个样，工作很吃苦，白天办公

处理公文，夜晚坚持搞创作。那时条件差，生活艰苦，写作时面前点一个小麻油灯，脚下放一个铁火盆，冷了在火盆上烘烘手，饿了烧几个山芋蛋充充饥，写累了伸伸胳膊，用湿毛巾擦擦脸，继续写下去。

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了，李季同志认真学习，照着去做。此后，他常深入到农村、基层单位去体验生活，积累素材，或收集整理民歌，记得他搜集整理了厚厚一本三边民歌。有一次，我去县政府，他拉我到北屋办公室说：“我用了二十夜的工夫写了个材料，你看看！”我一看是长篇叙事诗《红旗插到死羊湾》。我一口气读完，很受鼓舞，至今还记得里面的一些诗句。不久在《三边报》上以《太阳会从西面出来吗》为题发表了，后来又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连载了，改名为《王贵与李香》。党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同志还加了按语，肯定它是新诗歌发展的方向，标志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诗歌发展的新阶段。虽然《王贵与李香》反映的是土地革命时期的生活内容，但它的艺术魅力至今不衰。后来，李季同志调到《三边报》社搞编辑工作。

1964年李季同志回三边来了，他特地来盐池看望当年的老同志和乡亲们。态度还是那么和蔼，性情还是那么爽朗，精神还是那么乐观。走时，邀我抽空上北京到他那里住几天。依依深情、难分难舍。万没想到他这么早就离开了人间。每当我想起他时，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李季同志没有离开我们，他还活着，他留给我们的诗篇，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永存。

想 三 边

李 季

世上的歌儿呀成千上万，
听歌的人都各有各的喜欢。
这里也没有多少道理好说，
歌儿呵总和你的感情有点牵连。

我呵我爱的歌儿是顺天游，
这歌儿曾陪伴我多少年。
就象马兰草的千万条须根，
它使我植根在三边黄沙滩。

顺天游呵不断头，
千遍万遍听不厌。
多少欢笑多少泪，
清风长夜不安眠。

一曲顺天游，
梦魂到三边。
披衣忙坐起，
惊呼招待员。

深更半夜谁的兴致这么好，
甜滋滋的小曲伴琴弦？
熟悉的音来熟悉的调，
唱曲人一定是老三边。

在《三边报》工作的日子里

刘 山



刘山（1924—1995）陕西定边人，原籍河北省邯郸市，1939年参加革命，1940年入党。曾在三边地委机关《三边报》社当记者。建国后曾任《宁夏时报》社编辑部副主任，银川地委宣传部长、甘肃省理论宣传处长、宁夏自治区广播事业局局长、书记，自治区科协主席等职。

1936年夏，彭德怀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西征时，开辟了三边革命根据地，它是陕甘宁边区的组成部分。三边分区的党、政、军机关就设在三边地区长城脚下的定边县城。三边地区农牧兼营，盛产盐、皮毛、甘草三宝。为了宣传贯彻党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开发三边的资源，1941年夏三边分委（1942年12月改称三边地委）决定创办《三边报》。报纸创刊后，得到分区党委的重视，并请毛主席题写了报头。报纸从创刊开始，就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对党的方针政策做通俗宣传和讲解；同时从地方实际出发，宣传党在地方的任务和措施，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与介绍农、牧民勤劳致富的经验紧密地结合起来。三边的群众是勤劳智慧的，在多年的实践中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并获得了可喜的劳动成果。然而由于历史的缘故，使这个地区文化落后，交通不便，加上习惯势力和小生产者保守思想的存在，使得先进的经验得不到传播，影响了生产的发展。鉴于这种情况，分区党、政领导便组织干部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发现了许多在农业、牧业、学文化、破除迷信等方面的模范人物，对他们的先进事迹和经验进行了总结，通过报纸作了介绍。基层干部以《三边报》为依据，结合各地区总结的经验向群众作了大量宣传。如：通过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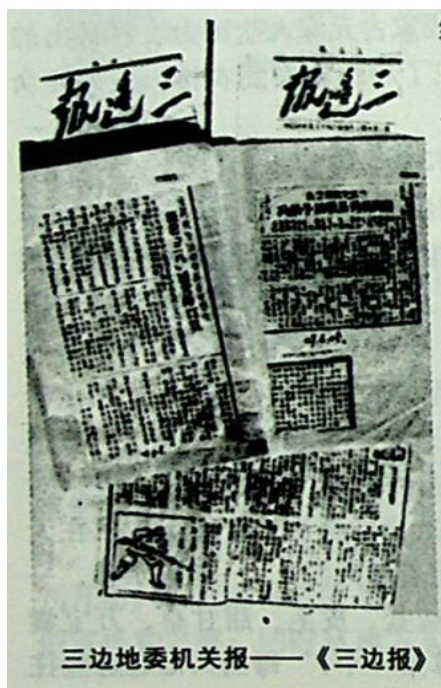
靖边县的植树防沙、拉沙开水田的报道，对定边县的山洪漫地和破除迷信的模范村的报道，对盐池县牧羊模范的表彰，对吴旗县二流子刘生海的转变报道等，在全分区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一个向劳动模范学习、向劳动模范看齐和追赶先进的群众运动蔚然成风，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在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干部和群众关系十分密切，常常吃住、劳动在一起，分区领导同志以身作则的好作风，影响和推动着基层干部，大家以深入农村为荣，以联系群众交朋友为乐，干部爱护群众，群众欢迎干部，真是亲如一家。《三边报》对此作了报道，如报道地委书记高峰和专员罗成德访问劳动英雄，罗专员亲自担盐等也给以报道，鼓舞了人心。

《三边报》还发表了著名诗人艾青、著名画家古元深入盐田力农村写出的通俗读物和作品。诗人李季的一些作品还印成了单行本发到农村，成为群众欢迎的读物。

三边地区的盐是边区的重要物资资源，不仅供应整个边区军、民食用，而且还供应国统区人民；同时也是根据地 and 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进行商品交换的物品，是联络双方感情的重要物资。《三边报》、《解放日报》对此都有积极的反映，在报道内容上各有侧重，互相配合。延安《解放日报》从全局出发，常派记者到三边，从盐田的开发、资源的考察、技术的，导以及经济效益等方面进行古今历史的介绍，以引起全边区军民的重视。《三边报》侧重于宣传地委提出的任务，具体部署，集中力量在产盐季节报道产盐情况，报道本区群众组运输食盐和边区各县群众到三边运盐的情况。记得《三边报》对于修建盐田的情景和担盐队伍的劳动场面作过这样的报道：食盐运输队在大道两旁架起的棚帐和野火炊烟，运盐队的脚户哼着信天游：“一道道水噢，一架架山，穿山越岭到三边，三边地方有三宝：咸盐、皮毛、甜甘草，万宝囊噢，宝贝多，咸盐要算第一个，嗨哟，咸盐要算第一个！”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仿佛又回到了那烽火战斗的年代。

《三边报》是8开石印报，由于条件艰苦，报纸版面所限，要求消息、通讯篇幅短小精干，内容要通俗易懂，语言要用当地群众的语言，文字尽量要精炼，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新闻、通讯的乡土味，才能使群众喜闻乐见。为了活跃报纸版面，当时采取集中报道，兼顾其他的方针，对于经济建设

和大生产运动、文化教育、手工业生产以及一些文艺作品也给予刊登。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就由作者自己改编后分段在《三边报》上发表，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各地基层干部、群众纷纷要求增加报纸的份数。



1947年春，马鸿逵部侵占三边后，《三边报》社随同三边地委、专署撤出定边城。在条件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三边报》不得不由石印报改为油印报。但我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干部战士更加爱看《三边报》。有一次我到农村去采访，就发现区、乡干部在他们那不离身的挎包中装着一叠叠《三边报》，有空就看。当时我们不仅报道边区的、全国的战局，还不失时机地宣传生产的情况，教育群众积极支援前线，保障供给，鼓励群众参战。经过一段时间，军民对于战争生活都熟悉了。

《三边报》又开始重新组织起通讯队伍，使我们能尽快收到游击区、边沿区、武工队、游击队的稿件，以补充报纸采访力量的不足，使斗争情况、生产活动情况得到及时报道。通过报纸使群众对当时形势及敌我两个政权形成的对比有了认识，对三边分区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1947年秋、冬两季，是边区敌我斗争最激烈的时期。由于分区领导机关的流动，报纸也随着流动。根据环境的变化，报纸有时是大张的，有时是小张的，有石印的，也有油印的，不论人多人少从不间断。对于各解放区大的战役还出捷报，虽然只是一页16开纸，但它所起到的鼓舞斗志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1947年夏季的一天，李季传达了地委的请示：派我到靖边县进行采访。我到靖边很快了解到一些情况。蒋军胡宗南部动员数万兵力向我党中央、毛主席活动的靖边县青阳岔、龙洲方向进行清剿，形势很险峻。这时党中央与强大的敌人相距只有10多华里，而我西北野战军主力已西出陇东，保卫党中央的部队只有一个团，还有当地站岗放哨的群众在监视敌人。一天

下午，下着濛濛细雨，山大沟深，又没有路，敌我隔沟相望，彼此不知对方虚实。一会儿雨大了，天空乌云密布，加上夜已降临，漆黑一片，远远可以望见对面敌人放起的烟火。敌人时而盲目放枪，时而胡乱打炮。在一阵枪声后，出现了可怕的寂静。毛主席率领着党中央机关向天赐湾方向转移，形势十分紧迫。正在此时传来彭总率部在羊马河地区歼灭敌一个师，活捉师长麦宗禹的消息。敌人闻讯后像惊弓之鸟，调头回窜，我党中央机关转危为安，毛主席、周副主席又回到了小河村。敌人退走后，我们一行数人，到蒋军住过的杜家崙调查。回到区政府所在地小河村时，区上的同志为我们烧了一锅开水，大家边休息边喝水。忽然区政府院内进来一些人，我们从窑洞出来，仔细一看，噢！原来是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等同志！我们很自然地围上去蹲成一个圆圈，只见干部头上都扎上一块羊肚子手巾，穿着打扮真有点军不军，民不民。我那时头上留有头发，穿着一身褪了色的灰色学生装。毛主席询问了每一个人。毛主席问我：“你是哪个单位的？”我回答：“是《三边报》的。”主席又说：“你们的报办的很好，最近没有看到。”我听了很惊讶，主席这么忙，还看我们的小报。我连忙回答：“家里刚刚寄来几份。”我回窑洞拿出《三边报》交给主席和周副主席。毛主席握住我的手说：“谢谢同志们。”周副主席说：“《三边报》以后能经常给我们吗？”我激动地应声答道：“一定。”这件事我写信告诉李季，从此《三边报》一直给党中央寄送到迁进北京的前夕。

在我们谈话中间，区委书记给主席送了一碗水，又向各位领导汇报了敌人清剿时破坏的景象和我们调查的具体情况。周副主席说：“你们统计一下，看看小河村人民受了多大损失。要向人民控诉敌人的罪行。”

《三边报》能够引起当地干部、群众的喜爱，是和在这个地区活动的中央机关领导同志的重视，及报纸坚持了党所制定的政策和方针，反映了人民的意见和呼声分不开的。最基本的一条：报纸坚持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我在陕北地区和新闻战线上做了一些平凡的工作，深入农村采访，这个地区广阔的乡村几乎都有我的脚印。我曾经采写过的一些东西——战地通讯，除《三边报》采用外，《边区群众日报》、《解放日报》也发表过

我的稿件。解放宁夏的前夕，我写的一篇反映我军尊重回民风俗习惯的稿件，刊登在《三边报》上。登载这篇文章的《三边报》，至今还陈列在宁夏博物馆。

定边民教馆和“七七”剧团的

建立与发展

宋绍文



宋绍文（1914.2—1990.12）陕西西安人。自幼受其伯父宋德俊（留日学生，曾和孙中山及陕西督都张凤翔一起革命）的影响，思想进步。1936年定边解放后，曾任定边县委宣传部长。他一生酷爱文学、艺术，擅长诗词、书法，曾参与过新编《定边县志》的编写。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向我华北大举进攻，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我党为了动员一切抗日民主力量，一方面和国民党实行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进行改革。定边“民教馆”（全称“民众教育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937年8月创建的（地址在定边现文化馆）。馆长先是从延安派来的孙芳山担任。1938年，由雷迅波（现名孙效康）、1939年由史焕智、1940年由马锐志担任。1942年三边整风后，马锐志调到三边文工团，由唐铭鉴接任。

“民教馆”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开展群众文化教育和宣传活动，业务上除日常图书借阅、报刊阅览、图片展览等外，每逢节假日，还搞灯迷、歌咏、球类、象棋等比赛活动，每年春节组织群众文艺爱好者“闹红火”，上街扭秧歌、跑旱船、耍龙灯、踩高跷。平时还组织业余剧团进行演出活动。另外，“民教馆”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开展群众扫盲识字活动。在工、青、妇及乡政府（当时定边城内有南、北两乡）的紧密配合下，在

手工业者和城市居民（特别是妇女）中开办了“工人夜校”，“妇女半日班”，家庭院落识字组等进行识字教学活动，并取得了很大成绩。

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宣传工作也蓬勃地开展，延安民众剧团和边区留政宣传队等文艺团体用戏剧形态塑造人物，刻画反映当时抗战中的真人真事和边区人民的幸福生活，通过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对比写照，促进抗日战争胜利高潮的到来。延安民众剧团和边区留政宣传队到定边巡回演出后，博得群众一致好评。民众剧团演的《中国魂》、《那太刘》、《查路条》等秦腔剧，留政宣传队演出的《夫妻避难》、《送郎当兵》、《三边风光》等秧歌剧、歌剧，深深吸引、打动了广大群众，他们赞扬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好，演的戏和真的一样，真是叫人看了还想看。在街头，戏剧演到哪里，群众跟到哪里；在剧场，戏已演完，观众还是静坐不动。群众一致反映，延安的戏再好，我们是不能经常看到的，观后使人们有留恋不舍，思情深重的滋味，经久不能平息。所以，定边党、政及三边分区领导，根据毛主席“群众的文艺工作，要普及到群众中去”的指示，决定定边“民教馆”负责这项工作，民教馆馆长孙芳山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召开了定边文艺座谈会，研究文艺工作。大家一致提出定边需要一个剧团，但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公办是无法解决的，我们还是组织业余剧团。最后由孙芳山总结，通过大家提出意见，在民教馆的领导下，定边的文艺宣传工作固定机构始有萌芽。

业余剧团的诞生

1937年10月，定边业余剧团正式成立。一个业余剧团的成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白手起家，困难重重。首先由定边民教馆大力支持，解决演员问题，吸收定边城市爱好文艺的同志，有方作霖、崔俊杰、张世芳、王玉玺、宋华、许海、苏嵩秦等20余人。没有乐器自己自备，服装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没收地主的男女服装，幕布和军队服装都是民教馆自置，并发动定边商会馆义捐，置办乐器、道具、汽灯等，这样简易的剧团成立起来了。

当时延安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副团长马建翎，在他们的帮助下，给业余剧团排演了现代剧《中国魂》《那太刘》、《查路条》等新秦腔剧，另外还排演眉户剧《两亲家打架》、《十二把镰刀》。留政宣传队给剧团排演歌舞剧《夫妻避难》、《兄妹开荒》等，经过他们耐心教导，未上两个月时间，业余剧团的戏剧和群众见面了。日复一日有所进步，群众高兴的说：我们也能看到咱们定边自排自演的戏了。因为是业余剧团，人力杂散，成立当年演员的情绪相当高，出演时随传随到，不打一点折扣。可是经过一个时期，人就不容易集中了，一则演员没有任何待遇，二则这些人都有其它职业，所以你来他不来，致使工作不能进展，业余剧团流于形式。因此，定边县和三边分区决定：剧团要固定化和职业化，不能把这个来之不易的摊摊撂掉。演员除在原来的留一部分外（没有职业的或出色的演员），不足之数由定边完小毕业出来的学生添补，生活费用和待遇与干部相同，这样正式剧团便正式成立了。因为业余剧团在“七七”事变后成立，故剧团名为“七七剧团”。



七七剧团正式成立

“七七剧团”于1939年10月由业余改为正式，当时团址在南观音殿（现在的南口子），除吸收原定边业余剧团的王玉玺、张世芳、崔俊杰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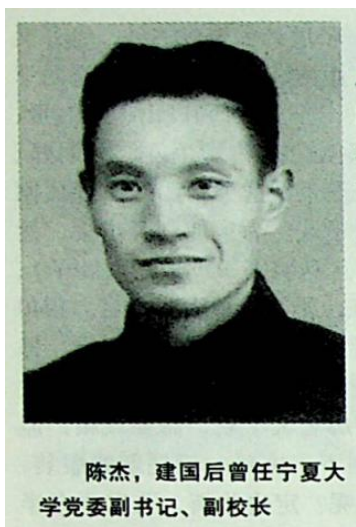
另外又聘请本县及盐池县的老艺人张兴汉、王天玉、丁还生、丁兆兰等；补充的学生有刘万仁、牛守礼、杜世亭、田丕栋、石生印、刘志杰、张成山、田兴贵、宋贵、高顺和、张志德、崔风猷、赵文俊；由部队转来的柳生祥、方明显、周占元；盐池县的孙逵等。团长孙芳山，队长王玉玺。这个剧团除演现代剧外，老艺人张兴汉、王天玉分别排演小型历史折子戏。为了使剧种增多，达到人民群众的要求，并由庆阳聘请老艺人马师传（马明轩，绰号马大肚子）、李大黑（马之徒弟）、朝师传（旦角）3人作教练，排演历史大本节目。1940年冬孙芳山调职，由马力中任团长。1941年春调丁光明到剧团任协理员，另外又从三边公学抽调陈杰到剧团工作。此时张兴汉、王天玉、王玉玺、张世芳均离开剧团，张兴汉的儿子张世孝到剧团。演历史大本戏，需要戏箱，但我们剧团没戏箱。原来的戏箱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搞到的都是新戏服装，关于历史剧需要，头帽，服装短的太多。怎么办呢？定边北街，孔家原有半副旧箱，我们买回添上张兴汉原有的箱，历史大本戏，可以对付的演了。

丰富多彩的历史大型剧与群众见面

马师传是个多才多艺的老艺人，因为他肚子里装的历史大本戏有四百本，一般出演的他都知道。同时，对每一本戏的所有角色的动作、家具、服装、性格，他全部清楚。他是文盲，上术之戏，全凭在脑海中记忆，真不简单，因而人们给他送了一个外号叫马大肚子。他的角色是多种多样的，生、丑、净、旦都能演，在宝鸡、陇东颇有名气。李大净是马师传的徒弟，他演大净有独立的风格，噪子宏亮，抬架好。马师传是演旦角的好把式，虽然年已40余岁，扮装起来，雅如青年，情感真挚，举止优雅，使人观之赞美。

第一本大型历史剧《蝴蝶杯》，前后两本与群众见面。在开演这两本戏时，三边分委负责同志指示，二本合一而演。剧团接受任务，从下午7点演起，直到晚上4点才告终（共演9个钟头），但观众还是静听无音、

毫不动摇，演员精神抖擞毫无倦意。一炮打响，博得群众好评。接着便排出了《反徐州》、《秦英征西》、《游龟山》、《鱼腹山》等 10 余本戏。从此剧团有了收入，演员技术随之提高，新生的力量不断成长。丁光明的须生，杜世亨的正旦，张成山的武生，牛守礼的丑角，孙逵的花旦，刘万仁的小生，成为名播三边的好演员。



三边分区 4 个县均来信调七七剧团去演出，从此以后，七七剧团的足迹遍于三边分区各县各区的每一个角落，使遥远的深山里常看不到戏的群众也得到了欣赏，他们高兴的赞扬说：如果没有共产党，我们这一辈子也看不到大戏了。后来，边保剧团给警三旅，改名为三旅宣传队，定边又增加了一支文艺劲旅，定边文艺之花大大开放。

七七剧团改为三边文工团

1943 年整风结束后，三边地委决定扩大七七剧团，从整训班调进许多人员，其中有吴坚（三边盐务局），聿尹（原三公音乐、美术教员）、加洛（音乐教员）、彭瑛（音乐教员）、陈冰（三边盐务局）、马锐（民教馆）、李锐、王志坚、张力、赵昊、尹影、陈宏、汶拜、宋治文（均系小学教师）、赵觉民（三五九旅四支队）、陈波女（高波之爱人）、路明（女）、张廷兰（女）、张桂英（女）（不是定边剧团的张桂英）共计 19 人。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有一定的文艺水平和技长。剧团的实力大大的增加了。

因为人事的扩大，演技水平不同，三边地委决定，把原七七剧团改为三边文艺工作团，直接由地委宣传部领导。团长马力中，副团长吴坚，协理员丁光明，共分为 3 个队，第一队队长尹影，第二队队长陈杰，第三队队长牛守礼。按专长划分 4 个小组，即美术、音乐、创作、戏剧。美术小组长聿尹，音乐小组长加洛，创作小组长赵觉民，戏剧小组长牛守礼。演员除了搞业务学习排练外，特别重视综合性的学习，按各人特长所需选择，

爱美术的学画画、爱音乐的学简谱练乐器，爱创作的学创作写剧本，不识字每日还有两个钟头的文化课。戏剧是本团的业务，也是文工团主课之一，历史剧本由我负责，听马师传口说我撰写，剧本抄出由吴坚改报地委宣传部，审批后进行排练演出。排演时由马教师指导，剧目结构、技术技巧随之提高。

1944年三边文工团机构变动，马力中调走，团长丁光明，副团长吴坚，协理员陈杰，尹影调走后，一队长陈宏，二队长牛守礼，三队长田丕栋。在人员方面又增加了许多，袁生（武打教练）、荷群林（西安人，给李正敏拉板胡，拉的特别好）；又吸收一批娃娃，有侯长命，李戈虎、荆改名、王伯喜、白林山、王振华、杜长林等。以后由银川觉民学社跑来的侯维国（主要演武小生），剧团后继之鲜花大大开放。

我们文工团不是单纯的秦腔剧团，而是综合性的艺术团体，除大型历史剧采取秦腔，一般还采取多种形式：如《兄妹开荒》（秧歌剧）、《夫妻避难》、《两亲家打架》、《十二把镰刀》，《夫妻学文化》、《大家喜欢》、（眉户剧），《张三顶灯》（滑稽戏）、《血泪仇》、《穷人恨》、《三万块响洋》（现代秦腔剧）等外。大型历史剧有《蝴蝶杯》（连二本）、《徐州革命》、《玉虎坠》、《彩楼配》（连三本）、《玉凤钗》、《潞安州》、《铡国舅》、《回荆州》、（八义团）、《破九州》、《破宁国》、《冠姐己》、《烽火戏诸侯》（赵觉民编）等20余本戏。历史折小戏有《激友》、《考文》、《审苏三》、《吕蒙正赶斋》、《苏武牧羊》、《柜中缘》、《猫王花》（宋绍文编）《放饭》、《辕门射戟》（侯维国主演）、《烙碗计》、《四差捎书》、《河神娶妻》、《三回头》等。

1945年到1947年间，定边文艺机构达到顶峰，有三旅宣传队、十一旅剧团和三边文工团等，共有三个剧团，每个剧团均有他独特的节目，三旅宣传队的《三滴血》，十一旅剧团的《白玉楼》、《周仁回府》，三边文工团的《王宝川》，三旅机关业余剧团由高波主演的京剧《貂蝉》都盛名一时，每逢这些节目上演，群众总是挤满剧场。

买回来了新戏箱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艺工作发展要求的条件越来越紧迫。剧团的经济也有了一定的盈余，购买新戏箱成为当时的主要一环，边区、延安等地基本买不到古装戏箱，非得在国统区购买，但是敌人层层包围，物质运输太难，如果不通过一定的关系，那是办不到的。我们剧团的领导人和地委负责人协商，办理买箱事宜。首先找到在敌区跑外商的薛雨亭，托其在西安购买。因为薛雨亭常在平凉一带跑买卖，平凉驻军是国民党十七军高桂滋部，高桂滋是定边人，那里定边人也不少，所以关系相当密切，关系拉关系，薛雨亭化装成十七军军需，到西安将戏箱买妥，运到平凉后又转回定边。见到崭新的戏箱，大家真是高兴的说不出话来，三旅宣传队也羡慕的很。为了亮箱，和三旅宣传队合作排出大型历史剧《三打祝家庄》。穿上新装上演，群众高兴的说，文工团有了新箱，戏也演的好了。群众的眼界大大的开放了，演员信心百倍，在各方面努力，没有西洋乐器，自己创造，聿尹和加洛，他们自制了中小提琴和高音二胡、低音二胡，文工团也有了管弦乐器，聿尹、加洛他们谱编文工团团歌，还成立了合唱队，真正达到文工团的称号。

在三边分区各县的巡回演出

我们文工团在定边、盐池、靖边、吴旗各区及内蒙等地均进行巡回演出，得到当地群众好评。每一场演出都是人山人海，预定期演完，观众总是恋恋不舍，尤其是我们剧团出色的演员和女同志，群众拉的吃饭交朋友，真是亲如一家。我们剧团是党的宣传队，在未开演之前，先进行党的政策宣传，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虽然以历史戏为主，但我们在不同情况下，给他们演新戏。例如在动员春耕生产，我们演《兄妹开荒》、《大家喜欢》、《十二把镰刀》；破除迷信，演历史剧《河神娶妻》，现代戏《红孩女妖精》；改造二流子演《王三保》，给群众的教育真不少。在休息时间我们

则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采访当地民谣、山歌（聿尹、加洛、彭瑛在收集山歌，当给陕北民歌投稿不少）。群众家中有稀奇的物件，我们予以素描写生。给当地爱好文艺音乐的教唱教画，在姬塬演出时高仲元就是一个实例。我们在内蒙三段地一带演出，蒙古男女同胞和我们坐在一起唱歌，聿尹、加洛记谱，当时由我们团里的人根据谱子唱出，蒙民听了特别高兴，竟和我一齐唱起来，所唱的词是：青山绿水万千长，草原千里赛秋光，你拉上马儿上沙梁，咳子哟，我赶上牛儿下牧场。我们文工团在各县的演出大大丰富了各地区的文化生活。群众赞扬说：文工团真是我们三边文艺尖兵。

在战争年代里文工团的活动情况

1947年定边被马匪侵占后，三边文工团随地委退到南山，当时我们文工团化整为零到各连队中当文化教员和指导员，其他同志成了地委的警卫战士。一方面演戏，一方面随军作战，1949年定边解放后回城，因为工作的需要，文工团调到银川、兰州开展新的工作。

战士的足迹

崔伦

崔伦（1920.9—2001.10）陕西省定边县红柳沟镇卜掌村人。1938年1月参加革命，到陕北公学学习，同年3月入党，后入中央军委三局通信学校学习。历任三局见习报务员，陕西省委机关电台台长，警一旅电台区队长，中央机关通信大队长，中央军委三局总台副台长，军委通信部业务处副处长。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司令部通信处处长。回国后任中央军委通信部通信处处长，通信兵司令部副参谋长兼《通信战士》杂志社社长，总参通信部部长等职。1987年7月离职休养。离休后仍笔耕不辍10余年，写下了近50万字的《通信兵往事回想》。本文内容即选自该书。



投奔延安

我是陕西人，1920年9月4日（农历七月二十日）出生在定边县红柳沟乡卜掌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卜掌村地处穷山沟，村子不大，姓崔的只有十几户，据说老祖宗是由外地迁来的。但到底从哪里来的说法不一，我也搞不清楚。

祖父在延安念过书，得到过学位。我父亲弟兄四人，伯父崔岳祥，叔父崔岳南，都是农民。二叔父崔岳岚1939年到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参加了八路军，在晋东南作战中与部队失掉联系，解放后在兰州工作，1962年国家精简城市人口，他响应号召迁回老家。我父亲崔岳瑞排行老二，他只

读过两年私塾，主要靠自学有点文化，能够看书写信。他虽不是贫苦家庭出身，但是政治上很开明，拥护共产党，送儿子参加革命。他主张破除迷信，为与封建迷信作斗争，下大力学会行医。1943 年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破除迷信英雄，先后再次到延安出席边区劳模大会和文教大会，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并给予他很高的荣誉。



我也是兄弟四人，其中三个共产党员，一个共青团员，所以我的家庭可算是革命家庭。我排行老二，哥哥崔藏珍是共产党员，担任过村里的生产大队长，一直在家务农。大弟弟崔藏西，共产党员，1947 年参加革命干通信工作，后转业到地方。小弟弟崔藏琪，共青团员，上中学时病故。还有两个妹妹，名叫崔藏凤、崔藏莲，均系家庭妇女。

我 12 岁以前在家放牛。当时村里没有学校，上学要到县城里去，因离家较远，直到 12 岁才去县城上小学一年级。因年龄大，按规定小学上 4 年，我跳一级念了 3 年。高小念了一年多，红军攻占县城，解放了定边县。我在县城待了几天，也参加过一些革命活动，如写标语等，以后学生们各自回家。

回家后，父亲决定让我去榆林上中学。1936 年 6 月，我到榆林考六中（即榆林中学），因时间已过没有赶上，就考入职中。1937 年 10 月，在榆

林职中刚学了一年多，日本鬼子就打到太原了。消息传来，榆林城人心浮动，学校学生思想混乱，很多人都退学回家，我也退了学。在榆林读书期间，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也没有参加任何组织。

在家待了两个月，未来何去何从，我也没有什么主意。此时，定边县的青年学生多数都投向高桂兹的部队。父亲对我说：“我看共产党行，有发展前途，去延安的人，不几天回来就大不一样，就这样定了吧，你还是到延安去。”父亲还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读了几年书，长期待在家没有出息，应当出去闯一闯，为了不拖你的后腿，你的婚事也不要在家里办了，出去自己解决吧！”我同意父亲的意见。这时，县政府也号召青年学生去延安学习。就这样，我和6位同学一起，由县政府介绍去了延安，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到延安后，边区政府介绍我们到陕北公学学习。陕公毕业后，因已是党员，党组织分配我到军委三局通信学校学习，也就正式参军当了通信兵。从此以后干军事通信工作，一直干到离休。我也算是个“三门干部”，离开家门就进学校门，离开学校门就参军到通信部门。我一生的职业经历非常简单，不仅参加革命前没有在地方上干过任何工作，就是参加革命后，别的行业也没有干过。从参加革命到离休，就干军事通信工作这一行，仅在总部机关就工作生活了50多年。

我1938年1月入陕公学习，同年3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前些年，通信部编研室的同志写了一份材料，题目是《志愿军人物志——崔伦》，开头一段是我的简历。我的孩子看后问：“你1月到陕公学习，3月就入了党，入党为什么这么快？”孩子的提问，引起我回忆当时的情况。

在陕公学习3个月，时间虽短，却多次听到中央首长的讲话和报告，影响最深的是毛主席和张闻天（当时叫洛甫）的讲话。毛主席不只一次到陕公讲话，他深入浅出地讲共产党的性质、纲领、奋斗目标及加入共产党应具备的条件等，都讲得很深刻。毛主席讲话时，两只手掐住腰，一边说一边作手势，虽是满口湖南话，但讲话含义完全能听懂。讲到张国焘对解决西安事变的错误态度时，用双手比划着杀头的姿势，已经过去50多年了，我还记忆犹新。刚参加革命，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就牢牢地刻在了我的脑子

里。我到陕公学习很快就入了党，这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对青年学生的关怀教育是分不开的。毛主席在讲话中说：“中国不亡，因为有陕公。”毛主席曾给陕公题过词，内容是：“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惟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当时，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中央决定政治局委员都要到陕公讲课，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给陕公同学反复论述这些精神。张闻天讲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对我影响也较大。每次听中央首长的讲话后，学员队都要组织大家座谈，我就畅谈自己的认识及看法。

当时，每个学员队有两个工作人员，专门收集学员的思想情况，很注意了解大家听了中央首长讲话后的反映。当他们得知我的思想反映后，就找我谈话，征求我对加入共产党的看法，这样我很快就入了党，并在3月28日参加了入党仪式。当时和我一起从定边去延安的几位同学，他们的年龄比我大几岁，听说我加入了共产党，都问我怎么这样快就入了党，说我的脑子太简单。但我心里想，入党是自愿的，没有人强迫，只要看准了，快一点不更好吗。那几位同学不但没有很快入党，有一位还离开延安到国民党统治区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到延安能经常听取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讲话，这是非常难得的机遇。毛主席在陕公的讲话给我影响很深，他在一次讲话中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不到别处去，而要到延安来呢？这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这里。”他还说“我应当送点礼物给你们，但是我没有多少东西，只能送给你们两件礼物：第一件，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这些话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1938年4月初，张国焘叛党外逃，党中央立即作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在党内传达。陕北公学在大砭沟召开党员大会，传达党中央的决定，毛主席专门到会讲张国焘叛逃的问题，我也参加了这次大会。

1938年4月17日，国民党抗日将领卫立煌途经延安，延安组织群众夹道欢迎，我随陕公学生一道参加了欢迎。毛主席鼓励卫立煌说，卫将军抗日坚决，和八路军友好，我们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平型关大战打得很好，忻口会战也打了一下，你卫立煌支持八路军，我们配合你们，这就是共同抗战。

调军委通信学校学习

1938年4月，我在陕公毕业后，党组织要我到军委三局通校去学习那时，从大后方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都胸怀大志，参加革命是想干一番大事业，对于做技术工作，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但我对技术工作没有什么不愿干的想法，而是愉快地服从了组织上的分配，听说要学无线电技术，只是怕自己的文化水平低学不会。

在陕公毕业的学生中，军委三局共选调了60多人，安排到通校第12期学习，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为什么说是选调呢？因为这批学员整齐得出奇：全部是党员，而且全是预备党员，一个非党群众都没有，一个正式党员也没有；全部是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一个比这高或低的都没有。到通校成立党支部，都是预备党员也是个难题，只好选了几位预备党员提前转正，才有了支部委员。

这批学员去通校学习，是军委三局王诤局长亲自送的。当时通校在富县的东村，离延安较远，步行要走三四天。从延安出发时，没有人向我们介绍王诤。他穿一身破旧的军衣，很不起眼，谁也没有注意他，没有看出他是领导干部。走了两天，到达富县县城休息时，领队人召集大家在一起宣布：“现在请军委三局王诤局长讲话。”大家都很惊奇，原来他就是局长，怎么根本不像个大官的样子呢？以后长期在王局长领导下工作，我这初次见面的印象，不但没有改变，而且更加深了。王诤艰苦朴素的作风，这是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公认的。通校距延安那么远，王局长亲自陪送

学员，还利用途中休息的时间，向大家讲话，做思想工作，说明王诤同志很重视把青年学生培养成有用人才。

步行四五十里到达通校，我们就住在东村的一个教学里，后来又搬到塬下的督河村。当时通校第 10、11 期的学生还没有毕业，同我们在一起住了一段时间。到通校后，很快就开始学习了。我在通校学习很安心，很用功，在学习的全过程中成绩也很好，尤其是收报技术更为突出。不论是日考、周考、期考，几乎都是满分，经常受到报务教员的奖励。

我们第 12 期 1938 年底毕业，军委二局从这期毕业学员中，选调了 10 多名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在延安盐店子材料厂驻地办了一期机务训练队，目的是增强独立工作能力。我和丁古、绳吉伦、陈伦、潘流、吕进等同志，都参加了这个机务班。在学习期间，除了听陆亘一工程师讲理论课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去材料厂实习，学习装配收发报机。王诤局长对这个机务班非常重视，也经常来讲课、讲话。这批学员以后很快成了骨干力量，这与领导的重视和培养是分不开的。

在通信学校工作时间较长，并担任过教务主任的王曙写了一篇回忆录，他说：“通校第 12 期教学时间较长，既学报务又学机务，总起来看，这一期学生文化水平较高，基础好，思想进步快，教学效果是最好的。”还说：“学员精神振奋，生动活泼，努力学习，准备到前线去，情绪十分高涨，教学质量都有所提高。可以说，在督河村的这一段时间，是通校校史上的发展壮大时期。”

1938 年 11 月下旬，我们第 12 期学员毕业。大家从通校到了延安，第二天都去城里玩，正赶上日寇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敌机投弹时我们都在大街上，跑也来不及，亲眼见到被炸死的人血流一片，幸好我们这些学生没有伤亡。事后听说，一颗炸弹就落在了李富春的院子里，毛主席很担心，亲自前去看望。当看到李富春安然无恙时，毛主席才松了一口气，并诙谐地说，这是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敌机初次轰炸后，延安城内市民开始疏散，以后陆续在延安城南面的山沟里建起一个新市场，延安成了一座空城，敌机再炸也损失不大了。

机务班学习结束后，分配我到延安 54 分队（电台）当见习报务员。工作一个多月后，又分配我到陕西省委（地下党组织）电台工作，刘寅科长找我谈的话。第二天，我就从延安坐汽车去报到了。

看望当上了边区模范的父亲

1943 年 11 月，我收到家中来信，得知父亲被光荣地选为陕甘宁边区定边县劳模代表，并要到延安出席“陕甘宁边区劳模代表大会”。自离开家乡到延安参加革命后，我没有回过家，父亲想利用到延安开会的机会和我见见面。

接到父亲的来信后，我立即从关中分区赶到延安。父亲比我先到，他和三边专区的劳模代表都住在延安新市场招待所。因多年不见，父子两人见面后心情都非常激动，故合影留念。我和父亲那张半个世纪前的合影照片，我妹妹一直保存着，1985 年我回老家探亲，妹妹将照片交给我，看了照片思绪万千。当年，我向父亲讲述了在部队的工作情况后，父亲曾深情地对我说：“你参加革命后，听说在部队工作得不错，进步较快，为父都为你感到光荣。你要继续努力，好好干，你的天资不笨，上完小时我听你们的校长说，你的考试成绩总是第一名，只要你努力工作，一定能干得很出色。”父亲对我的这些鼓励，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这次劳模代表大会是 11 月 27 日隆重开幕的。11 月 29 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了大会，毛主席在延安中央大

礼堂还作了“组织起来”的著名讲话，使全体代表受到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

代表大会结束后，党和政府对父亲同封建迷信作斗争的典型事迹给予了高度重视。1943年冬，地委专门派人采访调查。从1944年开始，陕甘宁边区广泛宣传了父亲的事迹，号召开展“崔岳瑞运动”。1944年4月2日，《解放日报》以头版的显著位置，报道了父亲破除迷信的事迹，同时还发表了“从卜掌村谈起”的社论，号召边区人民向崔岳瑞学习，同封建迷信作坚决的斗争。1944年7月，党和政府给父亲授予“反迷信的模范”光荣称号。7月29日，三边专区罗专员、孙县长、丁副县长带领部分群众代表及机关干部，拉着给父亲的英雄大匾及各种礼品，送到我家所在的卜掌村。在我家的院子里举行了隆重的发奖仪式，光荣匾上写着“破除迷信，治病救人”，卜掌村从未有过那样热闹的场面。当时我不在家，后来见到罗专员，他亲口对我讲了这次发奖仪式的经过。事后《解放日报》作了专题报道，标题是“英雄匾送到卜掌村”。边区政府将父亲破除迷信的先进事迹编入《小学课本》，著名诗人李季还写了说唱剧本《卜掌村演义》，广为宣传。

1944年10月11日，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文教代表大会”。这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大会，会议对我父亲的宣传特别突出。会议开始前，《解放日报》在报道代表到达情况时，专门报道了“全边区闻名的破除迷信英雄崔岳瑞先生亦远道赶来参加”的消息。10月20日的大会上，还专门作了题为“三边名医崔岳瑞10余年反迷信斗争事迹”的报告。10月30日，毛主席在会上作了“文化工作中统一战线”的讲话。毛主席不仅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方针，还对破除迷信运动作了精辟的总结。讲话结束后，毛主席接见了会议代表。据父亲讲，当毛主席握住他的手向他亲切问候时，他的心情非常激动，那一时刻是他一辈子也不能忘记的。文教大会还通过决定，在全边区推广“崔岳瑞运动”。1944年11月20日，大会举行了隆重的闭幕仪式，父亲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主席台，接受了党和政府授予他的个人特等模范英雄奖。《解放日报》刊登了19位特等奖获得者的个人画像，父亲的画像位列榜首。我从12岁上完小就离开了家，父

亲破除迷信的具体事迹我说不清，延安时期报刊上都刊登过。据说，他破除迷信在我出生前就开始了。我 1938 年 1 月离开家乡赴延安时，卜掌村已经不信神不信鬼，庙上的神像都搬掉了，过年时不烧香、不磕头，连门神、灶神爷都取消了，这是我亲眼见到的。

大会刚结束不久，我从关中分区调回延安学习。到延安后，很多同志都向我表示祝贺，为我的父亲被树为英雄模范人物高兴。有位同志看了关于我家的报道文章，对我说：“你真不错，进步够快了，1938 年学报务技术，1939 年就独当一面任台长职务，这至少是正连职干部，1942 年就担任警 1 旅电台区队长，这至少是正营职务，参加革命才 5 年，就任电台区队长，你为什么进步这样快？”我说：“我只有一点体会，党叫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党叫你在哪里工作你就在哪里工作，绝不挑三拣四，只要一心一意地埋头苦干，就一定能干出来成绩来。别的没有什么体会。”那位同志说：“你讲得很好！”说此话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我已离休多年，若问我革命一辈子，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我思索再三，还是这几句话，回想参加革命的历程，对“服从党组织分配”这一点，我觉得问心无愧。

夜袭兴武营

白寿康

白寿康（1912—1990）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陕西清涧人。1927年入团，1935转党，同年参加工农红军。历任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教官，红二十八军军部参谋，延安县委军事部部长，独立营营长，独立团团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三边分区司令员，陇东军分区代司令员，八路军三八五旅警备四团团长，陕甘宁三边警备区参谋长，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十二师副师长，建国后任师政委，人民武警学院政委，第二炮兵后勤部政委等职。



本文据作者1982年6月13日回忆，王惠选记录，马骥整理。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蒋介石为夺取胜利果实，一方面提出和平谈判，另一方面又积极准备发动新的内战。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一意孤行，背信弃义，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全面的大规模内战。驻宁夏马鸿逵部为策应南线的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从西线进攻三边分区。11月16日，马鸿逵调遣驻吴忠东塔乡的骑兵十九团五百余骑和马鸿宾部的一〇三团、一〇四团，分南北两路向盐池县推进。北路骑兵十九团侵占了盐池县西部的兴武营一带，南路马鸿宾部占据了盐池县的石家圈、长流墩、大水坑等地。

兴武营古城位于盐池县城西北 120 里处，建于明代，一里见方，城墙用砖石砌护。马部骑兵十九团团部驻在兴武营城外一家油坊的大院里，城内驻一个机枪营，另外两个营分别驻附近的余庄子、大圪瘩、天池子等地。

马部占据兴武营后，不时派遣小股骑兵侵扰距盐池县城以西 30 里一带的牛毛井、聂家梁等地。所到之处，抓丁掠物，对人民拷打搜抢，无所不为，并时时派兵侦探我方消息，给边区人民造成很大威胁。

盐池老区的人民对马家军的侵犯暴行痛恨至极，纷纷起来坚壁清野，填塞水井。盐池县游击队与民兵也不断袭扰和打击马家军。

由于盐池县民兵和游击队的不断袭扰，致使马部饮食维艰，日夜不安，如同惊弓之鸟。人不敢脱衣睡觉，马不敢解辔卸鞍。即使驮一次水，也要派 20 多名士兵保护。加之塞外天寒地冻，马部士兵多住着帐篷，没有取暖条件，士气十分低落。

为了保卫边区，收回被马鸿逵侵占的失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三边分区党、政、军领导遵照上级指示，一方面将部分机关、学校、商店、工厂、仓库向定边南部山区转移，实行坚壁清野；另一方面部署兵力，作好战斗准备，坚决消灭入侵之敌。

当时，我任三边军分区参谋长。马部袭占兴武营后，三边军分区司令部即派武装民兵深入兴武营侦察，并设情报网点联系。距兴武营城东三里许有一姓潘的住户，便是边区的地下联络站。兴武营城外一家油坊旁边有一小客店，也是一个情报点。侦察人员经常化装成牧羊人，赶上羊群到临近兴武营的马踏井饮水，顺便搜集情报。战斗的前三天，我和副司令员郭宝珊、三边专员吴志渊等人亲自到兴武营附近察看地形，并趁兴武营城内正在演马戏，四周的群众和驻军都到城里看马戏的机会，派遣王建民、魏忠孝、赵国祯等十余名战士和回民进步商人井涛等，化装成老百姓，潜入兴武营侦察。还动员兴武营附近的老百姓纷纷携酒担菜，提油拎鸡，到油坊“慰问”马家军，使马部的人更加麻痹大意。

在掌握了确切的军事情报之后，经过认真分析，我们放弃原来一部分人先打惠安堡（国民党盐池县政府所在地）的主张，作出集中兵力攻打兴

武营的决定。并根据敌骑兵团各连的驻扎地形、方位、兵员数额、武器装备等情况，绘制了作战地图，进行了详细研究，制定出了袭击兴武营的方案。当时，我三边军分区领导的部队有：警备八团，团长郭宝珊兼，副团长王正川；新十一旅一团，团长赵级三；新十一旅二团，团长李友竹；城川骑兵团，团长曹动之；还有盐池县余庄子工委游击队和各县保安队。参加袭击兴武营兵力的部署是：警八团集中攻打兴武营，城川骑兵团攻打大圪瘩，新十一旅一团攻打余庄子，余庄子游击队、盐池县保安队等配合作战，牵制兴武营东南架山地区马鸿宾部队，以预防其增援。参战部队共有两千余人，由郭宝珊任总指挥。

12月3日上午，我八团先派出一个侦察班侦察敌情。下午3点，八团、骑兵团、一团分别从驻地出发，向西挺进，晚11点多，按照作战计划，分路向马部骑兵团各驻地实施包围。4日拂晓4时许，警备八团接近兴武营。当日夜黑风大，警备八团一营选拔出14名突击队员，反穿羊皮袄，头顶皮帽，匍匐前进，像羊群一样蠕动。到油坊大院门口时，两名守门哨兵正畏缩在墙角打吨。趁一名哨兵进院叫岗，突击队员猛扑上去，将另一哨兵按住，给口里塞上布巾。敌哨兵回头发觉急呼口令时，战士高占禄一枪将其刺倒。突击队迅速占领阵地，包围了西北墙。后续部队随之紧跟，分别包围了油坊大院和兴武营城。两挺机枪封锁了油坊院的大门。霎时间枪声大作，硝烟弥漫，杀声震天。“放下武器，交枪不杀”的喊声不断。

马部的官兵从睡梦中惊醒，乱作一团，有的仓皇应战，盲目地拿枪向外扫射；有的冲向马棚，想牵马逃命。我一营副连长周占山率领突击队员跃上房顶，向院内投掷手榴弹，并迅速冲进院内。战士郭余山则在房顶上挖开窟窿，投入手榴弹，炸得屋内马部士兵“嗷嗷”直叫。马部士兵有几个人冲进马棚放出数十匹战马，企图转移视线，隐伏脱逃。我机枪手以猛烈火力封锁住大门，射倒马十余匹，使其余战马冲不出去，反而在院内狂奔乱闯，踏得人仰马翻。我一营连长康保民和二营连指导员刘生华亦先后率部冲入院内，里外夹击向后院冲杀。战士曹德兰原在马部骑兵团十九团当过兵（1942年参加八路军），奋勇当先，进院后大声呼喊他过去同事、同

乡的名字，及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马部中王华等人听到曹的喊话，立即放下武器，自动投降。

在战斗的慌乱中，马部团长马得英赤身光足越墙逃脱。联络参谋安永诚持手枪仓皇窜逃。军医主任张松明想夺门逃跑，被刺刀捅死。团指导员赵玉明想骑马冲出，中弹倒毙。团副杜子平钻进马棚内躲在马槽后面负隅顽抗，被康保民冲进马棚当场击毙。通讯排长穆从志不甘当俘虏，赤膊上阵拼命抵抗，结果也被击毙。整个战斗前后不到 30 分钟，油坊院内马部骑兵团部即被解决。除少数死亡逃跑者外，全部被俘虏。

警备八团三营负责攻打兴武营城内的马部机枪连。当攻城部队冲入城内，马部驻娘娘庙的 20 多名守军正在酣睡，未及抵抗，便乖乖举手投降。城中心钟楼上 80 多名守军负隅顽抗，拒不投降。我某连二排奉命组成突击队发动猛攻。突击队员手持大刀，身背手榴弹及步枪，爬上钟楼，用手榴弹压住敌火力，迫使守军缴械投降，战斗结束。与此同时，余庄子、大圪瘩守军分别遭到城川骑兵团和新十一旅一团的攻击。大圪瘩守军遭到袭击后即慌忙向兴武营撤退，中途闻兴武营已破，又调头向宁夏逃去。余庄子守军遭打击后向大圪瘩方向靠拢，被曹动之带领的骑兵团迎头击溃。

兴武营之战，共击毙击伤马部官兵 50 余人，俘获官兵 130 余人，战马 80 余匹，运送给养的骆驼 100 余峰，弹药辎重 50 余驮，迫使马鸿逵部骑兵团十九团残部龟缩灵武、金积一带，被敌侵占的兴武营、余庄子、大圪瘩、天池子 4 个据点得以收复侵占盐池县三区胡家圈、长流墩、石家圈、新庄子等马鸿宾部，恐再步兴武营后尘，闻风而逃。

为庆祝兴武营战斗的胜利，12 月 19 日，在三边首府定边城内召开了万人庆功大会。大会向刘生华、刘玉珠等 27 名战斗英雄佩戴大红绸彩花，并以“新长城”的锦旗赠予胜利部队。会上，三边军分区司令员曹又参、地委书记高峰分别讲了话，号召全体军民再接再厉，提高警惕，作好战斗准备，打击来犯之敌。延安《解放日报》于 12 月 20 日发表了题为《定边城内悬旗三日，万人欢庆光复兴武营》的文章，予以热烈报道。

閤门战斗中的警八团

惠世恭

惠世恭（1914—1997）字子敬，化名马伍。清涧县小岔则人。1928 年参加共青团，1930 年转党。曾任清涧城区巡视员，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警备三团政治处主任，湖南省新宁县委书记，八路军三八五旅五团、警备八团政委、三边军分区副政委，陕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共榆林地委书记，陕西省工业厅厅长、经委主任、常务副省长、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副省长。1983 年 8 月上旬，曾专程来定边就閤门战斗史实与定边县委党史办公室座谈，并亲临战场实地回忆，追述当年战争情景。本文即据此回忆，魏奎元等记录，余录荣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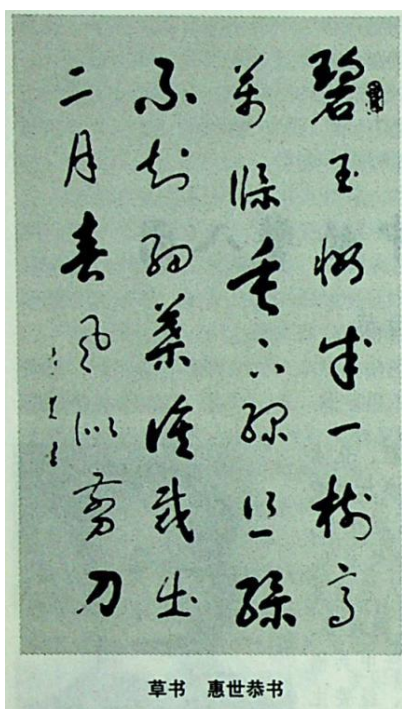


1946 年 6 月，我由陇东三八五旅五团调来三边，任警三旅八团政委。那时三边的形势虽然有些紧张，但还未动“武”。

当时，以起义后的新十一旅旅部为基础组成三边军分区司令部，把曹又参和新十一旅旅部从安边调到定边，曹又参任三边军分区司令员，杨林任副政委（政委由三边地委书记高峰兼任），郭宝珊、牛化东任副司令员（郭还兼任八团团长）。这是战前的情况。

1946 年冬至 1947 年春，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不得不把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集中重兵对我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发动了进攻，妄图把党中央和毛主席撵出陕甘宁边区，摧毁我领导机关。

1947 年春，胡宗南部约 14 万兵力，分为两路由南向北进犯延安，蒋介石命令宁夏马鸿逵配合胡宗南进犯陕甘宁边区的三边分区。马鸿逵乘我西



线、北线空虚，拼凑了步、骑、炮七八个团，约1.6万的兵力，任命其暂编第九旅旅长卢忠良为前线总指挥，一六八旅旅长马光宗任副总指挥，何晓霆任参谋长。在同年2月集结于灵武、吴忠、惠安堡、石沟驿、磁窑堡一线。3月19日，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后（我军主动撤离），马鸿逵部则开始向三边大举进犯，于3月24日侵占了盐池。盐池守城部队新十一旅一团给敌以火力杀伤后，主动撤出县城。

马部侵占盐池县城后，虽感得意，但他也很清楚我三边主力部队尚未露面，故不敢长驱直入，在盐池县城观望动静。9天之后，组织了三个步兵团、两个骑兵团、一个炮兵营，共五六个团的兵力，于4月2日趁大风弥漫之际，偷偷将部队伸向盐池和定边之间的盐场堡，4月3日早晨对定边城形成包围。上午9时许开始用迫击炮猛烈向城内轰击，似有攻城之势。当时城内守卫部队只有新十一旅二团和一些民兵，敌我力量悬殊很大，情绪甚为紧张。

警八团和新十一旅一团等机动部队由郭宝珊指挥，刚从盐池县南部的马鞍山、大水炕一带寻找战机未获返回，驻定边城南四墩口子、郑大墩、上下閤门沿古长城一线休整待命。

4月3日6时，驻四墩口的八团一营突然发现敌军向定边城推进，并立即报告城外机动部队指挥部。按照原来的分工：机动部队为便于寻找战机，一般情况下不协助守城部队；守城部队也不可能出城支援机动部队。但当时考虑到守城部队新十一旅二团兵力单薄，地委、专署、军分区司令部等机关的主要领导均在城内，若不协同作战，城防一旦被破，将会造成很难设想的不良后果。于是，八团主动出击配合守城部队打击敌人，同时和城内党政军取得联系。开始时一致意见，仍要坚持守城，可好就在这天的9点左右接到联防司令部不可死守城市的指示，但这时已难以撤出了，于是

八团即向攻城之敌发起进攻，接连三次打破了敌军的攻城之势和对八团一营的进攻，迫使敌人暂时放弃攻城，即将围城部队主力转向城南机动部队。

敌人被迫放弃了原来的攻城计划，改变为先打我城外机动部队主力警八团。这时，芦忠良已经感觉到，不首先消灭和打垮城外部队，定边城不可得。所以，他把兵力重新做了部署：两个骑兵团从东西两侧迂回包抄我军后路彭滩、上閤门一线，几个步兵团从正面进行强攻，对我军形成大包围，妄图一举聚歼。下午1时许，战斗最为紧张，冲锋和反冲锋进行的十分激烈。下午2时，敌人花了很大的代价突破我军前沿阵地，警八团即行南撤。开始的时候虽然伤亡较大，但是秩序井然，有计划的一边打一边撤，当我们撤至下閤门时候，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老边墙，我们利用这一有利地形组织部队又抵抗了半个小时，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不料新十一旅一团阻击王来滩方向敌骑十九团的任务没有完成，使敌骑十九团抄了警八团的退路，警八团只好向东南方向的彭滩退，结果未到彭滩就在田圈附近遭到敌骑二十团的堵截。紧接着敌骑十九团也由西赶来，后面的步兵同时尾随。在这种情况下，警八团一部分与敌骑十九、二十团混战在一起，来回厮杀，杀出了一条血路；一部分死守两点，紧紧钳住敌步兵进行拼搏。此时整个部队建制被打散了，以连、排、班为单位（个人）“各自为战”。从下午4时左右，一直混战到日落西山。这时战斗之所以能停下来，首先是敌人怕夜战，急于退出战斗；其次是双方伤亡惨重，加之人困、马乏、弹药尽，战斗很难继续下去，于是各自南北。



总的来说，敌人算是暂时“胜利”了，他们打扫了战场，我们撤至彭滩以南马沟泉时，走进一条断壁的“死胡同”，丢掉了迫击炮和无线电台，撤离了滩地，并受到严重的损伤。但閤门战斗给了敌人一定的打击，拖住并疲惫了敌人，使我三边分区党政机关和新十一旅二团于当晚顺利突围。

经过一整天的恶战，我警八团伤亡、损失甚大。副团长王正川被俘；团政治处主任李晓初、二营教导员李腾辉、三营教导员张树元及连、排、

班干部和战士约 120 余人阵亡；一营营长孙长富、三营营长刘玉珠及连、排、班干部和战士 340 余人负伤，不能行走，而当时未能救出的重伤员约 70 余人被俘、失踪七八十人（大部是些新兵跑回家了）。武器损失有：八二迫击炮三门，机、步枪 200 余支，无线电台收发报机一台。

从这次战斗总的情况看，警八团是吃了个败仗，主要是人员伤亡甚重，武器弹药消耗殆尽。回来近 1000 人（包括 300 多伤员），成建制的只有一个九连，其他连队经过补充和短期休整方逐渐恢复战斗。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个部队原来的战斗力确实是很强的，就拿奉命死守阵地的七连来说，他们直打的全连死的死，伤的伤，最后只剩一个连指导员，仍在顽强抵抗，敌人没有办法，最后把房子用火烧掉。这对掩护全军撤退起了很大作用，以一个连的损失换取了多数人的安全。这次战斗中像这样的英雄事例是很多、很多的。

这次定边战斗，警八团的战斗力受到一定的削弱。但在联司、三边党、政、军等上级部门的正确领导和积极指导下很快治愈了创伤。加之，部队底子好，素质好，老红军战士占的比例大，大部分是边区子弟兵，有实战经验。撤出战斗后，由三个营编成两个营，所缺的枪支弹药，及时得到补充，经过短期休整后，很快就恢复了战斗力，大家的信心也很足。虽不如从前那样充沛、强劲，但仍起着主力部队的作用，活跃于定边南部山区一带。

定边战斗充分显示了警八团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在一片平坦的沙滩上，与数倍之敌整整恶战了一天，不仅未被敌军吞噬，且使敌军同样遭到惨重的伤亡。后来马鸿逵在定边城向其部队训话时亲口称：“警八团是个铁八团，这次战斗虽败，但元气并未受到损伤，而经常出没于南山、平滩，我军（指敌军）不得懈怠……”

定边战斗失利后，三边的政治、军事形势一时出现了较大变化。一是对撤出城市，上山打游击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二是认为敌众我寡，警八团又受到了重创，对共产党能不能取胜，产生了怀疑。因此，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定边失陷不久新十一旅一团团长赵级三绑架了政治委员高波等叛变投敌；

少数游击队员开小差或叛逃；滩地部分群众动摇，不少机关人员、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情绪低落。

上述情况给当时的整个对敌斗争造成严重困难。为了稳定军心、民心、扭转局面，警八团经过短期休整、补充后，部分继续投入战斗，部分继续整顿、训练。新十一旅二团、独立营和游击队，也同时伸向靠近定边南山畔甚至滩地，寻找打击敌人，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斗争。是年5月1日，芦忠良派出一股匪军，窜入鹰窝山涧一带，企图进一步深入山区。这是敌人一次试探性的举动，不料被我警八团九连击溃。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军的战斗力，上级决定将原警八团、新十一旅二团合编为二团，1947年5月在凤凰寺川两团正式合编。合编后团长李友竹，政委是我，副团长吴子明，参谋长雷宗林，政治处主任王世杰。合编后人员武器充实了，领导班子加强了，部队斗志更加旺盛，以后多次击溃或重创进犯之敌，并主动打击分散的敌人，迫使敌人放弃了张家畔、柠条梁。

6月下旬，我西北野战兵团于陇东战役之后，挺进三边。6月29日收复安边，30日收复定边，7月7日收复盐池，歼敌骑兵二十团一个速，其余敌军全部逃回灵武以西。三边收复后，我三边分区党、政、军机关、部队又回到定边。一个多月后，西野东进，“围榆打援”。宁夏马鸿逵部乘机再次来犯，我党、政、军机关主动撤至山区坚持游击战争。

1947年11月，三边部队参加袁大滩战斗，取得辉煌胜利，我二团和骑兵团、蒙汉支队在红石桥、巴拉素一线经过一昼两夜截击马鸿逵援榆溃兵两个团大部，生俘宁马保安四团上校团长弓长舒、中校副团长魏哲正以下7000余名，缴获轻重机枪800余支（挺），各种子弹一万余发。这次战斗的胜利，不仅在人员、武器、弹药方面得到较好的补充，特别是对我军士气的鼓舞和三边整个形势的好转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48年3月，二团又分为二团、八团，八团恢复建制转战陇东后归建四军十一师，团长吴子明、政委张鹤田，参加了解放大西北战斗。

定边战斗后，三边地委当即在吴旗县的阳塘圪召开扩大会议，总结此次战斗失利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会上一致认为失利的主要原因是三边军

分区在军事部署上犯了分兵把守的错误，致使我军兵力分散，固守城市，形成被动挨打态势，给了敌人可乘之机。在责任问题上有过激烈的争论，但因情况复杂，一时难以搞清，会上没有明确的定论。

当年鏖战急

——忆閤门战斗

刘玉珠

1946年冬至1947年春，蒋介石全面进攻我解放区遭到严重打击后，不得不改为向我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妄图把我党中央和毛主席撵出陕甘宁边区，伺机歼灭。

1947年3月，蒋介石调遣全部美式装备的14万大军，由他的嫡系胡宗南指挥，分两路浩浩荡荡向延安进犯。同时命令驻守宁夏的马鸿逵部，向我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进犯，目的是消灭我在这块地区的主力，切断我三边分区对延安的援助，不使胡宗南部进犯延安有后顾之忧。

马鸿逵部是一支异常骄横的部队，以骑兵为主。过去在边界摩擦和小的接触中，由于他占有地理和装备优势，加上我们以团结为重，一再忍让。他占过一些小便宜，从而更加滋长了他的骄横。这次大举进犯，仍不把我们放在眼里。马鸿逵是不轻易离开他的宁夏老巢的，但又不能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他拼凑了步、骑、炮八个团的兵力。任命他的亲信，整编暂九旅旅长芦忠良为前线总指挥，一六八旅旅长马光宗为副总指挥；何效亭为参谋长，集结于灵武、吴忠、惠安堡、石沟驿、磁窑堡一带，虎视眈眈，整装待发。他们疯狂地叫嚣：“只要马到，就要成功”。

当时我们的战斗口号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其实，这是一种战略号召。实际上，我党中央早已做好撤退的战术准备。3月19日，我军主力撤离延安。胡宗南兴师动众，只得到一座空城。马鸿逵认为时机已到，指使芦忠良大举进犯三边分区。因盐池县和敌区接壤，首当其冲遭到攻击。我驻守这个县城的是一支起义部队十一旅一团，连、营、团都有我们派去的政工人员。在该团政委高波指挥下，打的非常顽强，给敌人很大的杀伤后，于3月21日晚撤出盐池县城。敌人的总攻目标是三边分区党

政军所在地定边县，由于我们派小股部队出击，主力部队尚未暴露，因而敌人不敢轻举妄动。他们在盐池县观望了9天之久，在胡宗南一再催迫下，调集了五个步兵团，两个骑兵团和一个炮团于4月2日，乘大风弥漫之际，集结到盐池和定边之间的盐场堡。翌日拂晓，对定边县城形成包围。上午9时许，用迫击炮猛烈向城内轰击。实为佯攻，他不敢贸然进城，意在寻我主力。我守城的部队只有十一旅二团和专署保安队几十名以及一些民兵，大家情绪都很紧张。当时，我们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认识不深，对敌人的大举进犯缺乏应有的准备，低估了敌人的兵力，总不愿失掉根据地，认为陕甘宁边区是我们苦心经营多年的老根据地。这里有和我们共患难的边区人民，有我们用血汗浇灌的劳动成果，三边是我们边区的食盐和毛皮供应地，即使撤出延安，守住三边这块地区，还可以为党中央、毛主席提供回旋活动的余地和物资资源。因此，开始只有自卫反击的准备，而没有主动撤离的打算，定边城内党、政、军机关和群众都没有想到撤离，大量物资也没有转移。

部队的战斗情绪很高。我们宣誓要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警八团和十一旅一团组成野外机动部队，统由分区副司令员郭宝珊指挥。我们机动部队刚从盐池县的南部地区马鞍山、大水坑及定边的羊圈山寻找战机未获返回。途中听到中央撤离延安的消息，犹如春雷轰动，我一时接受不了浑身软弱，四肢无力，连路都走不动。但又不敢明说，怕影响部队情绪。夜宿定边县城南一个小村庄，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心想：天天喊保卫，结果还是失守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在那里？感到内疚。“要我们军队干什么？！”好象失守延安的责任就在自己身上。但这股情绪也更激发了我们的斗志，决心和蒋胡马匪拼到底。“延安丢了，不能再丢三边”！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守住定边。

面对敌人大兵围城的现实，党中央一再催促撤离。分区党政军首长这时也下决心准备撤离，但主动撤离的时机已失。现在，敌人围城水泄不通，突围更加困难。在此情况下，我军决定有意暴露主力，把敌人从城下吸引开，好使分区撤走。

警八团回到定边城南闾门一带，我们三营住到郑大墩附近村庄。正准备开饭，团部通讯员传达紧急口头命令，命我三营迅速布防在闾门沿长城一线上。

闾门在定边县城南，离城有数里，周围有古撤、长城山。这里便于袭击、防守，撤离尤为有利。我们三营由三个连。一个重机枪排和一个通讯班组成，共有 500 多人。红军战士居多，战斗力较强。我们布防不久，分区副司令员警戒八团团长郭宝珊，副团长王正川、吴子明，政治委员惠世恭，参谋长雷仲林，政治处主任李晓初，都亲临阵地检查起到前沿阵地察看了地形和防御工事，在望远镜里清楚地看到敌军挥官指手划脚调动部队，敌大军正向县城西门逼近，就连敌人的大炮阵地也都看的很清楚。

看到这种情况，特别是团首长亲临阵地检查，我感到自己担子很重，我立即请示三营的战斗任务。团首长指示说：九连作为团的预备队，另派用场；七连布防在古长城沿线和一营靠近；八连布防在城南面的郑尔庄；营指挥所设在郑大墩，和七连在一起。这个墩高十余米，周围有一米七、八高的围墙，在墩上看的远，敌我情况了如指掌，便于指挥。

这时，敌人已向定边县城发起猛烈攻击。在危急关头，靠近定边城的一营，立即以密集火力向攻城之敌猛烈开火。敌军被打的昏头转向，他们没有料到我军从侧面攻击，损失很大。但他们很快惊醒了，认为终于找到了长期寻找不着的我军主力。因此，停止攻城，分三路向我阵地扑来。敌骑兵十九团、二十团和几个步兵团迂回包抄过来，并发起猛攻。一营进行顽强反击，接连打退敌人数次进攻，敌军死亡很大，我军也有伤亡。在几次反击后，我一营按计划主动撤出阵地，敌人更加猖狂，蜂拥而来，紧追不放，我三营立即按计划奋起迎战。

我指挥七连首先接火，我们已处在敌人前后包围之中。我命七连一排迎战正面之敌，二排抗击背后之敌，三排坚守阵地。当时我们面临十倍之敌，但我军战士个个毫无惧色，生龙活虎，以一当十，奋勇杀敌。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被打退，使他前进不能，后退不成，在我阵地前又死伤一大片。在一次反击中，连长邹仁山光荣牺牲了，我指定指导员温志俊代理连长。接着温志俊也负了重伤，我又指定一排长代理连长。敌人凭借人多势

重，妄图一局全歼我们，占领阵地。因此开始了肉搏战，我亲自看到战士高步福冲到敌骑兵跟前，敌人用大刀砍他时，他弯腰躲过，顺手砍断敌马腿，敌人摔下马，被他一刀将脑袋砍成两半。就这样，他一连砍倒几个敌人，自己也满身是血，但始终未倒下。这时我军阵地已被突破，我们撤到郑大墩围墙内，敌人不断往围墙内投掷手榴弹，我军战士拾起未炸手榴弹反手投出去。七班副王云治被手榴弹炸伤，肠子露在外面，他一手把肠子填到肚里，一手还拾敌投进来的手榴弹再掷出去。我命令他休息，他知道自己不行了，一边战斗一边对我说：“营长，这是我唯一也是最后一次不服从命令，我不能不战斗。我只有一个请求，这次战斗结束后，请组织审查我的入党问题”。我一面组织反击，一面告诉他：“现在来不及讨论，但我个人认为你完全够入党条件。战斗结束后，我当你的入党介绍人”。他听了高兴地笑了，打的更勇猛坚强。这时他接连投了两颗手榴弹，又拾起第三颗时，还未投出手，手榴弹在他手中爆炸了。我转过身，见 he 已倒在了血泊中，一只手炸丢了，半个头部也不见了，他光荣地牺牲了。我和通讯员含泪把他的遗体安放在一个小窑洞里。敌人死死咬住不放，我军伤亡很大，好多同志倒在我身边。我也突然负了重伤，敌人的炸弹炸伤了我的下嘴唇，一大块肉掉在下巴上。我怕战士看见，影响情绪，赶忙转身招来卫生员包扎了一下，用手继续指挥战斗。我想这样拼下去，阵地守不住，全连会覆灭，因此，决心立即突围。我指定几名战士投击一排手榴弹，杀声震天，向敌人杀出去，敌人没有料到我们突围，被打的措手不及。经过一场激烈的肉搏，我们终于突围，回到闾门见到团首长。政委惠世恭看到我受伤，让我下去。他说：“你们打得很好，已完成了任务，撤退是对的”。正在说话之间，一颗炮弹在团政治处主任李晓初身边爆炸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和他说话，他就牺牲了。我也是唯一的一次没有服从团首长的命令（叫我下去）。

八连由营教导员张树元指挥，他们担负坚守郑尔庄阵地，那里的仗打的也很艰苦。郑尔庄和七连阵地前后相距不远，敌人把七连围在郑大墩围墙内后，同时向郑尔庄发起了攻击。八连为接应七连，死死咬住敌人不放，他们接连打退敌人几次进攻。张树元身先士卒，率先和敌人肉搏，最后身受重伤数处，子弹打光了，敌人叫喊要活捉，他用剩下的最后一粒子弹，

对准自己的头部，在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倒下，八连伤亡惨重，最后能战斗的只剩下连指导员一个人，他一会儿在这发射机枪，一会儿在那投手榴弹，始终没有离开阵地，直到残暴的敌人放起大火烧了阵地。除此，在附近另外一块阵地上仗打的也很苦，这就是和我营相距不远的王来滩，由十一旅一团阻击敌骑兵十九团。接火后，一团过早撤离阵地，致使我营七、八连腹背受敌。我团其它连队赶到。从正面堵击尾追之敌，几经苦战，才把敌人压住。黄昏敌人怕我们夜战，这才撤出战斗。

这次战斗，我军伤亡很大，但敌人死伤更大。这回给骄横的马家军狠狠教训了一下，马鸿逵进了定边城时对他的部下讲话中，称我们是“钢铁的八团”。

这次战斗在战术上的最大胜利是牵制了敌人，赢得了时间。敌军主力从定边城被我们吸引过来，城里党政军机关、重要物资和多数群众于当天晚上 10 点左右突围出城，安全转移到山里。这次战斗是迫不得已的，其目的就是为保卫分区机关安全转移，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但从战略上讲，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败。敌人要进犯三边分区是无可置疑的，分区机关若事先做好撤出准备，不要固守一城一地，不怕打烂罐罐缸缸，就可以避免这次战斗。只要我军实力在，主力不暴露，我们就可以照准敌人薄弱部分，抓住战机，歼灭击破，敌人也不敢长驱直入。结果因战斗损失大，主力被敌人发现，敌人肆无忌惮很快占领了三边分区大部分，人民生命财产也遭受了重大损失。

这是一个教训。本来党中央、毛主席早有教导，要注意歼灭敌有生力量，不要固守一城一地的得失。后来，正是在我们接受了这个教训，从实践中深刻领会了这个英明的战略指导思想，我们才又很快地重振旗鼓，活跃在三边境内，不断给敌人以打击，使敌人不得安宁，更无力去配合胡宗南的进犯。我们起到了牵制敌人，支援北线我军对蒋胡匪军的反击作用。

这次战斗中，我军战士英勇奋战，许多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这种高尚精神和英雄行为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的尸骨现在还留在这块土地上，他们的精神将和这块土地永存。我在有生之年的一个愿望，就是回一次三边，在他们牺牲的地方献上一束鲜花。

马鸿逵进犯三边的

一段回忆

吴志渊



吴志渊（1910—）陕西安定（今子长）人。辅仁大学肄业。1927 年加入共青团。1928 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西北抗日救国会主任，中共镇原、定边县委书记。三边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咸阳分区行署专员。建国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副部长，中共西安市委第三副书记、书记处书记，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政协云南省第三届副主席，云南省副省长，湖南省第五、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著有《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湖南出版社 1991 年 4 月）等书。本文由杜承厚、侯占元整理。

1943 年我第二次到定边，最先任定边县县长。1944 年任定边县委书记兼县长。1945 年任三边分区专员公署专员，直至 1949 年 6 月。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蒋介石依赖帝国主义的援助，拒绝我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悍然发动全国内战。1946 年 6 月内战爆发后，我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激烈战斗，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计划，迫使他全面进攻改为重点向我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两翼的进攻。于是，1947 年春命令胡宗南进犯延安，马鸿逵进犯三边。当时，三边以王世泰、贺晋年为首的警三旅已调离三边，只留下警八团和安边起义的新十一旅一、二团，及李振海的骑兵团，兵力比较单薄。高峰任地委书记兼三边军分区政委，我是专员（战争开始后兼管民兵工作），陈思恭是

副专员，曹又参任新十一旅旅长兼三边军分区司令员，郭宝珊是副司令员兼八团团长。地委组织部长孙润华，宣传部长贾怀济，地委常委也就是以上几个人。敌人进攻之前，地委也曾多次开会讨论过三边的军事问题。但意见不一，有的主张撤退到定边南山一带打游击；有的人则主张固守。“人不离乡、枪不离人”的口号是我提出的，当时主要针对民兵工作提出的。

马鸿逵部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三边，于3月24日首先侵占了盐池县。守盐池县城的新十一旅一团有一个连打的很艰苦，最后指导员牺牲了，连长也被俘虏。敌人占了盐池之后，于4月3日进犯定边，我警八团在閤门一线与敌人接火后，战斗打得很激烈，整整一天，终因敌众我寡，战斗失利，损失惨重。进犯三边是由暂九旅旅长芦忠良指挥的。投入这次战斗的部队有七八个团，有步兵，有骑兵，还有炮兵。

閤门战斗时，我已出城。当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张仲良有两次电报指示。第一次电报叫固守定边。后又来电指示叫撤离定边。但电报发到武峁子警八团后勤部电台，因刮大风，赶4月3日转送到定边时，定边城已被敌人包围，部队来不及撤退。不过以前固守定边确是张仲良来电指示的。高峰书记按照保密制度，将电报焚烧。后来在绥德义合开会，贺老总追究高峰的责任时，高峰拿不出真凭实据，很被动。贺老总又向张仲良追问发电报的事时，张仲良反过来问我，我说：“不知道”。最后张仲良含含糊糊地回答：“没有这回事吧！”据说张仲良在解放后，又承认他发电报指示固守定边这一事实。

关于警八团在暗门战斗失利问题，当时三边地委是有责任的，情况也是很复杂的。地委在阳塘圪开会时，总结过警八团的失利教训。总之，警八团一经战败，给三边地区带来严重后果。新十一旅一团团长赵级三叛变，团政委高波被俘（后杀害在南京），不少地方干部和民兵投敌叛变，各方面遭受到很大损失，还牺牲了不少好同志。真正的叛徒也大有人在，例如定边市副市长雷龙亭就是一个。这个人很坏，叛变后给敌人说他在“驴圈”里呆了好几年（指在革命队伍里）。

警八团閤门战斗失利后，三边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都撤到吴起。不久，上级派郭炳坤任地委书记，朱敏任副书记（郭调离后，朱任书记）。绥德

义合会议以后，我又回到三边专署，一直干到 1949 年西安解放前夕才离开三边。

定边突围

牛化东

1947年3月，国民党蒋介石集中了23万兵力，向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胡宗南部15个整编旅14万人，从南线直取延安。我军经过六个昼夜顽强阻击，于3月19日主动撤出延安。宁夏马鸿逵部为配合胡宗南的进攻，也集中其主力暂九旅、一六八旅、骑兵第十旅以及几个保安团向我三边分区发动进攻。3月24日侵占盐池，4月3日向三边专署和三边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定边县城扑来。

当时，三边地方部队只有警三旅八团和1945年起义的新十一旅的两个团。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本应主动放弃县城，将部队撤到南山，以游击战争困扰入侵之敌，封锁城市，寻机歼敌。但是，由于坚持了错误的守城方针，结果导致了警八团闇门战斗失利，定边县城被迫放弃，三边地区的局势骤然恶化。

这个错误的守城方针是三边地委讨论提出的，专署、军分区和新十一旅负责同志都是同意的。当时的想法很单纯，认为延安失守了，前门闯进了虎，三边这个后门再放进了狼，党中央哪里去呢？只有新十一旅参谋长王子庄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不能守城，应把部队撤到山上去。但是他的正确意见，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关于坚守城池的方针，当时曾向联防军司令部报告过。彭总不知道，但联司有的负责同志是知道的，并同意了。后来闇门战斗失利了，三边地委书记高峰主动承担了责任。这不能全怪他，他不懂军事，正如他自己也说：“军事我不懂，要靠你们呢”。

为了坚守定边，当时决定新十一旅二团负责防守定边城，警八团和新十一旅的一团摆在城外，由三边分区副司令员郭宝珊指挥，作为机动力置。吴志渊专员先撤到南山，高峰书记坐阵定边。由于三边党政机关和新十一旅二团仍在定边，警八团和新十一旅一团总是牵挂着城内，不敢远离。敌人进犯后，警八团曾在盐池、定边之间游动，企图寻机歼敌，但未能成功，

后来回到定边城南 10 余里的閤门、彭滩一带休整。郭宝珊回到城里，我们又曾研究，机动部队最好摆在定边城东 50 里处的砖井一带，这样进可攻，退可走，比较主动，免得在定边城郊被敌人缠住。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郭宝珊决定在閤门、彭滩稍事休息，然后再走。结果迟了一步，机动部队和定边城同时被敌人团团包围。

敌人进攻那天，城头上看得清清楚楚。我担心警八团被围，当时向高峰建议，让警八团赶快撤到南山，不能守在城郊附近，免得被敌人围住。高峰同意我的意见，派高宜之出城送信，待高出城以后，警八团已经被敌军包围，无法转移。

开始，警八团打得很勇猛，击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大家信心很足，想狠狠地教训一下敌人。这个团是八路军的老部队，1946 年冬，马鸿逵骑兵十九团、廿团侵占我盐池县兴武营，骚扰我大圪塔、余庄子等地，警八团在郭宝珊指挥下，在新十一旅一团和三边骑兵团的配合下，12 月 4 日，奔袭兴武营，一举歼灭十九团团部及三个连，击毙击伤敌人 50 余名，生擒团长马德英，俘敌 130 多名，缴获战马 80 多匹，骆驼 100 多峰及大批物资。从此声威大震，被誉为“铁八团”。但是这次被数倍之敌重重包围，处境十分危险。城里为解警八团之危，曾派城防司令马万里带三个连的兵力出城侧击接应，结果被敌阻击，未能出去。我急了，向马万里发火：“要往出冲嘛！不打怎么能出去！”我向高峰请求，要亲自带部队出城支援，高峰不同意，要我指挥守城。我说：“城里有李友竹（二团团长），不怕！”高犹豫不决。我又说：“现在情况紧急，犹豫不得，几分钟就有危险。”说话中作战科长郝耀前来报告，警八团已经垮了，乱了，向南撤退了，损失惨重。

警八团战斗失利后，我们再次研究了怎样守定边城的事。这时仍未考虑撤退的问题。我以为守城是个防御战，光消耗没有补充不行，得想法子歼灭敌人，补充武器弹药。我与李友竹、高宜之等人研究，计划放一股敌人进城，然后加以歼灭，挫敌锐气，夺取武器弹药。当时拟定由李友竹指挥守城，由我和高宜之指挥歼敌。具体部署是：从西门放进一股敌人，在北大操场空旷地带加之歼灭。为了与敌拼杀，从城里老百姓家还集中了 1000

多把铁锹。正在这时，接到西北野战兵团彭总的急电，命令我们“迅速撤出，否则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这才下决心撤出定边县城。

何时突围，如何突围？经过分析，我们判断：闾门战斗结束后，敌人一定会集中兵力来攻定边县城。敌人重兵对定边县城包围后，以为我们跑不掉了；同时敌人和警八团经过一整天激战，他们需要休息吃饭，起码需要两三个小时的时间，这个空隙将是突围的最好时机。因此，我们决定当日黄昏时间突围，冲出东门，兵分两路，一路沿城南烈士塔方向经彭滩进东南山，一路经蔡马场绕道砖井撤往南山。这个判断和决定后来证明是正确的。

当晚突围时，我带特务营在前面开路，中间是机关人员，二团长李友竹负责断后。先头部队特务营的一个连，出城后在烈士塔遇到敌人的一个骑兵连，接触后就退回城里，这样把后面队伍也冲乱了。我查明情况，亲自指挥向前冲，结果也未看见敌人。部队走了 15 里，到了梁圈村时，看到城里浓烟冲天，我们知道这是李友竹在烧毁粮草库。我们在梁圈村休息了一会儿，后面的部队和机关人员都已顺利突围出来，大家这才放了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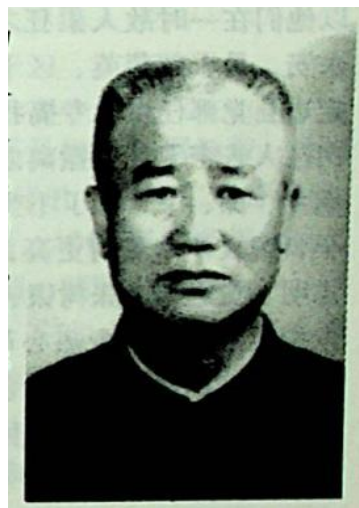
我们赶到砖井时，遇见了地委书记高峰，这时得到报告，警八团被敌人打垮了，团长王正川被俘，郭宝珊副司令员突围脱险，到了孙克崾崄，心里焦急，眼睛也失明了，我们派人将他接到崔涧。4 月 30 日，地委、军分区召开了县、团级干部紧急会议，研究了定边战斗失利后的局势，决定成立各县工作委员会，领导人民开展游击战争。

由于警八团战斗失利，新十一旅一团团长赵级三率部叛变投敌，安边县县长刘文卿（非党人士）也叛变革命。三边分区的盐池、定边、安边、靖边也相继失守，一部分区乡政权被敌摧垮，大批共产党员被捕或被迫自首；逃亡在外的地主又乘机拼凑反革命武装清乡团，向人民反攻倒算，气焰十分嚣张。此时，我们的处境相当困难，三边党政机关和新十一旅二团及警八团突围出来的人员，被迫退到吴旗县深山地区。直到 1947 年 6 月底，西北野战兵团第一次收复三边后，局势才开始好转。

战时生活回忆

顾生杰

顾生杰（1922—1997）陕西省定边县红柳沟镇郭圪劳村人。1943年参加工作，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乡文书，区委组织干事、区长、区委书记，县工商科长、统战部长等职，1953年4月任中共定边县委副书记，1957年调往榆林，负责建起了榆林火电厂、榆林农学院。后任国营新桥农场场长、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四十六团、四十五团党委书记、政委等职。1978年任吴旗县委书记。



定边县城失陷

1947年，宁夏马鸿逵部以重兵进犯三边。农历闰二月初五上午，与我驻定边县城的外围部队新十一旅一团、警三旅八团接火。城南郑大墩一带枪声大作，喊杀连天。由于一团团长赵级三指挥不力，加之部下系起义人员，战斗力不强，很快就将我方左侧阵地（干沟水坝墙）失掉，致使警八团左翼受敌。警八团将士奋力迎敌，直打到日色过午。由于敌众我寡，为保存实力，再寻战机，一团、警八团便主动撤退，进入南山。

马匪不敢追击，只好重整军容，准备在当晚围攻县城。此时，三边地委、定边县委及所属各机关尚在城内。由于地委领导和三边军分区及警八团、二团领导的有力指挥，是夜便胜利突围，进入山区。不几天，一团团长赵级山率部叛变投敌。二、警八团休整后，展开了游击战。

在暂时失利的时候

定边城失陷后，在我们干部中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思想混乱，不少意志薄弱者，对革命前途信心不足，心里或明或暗。经各级党组织的教育，绝大多数坚定了信念，但仍有个人怀疑动摇，还有一些本来就是投机革命者，所以他们在敌人猖狂之下，投敌叛变，为虎作伥。如定边县公安局局长张永安、县干部薛英、区干部苗得水等人。张永安、薛英等人投敌后在国民党定边县党部任事，专搞我党员、干部自首登记，搜查我党政军文件、物资等；向敌人告密了我未撤离之党员、干部姓名和物资存放地址。他们还为敌人组织乡、保、甲，干了不少坏事。和这些人相反，多数同志为光复县城、全国早入解放革命热情更高，如蔡廷训、杨正喜、丁子齐、郭子范、贾生财、吴志明、贾志诚、张树银、马生骥、韩月相、白生华、阎立仁、潘仁发等；群众中也涌现出不少热心革命事业的志士，如杨立枝、邵金山等，他们主动离开家乡到山区投奔革命。这些党员、干部和群众，在定边城突围战斗中和以后游击活动中，都为人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两次寻找组织

敌人进攻定边县城的那天，我正带领土改工作队在四乡（今贺圈东部）搞土改。当天早上，我们从上閤门温旺家动身到辛圈村一群众家。这时，县城西、南园子战斗已经打响，我们又向薛圪走去。到薛诚家已是半前晌，郑大墩、丁寨子、王来滩、西羊圈一带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半后晌时分，薛诚已集中了马生骥等十多人，大家又一起进了山。于是，我们同地委、县委、县政府和部队失掉了联系，单独活动了五、六天。在此期间，李贵财、王海基、张森、薛英等逃离革命阵营，叛变投敌。汤铭鉴、赵培梓、王杰、张得林、蔡廷训等十多人组成一个武工队，由蔡廷训负责，到三区的古庄畔、油房涧、白湾子一带活动。不几日，又给我们增加来三区民兵12人。

大约在古历四月间，敌人进山“清剿”。我们这支武工队再次和上级组织失掉联络。一天，武工队到三区二乡王盘山村。晚上兵痞李万山伙同徐根策动民兵逃跑投敌。在这种不知上级组织和政府的去向，又摸不清敌人的情况下，几个人都很着急。蔡廷训说：“同志们坚定起来，一定能找到我们的人，咱们向吴旗走。”路上又赶来了阎立仁。经过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到达吴旗，找到了三边专署的路思温。他告诉我说：“你们县政府可能在四区一带，三边地委在吴旗的杏柳沟，你们去找。”同时给我们发了军鞋。我们沿乱石头川北行，在吴旗杏柳沟村找到了三边地委。地委书记朱敏和专员吴志渊同志表扬了我们，并告诉我们定边县政府在定边境内的四区黄湾。两天后我们找到了县政府，真象回到了家，见到了亲人。

在敌占区活动

1948年春，组织分配我任三区区长。由于三区还是红白扯据地带，所以我们干部仍以武工队编制活动。这个武工队有我和赵学礼、王学仁、曹仁成、贾志诚、薛诚、蔡廷元、杜守义、卜成贵、马凤来等。1948年后半年，我又调任敌占区的定边县城区任区委书记，干部有陶德耀、韩贤忠、邵金山、罗光廷、丁仲贤、杨立枝、赵会华、丁俊生、高仲元、王璞、张鸿喜、黄文秀等；仍以武工队编制开展工作。我任政治指导员，陶德耀同志任队长。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特工人员打入敌区内，在伪政府、伪军内作分化瓦解工作；侦探敌情；打击伪乡、保、甲和特务组织；争取敌伪人员为我们工作。如伪乡长蔡成谋、伪保长魏邦统，就是明敌暗我。

在敌占区，敌伪乡长、保长和特务，小狗仗着大狗势。抓我方未退出去的地方干部、党员，抓我军政人员家属，搜挖我方在群众中寄存的物资，搜刮民财。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我们武工队就针锋相对开展斗争。有一次，我们在土桥子抓住了伪保长王国佐、张满成，让群众以村递送往县巧府，不料这两个家伙途中逃跑。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给王、张写了一封信，信中假称：“你们送来的敌情报人员名单收到了，做了不少工作，

望继续努力，立功赎罪。”同时将我军打胜仗的捷报也写上，派王国佐老二有意传送到伪乡政府。伪县政府发现后，说王、张是我方抓去后又放回家专为红军做工作的，一顿毒打之后，撤了二人的保长职务。还有一次，我们夜间深入到离县城二十里的王来滩村，抓住了伪保长王振山、牛润生和反革命分子王背锅。离村时，为造成敌人的混乱，我们打了四、五枪，甩了一颗手榴弹。果然城里敌人大哗，城上加岗加哨，等到天明才派出骑兵无目的的追赶我们。有时，我们还派特工人员夜间深入城郊，贴标语，散发传单，这样搞得敌乡、保人员提心吊胆，不敢死心塌地为敌效劳。开始表面应付敌人，讨好群众，有的人还给我们捎话代信报敌情，给自己修后路。

战斗中成展壮大的

定边游击队

邬怀礼

邬怀礼，定边县红柳沟人。1936年5月参加革命。历任乡赤卫队队长、区团委书记，自卫军营长，县保安团中队指导员、游击大队队长等职，参加了三边保卫战争，建国后任宁夏区园林试验场书记。



1947年4月3日，马鸿逵部侵占定边城后，定边县警卫队随同地、县党、政机关转移到东南山区。根据形势需要，县委决定将县警卫队改编成县游击中队（即一中队）。王维新任中队长，我任指导员，下设3个分队，共计60多人，由县保安科长惠锡礼直接领导和指挥。五六月间，游击队活动在二区、三区、四区和六区、七区的敌占区边缘地带。当时的主要任务：一是侦察敌情，二是主动袭击小股清乡团，三是配合政府镇压敌特分子，四是保卫后方生产。6月30日，西野第一次收复定边时，游击队前边带路进了定边城。8月中旬，西野东进围榆打援，马鸿逵部二次侵占定边，游击中队同定边县游击大队，下设十一、十三、十五、十七4个支队和1个骑兵支队，共计200余人。这时，惠锡礼已经调离，白天章任大队长，县委书记郝玉山兼任游击大队政委，我任十一支队指导员。

定边县游击大队成立后，首战柳上梁告捷，接着进行了平主、凉湾、范圈梁、李崾崄等战斗。李崾崄是遭遇战，十一支队首先与张廷芝清乡团田润的连相遇，经过激烈战斗，击溃该连，打死敌人5名，缴获子弹2000余发，在这次战斗中，游击队班长傅德清光荣牺牲。

1948年春，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到处捷报频传，我们游击队也得到迅速壮大，队员增到400余人。敌占区逐步缩小，敌人龟缩在定、安两镇，不敢轻易进山骚扰。在这种情况下，三边地委和军分区决定，将定边县游击大队的两个支队200余人充实给二团，其余部分整编为定边游击二大队，盐池成立游击一大队，靖边县成立游击三大队。定边游击二大队下设二十一、二十三、二下五3支支队和骑兵队。7月，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遵照三边边区的命令，定边游击二大队给编为四、五两个中队和一个骑兵队（后又新建一个中队）、此时，白天章调走，我接任大队长，郝玉山仍兼任政委，任翔任教导员。

这一年是游击队活跃的一年，曾和敌人交战过十多次，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两打盐场堡、上张崾崴阻击战，攻打环县敬明君等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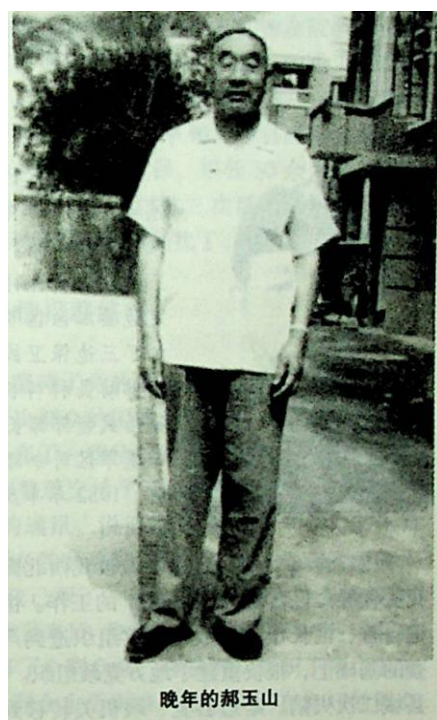
两打盐场堡。盐场堡在定边西北方向，相距30华里。当时，这里设有敌人的盐务局，并驻扎武装盐警40多人。平时，这伙盐警为非作歹，敲诈勒索群众，欺压当地盐民，不准群众向南山运盐，给我军民吃盐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经研究决定，由我带领一支40多人的小分队（其中有两个骑兵班），对盐场堡进行一次长途奔袭。同时，还组织了100多头毛驴的运盐队，准备在战斗打响后，到湖上抢运食盐。我记得那是4月的一天，我们从二区的任塬出发，赶晚上12点钟左右到了朱嘴，一点钟到了波洛池，听了地方干部李让山的汇报，了解到盐场堡的敌人毫无准备，于是我们立即出发，跑步赶到盐场堡，迅速把敌人包围在两个房子里，并向定边方向派出了警戒。战斗打响后，经过我们喊话，交待政策，敌人仍然负隅顽抗，拒不缴械投降。我立即命令战士爬上房顶，准备挖洞投弹。敌人见势不妙，才向我们乖乖地缴械投降。这次战斗前后不到一小时就胜利结束，我方无一伤亡，俘虏敌人42名，缴获步枪20多支，子弹200多发，驮盐100多驮。

时隔一月后，又由教导员任翔带领小分队，对盐场堡进行了第二次袭击。这次由于敌人事先有所觉察，当小分队赶到时，敌人已经逃走，只缴获步一支。

上张嵯岭阻击战，是在 1948 年夏天。马鸿逵部从定边出动了两个团的兵力，配合张廷芝清乡团，直扑王盘山，上张嵯岭一带，企图一举围歼我定边游击二大队。我们当时住在老虎脑北坡下的阎新庄，利用胜利地形，对敌人进行了阻击。经过英勇奋战，打死打伤敌人十多名，击退了敌人的南犯，取得了阻击战的胜利，我们牺牲了两名战士。

攻打环县敬明君。环县敬明君是一支地方土匪武装力盘，经常活动在环县、盐池、定边三县交界地带，抢掠烧杀，遭害百姓。为了保护当地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是年冬天，游击二队经过盐池县麻黄山、黄米滩一带，在阳掌攻打环县敬明君。双方接火后，经过激烈战斗，敌人溃败逃窜，活捉匪首李扬真。

1949 年，解放战争接近最后胜利，郝玉山调离，游击大队由我和任翔带领，继续活动在南山一带。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扩大游击区，巩固后方根据地，保护群众生产建设，支援人民解放战争。6 月 15 日，配合二团和靖边游击三大队，一举攻克陕北军事重镇安边，后又胜利地冲破了敌人的包围，安全撤出，8 月 2 日至 5 日，定边游击二大队，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榆林独一师、独二师和华北兵团四六团连续攻克安边、定边和盐池三县县城。随后，二大队西进宁夏，改编为宁夏独立团二营，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晚年的郝玉山

回忆二区武工队

汤铭鉴



汤铭鉴（1922—）定边县后湾子镇天池塘人。1938年2月参加革命，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陕甘宁边区盐池县副秘书长、三边专署教育科科长、定边县民众教育馆主任、定边县二区区长、区委书记兼武工队队长。参加了三边保卫战争。建国后历任宁夏省军区司令部动员科科长，银川军分区兵役科科长、青铜山武装部部长、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宁夏军区司令部征退处处长。“文革”中受迫害。1982年平反，以副师职待遇离休。

1947年6月底，定边县城被我西北野战军光复后。上级决定派高满录和我去领导二区（红柳沟一带）的工作。由于定边4月初失陷时前二区区委书记自首，区长叛变投敌。党政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我们到二区后，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很快重建了地方党政组织。8月上旬，西野东进围榆打援，定边县城二次失陷。定边县党、政机关转移到南部山区坚持斗争，二区正好处于敌我双方争夺的“扯锯”地带。为适应战争环境，便于开展工作，我们遵照县委的指示，以区、乡干部为骨干，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组成了二区武装工作队，坚持开展边沿区、敌占区的工作。武工队最多发展到近30人。20多枝枪，和敌人作战20多次，击毙、击伤、俘虏敌人40余名，经上级批准，镇压敌特反坏分子48人。为定边的解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三次深入敌占区

1947年秋冬，我们武工队配合县游击大队，三次深入敌占区，摧毁敌保甲组织30多个，镇压了一些罪大恶极的敌特反坏分子，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第一次是10月下旬。我们深入到红柳沟，镇压了敌人安插在红柳沟的特务韩XX、李三阴阳等，没收了叛徒苗得水等人的财产。第二次是11月末。在板窑、蔡圈到沙场东部一带，逮捕了反动地主、敌保长赵文翰、赵六等人，没收了一些地主特务坏分子的财产。第三次在12月下旬。在县游击大队的配合下，深入到敌占区的原二区所属四、五乡，将敌保、甲长30余人全部押到山区的冯地坑，进行了短期教育后放了回去。经过这三次活动，加上冬季李崐岭战斗和沙涧追击战，敌人再也不敢轻易到二区骚扰了。

二、三条情报联络线

当年，虽然环境险恶，我们仍然坚持了党的群众路线方针，积极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解决群众的困难，深受群众的拥护。沙涧追击战后，敌人在陡沟子的山沟里丢弃了一些枪枝弹药，群众拾到后藏了起来，等到我们在张崐岭开会一回来休整就交给了我们。曾记当时《三边报》上登载了《一枝枪和三颗手榴弹》的通讯，说得就是这件事。1948年3月间，我和老郑到大巨滩工作，准备到老魏家落脚，到门口时，听到屋里有人说话，正议论如何渡荒的事。此时，夜已深了，有人说回家休息，老魏却说：“别忙，今晚南风刮得紧，武工队可能要来！”我在门外笑着喊了一声：“吾神来也！”说笑了一会儿，我们就乘机开了个群众会，帮助群众组织了两个驮盐队，下湖驮盐到山里换粮渡荒，解决群众生活困难。由于我们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所以除普遍动员群众为我们传送敌人行动的情报外，还建立了三条专门情报联络线：一条是从宪儿庄经红柳沟到任塬；

一条是从沙场经贺圈到沙涧；一条是从定边城内经蔡圈到郭圪崂。这样，县城和二区一带敌人一有行动，我们很快就知道了。

三、政策攻心化敌为友

为了瓦解敌人，“化敌为友”或为我们工作，我们还十分注意做敌特人员家属的工作，利用政策攻心把敌特人员及其家属严格区分开来。有一次，我们到大沟门老石家听闲，发现这家已三天没揭锅了，孩子饿得气息奄奄，媳妇坐在灶头哭泣，老石在外边跑了两天没借回一粒粮食。我们当即给开了个条子。让他到板窑赵六家（此处存我们十石义仓粮）取回3斗糜子，救活一家人性命。老石十分感谢，表示保证设法把清乡团当兵的儿子找回来。不久，老石的儿子就成了我们在清乡团里的一个地下“关系”。由于我们重视做敌特人员家属的工作，不少敌特人员的家属都能为我们工作。有一次，我们黎明时赶到板窑西庄，准备开群众会。这时，东庄的曹二（其弟弟在清乡团当兵）担着个送饭罐子急急跑来，说清乡团先头一个班已到东庄，大部队随后就到。我们得到这个情报后，立即离开板窑，做好了应敌的准备。

四、四个战例

从1947年冬到1948年底，我们二区武工队配合县游击大队，或者单独行动，积极寻找战机，打击敌人，大小战斗进行了20多次。这里谈四个战例；

（一）沙涧追击战。这次战斗是以县游击大队为主，二区武工队配合进行的。1947年12月，天寒地冻，大雪封山，清乡团两个中队不断到板窑、蔡圈、黄沙窝一带抓丁抢粮，坑害乡民。地方反动头子苏汉山还跑到红柳沟的贺圈一带来抓兵派款。根据敌人的活动规律，我们研究了一个诱敌深

入的作战方案。县游击大队集中隐蔽在任塬、董涧、郑家沟一带，二区武工队虚张声势在沙涧召开群众大会，没收敌保长高凌云的家产，分田分地，闹得热火朝天，一直闹腾了两天。第三天拂晓，敌人果然来了，妄图将我二区武工队吃掉。结果闹了个狗逮尿泡一空喜欢。敌人很狡猾，在沙涧扑空后，不敢冒进派了一个小分队向董涧方向探索前进。县游击大队的骑兵迂回到滩地区，准备包围敌军。谁知敌人一触即溃，仓惶逃窜。我军全力猛追，直追了 20 多里，击毙、击伤、俘虏敌人 20 多名。

（二）夜袭定边城。这次行动是二区武工队单独进行的，1948 年春，我们从县委、县政府驻地张崾崴休整回来后，就对定边城周围的敌情进行了侦察。然后确定以南城敌乡长张世科的店和西城秦汉山店驻扎的马部一个连队为主要袭击目标。以镇压张世科等人。我们组织一个 12 人的小分队，于晚上 11 时左右摸进西城门外。这时向导老郑迷失了方向，怎么也摸不清到南门的道路，只好实施第二个方案，我们前进到离秦汉山店五六十米远的地方，将 9 人埋伏在后面接应，我和刘弟、郑子清 3 人摸了上去，距敌哨兵只有几米远了，敌哨兵发现了我们，喊叫“干啥的？”刘弟随即甩出一颗手榴弹，两个哨兵应声倒地，我们冲上去将枪支缴获过来。敌人闻声向店门外冲击，我们排枪齐放，手榴弹齐轰，然后从容撤退到羊圈山。事后得知，那晚敌死伤七八名，于是连日戒严，人心惶惶。对此，三边专署传令嘉奖了二区武工队。

（三）伏击中统特务景步哲。这次也是武工队单独进行的。景步哲是国民党定边县中统特务头子。一次为筹款问题向与我们有关系的敌乡长蔡成谋大发雷霆，并扬言要将蔡扣押。蔡成谋有意激将他说：“我说的你不相信，你亲自下去看看就知道了”。过了几天，景步哲通知蔡第二天和他下乡视察，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后，估计敌人赶十一、二点能到达蔡圈，再加蔡成谋一番招待，然后可能绕道黄沙窝、宪儿庄、沙场回城。于是我们决定在宪儿庄设伏。还在盐池县的双疙瘩村埋伏了一个战斗组。下午 3 时许，敌 20 多名骑兵向宪儿庄奔来，距我们还有 200 多米远时，武工队一个新队员由于精神紧张，不由自主地放了一枪，过早地暴露了目标。我看不能达到诱敌进庄的目的，当机立断，令全队打排枪，敌人顿时乱了阵脚，

加上庄里群众呐喊助威，怕得敌人向城里狼狈逃命。这次虽然只伤敌一人一马，但蔡成谋却在城里站住了脚，更有理由抗粮抗款，同时景步哲再也不敢出城了。

（四）夜袭蔡圈。这次还是二区武工队单独进行的。景步哲在宪儿庄吃了一次亏后，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但仍贼心不死。经苦心策划，于 1948 年 8 月 8 日，向驻定边马鸿逵借了一个骑兵连，准备在蔡圈安个据点。我们掌握了这一情况后，作了赶走他的部署。一天晚上，我领七八个武工队队员，打算到蔡圈具体商议应敌之策。晚十点多，我们到蔡圈东边的麻林里，就听到庄里人喊马嘶，鸡叫狗咬，敌人已经来了。于是，我们当即决定进行袭击。此时，雷鸣电闪，大雨倾盆，我们乘机摸进庄，将队员隐蔽在蔡德山场院矮墙下。我和张云山摸到蔡德山的大门口，借闪电发现牛棚里有马，就往马群里甩了一个手榴弹，然后退回阵地待敌行动。敌人一下乱了营，来蔡圈还没吃上一口饭，就慌慌忙忙冒雨跑了出来。我们一阵猛打，敌人哭爹叫娘，仓惶逃窜。自此，景步哲设据点的如意算盘被我们彻底砸烂了。

在武工队的日子里

朱 瑜

1947 蒋介石在“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破产后，又纠集胡宗南、马鸿逵、马步芳部和榆林邓宝珊部共 34 个旅（师）、约 23 万余人马，从南、西、北三个方面，向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发动了重点进攻”。3 月 18 上午，党中央和毛主席主动撤离了延安，19 日胡宗南部占领了延安这座“空城”为策应胡宗南从南线的进攻，驻宁夏马鸿逵集结 5 个步兵团、2 个骑兵团、1 个炮兵营，约 1.6 万多兵力，从西线进攻三边地区。3 月 24 日侵占了盐池县城，4 月 3 日三边分区所在地定边城失陷。当时我在定边完小任教。

定边失陷之前学校已转移到县城东南 90 里地的孙克崾崴。定边失陷后的第一天深夜，县委副书记杨正喜等领导也赶到孙克崾崴，主持召开了会议。会议商定了条办法：一是由我、阎立仁等几个男教员带领一些年龄较大而又自愿参加武工队的男学生，随同杨正喜深入山区，开展对敌斗争；二是教导主任桑柯和部分年龄较小的干部子女，由校长汤中甫带队转移到吴旗；三是年龄较小而家又在山区的学生，一律疏散回家。会后的第二天，学校就按照上述办法分头行动。



参加县武工队的教员和学生绝大多数都表现得很坚强。只有教员王学智对革命悲观失望，思想动摇，尽管大家对他进行了必要的批评教育，但王还是在行军途中逃跑，投敌叛变，后被我人民政府捉获镇压。

县委和县政府对武工队的工作很重视。县委书记郝玉山、副书记杨正喜、县长丁子齐等领导都亲自听取汇报，布置任务，并先后指派宣传队长陈志才、保安科长冯茂、委组织部长蔡廷训等带领武工队深入各地活动。当时，武工队的任务是：动员军粮、军鞋；侦察敌情和在群众中布置瞭望哨；写标语，发传单；组织和帮助群众坚壁清野与开展生产活动。活动的方法是：以分散为主，集中为辅，分散与集中相结合。平时大多是三五人组成战斗小组，有时也由 10 多人组成小分队，机动灵活地开展活动，做到：“行无定时，衣无定形，食无定量，宿无定点，枪不离身，睡不解衣”。既是工作员，又是战斗员。虽然生活异常艰苦，但是每个武工队员精神都非常饱满，斗志十分高昂。

4 月下旬，陈志才带领我和高生贵、霍仲廉，前往四区兔儿窝子一带活动。进村后，我们立即派出一名贫农积极分子，去侦察敌情。白天，我们帮助群众生产，晚上召开群众会，向群众作宣传，动员军粮、军鞋，会后，又到农民家中进行个别访问。一天，约半夜时分，我们正准备休息，派出侦察敌情的人赶回来报告，说清乡团有 100 余人正在距兔儿窝子 30 余里一带骚扰，并有向兔儿窝子方向侵犯的迹象。我们立即把这一情况向县委写了报告，派出可靠的人送去。随后就连夜转移到 20 里外的吴新庄。到达吴新庄后由于是深夜，为了不惊动群众，我们 4 人准备在村头一孔草窑里过夜。谁知，进窑时有一个人不慎被土块拌倒，发出响声。刹时全村的狗吠声大作。有两个被惊动起来的群众来到窑口，我和霍仲廉立即向这两个群众作了解释，并对村子里的一些情况作了了解。天快亮时，那股清乡团匪徒也赶到吴新庄，但由于群众的保护，我们四人安然无恙。

5 月间，领导派我和刘生耀去新安边川一带进行活动。行至中午时，突然山面塌方，道路被堵死，无法通过，于是我俩只好爬上山去绕道而行。刘生耀是山里人，爬山下沟很利索，而我没有爬过高山，上山困难很大，不是划破鞋就是碰破脚，花了好长时间才到达目的地。我们立即找村干部

布置工作。向群众作宣传，用烟煤在墙头书写了革命标语，贴了传单。经村干部的努力，群众的紧密配合。几天内就完成了动员军粮、军草任务。

6月16日，彭德怀司令员率领西北野战兵团攻克了陇东环县县城后，即向三边挺进。定边县委、县政府及武工队、游击队，为配合西野歼灭马鸿逵部，收复定边，分头迎接大部队。我们武工队的部分同志从县境东南山区经数日急行军到达姬塬一带。这时，西野分数十路向北挺进。领导分派我给先头部队带路。时值仲夏。太阳像火球一样，烤得人汗流夹背，口干舌焦。山区饮水又很缺，战士们每到一处，都得四处找水，分着喝。虽然部队急行军，战士们又累又渴，但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当我见西野的战士都背着从蒋军那里夺来的新式武器，非常羡慕，心想如果我能有一支七九步枪就好了。于是我就大着胆子向先头部队领导提出要求，能否给我一支好枪。领导很痛快答应了给了我一支“中正”式步枪，我简直喜欢的不得了。经过几天急行军，于6月29日下午赶到土桥子村，这里已接近滩区，离县城只有40多里。

我们一进村就找到该村的地下党员、村干部王国佐（该王后叛变投敌当了伪保长），让他协助筹集粮草，动员群众为部队备水。群众一听说大部队要来，非常高兴，他们赶上牲口到十多里以外的村子驮水，全部储存在村里的水窑里，等待大部队的到来。先头部队的同志一方面派人了解敌情、察看地形，一方面为后续部队准备食宿地方。

6月30日，大部队来到土桥子。作了短暂的休息后，就向定边县城挺进。驻守县城的马鸿逵部暂九旅、保安兵团，闻风丧胆，未放一枪就夹着尾巴狼狈向西逃窜了。当天，西野第一纵队和新四旅收复了定边城。定边县委、县政府机关及武工队、游击队，也都分别从山区迁回了县城。

袭击安边战斗经过

牛化东

1949年夏季，蒋家王朝虽面临崩溃的边缘，但盘踞在三边的马鸿逵部，仍仗着人多武器精良的优势，继续为非作歹，欺压人民群众。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消灭其有生力量，迎接全国解放的即将到来，边地委决定：集中三边军分区所属步兵二团、定边游击二大队、靖边游击二大队、安边游击队和一个警卫排，共1000余人，对驻在安边城内的马部骑兵十九团（辖6个连，共1200多人）进行出其不意的袭击，力争全歼该部。

当时，敌人在三边的总兵力占绝对优势，计有骑兵十九、二十两个团，张廷芝的三个保安营，一个骑兵大队和赵级三的骑兵支队，共约3000余人。但因这些部队分驻在盐池（二十团的一个连）、定边（主力）、安边一带，兵力分散，战线过长，不易相互支援，给我军造成速战速决，突然袭击的有利时机。加之当时马鸿逵的主力部队（两个军）调往陇东，宁夏防务空虚，驻守三边之敌，终日惶惶不安，缺乏斗志，随时准备逃跑。因此，驻守安边之敌，虽与我方兵力大致相等，却经不起一击，在我军奇袭下，立即陷于混乱，溃不成军，各自向定边逃去，我军一举攻占了安边。全部战斗经过如下：

6月14日夜间，我军袭击部队奉命集结于安边南面的孤山涧一带，严密封锁消息，进行政治动员。当时指挥部对各部队的任务、到达指定地点的时间、应注意的事项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各部队按照规定，趁夜出发，分途前进，指挥部随二团行动。

拂晓前，我主力部队步兵二团进至安边南园子附近，在观察敌情、研究突破口的同时，检查了各部队的战斗准备，便立即开始攻城。战斗先从东关打响，同时从南面爬城。这时绝大部分正在熟睡的敌人，一听枪响，当即慌作一团，有的赤着膀子、有的光着屁股，丢盔弃甲，一面仓惶应战，一面往西门逃跑。我们原来也估计到敌人可能要从西门逃窜，故事先命令

回汉支队和定边游击二大队在攻城前，埋伏于城西边墙地带，以堵截敌人的退路。不料回汉支队因路线不熟，未能按时赶到预定地点，定边游击二大队虽按时赶到，终因兵力太弱，只把一些敌人杀伤，未能堵住，致使敌人幸免全歼。

这次战斗，我们缴获了敌人一部分枪弹、马匹和物资。次日，安边县政府人员都进了城。部队则分驻城内和东西关，并向定边方向派出了骑兵侦察队，城内秩序井然，军民欢庆胜利。

战斗结束后，由于我们产生的轻敌思想，对敌人作了过低的估计，认为敌人如再次向安边反扑，光弄清我方情况，研究战斗方案，调集兵力，行军赶路等等，最少也得三天时间，故未能及时撤离安边城。甚至还认为，一旦敌人早来，我们就制造战机，再狠狠地揍它一顿，然后胜利撤出。在此思想指导下，便确定在城内做三天群众工作，购买办公用品，同时让部队休息一下。



牛化东在书房

然而出乎我们预料的是马鸿逵的二儿子马敦静，接到安边被我攻克的报告后，立即命令骑十旅副旅长王伯祥率领驻定边的骑兵第二十团（欠一连，驻盐池）和自安边逃回的骑兵十九团，以及张廷芝的保安团（欠一营留驻定边）、骑兵大队和赵级三的骑兵支队，共约3000人，配备迫击炮8门，以急行军于我们进驻安边城后的第三天上午，把我们包围在城内。与此同时，

还令驻灵武的马英才（师长）带步兵一营，重迫击炮一连，乘汽车赶到安边，加强其围城兵力。敌人大喊：“打进安边城，活捉牛化东！”“剥牛皮，抽牛筋，吃牛肉。”气势汹汹，甚为嚣张，妄图一举将我歼灭。

当天，敌人一面构筑工事，一面向城内开炮轰击。在此情况下，我们的全体指战员个个沉着冷静，隐蔽在掩体里，观看敌人浪费炮弹。我们几

个指挥员都在城上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攻城部署，分析敌人行动意图，研究我们的具体对策。开始，我主张在安边再打一仗。敌人的指挥部设在西园子的树林子里，我们已经侦察得清清楚楚，我打算让李友竹带四个连守城，我带二团主力去袭击敌人的指挥部，把敌人的指挥部打掉，敌人肯定陷入一片混乱，我们就主动了。军事干部多数同意这么干，但有些同志担心这样做太冒险，三边地委也来电指示我们迅速撤离。当时，敌人的第一线兵力距城近，第二线兵力距城远，第二线兵力多于第一线兵力，且第一线光打枪炮，不向城下逼近。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判断敌人采取的是纵深包围，妄想借此逼着我们突围，以便在城外利用其骑兵的优势消灭我们。于是我们决定当天不走，并故意摆成守城架势，待把敌人的第二线兵力吸引到城下后，再寻机突围。



王金璋、牛化东在宁夏自治区政协会议上

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第二天早晨，我们还特意大开城门，让老乡们自由出入。敌人一见这个情况，就很快缩小了包围圈，并将第二线的兵力，急急忙忙地向第一线推进，他们满以为我们绝对跑不掉了。我们一见敌人果然中计，就立即研究了突围的时间、方向、道路和队形等，确定当晚一定要突围出去。根据敌人动态，我们分析敌人若在黄昏时候攻击西关，我们就在打退这次攻击之后，马上突围。如果敌人不攻西关，我们便派一个游击队出扰，然后大部队再迅速撤离。我们估计安边东南和正南方向，敌

人会部署较强的兵力，西边由于是敌人进军的来路，且城外地形平坦开阔，敌人会认为我们不敢向西突围，兵力可能较弱，遂决定了向西突围的方案。突围队形是，前边放一支勇猛部队开路，两侧放两支部队掩护，后边再放一支较强的部队殿后，堵击追兵。机关和地方政府人员都在中间。这种队形，战士们称之为“梅花阵”。同时决定大部队撤离时，城内留一个游击队和警卫排的两个战斗班，分守阵地，迷惑敌人，以掩护大部队突围，待突围成功后，再行撤退。

突围方案传达后，广大指点员积极进行准备，情绪很高，一致表示要坚决打出去，赢得最后胜利。

果然未出我们所料，天刚一黑，敌人就向西关发动了进攻，我们立即进行还击，在打垮敌人的进攻后，就准备突围。原来确定由二团三营营长刘玉珠率三营在前边开路，三营战斗力较强，刘玉珠又作战勇敢，有实战经验。不巧的是在敌人进攻西关时，刘玉珠负伤了。他正在高声喊叫指挥作战，一颗子弹从他的嘴上穿过，流血不止，幸好未伤牙齿。我让他赶快下去治伤。王世杰一见就说：“这么点伤，有什么了不起，你下来，司令员呢？”刘玉珠敷了绷带又跑到前边来了。刘玉珠负伤谁带前卫营成了问题。我就说：“刘营长负伤，前卫营还是我去吧。”刘玉珠忙说：“还是我去。”我原来想叫他去，故意激将。我说：“你去当然比我好，队伍你比较熟。”最后刘玉珠还是负伤带队打了先锋。

我们预先选择的方向，恰巧是敌人保安团防守的地段，我们的先头部队一冲，就把叛匪赵级三打伤了。敌人一听说赵级三负伤，遂不战自逃，军分区副政委孙润华率主力和安边县地方机关人员顺利地突出敌人的包围圈。

我和安边游击队，以及司令部警卫排的两个班留在最后，装作守城的样子，迷惑敌人，掩护主力突围。约定在主力撤出 30 里外，在南山边上放了堆火，我们再撤出。

我认为最后担任掩护任务的小部队，要有一个胆大的人指挥，多数人有顾虑，实际上最后突围的小部队可能最安全。我留在最后指挥掩护部队，

二团政委王世杰不同意，认为主要指挥员不宜留在最后，安边县县长刘汉鼎也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的。我说明我的想法，执意留下，刘汉鼎也不走了，我动员他先走，他说：“司令员能留下，我就不能留下？”他也想让留在最后的安边游击队员更放心一些。

在部队突围后，我们最后留下来的人集中到安边西南城墙角上。敌人仍在猛烈的射击，又是机枪，又是打炮。我以为突围部队被围住了，打算派一支小队去袭击敌人，刘汉鼎劝道：“好我的爷，你还要打，我们能出去就谢天谢地了。”实际上敌人还未察觉我军已突围，正组织兵力准备攻城。

我留在最后，把马也让给前边的同志带走了。不能留马，留下马战士就不放心，他们会想，当紧忙你骑上马跑了，不是把我们丢下了。大家都步行，同命运，共呼吸，他们的心就踏实了。

最后我们突围时，警卫连副连长杨宪带的两个警卫班在前边。杨宪原是郭炳坤司令员的警卫员，人们都呼他的小名杨双喜，身高腰粗，作战非常勇敢，一个人吃双份口粮。出城后到南园子一户姓张的人家，突然发现敌人，敌人问口令，杨宪机智的答道：“自己人。”一边答一边直往前冲，我对杨宪说：“不要先开枪，准备好手榴弹，到敌人跟前一顿手榴弹，乘敌混乱时就冲过去！”结果敌人看见我们直往前冲，吓得上马就跑了，马鞍子丢下满院子，原来是敌人的一个骑兵连。敌人慌忙逃窜之中，丢下两匹马，有一匹好马，我让刘汉鼎县长骑上走。他的行动不便，跑不动，两个战士还搀扶着他。他不骑，我说：“你走不动，你不骑还得两个人照顾你。”刘这才上了马。

走出三几十里，到了一个村庄，这才松了一口气。在老乡家喝了一顿开水。老乡非常热情，问有没有伤员，要不要担架和向导。

安边突围，我们作了充分的准备，为防意外，把电台的机要密码都烧了。因为烧了密码，就和地委失去了联络，三边地委十分担心。我们撤到崔涧，派人到吴旗送信，地委朱敏书记亲自来到崔涧慰问。由于部队和安边县政府工作人员都安全撤出，连伤员也平安撤出，大家都很高兴。只有

一位医生高霁和两个护士，因驮药品器械的骡子跌到沟里，被敌俘去。还有一头驮炮的骡子，受惊后掉头向城里跑去，用枪也没打中，人们开玩笑说：“一头骡子叛变了。”

收回教地的一点回忆

李维钧



李维钧（1908—1990）原名李国铨，陕西延川人。1927 年入党。历任陕北游击队副班长、中队长，山西游击营政治指导员，清涧二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延水县革命委员会教育部长，安边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盐池县委书记，西北野战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甘肃省张掖、天水行署专员，新疆伊犁区委组织部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1945 年，驻安边堡国民党军十一旅一团，在中共地下党员牛化东、李树林、冯世光等策划下，于 10 月 25 日举行武装起义，并在警三旅的配合下，消灭反动的史舫城第二团武装力量，建立了安边县地方民主政权。下设安边市、白泥井区、东滩区、柠条梁区、柳堡区、砖井区。我任中共安边县委书记，第一任县长是刘文卿（民主人士，后叛变），副县长有邓清辉、张文辉。第二任县委书记是王金璋。

安边是三边之一。外国洋人在白泥井、堆子梁、仓房梁、小桥畔等周围数百公里土地上设立四处比较大的教堂，传教士有法国人，有比利时人。他们以传教为名，行文化侵略的勾当。霸占了大量的土地，剥削当地农民，并在教民与非教民中间，制造矛盾，甚至挑起武斗。

安边县民主政权建立后，我们在三边地委、专员公署的领导下，开展了收回教地的斗争。一是发动群众，揭发教堂利用传教手段欺骗群众，奴役农民的罪行；二是宣布收回教堂侵占的土地，分给广大的农民群众；三

是唤醒群众，揭露为教堂服务的洋奴、恶霸地主的罪行；四是向洋人传教士，宣布我党独立自主的政策，护送他们安全出境。

1946年7月1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了关于减租和查租的指示。安边县依照租佃条例进行了退租、减租活动，特别是在县民主政府的领导下，新获得解放的农民收回了被天主教堂强占去的土地，取得可喜的成绩。

在安边县政府的两年

张文辉



张文辉（1916—）化名照明，清涧张洼人。1935年入党。曾任少共清涧县委书记，陕甘宁边区安边县副县长，中共黄龙县委书记。建国后历任甘肃武威地委副书记，甘肃省农业厅林业局局长，水电部刘家峡工程局分局局长，甘肃省林业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顾问等职。

本文是作者1982年应定边县委党史办公室之约写的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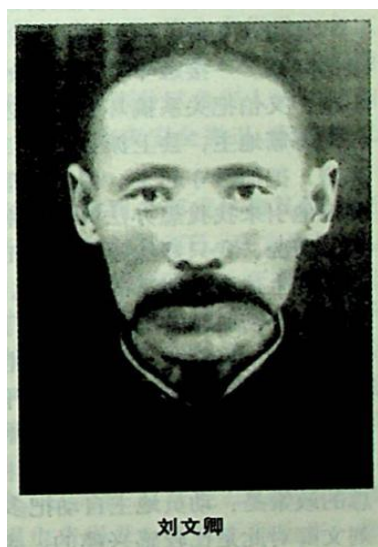
1945年冬天，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我为安边县副县长。我知道安边是陕甘宁边区刚解放的唯一的新的解放区，情况复杂，而我从未做过行政领导，文化程度又低，实不敢当此重任，要求组织上考虑调换一下。干部处长马定邦同志说：“‘三三制’政府没有共产党员骨干不行。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决定，没有把握的事，可随时请示。你任职之事西北局已定了，不好改变。”这样，我只好服从组织的决定去安边工作。

陕甘宁边区只有二三十个县，县长出任前，边府主席、副主席都要面谈。我临走前，林伯渠主席又勉励了一番。李鼎铭副主席详细介绍了安边现任县长刘文卿的情况，刘景范副主席对工作做了具体指示。1946年新年元旦，我到安边。在安边两年多的工作，有成绩，有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

安边县的政治情况非常复杂。1945 年安边解放前，由于周围都是陕甘宁边区管辖，所以边区内的一些反动分子和其他国统区的反动分子，都跑到安边来活动，这里就成了国民党反动派安在边区的一颗钉子。虽然反动派内部也有矛盾，有时还很激烈，甚至火并，但他们对付共产党员都是一致的。此外，在堆子梁、白泥井等地区，还有外国人设的天主教堂，以传教为名，行侵略的勾当。他们占有大量的土地，剥削当地农民，并利用教民在农民中制造矛盾。

1945 年 10 月，国民党第十一旅起义后，原国民党县政府的官员，除县长连友贤逃跑外，其余都被留用。刘文卿也是此时任命的县长。我们除派一位副县长外，还配了科长，原国民党县政府的科长都为副科长。好在县委、区委的干部和各区政府的干部都是从定边、靖边等老区调来的，所以工作尚能够展开。

刘文卿原是住在安边县城里的一个地主，在当地绅士中势力最大，他的家族和主要亲戚多是实权派，地地道道的地头蛇。正象李鼎铭副主席给我介绍情况时所说的“无论谁当安边的县长，得不到刘文卿的支持，就站不住脚。”我到安边后，就见他的大门上还挂着国民党甘肃省府主席朱绍良书写的匾，上写“乡里楷模”四个大字。



刘文卿

刘文卿虽然当了县长，但骨子里还是很反动的，我到职不久，召开县参议会讨论减租减息法令，其他参议员都举手赞成，唯独刘文卿不举手。我执行边区政府两位副主席的指示，对他特别尊重，主动和他商量工作，在生活上又特别优待他。但他当着我的面，多次说共产党的坏话，骂农民土改积极分子。我听到十分气愤，但又不好驳斥。解放战争开始，为保护他的安全，由县委书记王金璋同志把他陪送到三边分区后方，同吴志渊专员住在一起。不几天，他又

回到家中。马鸿逵进犯三边，我们撤退时，他利用防空之机溜走。我们派人找他，他坚决不走，还组织县城各界人士去定边欢迎敌军进城，并充当了清乡委员会主任，利用亲戚关系，拉拢我们一些不坚定的干部向敌人投降自首。西北解放时，他被我们抓住，送到延安，死在狱中。

二

对安边的工作，当时西北局有指示，总的方针是：“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但不要惹翻新十一旅。”十一旅的一些军官在地方上有相当数量的土地，靠士兵和农民耕种，他们同地、富有密切联系，群众不敢起来向地、富作斗争。若有少数群众敢于斗争，地、富、恶霸就请十一旅军官向政府说情，不答应就无理取闹。比如一个原在十一旅当过营长的退役军人叫宋子元，外号“宋阎王”，此人作恶多端，还有血债，不少群众向政府告发，县政府以法拘押，后经县委讨论决定，开了个群众大会，让群众揭批，宋本人认错，保证不再欺压群众，就不了了之。

县长刘文卿这一关最不好过，因他同当地剥削阶级和反动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接触斗争，被斗的人都托他求情。如准他的情，就是放弃原则；不准，又怕把关系搞坏，真是左右为难。例如民团队长葛希亮的父亲，是有名的恶霸地主，县上派去一个工作组，发动群众清算他的剥削帐。农会怕他 逃跑，把他看守起来。但因看管不严，他还是跑到县城找刘文卿说情。刘文卿把他引来找我想办法开脱。就在这时，农会也派代表来县政府要人。处于这种情况，我只好从两方面做工作。当然我是站在农民这一边的。

在上述多种因素的干扰下，群众发动得不充分，致使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很不彻底，各项工作受到了一定影响。但对收回教堂的土地，倒比较顺利，政府一出面，少数几个神甫就不敢反抗了。

当时全国的形势是处在和平与战争的三岔路口上，我党的方针是争取和平，准备战争。为了给解放区解决土地问题取得经验，西北局决定安边

县作为土改试点县，并派出以赵国根同志为团长的土改工作团，帮助进行土改。总的政策是：动员地主自动把多余的土地献出来，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刘文卿对此是比较感兴趣的，亲自出面说服地主献地。但这个工作还没有结束，战争就全面打起来了，因此，土地改革也就不了了之。

三

1946年冬，三边专署指示安边县扩大地方武装，成立保安大队，后又改编为保安营，直属军分区领导。扩军是按老区的办法，从“弟兄多的人家抽”，而该县弟兄多的家户又多是地、富或富裕中农，加之部队中党的力量薄弱，对新兵教育改造不够，所以战争一开始，不少人叛变或逃跑了。

1947年3月下旬，专署专员吴志渊来定边县传达地委关于保卫边区的指示，准备死守三边。安边又是三边的最后防线，因此，不但安边县城粮草不能疏散，还要把各区的粮食运往安边县城，至少要准备够2000人一个月的粮食。安边县的领导干部也分成两套班子：以县委书记王金璋为主，城防司令李明松（军分区派）、副司令王成信（兼安边保安大队长）、政治教导员杨占林、保安科长贺子明参加，组成一个死守县城的班子，以我为主，县委、县政府其他领导干部参加，组成一个在城外活动，支援城防的班子。并指定县政府司法处副处长刘汉鼎同志将在押犯人转解到定边山区。二科长呼清宁、县委秘书谢兢分别负责转移政府和党委方面的和重要物资和机要文件。

马鸿逵部队此次进犯来势迅猛，吴专员部署后没几天，还未来得及把各区粮食运往县城，战争就打响了。盐池战斗失利，定边也只坚持了一天，且我八团损失惨重。定边失守的第二天太阳快落时，通讯员送来军分区负责人杨林的亲笔信，在日记本上撕下的一片纸上用铅笔写道：“定边昨夜安全撤退，安边相机守备之。”

接到此信，王金璋同志立即主持召开了安边城防司令部成员和其他主要领导干部紧急会议，最后讨论决定：疏散粮草，倘敌兵临城下，我立即

撤退。我提出：“既不坚守，王书记有病，可早点出去。”会议结束后，王书记就走了。我又召集县上所有干部，部署连夜动员牛车、毛驴，进城疏散粮草。干部出发后，我又去和市政府的干部研究将草分给市民，藏在防空洞内。随后我到城防司令部，想了解一下情况，正遇正、副司令和教导员三人研究撤退问题，于是我们就商讨撤退的办法。我提出粮草还未疏散怎么就撤退呢？李明松说：敌人的先头部队已到砖井，离我们只有 50 华里，安边城四周平坦，若等敌人兵临城下，就撤不出去了。商量结果，在离城 20 里左右的地方派出骑兵潜伏哨，敌人一来就打枪，听枪声再撤退也来得及，若听不到枪声，赶次日拂晓一定撤出，撤出后的集合地点是城南大约 10 多里的梁庄。

当时我认为，军事上是城防司令部负责，既然定下撤出时间，粮食也只能在市民中疏散，以后再按数收回。我刚到仓库，才开始过斗，保安科长贺子明同志跑来一把拉住我说：城防司令部已撤走，你还在这里等啥？我提出粮食的事，他连说带拉，一定要我走（他是尽自己保护县上主要领导干部安全的责任）。于是，我只好把仓库再锁上，集合仅有的几个干部和警卫队战士撤走。

天还不亮，地委宣传部长贾怀济赶到了安边，他批评撤的早了，并说专区在吴旗县正动员群众来安边运粮，要我们继续进城。于是，由县政府三科王伯宜科长带领市政府干部进城疏散粮食，城防司令部派了两个排掩护并拆除城上的工事。结果，担任掩护的一个排叛变，打死了排长刘昌海（共产党员），投敌去了，另一个排追打叛军，粮食也只运出很少一部分。

敌人进了安边城，安边县绝大部分地区沦陷。白泥井区委书记贺志亮同志和县政府派去工作的四科长宋文治同志，被叛军抓去送给敌人了；宁条梁区区书牛山同志和县政府派去工作的一科长陈文敬同志，在小桥畔战斗中牺牲了；柳堡区公安助理员吴斌同志，被当地反动派抓送敌人报功了；城防司令部在城西监视敌人的一个连的几十个战士，被敌人俘虏去了；小桥畔驻的二连在调往途中到石洞沟，绑架连长刘具山、打死一个排长而后叛变了。我们转移到定边的山区打游击。原国民党县政府的官员只带出来受县长刘文卿排挤的一科科长王瑞亭，其余人有的投敌，有的溜走。

四

这次失败的教训何在？我认为主要是：在政权建设上，只强调上层统战，未重视基本群众和基层政权建设。在上层统战上，又没有按毛主席“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和“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的原则办，而是笼统地强调团结，忽视斗争。对新十一旅，只注意迁就照顾，不注意教育。特别是象赵级三那样的人，群众称之为“赵阎王”，即霸占好地，霸占好马，霸占漂亮姑娘，十一旅起义后不但由营长提升为团长，而且还入了党。结果战争开始后，这个“共产党员”便把他的入党介绍人、团政委高波同志绑架送给敌人，作为全团投敌的献礼。在组织地方武装方面，没有注意阶级成份，实际建立起来的是一支保护地富利益的武装。最糟的，是违背了毛主席关于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思想，坚持死守一城一地，以致把军队拼垮，各方面又陷入混乱，措手不及的被动境地，遭受了严重损失。

五

在定边山区的几个月活动中，我们的干部和原从老区调来的警卫队战士，绝大多数表现很好。原国民党政府的一科科长王瑞亭也和我们一直坚持到底。特别是定边五区阳山涧、胡尖山、伙草涧一带的群众，对我们亲如手足，给我们工作上极大的方便和帮助。当时，我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我们的干部和游击队战士筹备衣食用品。顺便提一下，我们在县城时，经费方面就你自己生产解决，大家都省吃俭用。有一次，邮局一位负责人带一床旧被子，要我给他换一床新的，正遇我晒被子，我当即说：“好吧，把我的换给你。”他一看我的比他的还旧，就不再要求了，再比如吃水问题，原来县委和政府几十个人设一灶，用一个毛驴在西门外驮水吃，大家一合计，一个驴的草料比两个人的费用还多，还得人饲养，于是把驴卖掉，一

个人挑水，节约二、三倍。过一段时间，有人计算专设一个人还不如买水吃开支少，又改为买水。这样又有人算帐了，我们每人都订有生产任务，干脆自己担水顶生产任务，不是更好吗？大家都同意，结果不仅不花钱，而水缸还常是满满的。可见那时的增产节约搞得多好。在山区打游击，比在城里抠得更紧，虽然有人不满意，说我是“铁公鸡，一毛不拔”。但保证了县委、县政府的正常供应。直到我调走，财政方面都没有发生大的困难。

三边岁月

李子奇



李子奇（1929—）陕西神木人。1937 年入党。曾任中共吴旗县委副书记，安边县委书记，安边县游击大队政治委员，青年团宁夏省工委书记，宁夏省教育厅副厅长，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经理，中共白银市委书记，甘肃省轻工业厅厅长，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甘肃省副省长，中共甘肃省委书记。是中共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本文节录自甘肃人民出版社《岁月——李子奇传》，有改动。

1940 年 8 月，我被组织从子长县调到三边分区的盐池县工作，任盐池县委常委，抗联会主任、青救会主任，这一年我 17 岁。

盐池县西面的宁夏是军阀马鸿逵的统治区，北面是毛乌素沙漠和残存的长城，远近盐湖密布，沙多田少，自然条件艰苦，群众生活困难。马鸿逵不时在边界制造摩擦，挑起事端，有时越界在我区抓人，抢牲畜。盐池县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结合盐池的实际，动员群众提高警惕，组织起来，打击敌人的挑衅行径，保卫边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当时，我是县上最年轻的科级干部，凭借之前在党校和青训班两次学习和在子长县一年的工作经验，我紧紧围绕县委的中心任务，积极动员广大青年、妇女投入大生产运动。县委每次组织下乡，抗联会、青救会、妇救会、工会的干部都积极参加，并通过办识字班、扫盲班，大力扫除青年、妇女文盲，组织青年、妇女和群众踊跃缴纳爱国公粮、做军鞋、动员参军。因为抗联会能给县委、政府撑上劲，所以县委、政府对抗联会的工作十分满意。

盐池的冬天，朔风如刀，飞沙似弹，冻得人手脚发麻。可是，我的革命热情如炉火般炽旺，干劲足，工作积极，有时废寝忘食；县上的领导对我也十分关心、爱护和信任，同志们也很喜欢我。大家在一起工作，亲如一家，胜似兄弟。每年春节，大部分同志都回家过年了，我家在神木，不能回去，就留守机关。平时工作忙，抽不出时间读书学习，趁大家都回家过年，机关安静，我读了许多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觉得书本上写的尽管不能生搬硬套在眼前的每件事情上，但对我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上大有裨益。

1942年春，我被调到三边地委担任抗联会、青救会主任。这一年，全党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3月，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三边地委召开了干部学习动员大会，地委书记王世泰和前任书记高峰同志都作了动员报告，全区掀起了干部学习运动。各单位认真学习文件，遵照毛主席关于整顿“三风”的要求，联系思想工作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也积极投身于整风运动，决心借此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更好地为党工作。

这年7月，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发动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肃反扩大化，采取逼供讯的办法，把大批从国统区来的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搞成国民党特务。“三边”分区也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号召一切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干部交待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的同志自己给自己扣上各种帽子。为体现政策，地委领导还请坦白的同志吃了一顿好饭，还上了酒。在整风运动中，不少同志被整成了特务、间谍、CC、复兴社、蓝衣社分子。我当时是红小鬼，无任何辫子，平安无事，还兼管了整党训练班的一些工作，把大家写的检查交待材料汇总交给地委领导。可我心里总在嘀咕：有这么多特务、间谍吗？觉得“抢救失足者”运动搞得太过了，太“左”。果然不久，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干部工作的决定》，纠正了“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做法，对搞错了的同志逐个甄别平反。

1943年冬，整风运动结束。日寇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蚕食变本加厉；蒋介石军队在与我接壤的边界屡屡制造事端，进犯边区，妄图消灭革命力量。三边的一部分干部去了抗日前线，留下来的同志因将近春节，地委、



行署再有布置新的工作任务。正遇这个“空档”，加上5年没有回家，我写了回家过年的报告，因路途遥远，腊月二十日就出发了。路上很不安全，有的地方是国民党统治区，偏僻的地方还有土匪，在我们管辖的区域也有国民党特务活动。因此，我格外小心谨慎，晚上歇在店里，也得随时留心。

总算一路平安，年三十，赶了115华里路程，上灯时分，赶到我的家乡石角塔。游子归来，山川依旧。我村头下马，手握缰绳，慢步进村，一孔孔石窑窗上闪着灯光，传出欢声笑语，偶尔，稀疏的鞭炮声划破沉静的夜空，略显节日气氛，一切熟悉而又生疏。离家5年了，我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不觉到了自家的院门。我的大大、妈妈、弟弟、妹妹，谁也未料到我会从天而降，一见面，喜不自禁，热泪盈眶。

我骑马归来，在石角塔村引起轰动，在当时人们的眼里，骑高骡子压大马归来，就是“衣锦还乡”，族里人都感到脸上有光，家族有幸。我到每家，都受到最热情的接待，说许多赞许的话，又是让吃油糕、炸麻花、酒枣，又要热浑酒、下扁食（饺子），问这问那。我也乘机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讲述全国的抗日形势、延安、三边的新鲜事和革命势力的壮大和发展。人们听得津津有味，兴高采烈，小伙子们对我又羡慕又崇拜。正月二十一，我恋恋不舍辞别了亲人和乡亲，回到“三边”。这时，地委已决定将我调到吴旗县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我未敢停歇，即赴吴旗走马上任。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之付出巨大牺牲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正当举国上下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喜悦中，满怀希望迎接和平、幸福的新生活之时，蒋介石急不可待地从峨嵋山下来，一面假惺惺地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面密令各战区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公开撕毁了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的反革命内战，以19个旅的兵力进犯陕甘宁边区。次年3月，

形势急剧变化，胡宗南纠集 16 个师进犯延安。党中央主动撤离，转战陕北。为配合胡宗南的进攻，宁夏国民党马鸿逵部队出动一万二千之众，猖狂进犯我三边分区，一时，三边地区战云密布，烽烟弥漫。在强敌压境的形势下，三边地委个别领导有轻敌思想，对敌人的实力估计不足，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未听从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迅速转移”的指示和地委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的建议，死守城市，阻敌前进，造成被动局面，给革命带来重大损失。3 月 24 日，马匪攻陷盐池，随后，安边、定边、靖边县城沦入敌手，敌人控制了广大滩区和交通要道，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只有吴旗县城和一些山区在我手中。三边自卫战遭到严重挫折，三边军民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这时的三边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革命形势异常严峻。



1947 年春天，各解放区捷报频传。6 月下旬，彭德怀司令员率西北野战军收复陇东后，挥师三边，在定边与环县交界处击溃马鸿逵 104 团。宁夏人民解放军协同作战，先后收复安边、定边、靖边、盐池，三边地委、行署、军分区机关重返定边县城。毛主席、党中央在转战陕北期间，7 月 21 日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诱敌北上，伺机开敌有生力量。随后，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撤离三边，挥师东进，围攻榆林。

西北野战军撤离三边后，马鸿逵部卷土重来，又占领了盐池、定边、安边、靖边县城，地主、恶霸及其反动势力乘机反攻倒算，叛匪、民团随

之猖厥起来，三边的自卫战呈现复杂态势。三边地委、行署、军分区机关移驻吴旗县城，吴旗县城成了三边的政治中心。然而吴旗也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北面地区已被马鸿逵占领，与宁夏和定边、安边接壤的地区，马鸿逵军队和地方叛匪不断侵扰，战事不断。

在形势最紧张的时候，我率游击队两个团的地方武装，共 100 余人，出没入于山林沟壑，与敌人巧妙周旋，密切注视敌人的动向，仔细研究敌情，寻找战机，各个击破，取得了七次局部战役的胜利，消灭了敌人的部分小股势力，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然而，敌情千变万化，战争打得很艰苦，既有胜利的喜悦，又有失利的伤痛。我们既要对付马鸿逵队伍在边界的侵扰，又要打击地方匪徒和民团的骚扰、祸害，而这部分敌人都是本地人，既十分凶恶，又很诡诈，熟悉当地情况，神出鬼没，烧杀掠夺，危害百姓，甚是残忍，他们或单独行动，或配合马鸿逵军队，与我游击队作战。我游击队须加倍警惕，慎重行动，稍有疏忽，便会吃亏。

1947 年 12 月的一晚，有群众报告：民团 30 多人，已进入我边界。当时，游击队已有多日没有参战，也是出于对民团糟蹋残害百姓的仇恨和愤怒，士气旺盛，求战心极切，队员个个要求出击，建议把敌人包围起来“吃”掉。我接受了大家的建议，心想：“我们 100 多人打他 30 多人，十拿九稳”。便下令行动。先占了一个山头，又分两路进击，形成包围之势。战斗在黎明前打响，烟雾弥漫，只听得枪声响，看不清敌人。随着黎明的亮光，浓重的雾气渐渐消散。我用望远镜一看：“不好，情况有变！”镜头里沿边界的山梁坡坨，敌人密密麻麻向前移动，有民团，也有马鸿逵的军队，后面还有大量骑兵；我又将望远镜转向左右和身后，发现也有敌人。放下望远镜，我立即命令一部分队员留下掩护撤退，随后赶来；其余队员边打边退。留下的队员立即寻找有利地形，阻击敌人；突围的队员像一支离弦的箭，猛烈冲开敌人的包围圈，我率队员迅速翻了一条沟，爬上一架山，才到我方控制的安全地带。稍歇片刻，担任掩护任务的队员也紧跟而来。

我清点人数，28 人没有回来（后来核实 27 位同志被俘，1 人牺牲）。失败，像一场恶梦，给每个队员心头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一个个垂头丧气，

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沮丧、痛苦、内疚，感到无地自容，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辜负了党组织和同志们对自己的信任，给革命带来这样重大的损失！我们认真的总结了这次吃败仗的主要原因，就是思想上轻敌、麻痹。前面打了几个胜仗，就盲目乐观，对敌人的力蜚和战争的复杂性、残酷性认识不足，缺乏周密的调查研究，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轻率地部署了这次战斗……。

1949年春天，灾难深重的中华大地，冰溶雪化，旭日高悬，春风扑面，气象万千。元旦，毛泽东为新华社亲自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元旦献辞发表。经过辽沈、淮海、平津战役，国民党军队主力被歼。威武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势不可挡。蒋家王朝气数已尽，覆灭已成定局。自1948年收复延安，西北战场转向反攻，国民党胡宗南部节节败退，我西北野战军乘胜追击，直捣其老巢，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随即，挥师西进，直逼甘、新、宁、青，榆林和平解放……

然而，三边的春天，姗姗来迟，月翳日暗，朔月凛冽，寒凝大地。1948年马鸿逵仍以优势兵力，盘踞于盐池、安边、定边、靖边县城和平滩地区，糟践百姓，杀害干部，为非作歹，三边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此情况下，三边地委、军分区决定：集中地方部队、各县游击队和警备队，攻打安边，力求全歼守敌，消灭马匪有生力量，迎接全国的解放。

此时，我担任安边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在全县人民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率领数百名县武装大队队员巧妙与敌人周旋，开展游击战争，保卫了安边广大农村革命胜利果实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并配合三边替备部队（主要是二八团）参加了攻打收复安边的战斗。

1948年6月15日临近拂晓，我一千多人兵临城下。星稀月暗，夜雾朦胧。突然，三颗信号弹腾空而升，顿时，杀声四起。驻守安边的马匪骑兵十旅马得英十九团、张廷芝保安团的两个步兵营、一个骑兵大队，共1200余人，除少数驻在城内，大部分盘踞于东关和西关。担任主攻任务的我刘玉珠二团三营，先从南门冲进城，东西关守敌从睡梦中惊醒，晕头转向，乱作一团，丢盔擐甲，只顾逃命，有的光着屁股，仓皇上马逃遁，直窜定边。

战斗结束，军民欢呼，共庆胜利。当时，在吴旗的三边地委书记朱敏在我攻占安边的当天即指令：迅速撤离安边县城。但是，部队前线主要指挥人沉醉于小胜之中，盲目乐观，轻敌麻痹，认为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地节节胜利，蒋家王朝危在旦夕，安边逃敌既已败北，再无力反攻，定边守敌自身难保，故迟迟不愿撤出安边县城。我从上次吴旗“败走麦城”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变得成熟起来，遇事沉着冷静，三思而后行。从开始进攻安边城，我就觉得应把敌人包围起来，一口一口吃掉，仅仅把敌人赶跑，占了一座空城，没有什么意义，未达到歼灭有生力量的目的。虽然全国胜利在即，但三边的形势不容乐观。敌主力既然未歼，必然纠合定边守敌卷土重来，我们应该立即撤出县城，在南山安营扎寨，等待敌人“二返长安”，寻机歼灭。可是，我是安边县委书记，只是配合作战，没有决策指挥权，就召集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开会，建立了地下联系网，部署了具体任务，要求在我军撤出安边县城后，通过秘密联系渠道，及时将敌人的活动情况送出来，我还强调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轻举妄动，要尽最大努力争取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

果然不出所料，马鸿逵和他的二儿子、宁夏“援陕兵团”司令马敦静，6月15日接到安边被我攻克的报告后，立即命令骑十旅副旅长王伯祥组织兵力，反攻安边。王伯祥率驻定边20骑兵团和从安边逃回的19骑兵团等两千余众，奔袭安边，将安边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敌人在城外高喊：“打进安边城，活捉XXX！”城内数千军民处于危急之中。

在我军政有关负责人会议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部队前线主要负责人主张死守县城，认为突围没有成功的把握，太危险，就是能成功，损失将会很大；另一部分同志则认为，突围是惟一出路，理由是：我西北野战军主力远在千里之外，不可能赶来救援，在此情况下只能选择突围，即便付出较大的代价，也能保存一部分力量；如果死守县城，不是弹尽粮绝，被困死在城里，就是敌人打进城来，两千多名指战员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于是，我和其他主张突围的同志建议：选择敌人兵力部署最薄弱的地段，在城墙下开挖地道，乘夜晚敌人不备之时，从地道突围出去。部队前线主要负责人出于无奈，接受了突围的意见，但思想上犹豫不定，顾虑

重重，迟迟不下命令，丧失了良机。敌人的子弹、炮弹暴雨般向城内倾泻，并向我方发出：

“XXX，带领你的人马投降吧！不投降死路一条。我们限你们四小时内投降；否则，攻进城去，鸡犬不留，将安边县城夷为平地，快投降吧！……”我军民干部对马匪恨之入骨，当然不会理他这一套。但敌人的攻势越来越猛烈，前沿阵地逐渐缩短，城内许多房屋被炸毁，伤亡者越来越多，情势万分急紧。在多数同志的要求下，召开部队营以上、地方警备队长以上联席会议，主张突围的同志批评了前线主要指挥人接连失误。突围呼声十分强烈，一致同意，当晚突围，并部署了行动计划：迅速在西门附近的城墙下挖通出城地道，天黑后，通过地道在西城外集结，由一支强有力的部队在敌人的防线上猛烈冲开一个缺口，左右两支队伍掩护主力撤退，党政军机关人员和伤病员夹在中间，后面一支队伍堵截追兵，城里留下两个小分队迷惑敌人，随后撤出。

夜幕降临，一时城里城外枪声停歇，夜雾浓浓，寂然无声。我军以最快之速度在城墙挖开三个通道，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我方人员迅速通过地道。担任前锋任务的队伍，像出笼的猛虎，冲向敌人的防线，势不可挡。我率领县武装大队担任一侧掩护任务，战士们表现得特别勇敢，强大的火力将敌人压得死死的，使企图阻击我突围的马匪无还手之隙，或被击毙，或退回营地，我大队人马顺利通过。防守该段的敌保安团本害怕与我接触，一心想把我军民困死在城内，万万没有料到我会选中这一片开阔地突围，有的正在吃晚饭，有的准备睡觉。突然听到噼噼啪啪的枪声，乱作一团，瞬间，我部队从天而降，逼在眼前，敌人被吓得魂不附体，到处乱窜，哪里还敢还手？人称“赵阎王”的马鸿逵骑兵支队头目赵级三没来得及上马，就挨了两枪，多亏部属抢救得快，保住了一条小命，我方军民顺利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撤到了安边的西南梁。随即，放火三把为号，留在后面担任阻击敌追兵和留在城里迷惑敌人的两个小分队看到火光，迅速赶来，与大部队会合，突围成功，上了南山。经清点，除两名医务人员和几名担架队员在突围中失掉联系，下落不明外，其余两千多人全部脱险，没有一人伤亡。

随后，西北局、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发来贺电，对此次成功突围表示祝贺！表扬了三边地委和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在随后召开的三边地委扩大会议上，部队前线主要指挥人受到与会者的严厉批评，作了深刻的检讨。鉴于其态度较好，最终执行了地委的指示，突围成功，没有给予党纪处分。

1949年夏秋，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辉煌夺目的一页，也是中华民族最为自豪荣耀的时刻。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直捣国民党老巢南京，蒋家王朝顷刻覆灭，统治大陆22年的国民党政权寿终正寝，蒋介石逃往台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冉冉东升的旭日中诞生，巨人毛泽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宏亮声响彻寰宇。在西北，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黄罗斌独立一师，高凌云独立二师组成的北线西进兵团，从榆林直插三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马鸿逵匪帮，光复安边、定边、盐池。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下，8月26日兰州解放，9月27日银川解放，按上级决定，三边干部800多人，西进宁夏，开辟新区。

塞北原野，秋高气爽，果实累累，人欢马啸。我和战友们，怀着无限深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挥洒青春、战斗八载的三边大地，告别了我们同甘共苦度过艰难岁月的乡亲父老，满怀豪情壮志奔向黄河之滨的塞上江南——银川。

三边分区建团工作的回忆

白纪年



白纪年（1926—）陕西绥德人。1942 年入党。曾任吴旗县政府民政科科长，共青团三边地区筹委会主任、西北工委副秘书长、陕西省委书记，中共汉中地委副书记，陕西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陕西省副省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三边分区 1946 年共辖吴旗、盐池、定边、靖边、安边 5 个县。抗战期间，老的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适应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需要，按照共产国际和少共国际指示精神，改造成为青年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在陕甘宁边区主要是由青救会来担负青年工作的使命。三边分区的青年组织也是青年救国联合会。由于其组织性质的松散性和庞大性，1942 年后，青救会组织逐渐解体，青年工作干部也分散了。所以，青年工作一度比较沉闷。抗战胜利后，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青救会这样松散庞大的青年团体，既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也不能满足青年积极分子的政治要求。

1946 年 11 月初，党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接着，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常委会，决定扩大建团试点工作范围，在每个分区选择一个县进行，并且要求抽调一批年轻干部参加这一工作。这时，国民党军队开始向三边发动进攻，并先后占领了三边分区的盐池、定边。1947 年 3 月后，安边、靖边又先后被敌人占领，三边分区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建团工作无法进行。我当时在吴旗县作政务秘书兼民政科长，主要负责战争动员、征兵征粮、缝制被服和军鞋、组织随军担架与牲口运输队、战时救

护等各项战备与支前工作。1947年5月，我带领吴旗县500余人的担架队随军参加了陇东、三边和沙家店战役。随着沙家店战役的结束，我们这支担架队也完成了任务。1947年冬胜利返回吴旗，不久我被调做专属民政助理秘书。

1948年春延安收复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重建工作在陕甘宁边区全面展开。4月，三边地委决定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在三边分区开展建团工作。5月4日，三边分区经西北局批准，成立了青年团筹委会。在为筹委会选人时，地委本想在以前从事过青年工作的干部中选一个，但那些人这时年龄都较大了，不适合做青年工作。我虽然来三边分区已经快10年了，可仍然是分区机关干部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二十岁刚出头）。于是我就被任命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边分区筹委会主任，委员有：朱瑜、吴学易、海涛（分区妇联主任，负责女青年工作）、郭永诚、齐文祥（蒙古族，又叫巴彦尔）。

三边分区青年团筹委会成立后，由于当时定边、安边、靖边、盐池四县的全部或部分地方，仍被敌人占领着，建团工作不能全面进行。所以，根据地区特点和青年状况，主要有两个方面开展建团工作，一是选择分区党政机关和学校作为建团试点。基本依照中央青委建团的经验，首先召开青年工作会议，传达中央建团决议和任弼时同志的指示，建立支部，发展团员，开展文化学习、政治教育及其他团的活动。我们分别在地委机关发展8名团员，在分区专署发展6名，在三边干校发展39名，在三边文工团发展12名，建立了三边分区第一批青年团基层组织；二是在未被敌人占领的吴旗县农村开展试建工作。我当时还是吴旗土改工作组长，我们结合正在进行的土改工作和生产活动，建立团的组织。记得试点先是在吴旗县凤凰区的张家坪乡，在那里进行青年积极分子的培养，发展了一批农村先进青年入团。取得经验后又在6个乡进行，再以后就全面铺开，扩大到全县36个乡，在各乡都建立了团的组织。当时吸收青年入团的条件一般是：年龄在15岁到25岁之间，有为新民主主义奋斗到底的决心，能做群众的模范，能服从组织，过组织生活，缴纳团费等。团的主要活动是，一是配合党组织搞好土地登记和评定产量工作；二是发展生产，口号是“多打粮食、

支援前线”；三是参加文化建设，创办夜校、冬学，组织青少年开展识字、读书活动，结合文化学习，进行时事政治教育，学习新民主主义理论，四是支援前线，进行征兵动员，组织各种支前活动。再就是开展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活跃青年文化生活。

经过建团的乡村，工作有了活力，青年的政治觉悟和思想道德都有了很大提高，极大地推动了生产、支前和土地等工作。后来的实践证明，建立了团组织的村庄，青年们的向心力强了，精神面貌发生了大的改观，变工互助、文化学习等活动青年们爱参加了，青年中有“二流子”习性的人少了，家长们也高兴了，认为娃娃们变好了。村子里也讲卫生、爱干净了。一些优秀的团员，经过教育培养，成为党员发展对象，为党补充了新鲜的血液。1948年7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陕甘宁边区筹备委员会在延安成立，王治周被任命为代理主任，我作为三边分区团的筹委员会主任参加了成立大会，并选为当地边区筹委会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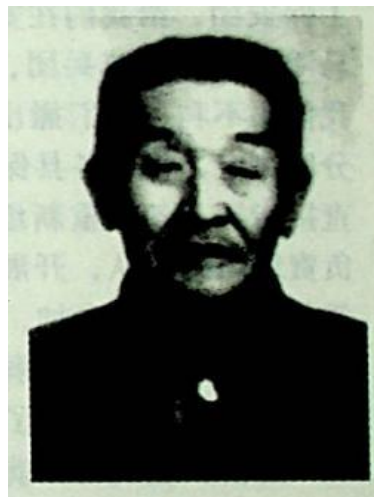
回到三边，既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也对做好青年工作充满了信心。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试建青年团的工作在各个解放区广泛地进行着。这时我作为土改工作团团长再次下乡，同时兼做面上的建团和青年工作。在土改运动中建立起来的青年团组织，带领团员青年在维持社地治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分配土地时，有的农民自私自利，农会开了几次会，都分不下去，团员青年便站出来，提出尖锐批评，坚决主张公平分配，使土地改革能够顺利进行。团组织还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发起组织互助和变工队，带领团员青年们帮助烈士军属耕种土地，带头学习识字，唱革命歌曲，活跃了革命气氛，增添了工作活力，受到各级政府和乡亲们的普遍赞赏和支持。

三边分区土地多，人口少，居住分散，和绥德、延属等地相比，文化更是落后，经济不发达，加以较早进入战争状态，所以建团工作起步晚，又因大部分地方被敌人占领，建团范围也局限在吴旗一县和分区机关及学校。定边、安边、靖边、盐池四县的建团工作，是1949年8月收复以后才开始进行的。那时，我已经离开了三边。

解放战争中的安边游击战

刘汉鼎

刘汉鼎（1913—1989）化名黑老婆。陕西清涧人。1927年入团，同年转党。历任清涧北区党委组织科长，安定县革命委员会主席，绥德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吴堡县委书记，陕甘宁边区高等人民法院典狱长、函审员、巡回法庭推事，安边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职。建国后任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省气象局副局长，省农垦局副局长等职，1982年离休。



本文节选自刘汉鼎《六十年革命生涯》。

1946年8月，我从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分配到安边县司法处工作。

安边是个新区，是在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起义后，组建起来的。县长是个民主人士，叫刘文卿，思想上十分反动，是地主阶级、土豪劣绅的代表人物。当地的反动势力也基本上没有受到打击和镇压，情况十分复杂。

1946年9、10月间，安边县征兵组建了保安大队，下设三个中队，共300多人，兵员的成份严重不纯。

三边军分区原有三个团，一团、二团、八团。其中一、二团是新编十一旅起义部队整编的。

1947年4月，宁夏马鸿逵凭借优势兵力，向三边地区发动进攻，一团又临阵叛变，结果二团、八团受到严重损失，战斗失利，士气受到很大影响。而反动分子却趁机活跃起来，像安边县长刘文卿，敌人进攻定边县城

时，他就从安边县政府逃跑了。敌人进攻安边县城时，他又勾结当地一些土豪劣绅前去迎接敌军进了城，并组织欢迎敌人的大会，在会上讲话，攻击我党、我军。说什么他当了一年多县长，还不如说是坐了一年多看守所等等（1949年9月，刘文卿被我们捕获，送到了延安，后来死在狱中）。混入保安队和武装民兵中的反动分子纷纷反水，捕杀革命干部，投降敌人。安边县白泥井区和东滩区的武装民兵，实际上掌握在反动势力手中。敌人还没有进入安边境内，他们就叛变了，由堆子梁调回来的二中队住在城外，打死了中队长和指导员后全部叛变了。将这两个区的区乡干部全部抓了起来。安边城内驻一个保安中队，4月4日县级机关撤离时，其中一个排长被打死，携械叛变了。这就造成了敌军到安边后，很快地就可以组建地方反动武装，反动头子张廷芝成立了保安团，给我们在安边开展游击战争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那时安边县驻有马鸿逵的两个骑兵团，一个保安团。安边地势平坦，骑兵活动非常方便，对我们很不利。我们撤出了安边，退到定边县五区的山区里。这时，地委和军分区决定，将原各县保安队与原二团、八团合并为“二八团”，由三边军分区直接指挥。各县重新组织游击队。三边地委任命我为中共安边县委副书记，负责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于是，我们在县警卫队的基础上，吸收一部分区、乡干部参加，组成了一支40多人的游击队。在不断的战斗中，这支游击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虽然没有自己的根据地，兵源不足，只能从俘虏中甄别补充，但到了1949年还是扩大到了100多人。

游击队组成后，就不断地向敌人发动袭击，扰乱敌人后方。小的战斗两三天就有一次。开始时，只能与敌人十几人、几十人的小股部队作战。到后来，已经能与敌人的一个营（大队）作战并取得胜利了。我们游击队成立后，和敌人进行了多次战斗。有一次，在安边县沙湾村遇到了敌人一个保安大队，共200多人，有些同志主张避开，我说要打，结果，打了一上午，也没把敌人打退。我们带的手榴弹中有一部分是从阎锡山处得来的，摔不响。中午过后，敌人逐渐逼近，我们决定突围，大部分同志冲了出去，我和其他五位同志为了掩护大家没有冲出去。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我们的手榴弹摔不响，子弹也打光了，我就说：“大家把枪背上，每人手拿一把铁锹，集中力量往外冲，能冲出去就冲出去，冲不出去就和敌人拼了。

反正宁死也不当俘虏。”我们选择了突破口，挥着铁锹向出冲了。敌人看我们来势很猛，往两旁闪了开来，我们趁机冲了出去。敌人在后面追，距离很近，我的帽子都被抓去了。幸好，指导员带着先冲出来的战士，又冲了回来，反把敌人又打垮了，还抓了几个俘虏，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这次战斗虽然胜利了，但我们也伤了一些同志，其中有个副区长。本来，在敌人数倍于我们的情况下，是不应该硬拼的。事后，三边军分区牛化东副司令员批评我说：“游击队的任务是扰乱敌人，袭击敌人，总想和敌人硬打怎么行呢？”从那以后，我也吸取了一些教训。后来，各县游击队互相配合，又进行了几次较大的战斗。

1947年6月29日，彭德怀同志率领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安边县城。7月5日，西北局负责人马文瑞同志找我谈话，任命我为安边县县长。以后安边县几次失而复得，我仍然带着游击队继续坚持战斗，一直到三边全部收复。

沈口子民兵叛变见闻

邹士杰

邹士杰（1930.2—1998.8）定边县杨影小湾村人。1945年参加革命，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定边县回区二乡文书、副乡长，区政府助理员，三边分区游击大队文书。建国后任西北军区独一师营书记员、连指导员，宁夏军区农建一师团政治处助理员，安西十二农场办公室副主任，农十一师副团长，国营黄花农场副场长、党委副书记、书记，酒泉农垦分局副局长等。

1947年春，国民党蒋介石在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破产后，又纠集胡宗南、马鸿逵、马步芳和榆林的邓宝珊部共34个师（旅）23万余人，从南、西、北三个方面向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发动了重点进攻。为策应胡宗南的南线进攻，驻宁夏马鸿逵集结1.6万兵力，从西线进攻三边分区，3月24日侵占盐池县城，4月3日，三边分区所在地定边失陷。此时，革命形势异常紧张，三边地委和专署撤到吴旗县东北山区党家畔一带坚持斗争，定边县委和县政府也撤到定边西南山区。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兵痞流氓乘机纷纷出笼活动，驻安边的土匪张廷芝网罗杜万金、赵坤、柳生禄、刘伯仁、祁仁德等地头蛇和社会渣子组成反革命武装清乡团。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到处杀人放火，抢夺掳掠，残害百姓，破坏我党政组织。在白色恐怖下，一些立场不坚定的党员、干部、民兵或逃跑回家或投敌叛变，定边县四区民兵沈口子叛变便是其中典型的事件。

定边城失陷后为壮大地方武装，进行自卫游击战争，县委决定以四区（孙克崮岭）民兵为主，组建定边县游击二中队，游击二中队由四区区委书记王禄和营长高生祥负责组建，人员主要由各乡副乡长和精干的民兵组成，共30多人。当时，区干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区长张明堂、副区长刘生耀负责留守区政府坚持工作，并将区政府迁到四乡宗兴庄；另一部分由区委书记王禄和营长高生祥带领组成游击队，并设3个小分队（也就是

班)；一分队队长马生成(原一乡副乡长)率一乡十来个民兵；二分队队长韩贤忠(原二乡副乡长)率领二乡和三、四乡十来个民兵；三分队队长范成林(原三乡副乡长)率三乡十来个人。我当时是四区的扫盲干部，因战争，连唯一的一所小学都解散了，就更谈不上扫盲，故王书记和张区长让我参加了游击队，被编入二分队里。游击队成立没几天，县上派来了一个总指挥叫杨正岐，他是陕甘宁边区赴定边土改工作团团团长，并带领两个盐务分局干部和一个小学教员，一块参加了游击队。游击队从古历三月初开始活动，十来天后，部队在张元峁村住了两天。到了第二天晚上，王书记带领我们出发向东行进。走时，谁也没有说到哪里去，还派韩贤忠带领两个队员前边到上沈口子庄去找人探路。部队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上沈口子庄北一个小山坡上，王书记命令部队暂时休息，等韩贤忠同志回来后，我再走，我因头年害过一场伤寒病，本来身体不好，又行了几十里路，所以，一休息就躺下睡着了。睡梦中，忽听枪声乱响，我睁开眼什么也看不清楚，以为是马匪或者是清乡团来了。只听见这些人一路向北而去。再找其他同志也都不见了，我误以为部队被敌人冲散了。于是，我决定到下沈口子村，去找我表叔沈养保送我回区政府。我提着枪一路小跑到下沈口子庄前一个小山丘上，碰见了四乡民兵王朝俊一个人拿着枪站在那里，一见到他，我非常高兴地问：“部队到哪里去了，刚才出了什么事？”王朝俊说：“范成林、马生成组织民兵叛变了，并把区上来的6个干部全打死了。他们现在正在庄里开会，研究投靠清乡团，叫我在这一放哨。”他还告诉我：“范成林早就密谋好了，今晚开完会叫大家回去通知家里人都向北跑，民兵明天在刘井集中，然后一起投清乡团。”我听了十分气愤，对王说：“咱们不跟他们走，你家在南山，咱们俩现在偷跑到我家，再到南山去找区政府。”王朝俊说他害怕，不敢走。这时，我站起来，提着枪，一个人跑脱向西走，准备到张元峁庄找张光明乡长回区政府。刚跑到山顶上，就碰见给区政府当炊事员的张元峁庄张万成弟兄俩，这时已过午夜了。张万成说，刚才韩贤忠在上沈口子村听见枪响就知道民兵叛变了，他就一个人跑到张元峁，现正在进庄路口上看动静。他听我讲了范成林组织叛变和我要找张乡长回区政府报告的事情后，就告诉我说：“张乡长现住在白湾子，你到村口找上韩贤忠一起找张乡长回区政府。”

我一口气跑到张元峁村口叫韩贤忠，他听清楚是我，才从路边隐蔽的地方跑出来。我们一块到白湾子，找上了张乡长后，三人赶天亮时到区政府驻地宗兴庄，这时县政府也在这里。我们把事情的经过向区长张明堂作了汇报后，张区长和县上郭维刚科长等领导安慰和表扬了我，后来又报分区记功和登报表扬。这次民兵叛变只有我一人带着武器回来，并且又在出事现场。早饭后，我和张明堂区长、刘生耀副区长和县上派的几名警卫战士又回到张元峁村，在路边找到了叛徒枪杀的王禄、高生祥、杨正岐三同志的遗体，怀着沉痛的心情掩埋了他们。到第二天中午，我们才知道区上派到游击队中另外3个同志有一个被打伤，他们在叛匪走后，也都跑回到区政府。

这次沈口子民兵叛变是由范成林、马生成等人预谋好的。后来，根据叛匪范成林的口供得知，在古二月二十九日，部队住在张元峁时，范成林、李发良、曹应科、马生成四人主谋，以部队中途休息再走时为信号，举行叛变。那天，部队在行军途中休息后，高营长说：“走”时，曹应科说：“你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妈的皮”说着，照高营长头上便是一枪。这时，范成林也开枪打死了王禄书记，李发良打死了杨正岐，士兵们乱打了一阵枪。最后，范成林吹哨集合，枪声才停止。民兵叛变后，又抢劫了边区设在定边的友爱工厂。工厂的皮鞋、毛毯、皮带、肥皂、机器大量物资等被他们抢劫一空。之后，他们就投靠了盘踞在砖井的清乡团，干了许多破坏革命、残害百姓的事情。解放后，叛匪们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判刑，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落下了千古骂名。

张廷芝落网记

朱秉才

张廷芝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胡宗南匪帮在陕北扶植的大土匪、大恶霸、反动武装力量的头子。他破坏抗日，残害百姓，罪恶累累。为了扩张实力，他和其弟张廷祥于 1941 年 9 月 4 日在安边设“鸿门宴”，把驻扎在安边国民党新十一旅连以上的军官，除旅长刘宝堂被击毙外，其余全部扣押。随即又向十一旅驻安边的城防部队发起进攻。由于十一旅地下党组织事先预料到张廷芝弟兄的阴谋，曾在赴宴前作了周密地自卫准备。在十一旅基层军官和战士们的英勇抗击下，打退了张氏匪部的进攻，保全了指挥部，还打死了张匪的骨干军官八名。张匪伤亡惨重，不得已请地方商绅出面调停，释放了被扣押的新十一旅全体军官。十一旅地下党负责人随即去定边向八路军警三旅汇报情况，请求援助。警三旅的援助部队配合十一旅反攻部队，消灭了伪保安十三团，活捉了张廷祥。张廷芝逃往内蒙给日本人充当了汉奸，被分为别动队长。1945 年日本侵略军投降了，张廷芝被编到国民党傅作义的部队任营长。后来，傅作义部队起义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六军，仍然驻在内蒙。张廷芝又编为连长，因此，更为不满。同时，三十六军从上到下的军官，大都是以前八路军的军官，而其中许多人都是张廷芝的老对手。于是，在 1950 年 3 月，张廷芝哄骗他带的那一连人逃离内蒙，回到他的家乡吴起金佛坪，呆了五、六天后，又游窜到榆林的张家畔一带胡作非为。他手下人知道上了当，便纷纷逃跑，张廷芝也从此下落不明。

1951 年春，我们骑兵一师驻扎在内蒙武川县，我当时任副师长。一天，师部收到绥远军区密电：说张廷芝带两个人化装成钉鞋匠在武川县境内的二分子村一带活动，要我们立即捕获。我们骑兵一师（当时是旅）曾经和张廷芝打过多年的仗，但我还从未见过他。当时传说他武艺高强，打手枪能百发百中，因此决不可掉以轻心，小看这三个人。我找来作战科科长（姓

闫)作了周密的布置，让他带一排人马去完成任务。闫排长带了一个精干的骑兵排，在一个深夜里前去包围了二分子村，二分子是个独庄院，院子里有两间房，张廷芝一人住一间，他带的那两个人与房东共住一间。半夜时分，我解放军战士把正在梦中的张廷芝从被窝里揪出来，他还未来得急取枪就被捆住，其他两个带的随从也同时束手被擒，缴获他们一支手枪、一支卡宾枪、一支盒子枪，张廷芝三人随即被押到武川县监狱里看管起来。

我出于好奇心，特地到监狱里看了一次张廷芝，因为我还没有见过他，不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当我看到他时，这个作恶多端，野心勃勃的土匪头子，虽然身材高大且结实，但已万念俱灰，垂头丧气地像条落水狗了。一个月后，按上级指示，把张廷芝押往呼和浩特，由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开公审会予以枪决。可是在陕北和陇东一些地方，有人谣传说，张廷芝在解放时逃到台湾；特别是在“文革”中竟有人说张廷芝不仅在台湾，而且还与国内的一些人有勾结，从事特务活动，从而制造假案。张廷芝是我布置捕获归案的，不久就在呼和浩特公审枪决了，“文革”中怎么还能出这样的笑话？因此写此文，以正视听。

后 记

编写革命回忆录《三边往事》是我们的夙愿。1982年中共定边县委党史办公室成立之初，即派人分赴全国各地，寻访走出三边或曾在三边战斗、工作过的老同志。当时正值国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新老干部交替，一大批老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他们以炽烈的余热投身到革命历史的回顾总结之中，或故地重游，与我们座谈，或接受我们的采访调研，中共定边县委党史办公室以《定边县党史资料通讯》丛刊的形式及时进行了交流，为本书的编撰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进入90年代，许多老同志都整理出版了回忆录和传记，使本书的题材和内容更加丰富翔实，引人入胜。2005年以来，在编写《中共定边历史》的过程中，我们重温这些史料，深为广大作者晚年毅力和奉献精神所感动。他们在耄耋之年，怀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一丝不苟，把自己几十年革命征途上的“亲历、亲闻”讲述出来，记录下来，形成一份份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既有对党和个人历史的回顾总结，也有对牺牲了的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既有胜利时的喜悦，也有失败时的痛苦和教训。字里行间，洋溢着艰苦奋斗、无私无畏、百折不挠的革命豪情和奋斗精神，“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是一代老共产党人向党、向人民交付的一份历史答卷，向广大青少年奉献的一片拳拳爱心。作为史志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将这些资料收集整理汇编成册，呈献史林，呈献给读者。应当说，在本书编辑过程中，老一辈革命家的感人事迹常常拨动着我们的弦，吸引和激励着我们废寝忘食的完成此书，相信这些发自作者内心的感悟也能让读者感动。

本书的编撰贯彻“亲历、亲闻、亲述”的原则，以最大程度地接近历史的本真。因此，一些非“亲历者”所述，如董必武、张浩、徐海东、阎红彦、毛泽民、刘悠安、罗梓铭、张德生、王震、白坚、王聚德、丁溪野、朱敏、柯仲平、艾青、于兰等诸多，有关三边的重要人物和事件的资料，未能收录本书，殊为遗憾，也许今后能有机会弥补这个缺憾。

由于时间有限，力量有限，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有些作者没能找到更为详尽的资料，只作简单的介绍，这也成为本书的一个遗憾。

本书的编撰得到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学会、中共党史出版社，军事出版社、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宁夏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市委史研究室以及靖边、吴旗、盐池县委史志办公室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中共榆林市委秘书长、原定边县委书记尚洪泽，新任县委书记邵胜凯欣然作序。县长杨文海，县委副书记贺子明，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张生平，以及县档案局、财政局、采购中心为本书的编辑出版给以极大的支持与关怀，陕西人民出版社刘景巍编辑审读了全书，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书所选照片多是搜集而来，在此对收藏者和拍摄者表示谢意。

通过编著《三边往事》，我们深深感到，要为读者提供一部比较有价值的读物的确不易。虽然是“编著”，其付出的时间与心智与写作一本书无异。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常常受到史料不足的困扰，虽作了许多努力，但也未尽人意。加之三边地区革命斗争历史错综复杂，每个人都很难经历他的全过程，所以作者也只能记述某个侧面，甚至在一些事件、人物、时间的记忆上还可能不够准确，希望读者谅解和校正。对书中的缺点和失误，恳请各方面批评斧正。

马骥谨记

2006年9月20日